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著
欧阳因（Annie Au-Yeung）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史学名著丛书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李 晓

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下放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1 700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本书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20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规模的运动），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本书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及充分的论据阐释了当年发生的令人心寒的历史事实。

Andre Laliberté, *China Quarterly*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为一重要事件，但却远不如红卫兵造反那么广为人知。如今，潘鸣啸终于为我们完成了一本含有确凿证据的学术论著。

Lucien Bianco, *China Perspectives*

眼前这部巨作汇集了曾经经历过那悲惨时期的各路英雄的面谈记录，对纷繁杂陈的中国资料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经过长期酝酿，最终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

Marie-Claire Bergère, *Vingtième Siècle*

ISBN 978-7-5000-8254-5

9 787500 082545

定价：45.00元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

[法]潘鸣啸(Michel Bonnin) 著
欧阳因(Annie Au-Yeung)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00-8254-5

Ⅰ.失… Ⅱ.①潘… ②欧… 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中国
Ⅳ.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889 号

中文版©香港中文大学 2009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Copyright © 2004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本书根据Éditions de l'ÉHESS 2004年出版之 *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 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 翻译而成。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李 晓
封面设计:巴蜀阳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635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30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8254-5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决不申诉
我个人的遭遇。
错过的青春，
变形的灵魂，
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来痛苦的回忆。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1980)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自　序

第一次与老知青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听他们讲述在中国农村的种种遭遇。他们那些独特的经历即刻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对中国知青很自然地有一种亲切感，可能由于自己也属于“老外老三届”，自己曾在巴黎参与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像其他同学那样，自己当年也是“左派”学生。

与他们来往初期，本人没有想到过会“使用”这些朋友之间的交谈内容。后来我将几位知青介绍给一位法国记者，他鼓励我用这些资料写本书。书出版了，是本访谈汇集，反响不错。这时我毅然决定放弃原来关于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而将上山下乡运动列为我的论文课题。马不停蹄，我开始安排进行各种可能的访谈，大量阅读文字资料，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到知青文学，从官方的政令文件到西方学者的报道评论，全面铺开。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是从零开始去认识了解知青。我真的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天能用中文向他们展示我的研究成果。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和当时的有关干部出版了不少书籍史料，在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对我很有帮助，特别是刘小萌老友的《中国知青史》和《中国知青口述史》。

今天我能将本书献给我的研究课题有着直接关联的读者，这一幸运应该归功于译者兼好友欧阳因女士的热心相帮。为求一个既忠于原文（法语）又是文字精湛易读的中译本，我们认真地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最终完成的这个版本，应该不会让人感觉到是译文。

在此，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繁体字版，感谢陆国燊先生、甘琦女士及出版社的其他人员，特别是谢伟强先生和黄丽芬女士。另外，当年的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的副主任，

我的朋友熊景明女士，她在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中给予鼎力协助，是她勉励我将手稿交托给中大出版社，我心存无限感激。

当然，我也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接受为本著作发行简体字版，尤其是郭银星女士，她在争取出版发行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决心和耐心令人万分佩服。周勍先生虽然自己不属于知青一代，但是他为国内版本竭尽全力寻找出版社，我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我将知青一代称作“失落的一代”，这一称呼可能会引致属于这一代的某些人不解、不快甚或反感。应该强调这里非但没有任何贬意，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

在本书第十四章，我解释了这个词语的由来，也阐述了与法国历史及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关系。当年海明威作为美国大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法国一边，战后定居在巴黎。一位比他年长的法国朋友跟他说：“你们这些去打过仗的年轻人，你们是失落的一代。”后来，“失落的一代”就被他用作某小说篇章的标题。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也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机会。所以也算是“失落的一代”，或者说“迷惘的一代”。但，另一方面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中获取了独一无二的经验。这一代人中不少已经颇有成就，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

这场运动无不例外地在所有的知青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然而他们的感受并不相同，这很自然。虽然对这种异乎寻常的经历产生出的反应不尽相同，但都值得去研究、去理解。就我个人来说，我最崇尚的知青精神就是舒婷在她的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因此我把这些诗句放在本书的扉页。正是这种精神令中国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展开历史的新篇章。

潘鸣啸

2009 年 5 月于巴黎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引 言 \ 1

几个词语的诠释 \ 2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 5
研究的资料来源 \ 6
直接的资料来源 \ 7
间接的资料来源 \ 15

第一部分 动机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 22

培养革命接班人 \ 22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 25
缩小“三大差别” \ 31

第二章 政治动机 \ 37

降伏红卫兵 \ 37
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 40

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 42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 \ 42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 \ 48

第二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

第四章　掌管实务的领导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1955~1966)与插曲(1966~1968) \ 63

低调的开端 \ 64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 67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 69
矛盾及保留态度 \ 73
"文化大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 76

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 78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 78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 92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发动:1973~1976 \ 98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 129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 129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 133
1978 年底~1979 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 144
1980:运动终结 \ 172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 \ 180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 185

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 20 世纪 80 年代 \ 187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 188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安顿在当地 \ 190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205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 208

第三部分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

第八章　沉重的启程 \ 212

动员工作 \ 213
选择下乡地点 \ 220
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泪的启程 \ 224

第九章　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 \ 229

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 \ 229
难以融入农村社会 \ 258
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 \ 282
个人的发展与前途问题 \ 298

第四部分　社会上的抵制

第十章　社会控制制度 \ 317

第十一章　消极抵制及其结果 \ 324

异端言行，违法乱纪及另类文化 \ 325
各自逃命及其后果 \ 343

第十二章　公开抵抗 \ 371

一个时代终结带来的震荡 \ 371
1978～1979：当权者与社会的较量 \ 375

第五部分　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第十三章　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 \ *381*

减轻城市压力问题 \ *381*
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 *392*

第十四章　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结 \ *400*

作为政治赌注的下乡运动 \ *400*
意识形态上准备达到的目的 \ *402*

结　论 \ *419*

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一场政治运动? \ *419*
国际间的追随者及同行者 \ *422*
上山下乡运动与魅力权威的局限性 \ *428*
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 \ *430*

参考文献 \ *433*

引 言

上山下乡，一场锻造新一代的运动

1968～1980年间，大约1 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下放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

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因为迫不得已必须给这一大批外来者腾出地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运动被纳入“教育革命”总政策的范畴内，这就对当时的教育质量施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连那些没有下乡的城市青年也深受该项政策之害。因此，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时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在1968年及1969年大批下了乡，他们对那特殊的一代尤其有归属感。在乡下平均待五六年，有些待了10或11年，影响要比红卫兵运动持久，这后一场运动固然是起非凡的事件，但

为时甚短，而且是前后脱节的。然而，整个西方世界都听说过红卫兵与“文化大革命”，但很少人知道派遣“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几个词语的诠释

先来介绍一些与这项政策有关的专有名词，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它的来由、目的以及形式。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是在农村打天下的。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共产党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夺得政权，而毛泽东则相反，他是依靠农民大军和“农村包围城市”①。

早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红色根据地（主要是农村）开始使用“下乡”这个词语，专指把年轻干部及知识分子短期送到农村去锻炼。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准确地说是从1955年起，中共政府就号召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下乡”或者“上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里，第一次将“下乡上山”这一双重词语运用在这个意义上。② 这个词语当时也同样指把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③ 逻辑上说，倒过来的“上山下乡”的说法只是在山区使用。④ 1965年一场发展山区运动之后，这一词语用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替代了另一个，成了泛指派遣下乡的专用词语。比如，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68年底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将两个词语掉过

---

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主要参考J.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1921～1949），1975年；以及L. Bianco,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1915～1949，1987年。

② 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7年。

③ 这种意义上的说法第一次似乎出现在刘少奇于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

④ 例如江西省，见1960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关于专门术语的问题，可以参考“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本著作：T. A. Hsia,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1963年。“下放”一词通常用于干部及知识分子，有时也包括知青，但是应该区别涉及干部及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与涉及知青的“下乡运动”。

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下乡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毛泽东的诗词经常高调颂赞崇山峻岭），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本书也是使用这个简单词语。

运动涉及的年轻人称“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因为外国没有这样一类群体，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外语译法。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 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①。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该词语出现之时，小学毕业就足以被当作“知识青年”。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这个词语主要是指在城镇念过书的农村青年，国家鼓励他们回乡。可是，从 1955 年起，特别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个称呼就扩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期望说服他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自打这个时期，就有了两类知识青年并存：“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②。本书中涉及后者较少，大部分篇幅是论及下放城镇青年的问题。

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自 1955 年一直到 1980 年。不过，我们不会详细探讨 1955 年到 1966 年这段时期，为的是将研究集中在 1968 年开始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严格地说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起。虽然这场运动部分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惯例，但无论从它的规模、形式、动员口号、还是它在毛时代晚期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一桩独特的历史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称的“正名”，因此也必须说清楚本书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及时间界定。不是现今中国政府

---

① 参看《争鸣》，1984 年 9 月，65 页，“她仍然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一旦回到北京就）没有人再称她知青了”。

② 在此需注意，该词在某种情况下指城市青年回到父母一方在农村的老家，不过更确切应该使用“投亲靠友”这一词。参见本书第八章 222 页注②。

所提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假使说“文化大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九大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①] 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表现出这个时期唯一的“革命”一面。这场“造反”虽然是由毛泽东鼓励和操纵的，但也有自发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政变或者派系斗争。但是，在诉诸武力镇压完全降伏了红卫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权，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派系斗争尖锐无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权体系内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告终，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场政变。胜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败者。他们将两个不同时期混在一起，统称“文化大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两者全都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动（当然，那是错综复杂地与法西斯式暴力纠缠成一团），另一是1969～1976年间的恐怖镇压时期，其实更应该确立为毛时代的终结期。这种词义上要花招倒真的是基于伟大舵手1974年10月发出的一条指示，认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邓小平及其他党内斗争的赢家可以在1981年对党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并将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②] 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20世纪80年代两种说法都出现在非官方的讲话及文字中。[③]最后，还要再强调一件事，就是好几位西方学者以及现居国外的老红卫兵也都拒绝接受

---

① 见林彪在该次大会上作的报告，《红旗》，1969年第5期，7页。

②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旗》1981年第13期，3～27页。

③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有一句话，谈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我所持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曾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几乎全部地从城市、从学校，走到了农村、边疆。”见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碑》，459页。

官方现在的这种断定法。[1]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希望藉着本书能让读者对下乡运动有个总的认识，为此我不仅揭示发起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我们会阐明集权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泽东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该项政策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断，那时也是经济改革的开场时期，在分析此政策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考这个时期社会与政府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西方及中国学者先后研究过该项政策的动因，他们都只停留在经济与人口层面。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就别树一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发展：建立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生送回老家，又将为数惊人的干部、专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轻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及边疆地区去。如此，中国就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拥有一种效率颇高的制度，能够控制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还可以组织一场群众运动，让城市人倒过来“下”到农村去。该项政策的全部，尤其是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措施，被描绘成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的榜样，至少可令他们深刻思考一番，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极度城市化以及缺少专门人才促进农村发展之类的问题。

那么，下乡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否与这个榜样相符呢？在提出及执行一项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经济动机和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各自的重要性在何处？缩小城乡差别，乃至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是这场运动经常用来夸耀的目的宗旨，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西

---

① 见 A. Chan 为刘国凯写的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所写的“出版者的话”，13 页，及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亦见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

方，特别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某种狂热。政府宣传中申明的这些理想事实上又如何促进这场运动呢？而运动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实现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难道领导人怀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而在公开讲话中说得含糊不清吗？

上述仅仅是将会提出的问题中的某几则。中心问题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农民、干部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劳动生活。至于其他的，那会是有关运动的终结及后果。下乡运动进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呢？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它应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一个什么位置呢？

今天可以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了。要想完成这个总结，只能求助于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下乡运动本身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形象地说，它处于社会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领导层不同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其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研究的资料来源

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运动开展的时期恰好是中国操控新闻登峰造极之时。当时，没有人讲求“客观”（包括统计数字的真实性），那是一个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

是建筑在社会政治现实的幻觉基础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贫农组成的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周围，与人民的敌人作不遗余力的斗争，大踏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在毛泽东去世后，尤其是在邓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纵的实用主义大转变之后，上述情况有所变动。跟着那几年，中国部分开放了，开始公布一些统计数字，包括某些回顾，社会学重新出现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变化的局限性很快就显现出来，很多研究课题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容许研究，但不能进入国家研究计划。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笔者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收集这类资料，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居住在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香港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

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1]。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2] 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他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做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做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笔者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 7 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相上下。[3] 因此，1978 年和 1979 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 18 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过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 3 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4]

---

① 见 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 年。Jean-Jacques Michel 是一个集体化名，而 Huang He（黄河）则是那些中国朋友创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

② 见 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 年，225 页。

③ 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广州市的。这一群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他们全都被下放到广东的几个县（其中两位以前在湖北待过两年）。他们都在农村里安家落户，只有两名被送了去农场，其中一名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离开了。除了这 11 个人，还有一位“贫下中农”青年，也是逃跑过来的。我采访过他几次。

④ 这些访谈都是在香港的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的，那里的惯例与众不同：免费借用场地，并享有选择采访对象的绝对自由。

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3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移居香港的内地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的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白鲁恂（Lucian Pye）①，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②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本书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 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乐黛云收集的资料③。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

---

①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86年，604～606页。

② 在 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年，257页，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移居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③ M. Frolic, *Mao's people*, 1980年，该书的法语版（见注②）是删节本；Liang Heng（梁恒）及 J. Shapiro（夏竹丽），*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年；Yue Daiyun（乐黛云）及 C. 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年。2000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本书，是描述改革时期中老红卫兵与知青的生成变异：Y. Jiang 及 D. Ashley, *Mao'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年。

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1] 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2]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3] 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他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4]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100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5]。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6] 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

---

①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1991年；张辛欣与桑晔，《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1986年。

② 就像杨绛及遇罗锦的作品（见文后的参考书目）。

③ 见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1983年；亦见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谈创作》，1985年。

④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该两名作家的作品。

⑤ 一位专业人士称之为“新写实主义”；见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1980年。

⑥ M. Bonn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9年；*The cas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1986年，233～238页。

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1] 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做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2]：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辛欣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他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他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辞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20世纪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3]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4]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政府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

---

① 刘心武，《这里有黄金》，1980年，49页。

② 当采访是公开进行，或者被访者是作家，而且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他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的时候，会刊登出他的真实姓名。其他情形下，为保护涉及人等的匿名身份，我们只使用代号。

③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王小波的作品。

④ 见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年，作者随后又根据小说摄制了同名电影；亦见陈冲的电影，《天浴》，1998年。

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1] 这种宽容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 1998 年上山下乡运动 30 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2]

当然，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3] 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下放知青人数等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

---

① 《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1990 年。这两本回忆文章汇编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发当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开发行仪式。同年 11 月，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敲锣打鼓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20 世纪 90 年代还出版了上海老知青金大陆的两部重要著作：《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 年；《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 年。

② 大型 20 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总编导为翟和平，原作者为晓剑和郭小东。该片集的文字本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 1999 年出版。参见该书 361 页，注⑤。

③ Ph. Joutard，见本书第 8 页引文，194 页。

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直到1978年只准许外国人查阅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广播摘要·远东》（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国每日播报》（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8至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①] 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联系。[②]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下放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③]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④]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他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

---

① 列举的期刊一览表在本书参考书目的最后。

② M. Bonnin, *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1980年，102～110页。

③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年，110～111页。

④ 见本书178页，图表1～3。

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性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份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的是，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是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阅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①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汇编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七零八碎的，是从以下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从过目），我倒获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②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

---

① 除了省志，还有市志及县志，一般都谈到下乡运动，可是只对研究某一特定地方才有用。

②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年。

月我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大革命”与1978～1979年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①

间接的资料来源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中国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大革命”的汇编里。②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1989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③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④。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⑤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⑥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

---

① 我曾经化名在另一本著作里刊登过一些照片及大字报文本。见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1980年。关于这些民办刊物以及可使用的资料来源，可参阅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C. Widor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chinois*，1978～1980年．*Revues parallèles et journaux muraux*），卷一1981年，卷二1984年。

② 张化，见前引文，第2页，注释②。

③ 潘鸣啸（Michel Bonnin），《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0》，1989年4月发表在《海南纪实》，72～78页。该杂志在其短短的生命中取得了老百姓一致好评。编辑组有多名老知青，由作家韩少功任主编。

④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何岚编，《中国知青事典》，1995年，222～223页。

⑤ M. Bonnin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Chine* 1968～1980，1988年，博士论文。

⑥ 潘鸣啸（Michel Bonnin），《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1989年。

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①。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的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知青'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②。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③ 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④。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大革命"前，另一为"文化大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

---

① 2000年7月26日与刘小萌的谈话。杜鸿林（见下一个注释）在前言里写道："就连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出有关中国知青的书"（2页），又在序言里写道："我不能再坐视，坐视那些局外人士评论我们的历史，尽管那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那些评论也不无道理。"（5页）伯恩斯坦（Bernstein前引）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了，翻译者也提出同样的想法，希望凭借外力来帮助激励亲身参加者对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见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1993年，1页。

②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93年，1、2页。

③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1992年。

④ 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1994年；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1996年。

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1]。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2]。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署、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3]。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4]，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5]。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议题和研究》(Issues and 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伯恩斯坦（Bernstein），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

---

①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年；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1998年。

② 顾洪章、胡梦洲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年；顾洪章、马克森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6年。

③ 张化是那位经过修改给书籍出版开绿灯的人。他本人是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第一份官方有关运动总结的作者，见第2页，注释②。

④ 当然，这种官方背景并不只让人得益，也可能令人惧怕太“负面”的信息会被掩盖或者被低估。

⑤ 见顾洪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2～306页。

的研究成果[1]。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史查平（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2]，但也是功不可灭的。史查平研究1955～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大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00万年轻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史查平下了很大功夫去编写澄清下放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下放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马兰安（Anne Mclaren）和高棣民（Thomas Gold）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3]。骆思典（Stanley 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4]，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

① T. Bernstein（伯恩斯坦），前引。

②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1980, 1981.

③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1979, 1～20;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1980, 755～770.

④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81.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移居到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编写过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轻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①。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20世纪60～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②。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

---

① 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年；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1992年，在此书第335页有在该研究基础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一览表。R.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年。

② 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9年，12～36页，该文后附有K. Chen及X. Cheng两位的评论。A. Walder, B. Li及D.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年，2000年，191～209页。X. Zhou, N. Tuma及P.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1994年，1997年，339～365页及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年，1998年，199～222页。

第一部分
动　机

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15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

三言两语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下乡运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①。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②，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泽东，就是他发起这场

---

① 参考本书第四章，64～77页。

② 党内“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是在1959年用这个概念来反彭德怀元帅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反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①。从 1963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1968 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

---

① 见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viance in Chinese Society”，刊登在 1977 年出版的 A. A. Wilson 编汇的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82 ~ 120 页。前两本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系统阐释 1949 年以后群众运动现象的著作。然而，本书以及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所知道的一切都与 Bennett 书中的论述相反。他认为 1949 年建立的政权是“参与者为本的民主”，而群众运动就是这种“民主”的得天独厚的方式。至于 Cell 的那本著作只给我们提供很少有关运动真实的资料。作者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与其他人绝对不同，他也相信“规范性激励”（即运动中的宣传和动员）具有神奇的经济效力。可惜，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1968 年 12 月 2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①]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③]。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泽东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④]，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轻人思想的严重危险。1964 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⑤]。”早在 1958 年他就一再肯定：“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

---

① 《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版。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又再重新刊登。

② 新华社讯，1968 年 12 月 23 日，刊于 *SWB*，1968 年 12 月 30 日。

③ 毛泽东，1963 年 5 月 9 日“对‘浙江省 7 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引用，《红旗》第 13 期，1964 年 7 月 14 日，32 页。

④ 有关毛泽东的反知识主义及他的思想中的其他民粹主义色彩，可参考 M.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第 3 章。在方苏的文章《千家驹谈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里，可以找到一些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意味深长的事例，刊于《九十年代》1994 年 4 月，90～93 页。

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464 页。

问不足的年轻人。”还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1]。”到了1965年，他索性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在可能上大学之前到农村、工厂及军队去干上几年[2]。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把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3]。这种新形势在年轻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泽东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他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4]。”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5]。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就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建立在通过考试选拔的基础上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韦伯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6]。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76～177页。

② 同上，626页。

③ 1966年有1 250万个中学生，而在1949年仅有100万个。参考《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001页。

④ 《红旗》1964年7月14日，第13期，32页。

⑤ E.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221～222页。

⑥ 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chap. 1－1，特别注意第26～27页上的图表1－2。有关“魅力领袖威权”（也叫“卡理斯玛支配”）的概念，可参考、《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①。1970 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们的歧视就更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②。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 年 12 月 22 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③。”1967 年 5 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

---

① 1963 年毛泽东曾经提出为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依赖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见《红旗》第 13 期，1964 年 7 月 14 日，31～32 页）。从 1968 年起，宣传重点就不断强调知青必须投身到“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

② G.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③ 《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社论，刊于外国广播信息服务（*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1]

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泽东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后，他对1949年到1966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17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该纪要正式撤销为止[2]。

毛泽东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1939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3]。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存在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在共享乡民们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他们与农民，特别是与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4]。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67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37～440、544～545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56页。

④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224～229页。

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1]。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2]。自1968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3]。

“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4]。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及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以及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5]。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及集体利益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吹嘘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6]。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就像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

---

① 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19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见前引M. Meisner，84页。

②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1版。

③ 例如，《人民日报》1968年9月6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11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

④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⑤ 一篇宣传文章谈及一位决心自我改造的女知青：“她决心要彻底铲除盘踞头脑的‘我’的概念”，该文登载于《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年9月号，32页。

⑥ 有关金训华，主要见《红旗》，1969年11月29日，第12期；亦可见《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第5期，10～15页。

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1]。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年轻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2]。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们必须从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3]。报章上的农民形象既崇高又浪漫：“当农民光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冒着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战胜千灾万难，最后夺取了胜利。”[4]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除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5]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1955 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6]。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

---

① 范玉松，《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抚育我们成长》，《光明日报》1970 年 7 月 10 日，第 3 版。

② 《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社论，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③ 《人民日报》1964 年 5 月 4 日，第 1 版；《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4 日社论，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④ 《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4 日社论，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⑤ 《红旗》1969 年 11 月 29 日，第 12 期，9 页。

⑥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9 月号，32～34 页。

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泽东选集》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①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②。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③。且听听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

>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④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

---

①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9 月号，32 页。语录引自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08 页。

②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4 月号，40 页。

③ M. Meisner，前引，第二与第三章。

④ 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1966 年 2 月 18 日，刊于《毛主席文选》，编者不详，87 页。通过红卫兵刊物传出的毛泽东谈话版本之间都稍微有些不同。另一个版本的日期是 1964 年 2 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年。

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①。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大革命”前，1964 年 1 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②。毛泽东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 1942 年 5 月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

>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③

1942 年，毛泽东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④。到了 1968 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著地去力图塑造⑤。我们甚至可以说，

---

① 新华社讯，1968 年 12 月 23 日，刊于 *SWB*，1968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 年 5 月号，14 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43 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08 页。

④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224～229 页。

⑤ 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①。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这么看来，发动这场运动的野心可谓不小啊！“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③。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④。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大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

---

① 这个概念是从斯大林那里借用来的；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版，25～30页。

② 青岛广播电台，1968年12月22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

③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④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20页。

"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1]。"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大革命"前那样了，而是逐渐成了单向独行。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2]。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3]。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4]。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

---

①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

② 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年轻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像的"农民"（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15～17页）。1968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642～643页。

④ 干部在这些"学校"生活的具体例子，参考杨绛，《干校六记》。

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泽东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其名曰“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①]。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②]。”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泽东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1969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泽东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泽东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

---

①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据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②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年6月号，24页。

③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1]。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泽东无需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年轻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2]。

1964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3]。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泽东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亦有称之为“绿林好汉”的。对毛泽东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泽东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泽东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泽东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大钊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4]。”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

---

① M. Meisner，前引，61～72页。

② 李泽厚，Mao as a Young Intellectual，刊于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93～126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549页。

④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146页。

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1969 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①，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②。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但是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1975 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做衣服③。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泽东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④。

---

①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 1941 年 3 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政治理想主义及艰苦奋斗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象征。

②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4 月号，40 页。

③ 《革命传统代代传》，载于《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4 日第 4 版。

④ 1967 年真正为着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的知青并不是一时糊涂搞错了，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失业问题。这些狂热的毛泽东派分子看到城市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明争暗斗，感到非常厌恶，而他们所向往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只能在农村实现（摘自 1986 年 6 月 30 日与 M. J. L. 的谈话）。下面这句话是从专门论述革命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将革命与下乡运动象征性的联系表达得一清二楚：“五千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48 页。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在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泽东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得以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第二章
政治动机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 1967 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 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①，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②。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 7 月 27 日起毛泽东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 3 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泽东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数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

---

① S. 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239 ~ 242 页，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一份中央发出的“警告”，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出红卫兵造成的动乱规模。

② J. Esmei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321 页。

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1]。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下放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古[2]。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3]。毛泽东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4]。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5]。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6]。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7] 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泽东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泽东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戍边，中

---

①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19页。

② J. Esmein，前引，322页；《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1版。

③ H. Mandarès 等，*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

④ 见本书103～110页。

⑤ 1977年在上海贴出的大字报指责张春桥利用下乡运动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他的人全赶走；见 *New York Times*，1977年1月19日，在 Bernstein 的书（前引）中也有引用，288页。

⑥ 例如，吉林电台广播，1968年9月4日，刊于 *SWB*，1968年9月12日。

⑦ 《文汇报》1968年12月21日社论，刊于 *SWB*，1968年12月24日。

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 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 年毛泽东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1954 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 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2]。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 1957 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3]。就像 1966 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4]。1968 年下半年到 1969 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5]，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 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6]。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

---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30 页。

② J. A.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63; *An Introduction*, 20 ~ 25 页。

③ 王泽厚、陈玉光，《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 4 期，14 页。

④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 页；1979 年 2 月我们在北京民主墙亲自拍摄的大字报照片。

⑤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载于 H. J. Ellison 主编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t: A Global Perspective*, 7 ~ 8 页。1969 年林彪发出的 1 号命令就是要求所有有可能加入苏联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人都必须迁出首都。

⑥ 见本书 126 页。

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①。

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②。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③；毛泽东因而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毕仰高（Lucien Bianco）指出的，毛泽东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④ 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汉娜·阿伦特

---

① “文化大革命”中，某些从农村回城“造反”的出身不好知青表示他们被下放就是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怀有不满情绪；见《支农红旗》，1968 年第 6 期，1 页。

② 新华社讯，1968 年 12 月 23 日，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③ 这场运动其实跟 1954 年的宪法是矛盾的，就像有关居住的法例，第九十条明明规定理论上保障中国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4 年版。

④ L.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ïsme, *Annales ESC*, 5, 1979 年，1 105 页。

(Hanna Arendt) 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① 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毛泽东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泽东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规模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

① H. Arendt,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27 页。

② 《人民日报》1970 年 7 月 9 日社论。

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①]。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泽东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②]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③]。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400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④]。毛泽东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

---

①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795页。

③ 毛泽东曾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写下了这条按语，这个庄子后来成了模范人民公社；见本书116～117页。

④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第2版。

或者教师[1]。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 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 3 500 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 30 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 50 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2]。1955 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 1954 年 2 月 20 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3]。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 6 月底起予以转发[4]。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

---

① 从 1963 ~ 1965 年，多篇文章都谈到有“4 000 万知青”在农村。事实上，那个时期只有几十万城市知青。其余的是把只要上过一天学的农村青年都算在内的粗略估计（见 T. Bernstein，前引，23 页；定宜庄，前引，326 页）。更有意思的是，共青团中央在 1962 年曾计算过，在农村大约有 3 000 万“知识青年”，就是说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他们约占同一代人的 1/4（见定宜庄，前引，326 页）。在参阅“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被算作“知识青年”的，但在城里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是初中毕业的。到了后期，似乎都把中学毕业当作厘定“知识青年”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国范围内 1968 年后回乡知青人数的资料，不过，在新疆，在 1968 ~ 1977 年间共有 9.8 万名回到了农村，同时期有 25.8 万名城市知青下了乡（见《新疆通志·劳动志》，70 及 72 页）。

② M. Malia,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418 页；M. McCauley,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

③ 《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 期，1 ~ 4，37 页。

④ 定宜庄，前引，43 ~ 44 页。

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 1957 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到开发的农村去，而不是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而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②。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泽东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③。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④，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⑤。“支农

---

① 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

② 见《人民日报》1964 年 5 月 4 日社论。

③ 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9～20 日；《中国农村》，前引，959 页。

④ 引自《中国农村》。

⑤ 《人民日报》1964 年 5 月 4 日社论。

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①。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②，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③。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④。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⑤。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

---

① 《河南日报》1968年8月24日，刊于*SWB*，1968年9月4日。

② 根据毛泽东在1965年的指示，农民或者知青在当地接受短期医学培训后，就兼职当医生。

③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的靶子都是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敌人”。

④ 新华社讯，1984年3月13日，刊于*FBIS*，1984年3月16日。

⑤ 《毛泽东思想万岁》，398页。

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1]。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2]，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45%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3]，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4]。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10%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5]。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6]。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

---

①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② *T. Bernstein*，前引，63～67页。

③ 汪力田、李平，《上海三十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1982年第1期，9页：知青中49万多下放到市郊，而60多万则下放去了外地。

④ 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可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4.63亩下降到1979年的1.78亩，从全国来讲，从1952年的9亩下降到1981年的4.8亩；见章长根等，《上海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载于《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32页；康久盛，《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载于《社会》1984年第四期，19页。

⑤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1967～1979年期间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区农场（由直辖市管理的国营农场）的上海青年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不会超出10%，因为那48万多下放到郊区的青年的大多数都在农场。

⑥ 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代价的问题将会在本书第188～190页专门探讨。

为支边青年。“文化大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下放了大约10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①。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②。后来，虽然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担心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戒备，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③。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④。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⑤。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下放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20世纪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⑥。从20世纪50年代初

---

① 见J. T. Dreyer,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as, *Pacific Affairs*, 48 (3), Fall 1975, p. 353 ~ 369; L.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79, p. 481 ~ 510.

②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195页。

③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in H. J. E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p. 3 – 28.

④ 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8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

⑤ 见J. T. Dreyer，前引，355页；La campagne est aussi une université（农村也是大学），《中国文学》法语版，1974年第2期，75 ~ 87页，尤应注意86页。

⑥ T. Scharping，前引，130 ~ 136页。

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轻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19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①。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②。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送回乡下。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

---

① 关于20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以及建立户口制度的问题，参见C. How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H. Y. Tien, *China's Population Struggle*; L. T. 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K. W.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T. Cheng & M.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② C. Howe，前引，49～73页。

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①。

1956 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 40 条”）②。1957 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③。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泽东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④ 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泽东，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少奇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⑤。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1964 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 500 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 600 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⑥。这个

---

① 定宜庄，前引，44～45 页。

② R. R. Bowie & J. K. Fairbank,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p. 126.

③ 见《人民日报》1957 年 8 月 22 日第 1 版。

④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187 页。

⑤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8 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⑥ 《支农红旗》1967 年第 3 期，3 页。

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1]。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下放知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2]。1968 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 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 995 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会给国家增加负担"[3]。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

---

① 《支农红旗》由一些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76 页。

② 《解放日报》1964 年 2 月 27 日，刊于 *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1966 年 3 月 31 日社论。

③ 《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版。

1949年当毛泽东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1]，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3]。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4]。

从1957年起，下放年轻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5]。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6]。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7]。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8]，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20世纪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

---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382～383页。

② 同上，393页。

③ M. Meisner，前引，65～75页。

④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得已处于无业状态的人们，其实这个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产性”的城市的强烈愿望，要将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到尽可能的低。

⑤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⑥ N. Lardy & K. Lieberthal，*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p. XXIX－XXXI.

⑦ 新华社讯，1962年4月16日，刊于*Hsinhua News Bulletin*，1962年4月16日。

⑧ 同上。

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 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①

到了 1966 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② 1966 ~ 1968 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轻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③。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 1964 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　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④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 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 10 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所以，尽管政府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 1968 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伯恩斯坦，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 1966 ~ 1970 年间

---

① 《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3 日社论，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② 《人民日报》1966 年 3 月 31 日社论。
③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 年第 2 期，53 页。
④ 《支农红旗》，1967 年第 3 期，3 页。

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1968～1970年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下放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①。史查平（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②。伯恩斯坦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③。

但是至于19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伯恩斯坦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④。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1966～19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

---

① T. Bernstein，前引，39～40页。

② T. Scharping，前引，421页。

③ T. Bernstein，前引，297～298页。

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 1981 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1]。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 1 300 万或者 1 400 万[2]。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 1 300 万和 1 700 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 900 万人[3]。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4]，那 10 年间共有1 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 600 万是知青，800 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 800 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5]。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

---

① 过去已经揭发出四人帮对在农民中招工采取放纵的态度，因而造成双向移民（农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农村）的荒谬局面，但一直没有任何准确的数字；见《辽宁日报》，1978 年 10 月 27 日，刊于 *FBIS*，1978 年 10 月 30 日；《中国青年报》，1978 年 11 月 23 日，第一版；江西广播电台，1980 年 10 月 14 日，刊于 *FBIS*，1980 年 10 月 17 日。从 1979 年起，招农民进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须严厉禁止，这样才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见《人民日报》，1979 年 6 月 17 日，第一版。

② 见《中国建设》法语版，1981 年 2 月号，25 页；冯兰瑞及赵履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Social Science in China*，1982 年第一期，126 页；冯兰瑞及赵履宽，Le Problème de l'emploi et les salaires，刊于于光远编辑的 *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第二卷，202 页；《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43 页；Zeng Qixian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中的言论，辑录于 L. Orleans，China's Urban Population：Concepts，Conglomerations，and Concerns，*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页 280。

③ 见图表 2，本书 178 页。

④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138 页。

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1966～19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①，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②。“文化大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20世纪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③。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

---

①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 *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71页。

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于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1]。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戴袜子[2]。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绝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 1968 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多年[3]。

---

①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130 ~ 131 页；《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97 页。据沈阳市劳动局的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招农民来打工的，因为正式工人把主要的劳动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了。一定得有人干活儿才能完成生产定额。2000 年 8 月 11 日与范先生的访问对谈。

②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 年第 3 期，7 ~ 38 页。

③ 在我们的许多访谈中，研究就业及老知青问题的中国专家们都肯定了这一点。文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一名干部靠“文化大革命”发了迹，就在 1970 1971 年间把自己在乡下的农民亲戚都招进城市打工，其他干部鉴于此例，也都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表示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①。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②。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大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爱默生（J. P. 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 1970 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③。布来契（M. 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 1972 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④。《中国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 1971 年 11 月 30 日发出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1971 和 1972 两年间，800 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 900 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⑤。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⑥。所

---

① 关于农民迁移进城一事，我们访问过的老知青中没有一位觉察到，Parish & Whyte 的访问对象也没有发觉；见 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21 页。

② M. Blecher, Peasant Labo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11 (8), 1983 年，734 页。

③ J. P. Emerson,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1980,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253 页。

④ *M. Blecher*，前引，734～735 页。

⑤ 《中国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 年，195～211 页。

⑥ *Blecher* 在他作实地研究的县城，很少“临时”工人真的回到乡下去。见 *Blecher*，前引，733 页。

以 1966～1976 年这 10 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 800 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 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 1970 年，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 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①。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②。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 1978 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③。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④。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 年 4 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⑤。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

---

① 见《中国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 年，195～211 页。

② 1986 年 6 月 23 日与冯兰瑞的对谈，以及 1985 年 8 月 21 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员的谈话。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作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 年 2 月 10 日，885～886 页。

④ 同上，《吉林劳动志（1991）》，72 页。

⑤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41 页。见本书，126～127 页。

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经济的领导们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

招农民进城打工因而是可以符合意识形态及经济这两种互补的动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1958 年就制订了亦工亦农政策，在 1964～1966 年间还特别加以推广，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掌管实务的领导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①。把农民招进城镇工厂干个三五七年，或者根据季节来安排，其实是很合算的。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因为农民比固定工便宜（报刊甚至报道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因为辞退了固定工，而让农民来顶替，为国家省了钱，之后还列出详细的金额数量）②；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策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③，所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完全命中了毛泽东的实际消除社会分工的宏愿。他的旨意曾在 1966 年的“五七指示”里表达过，后来在 1966 年 8 月 1 日把全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里又一再重复④。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亲毛泽东派，尤其是江青，一时间利用了临时工对不能享受固定工同样的权利而抱有的不满情绪，把决定政策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共识似乎很快就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向临时工造反派们宣布，将来“根据中国形势”，政策还会继续执行。后来在军事镇压中那些毛泽东派分子也不再理会他们了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种共识贯穿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在准许农民转迁户口上的意见不合，只不过是

---

① 这种制度不过是雇用农民临时工的方式之一；见本章 57 页注释⑤。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种招工方法，见前引 C. Howe；有关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见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The worker-peasant System，*Current Scene*，VI（5），1968 年 3 月 15 日；见 J. W. Lewis，Commerce，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gshan，刊于 J. W. Lewis 主编的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162～165 页。

②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The worker-peasant System，5 页。

③ Essai d'un nouveau système de travail，*Pékin Information*，1966 年 1 月 4～24 日，29 页。

④ 《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 日第 1 版。

⑤ 见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The worker-peasant System，7～17 页。

空想家与大管家之间取得默契过程中的暂短波折。1976 年，就有人企图去论证应当招聘年轻农民进城而不是知青，这揭示了那种共识是不稳固的，实际上存在着一股政治力量，为了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鼓吹城乡劳动力大交流。这么看来，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 1955 ~ 1966 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 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以上有关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介绍显示出那是关乎一项复杂的企图一石多鸟的计划。多方面的观察令我们对大力宣扬的发展农村目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泽东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期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回朝。1968 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强迫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这个宏愿的背后，其实是年迈的统帅拒绝承认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实权落入“修正主义”官僚派及掌管实务的领导的手中。就是为了顶住这种可能的演变，毛泽东在生前就要把中国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

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在运动的瞬息变化中关系到毛泽东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随者们的权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 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 1972 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①。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

①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IV (3), 1972 年 4 月，386 页。

第二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

第四章
掌管实务的领导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1955～1966）与插曲（1966～1968）

“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

在中国，下放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轻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①，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②。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

---

① 他们之中少数人，“土地与自由”组织的成员，拒绝做“来去如飞的宣传员”，愿意从事更深入的工作，但也只在农村多待了几年；见Wortman，前引。

② R. Wortman，前引；F. Venturi，*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 révolution。Histoire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e siècle*，t. 2，832～841页。

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1]。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彭湃[2]，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3]。尽管 1949 年以后向下放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 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 1942 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4]。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低调的开端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 1954 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 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 ~ 1956 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 8 000 人，

---

①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收录在《李大钊文集》卷一，648 ~ 652 页；M.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75 ~ 89 页。

② L. Bianco & Y. Chevrier,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503 ~ 511 页。

③ 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见 M. Meisner，前引；以及 S. Schram, *Mao Tse-toung*, 27 ~ 32 页。

④ M. Selden，前引。

比起当时被大批下放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①。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②。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③。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④。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⑤。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⑥。在那个时期，

---

① T. Scharping，前引，144页。在那两年期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省及山东省一共遣送了2 560名青年去“北大荒青年志愿垦荒队”；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30日第4版。

② 定宜庄，前引，46页；《黑龙江省志·劳动志》，127～130页。

③ 《河北省志·劳动志》，100页。

④ 见他们其中之一的Morgun的经历，载于M. McCauley，前引，174～176页。

⑤ 定宜庄，前引，60～68页。

⑥ 1959年各个青年志愿垦荒村纷纷并入国营农场系统。最为讽刺的是，到了1963～1964年间，这些农场“精简”机构时，有118名以前作为模范典型广为称颂的女垦荒队员被压缩了出来，她们当时已经与其他的垦荒队员结了婚，最后被逼退职当家属。杨华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她们在1970～1980年期间多次写信给中央，甚至写信给胡耀邦，但始终没能解决复职问题；见刘小萌，前引，782～785页。亦见李眉主编的《荒原上的足迹》，207页，这本书收集了当年北京志愿垦荒队员的回忆录及有关文章。

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 年 6 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下放青年下乡的人数：从 1955 ~ 1956 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 1958 年的 7.9 万人①。1956 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泽东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下放学校毕业生下乡到农村去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②。在毛泽东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数以百万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 1957 年底的 9 900 万上升到 1960 年底的 1.3 亿，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 3.1 千万增加到 6 千万）③。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 ~ 1965 年间有 10 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 ~ 1960 年间共有两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送回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 年 8 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

---

① T. Scharping，前引，145 页。Scharping 所引的是估计数字。根据官方资料，1957 年底有“7.9 万多”名城市青年去了农村，见张化，前引，142 页。

② T. Bernstein，前引，52 页。

③ 《统计年鉴》，90、107 页。

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1]。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轻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2]。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3]，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4]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

---

① 定宜庄，前引，185～187页。

② 《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第1版。

③ 遇罗克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名为《出身论》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产党政府鄙视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会歧视的现象。该文刊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顿时引起极大反响，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并在1970年公开处决，他当时只有28岁。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见遇罗文，《我家》，以及徐晓等，《遇罗克》。

④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

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1]。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2]，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 1960～1961 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3]。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 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 1960 年或 1961 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4]，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5]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 年底全国有两千万社会青年是当局要送去乡下的。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轻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 1958 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 1 月颁

---

① 有关下放出身不好的青年下乡遇罗克等，见定宜庄，前引，286～289 页。

② S. Rosen，前引，23 页；《文汇报》1968 年 5 月 25 日，刊于 SCMP，4207，15 页；《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4 日第四版；《山西日报》1963 年 3 月 26 日。

③ 见本书，71～72 页；定宜庄，前引，193～216 页。

④ “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在那个年代，单位不仅管理业务工作，还管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生管到死”。住房，补助金，粮票布票，娱乐，批准结婚、生育、搬家：无一不由单位决定。

⑤ 有些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主要是家庭妇女与无业青年，他们的单位就是街道委员会，由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监视该区的居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的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①。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返乡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②，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

① 见本书，47～48页。

② 宦官庄，前引，218页。

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1]。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 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2]。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3]。这份相当空泛而又不太科学的规划是不准备向公众宣布的，但必须通过宣传工作把主要精神传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报》就有连篇累牍的文章："每年有几百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4]

政府的这份雄心万丈的规划当然会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财政预算。20世纪50年代，知青下乡"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得到了高度赞扬。当时年轻人的热情如此高涨，他们甚至自愿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费和安置费。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变，习惯上是向去农场的知青发放安置补贴费。然而，面对大量知青，这笔补贴费对国家来说就太高昂了，加上国营农场已经容纳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假如这些农场不能赢利，那么国家的负担就更重，因为必须给职工发放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知青下放到农村去，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到那边去所需要的安置费远远没那么昂贵[5]，而知青的工资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了，是由生产队根据集体劳动所得来进行分配。因此，从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6]。

---

① 定宜庄，前引，219、222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39页。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42页；定宜庄，前引，218～223页。

④ 在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一文中引用，*Current Scene*，V（16），1967年10月2日，第5版。

⑤ 邓小平在1964年1月的一个讲话中谈到经费问题，他估计在生产队安置一名知青需要200元，而安置在国营农场就需要1 000元；见定宜庄，前引，222页。

⑥ 有关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5～250页。

最初，负责下放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下放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已经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①。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大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②。“文化大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掌管实务的领导，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泽东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

---

① 这个决定是作为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1964］第40号文件发出的。全文登载于国务院知青办主编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23～30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书中多处谈到。

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下放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少奇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然而，到“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①。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轻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

① 定宜庄，前引，337～348页。

总理、领导人……国家级人物和军官。"①

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轻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察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掌管实务的领导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泽东，而毛泽东有其他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泽东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校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

① 《北京"文化大革命"通讯》1967年12月，刊于SCMP，200，supp.，1967年8月31日。

月）下乡①。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化大革命”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②。有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 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 16 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③。

毛泽东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轻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 1963 年④。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⑤，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刘少奇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

---

① *S. Rosen*，前引，17，21，23 页。

② *J. Gardner*，前引，271 页。

③ 与 *F. M. D.* 的访谈记录，1985 年 7 月 21 日。

④ S. Rosen，前引，13 页。

⑤ 这类花言巧语的众多例子在红卫兵小报上都有列举；见 J. Gardner，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1958 – 1966，刊于 J. Lewis（主编），前引，270 – 271 页。

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泽东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 年 10 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①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 1965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4 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 18 年内下乡 3 500 万青年，降至 15 年内下乡 1 100 到 1 200 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 600 万个职位②，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 366 万人③。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 1962 年和 1966 年之间，总共有 196.9 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 129.28 万，占总人数的 65.6%④。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 1964 那一年。总共有 68.1 万人下乡上山，其中 32 万为知青，只占 47%⑤。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 500 元。不同的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 178 到 303 元，到农场去的 690 到 1 119 元。

1966 年，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 38.8 万。

---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49 页。

② 见本书，50 页。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76 页。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79 页。必须指出，这个数字比 1975 年公布的 1955～1966 年期间 120 万下乡人数要高很多；见《人民日报》1975 年 12 月 23 日第一版。

⑤ 当年很少公布具体统计数字。《工人日报》曾经提供一个总数：共有 292 000 名青年在 1962 年春到 1964 年春期间下乡，其中包括社会青年（没有列举具体数字）；见《工人日报》，1964 年 3 月 22 日，第 1 版。

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1] 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2]。

“文化大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3]。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4]，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5]。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泽东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6]。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

---

①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破”四旧，这就招致了1966年8月以后的大量打砸文化遗迹以及伤害有关人士的暴力行动。

② S. Rosen，前引，19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前引；T. Bernstein，前引，263～289页；定宜庄，前引，391～396页。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68页。

⑤ 刘小萌，前引，77页。

⑥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

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①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②。通过报刊号召回乡③，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④，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⑤，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⑥。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泽东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⑦，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

---

① 小兵，22，1968年2月17日，在T. Bernstein，前引著作中引述，279页。

②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165～166页。

③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本书序言曾引述，2页。

④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CCP Documents*…，560～563页。

⑤ 比如，在上海对社会上一小撮出身反动的顽固不化分子实行“群众专政”，以迫使其他人下乡；见《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4207，16～17页及《文汇报》1968年6月7日，刊于SCMP，4216，3～4页。

⑥ S. Rosen，前引，64页。

⑦ 访问X. X. 的记录，1978年7月5日。

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泽东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下放知青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下放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泽东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轻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时，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

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20 世纪 60 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轻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 10 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古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政府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 10 月 9 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 11 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①。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 1 200 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古和东北②。

1968 年 2 月 8 日，又有一队 55 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在 1966 年红卫兵大串联③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 1967 年 11 月 27 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恩来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④。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

---

① 见刘小萌，前引，110～113 页；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1～6 页。

② 刘小萌，前引，114 页。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226 页。

③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 1966 年 6 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

④ 刘小萌，前引，116～119 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01～102 页。

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①。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年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政府需尽全力安置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泽东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②。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年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泽东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广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

---

① 刘小萌，前引，119～121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98～99页，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3～18页。

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22～23页。

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1]。1968 年 6 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统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2]。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 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 4 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 1966 和 1967 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 1967 年 12 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 1968 年 3 月到 6 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去下乡。在北京，4 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 1967 年及 1968 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 1968 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利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3]。7 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轻的毛泽东一派潇洒，在 1922 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4]。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

---

①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134～137 页。

②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173～175 页，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35 页。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

③ 刘小萌，前引，135、131、151 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02～103 页。

④ 这张著名的油画 1995 年在公开拍卖会上卖出，接着公认的作者被另外两名画家及革命博物馆控告，又被法院起诉。这幅油画本身就像是一场历史骗局。其实，多位中共党史专家都认为，当年是刘少奇和李立三负责发动安源铁路职工与组织 1922 年大获全胜的罢工。“文化大革命”前的教科书都是把刘少奇写作为该次行动的领导人。1968 年的这张油画的目的就在于要刘少奇头上的政治光环摘除掉，而将革命荣耀全归功给毛泽东；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册，238 页；《动向》，2000 年 6 月号，76 页；以及 S. 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页 168。

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泽东表忠心来做文章[1]，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轻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 名天津学生用了 51 天走了 2 000 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 5 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2]。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 1968 年夏，毛泽东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 月 25 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 月 5 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3]。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 月 12 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4]

---

①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② 《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4 月，38～40 页。

③ 金大陆，前引，23 页。

④ 《人民日报》1968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大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①。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泽东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②。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等）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③。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

---

①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4207，5－6页。

② 同上。

③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20世纪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楷模。

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1]。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2]。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张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政府很担忧[3]。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下放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4]。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泽东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5]，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取得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就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些带同子女下干校，如果这些孩子16岁了，或者等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务人员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成千上万地出发到下乡去。此外，无业游

---

① A. Chan, S. Rosen, J. Unger，前引，444～445页；J. J. Michel/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 à la campagne*，页34。

② 《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4207，11页。

③ 这些“逃兵”是被《红卫兵报》（1968年7月17及31日）揭发出来的。见刘小萌，前引，152～153页。

④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246～247页。

⑤ 见本书，23页。这条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12月22日是刊登上报纸的日子，其实21日晚上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宣读了该指示，即刻掀起总动员。

民、家庭妇女、有政治污点的人，还有社会青年都被大批送到农村去。但是，被卷入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1]。

毛泽东12月22日的指示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父母以及接待他们的农民。从该指示发表那天起，负责干部就放弃了说服工作。根据林彪的逻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么一来，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那些当时未离开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热情，政府认为必须施行强制手段。学校、街道委员会以及父母的工作单位，三者联合起来，使这些青年无法进行消极抵制。而那些仍在犹豫的或者继续抗拒的，就随时被来做思想工作的积极分子骚扰，有的时候，还带些小孩儿来大声唱最新的语录歌。假使这还达不到目的，就会到单位去揭发，单位就工资、粮票一块儿扣。反正，任何伎俩都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声势表示对这项政策的全力支持。到处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欢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欢送下乡的知青。不时会看到某些古怪现象：被迫前来的欢送者的人数与被欢送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了120万人来夹道欢送120位知青下乡[2]。

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及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3]。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撼人心。主要

---

① 1968年有60万城镇居民下了乡，再加上近200万下乡知识青年；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83页。

② 刘小萌，前引，168页。

③ 同上，162～170页。

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①。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下放了10万多青年到农村去②。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必须无例外地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③。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④ 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

---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84页。

② 刘小萌，前引，167页。

③ 多次访谈记录。《上海经济（1949～1982）》，87页。

④ “老三届”有时也称作“老六届”，因为初中、高中各有三届学生，见《青年一代》，1984年6月，36页。

教育的学生。照毛泽东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 12 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泽东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泽东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轻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 1965 年进入大学的，而在 1966 ~ 1970 年间被宣布“毕业了”①。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②，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大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 10 倍，总共有 55 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 500 到 600 万之多③。鉴于 1967 ~ 1969 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 400 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 500 万和 600 万之间。虽然

---

① 他们的学习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了课，所以推迟了毕业。虽然他们的命运没有“老三届”那么悲惨，不过他们一般也都经历过混乱时期，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见观沧海（主编），《“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

② 1965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80 名文科大学生自愿要求调到北京郊区，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农村干部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他们的副手；见《人民日报》，1965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及 1965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③ 观沧海提出有 100 万“老五届”（前引，4 页），但官方统计没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 ~ 1981）》，963、966、969 页。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没有列出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学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镇户口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专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些认为有 400 万，城镇学生占 40%，这似乎有点儿太武断（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96、112 页），另一些说有 500 到 600 万，还有些说超过 600 万（史卫民等，《知青书信选编》，3 页）。1985 年一个官方资料来源称有 640 万（*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XI 页）。

“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 年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北京在 1967 ~ 1969 年间，有 25 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 1967 年走的，大部分是 1968 年被送下去的，但 1968 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①。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 1969 届毕业生几乎全部下了乡②。

在上海，1967 年没有人下乡，可是 1968 ~ 1969 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 66.5 万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 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1966 届及 1967 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 1968 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1966 届及 1967 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 1968 届则去了外省③。至于上海的 1969 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 1968 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 100%④。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 ~ 1969 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

---

① 10 月底，调动的 7.2 万名城镇知青中，2.3 万人进了工厂，1 万人入了伍；见《北京劳动大事记》，180 页。

② 刘小萌，前引，167 页。

③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22 ~ 31 页。1995 年底到 1996 年初金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案例调查。可惜，由于某些数据不足或含糊不清，调查没能提供每一届下乡学生的准确比例数。

④ 《上海劳动志》，112 页。

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①。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②。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大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③。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泽东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

---

① 在研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省志中，我们发现下放农村的速度明显的因省而异。有关各省上山下乡人数，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2～303页。

② 见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134页。

③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新华社讯，1970年5月3日，刊于SCMP, 4655, 197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1版。

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 年 12 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下乡的 600 万知青。6 个月后，1970 年 6 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①。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 400 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②。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 1969 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政府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 1967 年 4 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

---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89、93 页。

② 同上，85 页。

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①。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②。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③。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④。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⑤，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⑥，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⑦。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

---

① 《北京志·劳动志》，45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86页。

③ 《湖南省志·综合经济志·劳动》，68页。

④ 顾洪章等，同上；刘小萌，前引，275～284页，尤其是第279～281页上的表5－2，清楚地显示了省一级负责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极端繁复。

⑤ 《安源县知青志》，4～6页。

⑥ 据河北省电台广播，1970年10月30日，刊于*SWB*，1970年12月12日。

⑦ 新华社讯，1969年6月26日，刊于*SWB*，1969年7月15日。

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1]。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2]。

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3]。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4]。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

---

① 除了那些归地区、县或市监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371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91～92页，及刘小萌，前引，284～287页。

③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92～93页。

④ 见本书，26页。

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下放知青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①]。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②]。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③]。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④]。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⑤]。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⑥]。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

---

①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
② 《统计年鉴》，1983年，215页。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1～102页。
④ 同上。
⑤ 《统计年鉴》，1983年，215页。
⑥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4页。

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1]。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等。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2]。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3]。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4]。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5]。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泽东思想的祖师爷，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与赫鲁晓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6]。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泽东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泽东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

---

①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 Z. W. 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 M. 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前引，104页），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Childhood in China*，197页）。

② 与MXY的对谈。

③ 《贵州省志·劳动志》，68页；刘小萌，前引，387页。

④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006页。

⑤ J. Unger，前引，33、154页。

⑥ 同上，189页。

日，毛泽东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1]。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规定 4 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 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 年总共是 19 万）[2]，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3]。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4]。1973 年 7 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 1 万人从 1968 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5]。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6]，然而，就算在这种特殊情形下，

---

① J. Unger，前引，113～114 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65 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66 页。

③ 其实，当时似乎有一条“内部”规定：65% 的“农民”大学生名额是预留给知青的（与 C. H. G. 的对谈，1987 年 9 月 19 日）。Suzanne Pepper 也指出那个时期的一大部分大学生是知青，见 Suzanne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刊于 Asian Survey，1978 年 9 月，870～871 页。

④ 多次访问纪录。J. Unger，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Contemporary China*，*III*（2），1979 年夏，86 页。必须指出，因家庭理由回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一份工作。厦门年轻女诗人舒婷，因是独女，于 1972 年返城，但直至 1975 年方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待业期间，她只能靠着做些临时工作维生（与舒婷的对话，1985 年 7 月 7 日；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285 页）。

⑤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9～110 页。文件全文收录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84～86 页。

⑥ T. Bernstein，前引，106～108 页，及 S. Pepper，前引，869 页。

后门、关系和红包，对天才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梁恒就是一例，他个子特高，篮球场上手脚灵活，所以不仅可以不用下乡，还上调到湖南省会。如果他答应进篮球队，就有好几个大工厂都想招他做工人。虽然有省体育教练的支持，最后还是靠一位医生的贿赂及一个党支书的有偿支持，事情才得到解决[1]。

下乡知青人数下降确与城市工作单位大量招工有关，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时期正值“林彪事件”发生。这位“三忠于”人物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已经与他的恩师貌合神离，冲突已潜伏下来。这场政治危机最后以1971年9月大元帅的神秘失踪收场，同时也产生了较长时间的效应，尤其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在1972年回朝掌政[2]。极左派当时在教育领域明显地作出了让步[3]。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恩来就举双手赞成[4]。林彪身亡后，面对掌管实务的领导们，毛泽东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他，毛泽东派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掌管实务的领导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泽东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1968～1969年的不差上下。

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泽东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

---

① 梁恒与J. Shapiro，*Son of the Revolution*，第18章。

② 林彪，眼见阴谋暴露，企图乘飞机逃往苏联，后其座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J. Guillermaz，*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卷二，565页。

③ J. I. Löfstedt，*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页135。

④ S. Pepper，前引，869页。方毅的讲话载于*Pékin Information*，1978年1月2/16日，16页。

1970 年（5 月 12 日发出的）26 号文件[1]，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2]。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后门’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后门’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后门’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 1968 年入学的有 9 000 学生，可是到 1972 年毕业时，只剩下 2 300 名[3]。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1972 年底，估计有至少 10 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4]。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 年计划下放 140 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 53%。1973 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 5 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 29%[5]。

政府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6]。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 年 5 月 1 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 19 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 月又发布了 40 号文件，

---

① 毛泽东批示的这个文件强烈要求各级干部将下乡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解决知青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加强宣传工作以及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92 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13 页。

③ 刘小萌，前引，273 页。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2、107 页。

⑤ 刘小萌，前引，270～271 页。

⑥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96～97、106、108～109 页。

禁止“走后门”当兵。12 月公布的 44 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回乡[1]。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 1970 年起，或者说是自 1969 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2]。1969 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3]。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 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4]。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5]。不管是不是，在 1972 年公开“揭露”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 1973 ~ 1974 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 ~ 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 年春的

---

①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37 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97 页，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 1971 年 5 月 1 日。

② 见《人民日报》1969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及 1970 年 5 月 8 日第 1 版。

③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 年 7 月 19 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 年 9 月 23 日，各刊于 *SWB*，1969 年 7 月 23 日及 1969 年 10 月 7 日。

④ 这份文件的全文收录在 Y. M. Kau 的 *The Lin Biao Affair*，81 ~ 90 页。

⑤ 果真如此，那很明显是林彪厚颜无耻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各种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报上所说的：“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86 页。

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 年 1 月 7 日至 3 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 1973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 100 多万职工[①]。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泽东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泽东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 4 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②]，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 1972 年 12 月 20 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 16 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 45 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李庆霖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政府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③]。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

---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8 页。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 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 150 万。不过，政府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

② 见本书第九章。

③ “李庆霖事件”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355～367 页，以及在顾洪章等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16～121 页。M. Frolic 在 *Mao's People*，42～47 页，以英语做了介绍。

翼地托付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1]。1973 年 4 月 25 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泽东居然给他寄来 300 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庆霖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2] 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 6 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 号）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作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3]。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20 世纪 50 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4]。毛泽东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

---

① 李庆霖通过"关系"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31 页。

② 这的确是李庆霖所做的事。后来 3 张钞票存放在李庆霖居住的一个镇储蓄所的保险箱里。李当年写信给毛主席时所用的桌子已经摇摇晃晃了，可他怎么也无法下决心把它处理掉。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19 页，以及胡发云等，《沧桑人生》，32 页。

③ 然而，这令莆田县的地方小干部勃然大怒，觉得那是针对着他们的。随后他们就立即想法抹黑李庆霖父子，声言李欺骗了毛主席。他们的顶头上司比较聪明，严厉批评他们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职，另一人给调走了。刘小萌，前引，365 页。

④ 李庆霖在 1957 年被插上了"白旗"，因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他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多亏毛泽东给了他复信，过去那一切都随风吹走了，再不会克扣他的工资了。他加入了共产党，升任为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四届人大常委、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福建省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孩子们也在农村得到重要的职位。长子入了党，幼子入了共青团。1973 年长子还被推荐上大学，不过他拒绝了这一提升。由于父亲的政治资本是建构于"送子务农家长"模范的角色，他很难接受这一点。后来，当"教父"们倒台的时候，李庆霖就为他的社会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见本书，169 页。

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泽东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①。他还询问李庆霖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泽东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恩来急不可待地回应毛泽东的意愿，但同时借此机会就把"文化大革命"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恩来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

---

①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泽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 580多万元。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21～23页。

快的[1]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2]。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3]。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30号）的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4]。这个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5]。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

①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经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这个要求；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6～107页。

② 为准备1973年会议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给这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起码对那些可能接触这些资料的人士很有帮助。

③ 有关这次会议及准备工作，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22～129页，《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12～119页，以及刘小萌，前引，368～378页。中发［1974］30号文件全文载于《知青工作文件》，87～95页。

④ 可以使用的这些会议的总结汇报目录刊于T. Scharping，前引，160～161页，43页注释②。

⑤ 1974年4月，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一年以后，知青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从8 178名增加到13 541名；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29页。

1973 年 10 月开始运作，可是到 1974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①。1973 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 年 8 月至 9 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 1976 年 4 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领导者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 1973 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 1974 ~ 1980 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 年 6 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 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②。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 1968 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③。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

---

①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连刘小萌也不例外，以为“小组”从 1973 年 10 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382 页。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4 ~ 250 页。

②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423 ~ 434 页，及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25 ~ 126 页。

③ 有关 1973 ~ 1974 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 T. Bernstein，前引，143 ~ 171 页。

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①。从 1973 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②。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 1974 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至少配备一名干部③。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下放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④。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个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

---

①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十及十一章。

②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4 日第 4 版。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7 页。

④ 见本书，128、146 页。

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 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 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 230 元加至 480 元，而北方则从 250 元加到 500 元①。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 100 元口粮补助及 200 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下放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②，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

---

① 在畜牧地区（内蒙古、新疆）有 700 元补助费。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 400 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

② 企业与有关公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挂钩”；见《人民日报》1974 年 6 月 2 日第 1 版。

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1]。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4%之间[2]。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年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队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队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3]。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被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 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

---

① 见《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社论。

②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56～57页，援引在刘小萌，前引，865页。

③ 刘小萌，前引，394～401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15～119页。

的73.5%①。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②。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③。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泽东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

---

①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70～71页，援引在刘小萌，前引，864页。

②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

③ 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9页。

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① 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人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②。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③。

领导人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 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 724 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 368 600名，1976年1 880 300名，1977年1 716 800名④。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 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年，

---

①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4版。

③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25页。

④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

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下放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 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 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①]。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下乡运动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②]，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③]。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大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下放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④]，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青年

---

① 刘小萌，前引，391页，注释①。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5页。

② 见本书图表1，178页。

③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111页。见本书图表2，178页。

④ 见《中国人口·广东分册》，168页。

返城[1]。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2]。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 1967 到 1969 年，亏损额增加了近 5 倍，达到 4.6 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 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 年 10 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 1971 到 1973 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 1973 年就亏损了近 2 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 11.1 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 1973 年 2 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 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3]。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 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来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泽东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

---

①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②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471～480 页。

③ 史卫民、何岚，前引，374～378 页。

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泽东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① ——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 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 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 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③。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 6 月 30 日写的，7 月 19 日《辽宁日报》④ 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

---

① 青海电台广播，1975 年 12 月 22 日，刊于 *SWB*，1975 年 12 月 30 日。

② *Pékin Information*，1977 年 2 月 2～21 日，14～15 页。

③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 1958 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560 页。

④ 《辽宁日报》1973 年 7 月 19 日，刊于 *SWB*，1973 年 7 月 27 日。

7 月 10 日毛远新先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许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1]。8 月 10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 5 年前，即 1968 年 7 月 21 日，作出的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

8 月 16 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3]。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 9 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4]。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 1973 年 12 月到 1974 年 3 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 1975 年 1 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 年 1 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 27 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

---

① 刘小萌，前引，562～565 页，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② 《人民日报》1973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

③ 《人民日报》1973 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

④ 见《人民日报》1973 年 9 月 10 日第二版和 1973 年 9 月 22 日第 3 版。

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①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②。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途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 3 个月，在 1969 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 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 1973 年 9 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 年 2 月他回到了 1968 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

---

① 《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5 日第 1 版。

② 《辽宁日报》1973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及刘小萌，前引，571～572 页。

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 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1]。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2]。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 1974 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 1 月底到 2 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 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 1969 年曾鼓吹“内部参军”[3]，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走后门”的干部[4]。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

---

① 刘小萌，前引，538～546 页，及 T. Bernstein，前引，254 页。

② 见《湖北日报》1974 年 2 月 7 日，《内蒙古日报》1974 年 2 月 17 日及《山西日报》1974 年 2 月 17 日。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27 页。

④ 刘小萌，前引，533～535 页。

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①。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泽东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②。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戛然终止。毛泽东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

---

① 邓贤，《中国知青梦》，168页。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70%是高干子弟，进入知名大学的更超过90%。”

② 刘小萌，前引，535～537页，北京电台，1976年11月16日，刊于*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26页。

动后期来解决。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通知[1]。毛泽东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大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 年 1 月 28 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 3 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 1955 年写下那著名指示[2]。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 1955 年的 35 名农村知青，发展到 1976 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3]。模仿毛泽东（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4]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

---

① 刘小萌，前引，547 页。徐明旭，《调动》，198 页，作者在这短篇小说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打击“走后门”如何达到积极效果，及不久党的文件又把这效果一笔勾销。

② 见本书，42 页。

③ 刘小萌，前引，549 页。那个迅速电气化、机械化的公社在 1969 年底就已经有郑州来的 400 多名知青；见《中国建设》法语版，1969 年 11 月，35～38 页。

④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尤其以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造型而扬名全国。他的原名是钱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舍去“资本主义”铜臭味儿的“钱”姓。他言听计从，他的忠心使他在 1975 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宝座。

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1]。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2]。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3]。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

---

① 关于这件事，见刘小萌，前引，548～555页。亦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26～127页，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39～140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27页。

③ 刘小萌，前引，555～557页。

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 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 年 3 月，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 1973 年 5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 4 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 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轻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 年 5 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 年 1 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①。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 1969 年到 1973 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大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 1970 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 1950 年起，法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 18 岁，男方满 20 岁；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 23 岁，男 28 岁；农村青年为女 23 岁，男 25 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

---

① 刘小萌，前引，576～579 页。

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 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恩来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1]。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恩来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2]。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3]。

---

① 刘小萌，前引，501～505页，及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17页。

② 刘小萌，前引，506～507页。

③ 见本书，279～282页。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掌管实务的领导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①。1976 年，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 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 1977 年底，仅有 10% 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②。

1974 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 年 1 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 1964 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 月开始，为了响应毛泽东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③，毛泽东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 1973 年及 1974 年毕业，尽管有毛泽东 1968 年的 7.21 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

---

① 关于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1974 年 11 月 23 日。那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极好例证。

② 见刘小萌，前引，867 页。

③ 《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9 日社论。

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1]。1975 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2]。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3]。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 1975 年有 776 名毕业生，其中 84 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 1972 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4]。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 年 2 月，446 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 1975 ~ 1976 年间还是偏低的[5]。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6]。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 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

---

① F. C. Teiwes,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China Quarterly*, 62, 1975 年 6 月，308 ~ 309 页。

② 《红旗》1975 年第五期，79 页。

③ 同上，79 ~ 82 页。

④ 见《人民日报》1975 年 12 月 8 日及《光明日报》1976 年 2 月 5 日。《理想之歌》出版了单行本，也在《人民日报》（1976 年 1 月 25 日）登载过。关于这个问题，见高红十《〈理想之歌〉问世前后》，网址 www. dacoca. com/txyfriends。见 Masaaki Iwasa，"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此文中文版没有发表过，日语版载于 Mimei，1，神户，1982 年 2 月，95 ~ 126 页。另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277 ~ 278 页。

⑤ 1977 年，朝阳典型被揭发为"四人帮"的极左行为而废除了。见《人民日报》1977 年 10 月 22 日。

⑥ 这是 26 位河北大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使用的语句；见刘小萌，前引，596 页。

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直接挑战毛泽东的教育政策），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1]。因此，1974 年有 603 500 名知青返城，而 1975 年则达到了 1 397 900 名[2]。

自 1975 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 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3]。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4]，应该考虑到“现实派”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5]。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 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6]。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

---

① 《人民日报》1976 年 7 月 14 日第 1 版。S. Pepper,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 年 9 月，870 页。

②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1 页。

③ 访谈记录及 J. Unger，前引，168 ~ 169 页。

④ 见本书，363 ~ 370 页。

⑤ 见本书，74 页。关于陶铸和赵紫阳“文化大革命”前在广东的作为，见 E.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1972 年赵回到广东，从 1974 年 4 月到 1975 年 10 月任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对激进派及他们的政策，赵已暗中坚决抵制，从他对李一哲事件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动向》，1979 年 2 月 5 日，19 页，以及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1981 年夏，5 页。

⑥ J. B. Starr,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China Quarterly*, 67, 1976 年 9 月，475 ~ 476 页。

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泽东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①。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②。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③。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泽东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④。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⑤。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

---

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第1版及1976年3月28日第1版。虽然没有点出邓的名字，但是3月28日的“白猫黑猫”论就再清楚不过，该论的作者则呼之欲出了。

② 有关这个事件，见 Cheng Ying-hsiang & C.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

③ 《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第1版。

④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1版。

⑤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1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 *SWB*，1976年10月14日，BII/12～14页。

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 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①]。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 年 3 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 7 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②]。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 1975 年安排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 年 2 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③]。至于吴献忠，她在 19 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 19 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 7 月 13 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④]。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 1976 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 79% 的 8 000 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

---

① 刘小萌，前引，568 ~ 569 页。

② 同上，573 ~ 576 页。

③ 同上，580 ~ 581 页。

④ 同上，558 ~ 560 页。吴是第一个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封信是 6 月份在由毛远新的暂时替代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决定要发表的。当时毛远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儿替他那个风烛残年的伯父担当与外界的联系人。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41 ~ 142 页。钟志民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他既不是辽宁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进派铁杆核心的一部分。不过《人民日报》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文章，1976 年 7 月 17 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邓开火的这一边的。

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①。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4‰②，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③。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下发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他们都不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④。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⑤。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⑥。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⑦。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

---

① 《光明日报》1976年8月30日。

② 刘小萌，前引，592页。

③ 同上，593～594页。

④ 同上，585～586页。

⑤ 见《山村新人》。这个六幕剧本在1976年摄制成电影。

⑥ 毛远新亲自点名一个公社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在那里社员被批斗，其中47人被打致伤残，3人致死。这个公社有86名知青参加了暴力行动；见刘小萌，前引，587页。

⑦ 同上，586页。

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①。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多②。反击“拔根派”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③。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泽东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④。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

---

① 见本书，167～169页。

②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1页。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36页。

④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30～135页，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40～144页。

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①。2 月 1 日吴向毛泽东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 1968 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泽东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2 月 12 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为了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最新指示，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2 月 23 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于 1976 年 5 月 7 日正式成立（毛泽东的著名“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小组开会“学习”毛泽东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 75 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典型和坏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8 月 27 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 1975 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紧接着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 11 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

① 从 1973 年 8 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太密切，1977 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其实，无论是“拔根派”，还是“扎根派”，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1976 年 5 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

毛泽东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泽东 1968 年发起的这场运动在精神上的惨败。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泽东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 年 9 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泽东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①。实际上，毛泽东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涉足其间。

---

① 在激进派形象语言里，是说：“击溃了邓小平刮起的拔根复辟的妖风。”《光明日报》1976 年 9 月 27 日第 3 版。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简直融为一体了，所以他这头去世，那头就传言该运动即将告终。伟大舵手去世后一个月，为他的政策摇旗呐喊的死硬派“四人帮”倒台了，这就令人想到新的领导一定会放弃一项如下乡运动那样不得人心的措施。然而，那可不是新上台的头号人物华国锋的意图，华国锋是毛泽东临死前用两句话指定了的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国锋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11月一篇赞扬新上台的“英明领袖”的文章大谈华如何主动送子女下农村：1974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长会，会上他积极支持当时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下乡。宣传这段轶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他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确实一片忠心，“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①。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给予了华主席一个机会，可以

①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第1版。发表这桩轶事的目的也是要给干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送子女下乡，作出好榜样；尤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第4版和1977年2月15日第3版。

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向来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宣称，上山下乡政策将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继续执行下去[1]。他在讲话中关于下乡运动的评论，作为小道消息广泛流传，新闻报纸也有转载[2]，重复再现了毛泽东的最正统的思想：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并“与工农相结合”，为的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唯一与过去“经典”的讲话有些出入的是，把下乡运动形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政策”。报刊后来特别提出周恩来赞成下乡运动政策这一点[3]。其实，华国锋很需要用已故总理的威望来帮他坚持老百姓反对的下乡运动。华希望尽快制止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政府要放弃这个运动的说法。在讲话中，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造谣。在政治层次上，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也正好加强了下乡运动的宣传。“四人帮”过去指责邓小平反对这场运动，如今轮到他们被人用几乎同样的言词[4]来指责搞破坏。下乡运动中的英雄模范，像李庆霖、张铁生和朱克家，则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抓了起来[5]。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导人利用一个政治运动来肯定下乡政策及反击其潜在的或假设的反对者。从此以后，知青要下乡，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6]。

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 年的下乡人数跟 1976 年相若[7]。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 1973 ~ 1974 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

---

① 《明报》1977 年 2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8 日第 4 版。

③ 《人民日报》1977 年 1 月 17 日第 4 版，及《红旗》1978 年第 3 期，84 ~ 88 页。

④ 辽宁电台广播，1977 年 6 月 15 日，刊于 *FBIS*，1977 年 6 月 22 日。

⑤ 见《人民日报》1977 年 1 月 17 日第 3 版；*Pékin Information*，1977 年 2 月 21 日，14 ~ 15 页；《明报》1977 年 5 月 24 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 年 3 月 15 及 16 日，刊于 *SWB*，1977 年 3 月 18 及 19 日；吉林电台广播，1977 年 5 月 18 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 年 6 月 15 日，以及云南电台广播，1977 年 6 月 26 日，刊于 *FBIS*，1977 年 5 月 24 日、1977 年 6 月 22 日及 1977 年 6 月 28 日。

⑥ 见《人民日报》1977 年 2 月 15 日第 3 版。

⑦ 1976 年 1 880 300 人，1977 年 1 716 800 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 页。

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①。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等）③。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④。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小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⑤。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泽东”⑥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小平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⑦，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

---

① 见本书，102～106页。

②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60页。

③ 这篇讲话载于 *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98～109页。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8页。

⑤ J. Guillermaz，前引，594页。

⑥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

⑦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第1版。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94～499页。

两种准备”①。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②。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3万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③。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④。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⑤。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这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⑥，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轻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⑦ 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泽东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等）⑧。

---

① 同上页注释⑦。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1962～1966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

②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3版。

③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312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499、519、548页。

④ 刘小萌，前引，680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99页。

⑥ 见本书，183～184页。

⑦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3版。

⑧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第2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①]。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②]，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③]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 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 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④]。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⑤]。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

---

① 刘小萌，前引，653页。

②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1版。

③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1版。

④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见本书，178页。

⑤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1版。

泽东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泽东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邓小平的胜利[2]。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国锋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3]。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4]。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5]。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

---

①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1版。

②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③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

④ 刘小萌，前引，657页。

⑤ 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2月3日，刊于*FBIS*，1978年2月10日。

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1]。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2]。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3]。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 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 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 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09万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4]，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5]。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6]。再也不提思想上

---

① 《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第3版；贵州电台广播，1978年2月21日，刊于*SWB*，1978年2月25日；江西电台广播，1978年3月17日，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9月10日，福建电台广播，1978年9月21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0月26日，刊于*FBIS*，1978年3月24日、1978年8月11日、1978年9月15日、1978年9月29日及1978年10月31日。

② 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8月11日，以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8日，第4版。

③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④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110页。

⑤ 刘小萌，前引，719页。

⑥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第3版、1978年1月18日第2版及1978年5月16日第3版。

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1977年12月21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轻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①。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②。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再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③。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

---

① 刘小萌，前引，668～672页。

② 1978年5月6日通知（新华社讯，1978年5月11日，刊于*SWB*，1978年5月19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1978年5月16日，刊于*SWB*，1978年5月27日。

③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3版。

服务行业[1]。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2]。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3]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1978年10月31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4]。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泽东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5]。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6]

---

①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3版。
② 《大公报》，1978年7月21日。刊于*FBIS*，1978年7月27日。
③ 见本书，129～130页。
④ 见《明报》1978年10月30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1日第4版。
⑤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
⑥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①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②。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他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

---

①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②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1版。

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①]。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为缩小“三大差别”，“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②]，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③]。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④]。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

---

①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40页。

②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63页。

④ 同上，164页。

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1]。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绪，而从1973年起在财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3]"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4]。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5]。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 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6]。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7]。因此，

---

① 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65页。

②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53～162页。

③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58页。

④ 同上，151～152页。

⑤ 同上，248页。

⑥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60页。

⑦ 同上，155页。

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①。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②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③ 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泽东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四人帮’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泽东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

①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52页。

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54页。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①。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②，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③。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

---

①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拔根’”！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62页。

② 刘小萌，前引，716－718页。

③ 同上，719页。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1978年12月18日。

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轻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责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1]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2]，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

① 根据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73页），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万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720、732页）。

②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443页。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泽东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①。

1978年底～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②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

---

① 见本书，图表4，382页。

②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①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②。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他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古，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③。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人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

---

①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1版。

②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1页。

③ 见本书，118～120页。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728页。

招了5.5万名[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3]。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4]。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5]。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6]。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7]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

---

①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111页。

②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442页。

③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198页。

④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

⑤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60页。

⑥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1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页27以及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y*, vol. 1, 201～202页。

⑦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98页）。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156页，注释②）。

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①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大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泽东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

---

①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

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1]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 1978 年 11 月 15 日推翻对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2]。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 11 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3]。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

---

①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 1979 年 8 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7 页。

② 《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15 日第 1 版。

③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另见 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 1968～1970 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 1971 年到的）[1]。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 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 10 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 10 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 月 16 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 10 天，1 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 月初，37 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 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

---

① 在 106 600 名下放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 483 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 33 672 人是从上海去的，14 556 人从重庆去的，3 255 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142 页。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

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 月 8 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 40 名代表 12 月 16 日从景洪出发，20 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 18 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 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 24 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 3 组：一组 8 人出发去上海，一组 7 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 25 人小组从容行动。这 26 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 12 月 27 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①。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②。正在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 1979 年 1 月 4 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

---

① 路透社讯，1978 年 12 月 27 日，刊于《明报》1978 年 12 月 28 日；*Le Monde*，1979 年 1 月 2 日；《中国之春》1987 年 4 月号，79～87 页；《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99 页。

②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 V. Sidane，前引，206～210 页。

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 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 3 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 1 月 23 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 3 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1]。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 300 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 1 500 人，其中 211 人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 1 000 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 6 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 1 月 21 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决定按“6 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2]。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 700 万用来盖房子。23 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

---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0 日第 1 版。

②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 5 天内就有 3 000 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378 页。

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尚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①，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②，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③。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④。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

---

①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736页。

②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12页。

③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

④ 见刘小萌，前引，736、775页。

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3]。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胎儿”[4]，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大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高呼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5]。在接见游行代表的时候，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要他们等待正在参加全国会议的市长带着报告回来[6]。这条新闻正好显示着该会议的所有决定在全国具有了很具体的意义。跟着，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地方当局就以此为挡箭牌，不受理知识青年的请愿要求。但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是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进行罢工、绝食、占据地方政府办公室，还搞静坐。因此，在政治局还在审议通过会议决定期间，甚至已经在报章上公布之后，游行从没在上海终止过[7]，大字报越贴越多，虽然民主运动知青领袖滕沪生

---

①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81页。

② 同上，302页。

③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4页。

④ 《七十年代》1979年1月，7页。并不是Anne McLaren错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

⑤ A. McLaren，前引，6页。

⑥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 1980年12月，757页。

⑦ 法新社讯，1978年12月15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16日，亦见A. McLaren，前引，6~7页。

被逮捕了，但骚动局面还是持续了整整一个 12 月[1]。在北京不像在上海，知识青年问题在民主运动中并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也是许多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比方说，有一组下放到郊区 4 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控诉他们怎么“被迫”滞留在那儿[2]。我们前面谈过，云南知青 12 月底也在民主墙上贴过大字报，不过他们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中央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各省市都有其他的个别行动。12 月 30 日西安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述 31 名知青要求回城，已经绝食了 6 天。12 月底“知青联盟”在长沙成立，然后组织了一次在该市革命委员会门前的游行，有几万名青年参加[3]。这种骚乱到处都有点儿，严重程度视地点与时间而变化，一直持续到 3 月底。杭州知青也上北京要求平反，在 1 月 20 日张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4]。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风”愈刮愈烈，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大部分回了家的都决定豁出去了，再也不走了。当有的个人申请被上面否决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施加集体压力这一招儿。1 月 25 日，在南京，几百个来自苏北不同农场的知青串联一起，在市委门前集会，堵塞了几条交通要道。有些人抨击招募“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的做法，要求这些农民工回到乡下去，以便安插农场知青。2 月初，在南昌，在江西一个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包围了铁路局机关，冲击列车，要求安置他们[5]。2 月 5 日在

---

① 滕沪生没有作为知青领袖被捕，但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写“骂人”的大字报，特别是粗暴攻击毛泽东和华国锋。见上海民办刊物《科学、民主、法制》，1979 年 5 月 1 日，第十期，20 页，及滕的大字报之一，载于 V. Sidane，前引，103～104 页。

② 路透社讯，刊于 *Asahi Evening News*，1978 年 12 月 19 日。

③ 法新社讯，1979 年 1 月 4 日，刊于 *FBIS*，1979 年 1 月 5 日，以及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④ 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⑤ 新华社讯，1979 年 2 月 12 日，刊于《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3 日第四版。

杭州，一些青年聚众集会，堵塞路口，影响交通，一直持续到16日①。在重庆，游行示威的人群围攻指责劳动局的干部。2月7日在天津，知青在城里各处闹事。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在合肥也一样②。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③。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④。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

---

①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3日。

② 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9年7月向日本记者透露的；见*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1979年7月28日。

③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1979年5月1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

④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T. Gold，前引；《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1979年6月，22～30页；《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1]。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他们夫妻团圆再进行商调工作[2]。尽管知青有着各自的种种具体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能联合起来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组织请愿行动，而且还安排一些有酬劳的活动借以支持运动，又可以帮助经济极端困难的知青[3]。在杭州，1 000多浙江省五七农垦场的知识青年，9月8日开始静坐要求准许返城并安置工作。到17日，静坐仍在继续[4]。10月初，请愿知青增加到几千人，其中34名绝食了4天。他们确是受屈受害深重。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浙江日报》在2月宣布，所有在1966年进这些农垦场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进场的则要等下半年。这个消息令他们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

---

① V. Sidane，前引，38～43页及T. Gold，前引，762页。

② 上海市最终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当局不帮他们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他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一处境（连子女数量都得一样）下的有意对调的夫妻。2000年8月10日，我们在北京访问了R. Y. C.。她是与一位北京知青结婚的上海女知青。

③ 刘小萌，前引，771～772页。

④ 《四五论坛》第13期，40页。虽然名字相似，但这些农场跟“五七干校”没有关系。

26 日，这项已经写入正式文件的计划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与中央决定的精神有矛盾，而 1979 年 5 月 14 日国发 132 号文件规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国营农场就业的知青[①]。与此同时，在上海，请愿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人民广场，几个年轻人请求一个日本记者把警察撕毁大字报的情景用相机照下来，那份大字报的题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诉”归来，不欢迎吗?》[②]

1979 年秋风瑟瑟，对社会群体的要求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的各种抗议活动开始了一场严厉的镇压。到年底，《民主墙》被封闭了，地下杂志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迫停刊[③]。3 名参加 2 月 5 日游行的知青，12 月 1 日在上海被判徒刑[④]。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时期主要在 1978 年 11 月与 1979 年 10 月之间。在这一时期之后，知青的抗议活动消弱趋于消沉，一方面是镇压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绝大部分知青的回城愿望得到了满足。其实，知青抗议活动的结束并不是政府有能力单方面强制推行它的决定的结果，而是知青这个社会群体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有能力从政府那儿取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较为满意的折衷方案的征兆。当局在 1979 整整一年里，不遗余力地贯彻 1978 年 12 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的决定，但最后收效甚微，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的抵制行动的功效，不论那是消极或是积极的。

实际上，为了继续下放知青上山下乡，同时限制回城人数，政府在 1978 年底到 1979 年底期间竭尽了全力。这个时期采取的措施既认真又谨慎，还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国家是真的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至少还要持续好几年。

---

① V. Sidane，前引，46 页，及刘小萌，前引，776 页。

② *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1979 年 10 月 6 日。照片在《明报》1979 年 10 月 7 日。有关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问题，见本书，191～201 页。

③ 见 V. Sidane，前引，47～49 页。

④ 分别判 9 年、5 年和 4 年缓刑两年；见《文汇报》1979 年 12 月 12 日第 1 版，及《人民日报》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4 版。

精神落实到各省份并重申全国会议所定政策

在 12 月 15 日公布工作会议的当天早上，上海市就组织了学习文件的大小会议，再次肯定不应该像林彪及“四人帮”那样阻止知青问题的讨论，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否定这次运动的成绩，给运动抹黑”[1]。16 日，吉林省召开了大会落实全国会议的指示精神。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月底，决定一方面要“帮助知青满意地在农村安家落户，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鉴于本省的经济条件，几年内还应该继续动员知青到农村去插队”[2]。辽宁省党委在 12 月 20 到 25 日期间也开了会，肯定“全国工作会议关于今后几年继续下放知青到农村去的决定是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的”[3]。对新毕业生来说，上海预见到升学与城市招工的机会将会增加，他们就不再去农村插队了。但是，“特别要注意跟着来的这几年里，将会有大批毕业生离开中学，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必须下放到上海的国营农场去”[4]。山西政府则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三四年以后”不必下放知青去农村[5]。所有这些措施都完完全全与正式公布的全国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相配合，只等着落实了。浙江知青办公室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其主任宣称，暂时没有工作的年轻毕业生可以去农村，也可以留在城里自学准备升学考试，其实那就暗示着强迫下放政策的终结（前提是父母有能力继续供养这些毕业生子女）[6]。

在组织传达中央决定的会议之后，国务院又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省市当局如同往年一样在春节期间给各自管辖地区的知青寄慰问信[7]。

---

① 上海电台广播，1978 年 12 月 15 日，刊于 *FBIS*，1978 年 12 月 20 日。

② 吉林电台广播，1978 年 12 月 22 日及 1978 年 12 月 30 日，分别刊于 *FBIS*，1978 年 12 月 26 日及 1979 年 1 月 4 日。

③ 辽宁电台广播，1979 年 1 月 2 日，刊于 *FBIS*，1979 年 12 月 18 日。

④ 《文汇报》1979 年 1 月 5 日，刊于 *FBIS*，1979 年 1 月 24 日。

⑤ 山西电台广播，1979 年 1 月 8 日，刊于 *FBIS*，1979 年 1 月 12 日。

⑥ 浙江电台广播，1979 年 1 月 30 日，刊于 *FBIS*，1979 年 2 月 2 日。

⑦ 新华社讯，1979 年 1 月 16 日，刊于 *FBIS*，1979 年 1 月 19 日。

这些信件又再次谈到12月的决定，勉励知青继续奋斗、耐心等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新方向，而投身于这一建设乃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①。从6月份开始，面对新的一批毕业生离开学校，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省一级即时召开各种会议商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②。辽宁省强调要竭尽全力做好必不可缺的动员工作。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声称："今年我们动员知青下乡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各级党委不可有一刻松懈，而且得比往年做更多的工作"③。在各地，毫无例外地都有必要继续动员相当一部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与华国锋6月18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完全吻合④。这时，又祭出"两条腿走路"这一老掉牙的万能口号，不过赋予了崭新意义：在城市以及农村都提供工作职位⑤。1979年8月份，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们要继续下乡运动并再次掀起一场全面动员的意图。《红旗》杂志首先发表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的长文，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给新的一场秋季下乡动员打下一个理论基础。题为"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章再次提及全国工作会议的结论，并对其中某几点作了补充。文章开首"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然后对"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作了一番解释：

---

① 江苏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6日。内蒙古电台广播，1979年1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7日。贵州电台广播，1979年1月1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19日。河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1月23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1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日。

② 甘肃电台广播，1979年6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0日。青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28日，刊于SWA，1979年7月5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1979年7月16日及1979年8月23日，分别刊于*FBIS*，1979年7月13日，1979年7月27日及1979年8月27日。

③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

④ 《北京信息》，1979年7月9日，22页。

⑤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8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7日。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1950～1960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①。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②。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

---

① 《红旗》1979年8月号，58～62页。

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8月21日。

伟决心。26 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 9 月 20 日与 10 月 12 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①。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 1978 年 12 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 170 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

1978 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 8 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 1978 年 12 月 10 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②。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③。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④。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

---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27 日第 2 版。

② 《解放日报》1978 年 12 月 16 日。

③ 上海电台广播，1979 年 2 月 17 日，刊于 *FBIS*，1979 年 2 月 26 日。

④ 上海电台广播，1978 年 12 月 13 日，刊于 *FBIS*，1978 年 12 月 21 日。

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①。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②。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政府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③。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④。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⑤。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

---

①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154页，注释⑤。

② 主要见《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及1979年2月8日第1版。A. McLaren，前引，10页；W. Zafanolli，Shanghai，Place du Peuple，23页。

③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1版。

④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

⑤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

（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1]。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2]。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下放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3]。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4]。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5]。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6]。政府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7]。《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8]。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9]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

---

①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

②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19日。

③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刊于*SWB*，1979年7月19日。

④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

⑤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8日，刊于*SWB*，1979年7月31日。

⑥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

⑦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3版。《文汇报》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1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11～12页。

⑧ 《文汇报》1979年6月7日第4版。

⑨ 《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4版。

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1]。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2]。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3]。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4]。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5]。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化大革命’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6]”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轻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7]。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

---

①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152页，注释③。

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3版。

③ 采访C. W. H.，1978年7月25日。采访X. X.，1978年7月5日。

④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及1979年8月22日第3版。

⑤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181页。

⑥ 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

⑦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第1版。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7月5日，刊于*S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58～62页。

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1]。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化大革命”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音译）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2]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3]。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4]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下放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

---

① 见《红旗》1979年8月号，58~62页。《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

②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③ 见本书，160~161页。

④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

区参加发展建设[1]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2]。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 月 30 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3]。5 月 8 日她的照片上了报[4]，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5]。14 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6]。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 年 8 月号发表了张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 8 月底的大会。34 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 1960 年提出的建议，在 1978 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

---

① 《动向》1979 年 4 月号，22 页。1979 年 3 月 9 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8 页。

②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及《文汇报》1979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

③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30 日第 1 版及 1979 年 4 月 11 日第 3 版。

④ 《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8 日第 2 版。

⑤ 《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9 日第 4 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 6 月 14 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 年 6 月 15 日，刊于 *FBIS*，1979 年 6 月 19 日。

⑥ 《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14 日第 4 版。

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1]。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健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2]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3]。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4]。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5]。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

---

①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

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86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81～82页；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107～121页；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39～40页。

③ 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4版。

④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702～714页。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

⑤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110～126页。

露他的“罪行”[1]。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 年 3 月判了他 15 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 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 1979 年 12 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1977 年 3 月 1 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2]。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 1978 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3]。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4]，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 1979 年 8 月全国大会第 34 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 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 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 分子”而被关押蹲了 3 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

---

① 《人民日报》1976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② 刘小萌，前引，704 ~ 705 页。见 http://www.xiaoshuo.com/pages/readbook/2/8629/00128629_13889.html。

③ 1984 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3 ~ 18 页；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 2 册，688 ~ 695 页。

④ 《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23 日第 4 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 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96 及 255 页。

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 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泽东的撑腰，3 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①。然而，他在 1977 年初被逮捕了，11 月 14 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 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 10 年，后来又改为 8 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 100 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 年当选为模范②。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 岁当选为模范，20 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 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③。

---

① 见本书，100 页，注释④。

②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 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 1 000 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60 页。

③ 刘小萌，前引，713 ~714 页。

1979 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 1956 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 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①]。在 12 月底的最后 3 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 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②]。

1979 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 8 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 1979 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他们或者采用“顶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 6 万个职位，但到 6 月底就已经有 10.8 万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③]。从全国来看，大约有 400 万知青在 1979 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1978 年 250 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 1968 年底到 1970 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④]。大约 500 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 1978

---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26 日第 4 版及 1979 年 12 月 18 日第 4 版。

② 《人民日报》1979 年 12 月 28、29 及 30 日。

③ 《河北省志·劳动志》，112 页。

④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 1979 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51 页。

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1]。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2]。

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送80万人下乡[3]。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4]。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5]，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7万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6]。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4万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7]。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8]。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9]。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77万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10]。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

---

① 见本书，178页，图表2及3。

②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32页。

③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

④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

⑤ 见本书，159页，注释③。

⑥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

⑦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

⑧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

⑨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

⑩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页。

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泽东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①，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 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 000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②，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③，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

---

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

②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1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

③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1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

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1]。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2]。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3]。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4]。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5]。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6]

王虽然固守传统，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

---

①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

②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

③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④ 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知青。

⑤ 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

⑥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恩茂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 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①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②。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 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 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③。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④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⑤。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万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

---

①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189～190页。

③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

④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

⑤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445页。

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 10 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①。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 1980 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 1980 年 5 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②，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耀邦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③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 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④。10 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几届没有下乡的学生⑤。11 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

---

① 刘小萌，前引，813 页。
②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5 页。
④ 湖北电台广播，1980 年 8 月 3 日，刊于 *SWB*，1980 年 8 月 14 日。
⑤ 吉林电台广播，1980 年 10 月 23 日，刊于 *FBIS*，1980 年 10 月 28 日。

特别是在服务行业[1]。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布，经决定从夏天开始不再进行“强制”下乡，只是提倡“自愿”下乡[2]。这些自愿者有两种选择：到知青农场去当农场工人，签订可续约的月薪不低于30元的两年合同；或者报读设在某些农场的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情况下，学生都保留原有的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在北京市不会再进行下乡运动了。这些新建议的措施仅仅涉及几百人，所以后来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下文。到了1980年，要求青年真正地自愿下乡，甚至是在相对优越条件下的下乡，都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提议。另外，市政府宣布1978年以前下去的以及已经在农村待了两年以上的，都回城了。1979年秋下乡的1万名知青可以在1981年9月前回来。在这个日期之前，禁止招募那些本应该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拒绝走的，为的是要将优先权给予那些接受下乡的青年。

长春、陕西和北京的例子在全国都完全有代表性。虽然消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但1980年无疑就是全面放弃下乡运动的一年[3]。根据半官方的资料，在最后一年，全国有15.5万名青年下乡，主要去郊区知青农场，其中1/3是在辽宁及黑龙江两省，有10个省完全没有下乡的[4]。

其实，从该年夏天开始，让当局操心的似乎是如何安置仍在农村的知青。7月底，《工人日报》透露，只剩下了“大约200万”[5]。到了8月中，又宣布只有150万[6]，这就是说从年初开始，有差不多150万青年回了城。虽然留在乡下的人数很少，但《工人日报》的那篇文章依旧强调领导干部

---

① 陕西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1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13日。

② 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25日。新华社讯，1980年12月1日。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2月2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日。

③ 青海由于远离中央地区，跟得总是慢一点儿，到12月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在市郊建立知青农场的报告，但那是过了时的一役。见青海电台广播，1980年12月19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0日。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3页。这15万5千名知青一般都不计算在下乡运动的统计内，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太短。这个数字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

⑤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

⑥ 《中国新闻》1980年8月12日，刊于*JPRS-China Report*，1980年10月3日。

应该解决这些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3种可能：

——重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单位是经济独立核算的，但需要援手才可进一步发展。安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占了43万[1] 1972年前下去插队的仍在农村的“老知青”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这些知青和他们的爱人及孩子被安置在知青队。夫妻中城市出身的一方恢复城市户口，重获城市粮食配给，并且领取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待遇，而另一方则仍然保留农村户口，挣工分。

——城镇集体企业招工。政府鼓励以各种方式发展这类企业，包括发放预留为安置下乡知青的贷款，以便招募已在农村的知青。

——帮助已婚知青继续留在当地。对于这些“所在社队生产条件好、收入比较高、本人愿意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所属的知青办必须“规定鼓励办法”。可以请他们列出一个单子，写明他们在住房、农具以及家具方面的需要。准许有一技之长的搞个体户，并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工具（如缝纫机、理发工具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恢复城市户口。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子女的前途担忧，他呼吁知青办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承认在这些“受到了锻炼、吃过很多苦”但是“长期得不到安排”的知青中，“有些人感到没有出路、苦闷、彷徨”，所以他呼吁：“我们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关怀他们、体贴他们。”

1980年底还有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2]，几万名在农场。在12年来分散于农村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军中，这个数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6%或7%）。即使把已在接待地区市镇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几十万老知青都包括在内，也总共不到10%。因此可以说，这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体上来看是到达了终结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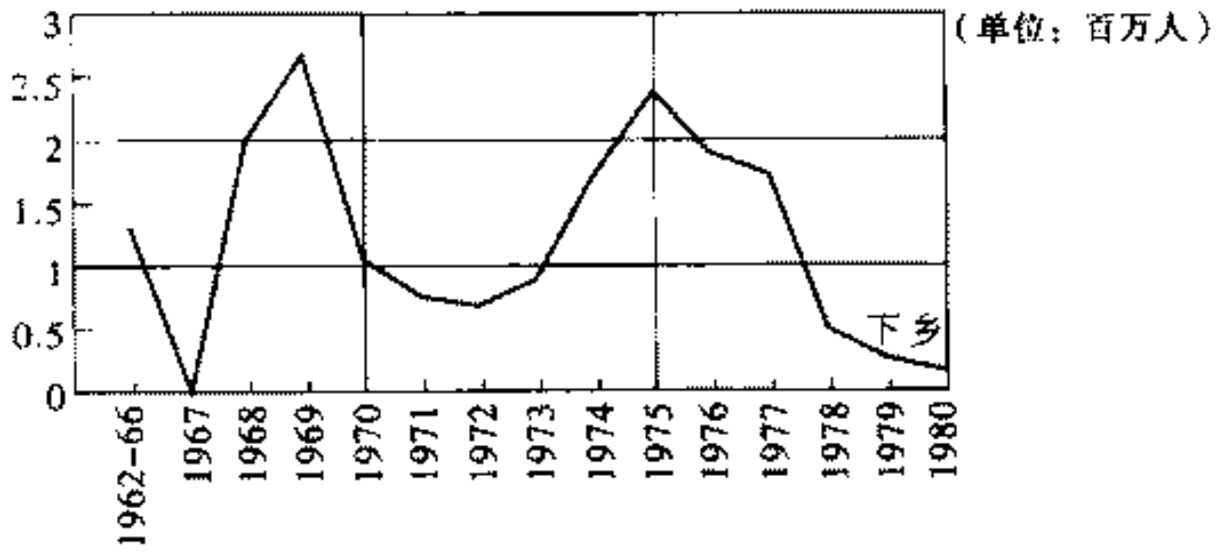
① 根据顾洪章书，只有20万，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2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3页。

下面3张图表可以显示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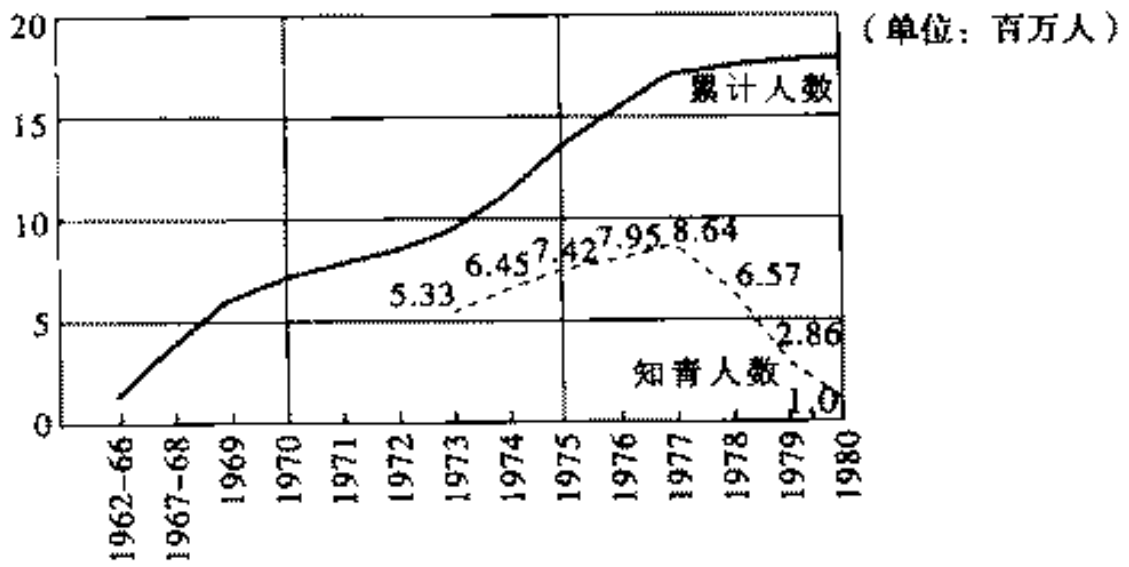
图表1　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逐年上山下乡人数

1962～1980年间总数为17 919 800人（其中1967～1980年间为26 627 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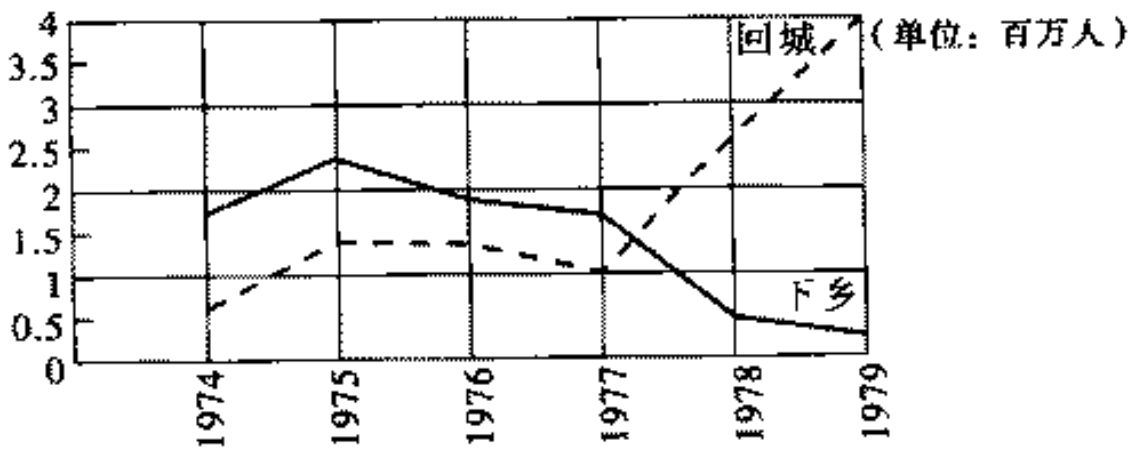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3页及301页。

图表3　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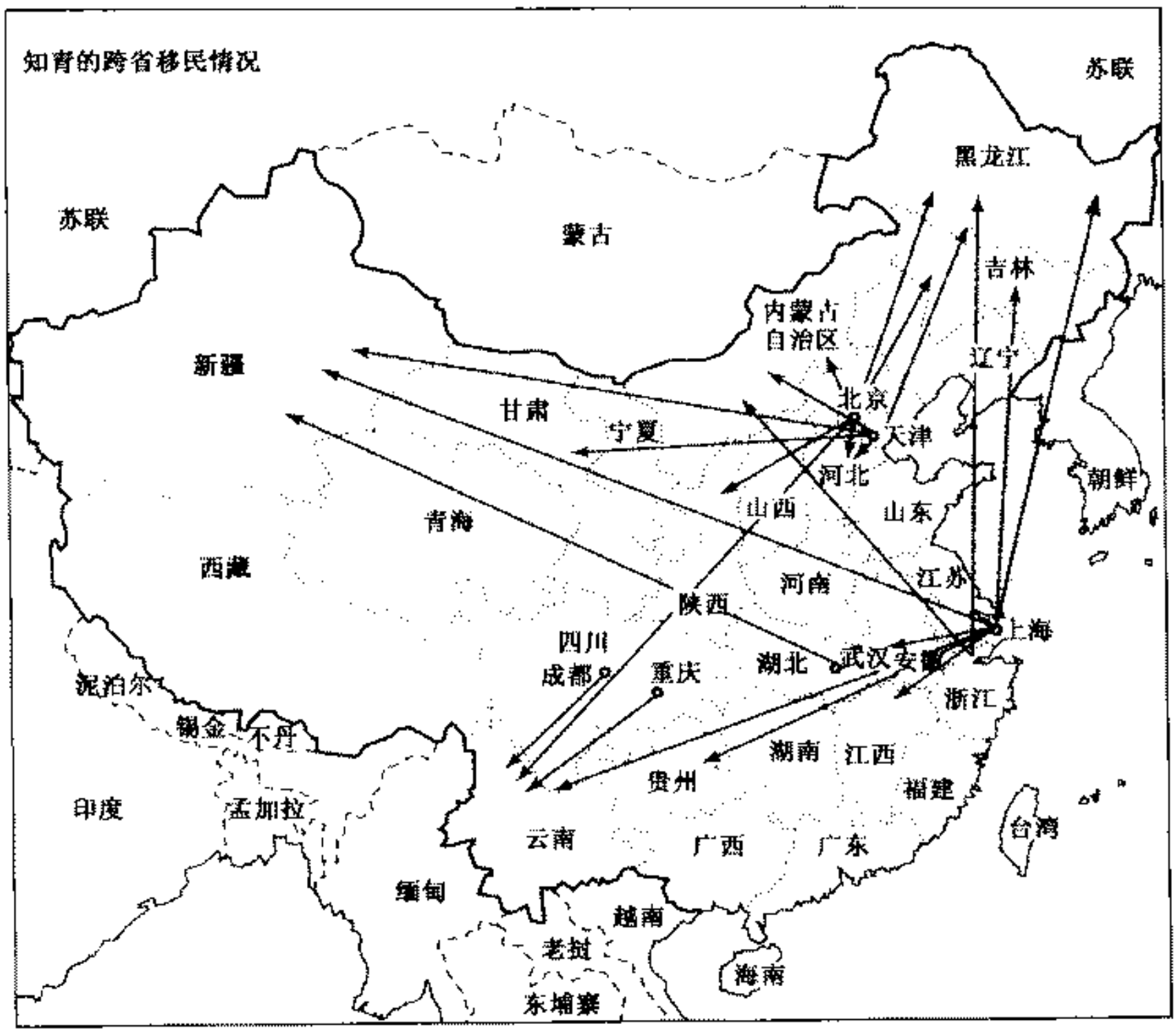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和第111页。

---

① 这些图表是根据下列数据制成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10～111页，及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3及301页。

从图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直至1977年，尽管已经有人回城，但在农村的知青人数仍然继续增加。①

下乡运动引致的主要跨省移民图显示出总的方向：从国家最大的城市，主要是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往最近的省份，或者向最远的边疆地区移民发展。大多数的迁徙都在省内或市郊，大约8%的知青（1962～1980年间17 919 800名下乡的知青中，有1 429 200名）被送到了外省去。



① 回城：这个词是简化了的，其实包括了已改变了身份但没有回原居城市的知青。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

当年组织下乡运动给政府带来许多忧虑烦恼，最后戛然终止又造成新的惊恐不安。人口的迁移也就将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去了，因此当局的注意焦点全集中到了城镇招工问题上去了[①]。实际上，中国在1979年面临着1949年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广泛的就业问题，那一年在各城镇有将近2 000万人等待安排工作，占了劳动力人口20%[②]。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与经济改革方向一致的，但其他的正相反，由于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构成对市镇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最初阶段，采用了各种对策来发展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其是那些只需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招聘更多职工的集体及个体企业。然而，对这类企业的钳制与歧视相当强烈。有一条法例就规定因特殊困难留城或回城的青年可以分配到国营企业，而因病留城或回城的就只能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在1979年8月废除了这项规定[③]。还有许多其他的歧视性的举措被取消了，同时通过提供贷款及减免税项来鼓励待业青年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或个体经营的企业。这直接关系到新近回城的知青，以及没有获得分配的留城毕业生。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工作（通常是临时性的），给无业青年（特别是近期回城的）开办训练课程[④]。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

---

① 株洲市成了这种发展的象征，因为安置青年取得的成绩，曾先后两次被提名为典型，而其郊区农场虽然几年前全国有名，但现在连提都不提了；见湖南电台广播，1979年6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2日，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6月4日第3版。

② 这个官方数字后来重新修订降低到1 500万了，但我们认为2 000万似乎更合理些。关于这个问题，见M. Bonnin，前引。

③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

④ 就是这样，上海徐汇区在1978年5月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队”，吸收了200名近期回城的知青，到1979年2月又把它改编成一个拥有900人的“公司”；见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4日。1979年8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司，那时容纳了近期回城知青的80%。见1979年8月11日进行的参观访问汇报打字稿，题为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1页。

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①。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②，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③。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④。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⑤。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1978~1983），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或“系统包干”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⑦。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下放到乡下去⑧。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的财富的取得既不根据市场

---

① 见本书，146页。

②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7页。

③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

④ M. Bonnin，前引，202页。

⑤ 《中国人口·上海》，150、156页。

⑥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152页。

⑦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25~31页；亦见《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前引，5~6、117、153页。

⑧ 见本书，104页。

的规律，也不根据公认的价值（像考试），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动用的“关系”。而普通人的“关系网”不会超越负责他们的单位。所以很自然的，要解决像子女就业这么重大的问题，他们只有围着单位转，向单位求助[1]。广东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这种模式，不同的是他们采取轮流下乡制，职工子女下乡两三年之后，企业会把他们招进本单位[2]。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职务世袭，导致出消极的后果，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积极性，还妨碍解决已超额的职工数量问题。

为了能抵销掉这些负面有害的后果，当局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效益，从1978年底实施“择优录取”的招工办法。最优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的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励到郊区农场去。这种模式强调新下乡运动的作用，但并不振奋人心，只可以看作是无业者的最后出路而已[3]。对大多数仍滞留在乡间或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来说，推行考核制度是他们命运途中的又一打击。他们当然比不过那些有幸读完所有中学基础课程的年轻毕业生。当年他们不但没能完成修业年限，就算在学校学了些知识也是杂乱无章的。那个时期里，占优先地位的是学习毛泽东选和参加政治斗争及体力劳动。后来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几年里，又把以前学过的一大部分忘记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双重的受害者。有的知青说：“过去四人帮迫害我们，不给我们读书的机会。现在招工又拿书来考我们，我们怎么总是倒霉？”让他们和年轻的毕业生竞争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的那几年在这场选拔试中完全不予考虑，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采取游行请愿的方式表示抗议。就算没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张铁生再世了，区别在于1979年的知青并没有否定考试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不满意当局无视他们的特殊经历。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来部分减轻知青的

---

① 本书第154页谈到的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的请愿行动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② 与G. M. 的对谈记录，1981年4月25日；亦见J. Unger，前引，169页。

③ 见关于上海形势的读者来信，载于《明报》1980年3月15日。

劣势[1]。

总的来说，1979 年与 1980 年为增加招工可能而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有效，在此两年间总共提供了 1 800 多万个职位[2]。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也包括了临时工，但尽管这样，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数实际上是提高了。城市里的失业现象当然没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当局其实很快就开始担忧失业对“社会气氛”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青年道德败坏及青少年犯罪[3]。所有无业青年（不论是知青还是其他）的处境都是很艰辛的，还影响到各自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些甚至处于赤贫之中。根据 1979 年初对家中含一名长期失业青年的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10% 的人每月所得低于 15 元人民币。那些待业青年偶尔才能找到的小工，一般也只能让他们每天挣到七八毛钱[4]。有些回家时年龄已经相当大了，那么他们的境遇就更加难以忍受。在北京，1979 年的头 5 个月里就录得 80 个因失业而自杀的个案。很多人对领导不满，认为失业令他们对当局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彻底产生怀疑。另外，一些青年游手好闲、整日游荡，又贫困交加，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时，城里各类罪案中的肇事犯罪分子，有 2/3 是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5]。

在求职者中知青往往是年纪最大的，但或许也是最精于组织请愿活动的。一般来说，与近年毕业的中学生相比，他们享有一定的优先权，至于那些留城的年轻毕业生，有很多需要推迟好几年才能进入社会工作[6]。尽管这样，大部分知青都得过好几个月之后才能获得工作，有的甚至得等几年。在上海，直至 1979 年 9 月底仍有 9 万多名获准回

---

① 刘小萌，前引，820 ~ 827 页。

② M. Bonnin，前引，215 页。

③ 见《人民日报》1979 年 6 月 8 日第 1 版，及 1979 年 7 月 24 日第 1 版。

④ 刘小萌，前引，801 ~ 802 页。

⑤ 同上，802 ~ 803 页。

⑥ 对 1972 年底前下乡的“老知青”，这种优先权理论上更加强调；见《工人日报》1980 年 7 月 30 日第 2 版，以及江西电台广播，1980 年 10 月 14 日，刊于 *FBIS*，1980 年 10 月 17 日。

城的知青处于无业状态[1]，此外还有不少未获准许回了城的，以及在等待批准回城的。江苏是招聘青年的模范省，但在1980年7月也只安置了88%的老知青[2]。到年底，有一部分人数很难估计，但又不可忽略的知青仍在待业之中。从1981年起，在全国招工数字里，知识青年不再另列，然而，有数字显示知青在西安该年国营企业招聘的青年中占1/3[3]。

由于有了“优先权”，大部分获准回城但到1980年还未得到安置的知青，到1981年也都获得分配工作。各项旨在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1982年底起，一般来说，青年都得到了工作，包括回城知青，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仍处于待业的其他人[4]。上海在1979～1982年间给153.8万人提供了工作职位，其中88.6万是回城知青[5]。可是知青不得不接受某些不太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许多都不能获得分配到有年龄限制的国营单位，只能去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些国营企业在1979年取得自主权，就把年龄上限降低至24岁，而在集体企业招聘工人的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6]。国营单位无论如何是没有足够职位以安置所有的求职者，因此众多的知青就得满足于能在不太吃香的集体及个体企业中得到一份工作[7]。此外，来自人民公社的（就是说大多数）还得忍受待遇上的歧视，因为不承认他们的工龄。有些知青年纪已经不小，却被招作学徒工，不过他们的学徒期限可以缩短[8]。

---

① 《文汇报》1979年9月27日第1版。

②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

③ 《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前引，163页。

④ 29个省市中有24个肯定已经完成安置工作；见刘小萌，前引，814页。

⑤ 《中国人口·上海分册》，269页。

⑥ 同上，189页。

⑦ 专家认为，伤残带病的、有过违法乱纪记录的、女知青以及回城的“老知青”都遭到国营企业的歧视，不列入招聘对象，因此发展上述那两种所有制的企业单位对安置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见《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前引，189、258页。

⑧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许多知青为了回城不得已“走后门”，但也有一些依仗着家庭的支持或者完全靠着自己个人的天分来摆脱困境。在那一股汹涌的回城潮中，成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走上了光明大道，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知青能达到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让大多数有意参加高考的知青都能如愿，政府将报考年龄提升至30岁。很多知青都去碰运气，由于入学名额有限，极少人被录取①。另外，年龄最大的知青还受到了大学的年龄歧视。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在1977年高考试中获取的分数已经可以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大学，可是最后却跟一群勉强及格的学生一起，作为超额部分，被分到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特殊分院②。从1979年起，入学年龄又重新降低到25岁，例外情况下可以提高至28岁③。1980那一年，极少情况被当作例外处理④，那些已经有了工作的知青对参加高考都已心灰意懒了。因此就出现了下列的变化：1977年的考生中只有20%或30%是该年的中学毕业生，1978年他们占了50%，1979年飙升到67%，到了1980年他们就占了绝大部分⑤。

1977～1979年间有43.9万名知青被大学录取，这个数字与1970～1976年间录取的工农兵学员⑥人数相当，或者稍高一点。上了大学，

---

① 见本书，132页，注释③。

② 《北京之春》第3期，见Widor，前引，卷2，229页。有关开办大学“分院”及超额学生，见S. Pepper，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Two Steps Forward，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CQ*，31，1980年3月，26～27页，以及S. Pepper，*China's Universities*，103～105页。

③ 新华社讯，1979年5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8日。

④ 到1982年就完全取消了；见S. Pepper，*China's Universities*，11页。

⑤ 见S. Pepper，*China's Universities*，页16～17。同时期，武汉大学的收生平均年龄从1977年的20岁降低到1980年的17岁；见S. Pepper，*China's Universities*，136页。

⑥ 总数为940 714，但无法知道其中知青的人数。这些大学生没受到良好的系统教育，因此他们的身份在1977年后也受到质疑而被降低。有些必须得再经过考试才能保住已有的职位。与他们同一代的其他人相比，他们能上大学，无论如何也算是走运的青年“精英”。

可以满足知青长年来压抑的求知欲，也使他们过三四年在大学毕业以后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们多少有点儿像是“文化大革命”掀起的知识海难中的幸存者。实际上，到了1980年底，几乎所有的老知青都成了“幸存者”，因为他们在多年梦想回城之后，终于都重返自己出生的城市。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没有消逝如烟。它的阴魂继续在社会上的某些角落游荡。

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20世纪80年代

为了摆脱那些小道消息的鬼影缠扰[1]，《辽宁日报》索性在198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省劳动局的负责人在文中驳斥那些说什么该年的毕业生会被下放到农村去而不能留城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尽可能多的学生会留城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很多可以顶替他们的父母，也有不少会被征兵入伍，或者被吸收进各区的“劳动服务公司”[2]。上述文章并没有排除送小部分青年下乡的可能。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就清楚地表明准备在5月会送一批哈尔滨的知青到郊区去，不过会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3]。从全国范围来讲，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在2月份介绍了一个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发展郊区农场、工厂及企业，将农工商三者结合起来[4]。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1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在第九条里也要求有效地管理好郊区知青农场，以及通过政治动员及经济利益的优待，鼓励无业青年下乡[5]。虽然第九条一再宣传这项1978年底就正式通过的政策，但是1981年下乡的人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最多是有些企业继续把职工子女的一

---

① 流言、谣言被戏谑地称作“小道消息”。

② 辽宁电台广播，1981年2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3月2日。

③ 黑龙江电台广播，1981年5月2日，刊于*FBIS*，1981年5月4日。

④ 《中国建设》法语版，1981年2月，27页。

⑤ 新华社讯，1981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81年11月25日。

部分暂时安置在农副业基地及企业自己在郊区开办的农场。10 月决定的第九条得不到响应，因为接下来那一年，再也没有下放农场这回事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报刊文章及政府文件中销声匿迹了。提出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是发展城镇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扩展“劳动服务公司”①。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1981 年 11 月 25 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务院知青办消失了。它被合并到一个新的机构里：国家劳动总局内新成立的就业司②。既然不再搞上山下乡，知青问题变成了简单的城市就业问题，那这个结果挺合乎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再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行政机构了。从中央来说，这类特殊的机构存在了差不多 20 年，其间因“文化大革命”曾中断过几年工作③。

省级和县级的知青办也撤销了，知青遗留问题就由劳动部门统筹管理。知青办公室最后两个重要任务是清理知青过去的财物以及给下乡运动做一个财务总结。

从 1962 年到 1979 年，知青安置费中拨付建房使用的就达到 30 亿人民币。国家还付出了几亿元用以购买农具、家具以及其他家庭设备。1978 年，知青开始大批尽速回城的时候，他们的财物很大一部分都遗弃在乡下，没有带走。有些农民早就觉得知青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重担，而且还得出钱出力给他们盖房子，所以后来就想将那些财物未得许可而占为己有，还准备挪用未曾使用的知青经费。1978 年春，在吉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全省被挪用的经费 400 多万元，还未计算用于个人的需要，请客吃饭，等等。此外，2.8 万多间知青住房（占全部

---

① 见《中国百科年鉴（1983）》，663～664 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9 页。1982 年 3 月劳动总局设置在劳动人事部内。

③ 关于这些机构的演变，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45～250 页。

住房的22.8%）被干部或公社社员占用了。在安徽做的另一项调查揭露出同类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下乡知青人数，目的不外是冒领经费。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具及家庭器皿用具等，有些被农民拿走了，有些损坏了，还有些是被知青带走了[①]。

因此，知青办与财政部为澄清财务的所有权在1979年4月联合发出了通知。该份文件指明一切财物以及未动用的经费应优先分给还留在农村的知青。至于剩余的房屋和物品，由县负责知青的部门代表国家折价处理，收回款项。用这种财产变价收入应该用于帮助留下的知青。如有余额，一部分留给县知青办使用，一部分上缴上级知青部门。生产大队要得到知青财物的所有权，就得厘定折价款，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队得跟进驻每个县的知青经费清理领导小组进行艰苦的协商。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最后的决定就在这些小组的负责人手里。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②]。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③]。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④]。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

---

① 刘小萌，前引，842～843页。

② 同上，843～846页。

③ 《北京志·劳动志》，53页。

④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9页。

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①。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②。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6%。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关闭知青办，并清算财物，但这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府依旧继续鼓励下乡扎根，还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仍在农村的知青。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③稳定在当地

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起码是接待他们的地区。政府关心他们的命运，着重于要表达国家是“负责到底”的④，同时也注意避免那些知青返回原居城市。的确，到了1981年，什么春节派“慰问团”、写“慰问信”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报刊仍继续树立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典型，他

---

① 刘小萌，前引，842页，以及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8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7页。

③ 这是张抗抗的名为《塔》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内心表达，见《塔》，载于《收获》1983年第3期，24页。同样生动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形容为“打在岩石上的巨浪，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溅起无数颗浪花，粉碎了，消散了”；金大陆，《世运与命运》，36页。

④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句口号，出自周恩来1965年对政府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6页。

们在专业上、在社会上都成绩卓越[1]。报章还高度赞扬一名天津老知青的事迹，她于1977年回城在一工厂工作，1979年又重新申请要求返回两年前离开的郊区农村[2]。可是这些特殊事例并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为数极少的留在农村的知青中，真正自愿留下的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被迫不得已留在当地的，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恢复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

虽然受到云南知青闹事风潮极大的鼓舞，但上海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抗争结果与云南有天渊之别，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一波三折，几经反复[3]。这些知青比较特殊，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前去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每年一批，4批共10万人[4]。这些青年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才离乡别井的，加上对少数民族风情的理想主义幻觉，使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离开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来到这个气候最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此外必须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在兵团中的反响特别强烈，而知青就成了冲击批斗的靶子，和干部们的关系很差。他们也不满意农场连年亏损，落后局面

---

① 《人民日报》1981年1月8日第4版，1981年5月4日第1版，1981年6月10日第4版，1981年10月27日第3版，1983年3月1日第3版，及1983年8月31日第2版。

② 《人民日报》1981年4月7日第2版。

③ 关于这个事件，除了当时官方报纸的文章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一份直接参加事件的目击者写下的详细阐述报告；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载于《争鸣》1981年6月号，12～16页。刘小萌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叙述这一事件（刘小萌，前引，748～764页）。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在香港跟一对上海老知青夫妻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在新疆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与F. M. D. 及L. L. Z. 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就是刘小萌对欧阳琏的采访，载于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445～505页。本书作者于2004年7月也采访过欧阳琏和几个参加过这个事件的前上海知青。

④ 提供的数字一般在8万和10万之间，后一个数字出现得最多；见路文，前引；《社会》1982年第一期，9页；《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四版；共同通信社，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日第一版。刘小萌、定宜庄与顾洪章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引用这个数字。上海和新疆的年鉴中的数字就偏低，但由于某些数字前后矛盾，所以可信度不高。

毫无改进，原因就在农场机关臃肿庞大[1]，充斥着不学无术的低能干部。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部分知青结婚成家，并且有了孩子。一个新问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前途问题。他们担心当地学校教育程度太低。即使借读制度可以让他们把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在上海读书[2]，但最后这些孩子还是得回到户口所在地：新疆。知青们不再年轻了，在农场熬了十几年，一心只希望能把孩子救出这个火坑。所以，当他们得知返城风潮刮起，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之时，特别是在外地农村或农场的上海知青，以及从其他城市来到新疆的青年[3]，他们都认为该行动了。云南知青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的知青[4]开始，建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也许是由于知青所处过于分散，消息传递太慢，这个上访团延至1979年4月中才启程，那时正巧是政治上再次收紧的一个时期。农垦部的几个负责人接见了他们[5]。代表们提出了知青的要求：准许所有愿意回上海的人回去。经过了十几天的讨论，中央当局的态度言辞非常强硬，农垦部要求代表返回新疆，还说很快会派一个工作组去向有关各方咨询意见。代表们乖乖地回去了，甚至没有在北京搞一点儿公开活动。回到新疆后，他们做了汇报，然后就等待工作组的到来，结果根本就没来。后来，倒是来了一个神秘的“农业生产水利工作调查组”，这个组走了没多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海青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知青们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酝酿另一次行动。由于据理力争没有任何效果，他

---

① 有的农场是6个职工养一个干部；见刘小萌，前引，749页。

② 这种“借读”办法不只在上海市才有，也并不限于知青之中，有些干部调到外地后也采取这种办法；路文，前引，以及与C. Y. L. 的访谈，1986年6月14日。

③ 也有天津、浙江、江苏、武汉和北京的知青与上海知青同时到达，不过人数少得多。

④ 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边：10万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万余名被送到了这个地区，他们到的时候，组成兵团农一师。到1978年底，只剩下2万9千人；刘小萌，前引，752页。

⑤ 这个部当时刚刚成立，见新华社讯，1979年3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8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文和刘小萌仍然继续使用“农垦总局”这个旧名称。

们就决定重返北京，即使被捕，也要搞出一定声势。7 月 19 日至 22 日，上访团代表分别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一边等火车，一边在这个自治区首府组织游行。那时正是 8 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30 周年纪念活动就在两个月之后，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中央当局下令劝阻他们赴京。行动果真火速，深更半夜，警察包围了代表们的所在地，把他们抓走了，然后严密监视长达一个月。那些已经上车走了的，半途在火车沿线的几个城市，被逮捕并押送回来。有一些到达了上海，他们张贴大字报，但没有赢得任何预期结果①。

到了年底，有组织的行动又开始出现在阿克苏地区了。在一个农场，500 名知青 带着他们的孩子游行，举着大横幅标语，上书“要奶奶”、“要外婆”。许多上海知青要求“病退”回城，有的抢了公章给自己的病历之类的文件盖章，以便上海有关方面同意接收。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有罢工，以致地方干部都开始接受知青应该回城的概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80 年 1 月 21 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解散“非法组织”，违者严惩。从 2 月 4 日至 15 日 11 天中，《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了 5 篇文章，强烈指责闹事分子，并斥责上访知青为“无政府主义者”。《通告》公布后，仍旧一片抗议声，知青决定“一边等着回上海”，一边怠工，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春耕。此外，未得准许就回上海的知青人数日渐增多，特别是那些有可能顶替父母中一方的走得更多。上海知青联合会虽说被解散了，其实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组织出现了，还鼓励知青用“特困”的方式申请回城。11 月中，三四千名知青聚集在阿克苏市，占据了农垦局招待所及其他的政府大楼。后来，来自整个地区的知青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还挑选了自己的总指挥：上海知青欧阳琏，他是丧妻而且没有孩子的鳏夫，所以他是准备豁出去，不惜自我牺牲的。11 月 23 日开始举行 100 小时的绝食活动。27 日，绝食宣告如期结束，但 200 多名知青晕倒昏迷，在零下 20 度的气温下送去医院。26 日地方政府曾经向参加绝食的青年传达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绝食行动，但毫不奏效。知青

---

① 见本书，157 页，注释②。

们又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二三十辆卡车，准备开到乌鲁木齐去扩大影响。不幸，有一辆卡车在途中，出了翻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大篷车队伍只好返回阿克苏。而那时，地方当局刚刚决定作出让步，同意发还给上海青年户口。青年们闻知，兴高采烈，回到农场变卖家具杂物准备走。他们收到户口准迁证和每人200元的搬家费。开了欢送会，气氛热烈感人，就像1979年初在黑龙江及云南那样。为了建设边疆地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10个寒暑，大家称颂他们的壮举，祝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继续奋斗。他们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南疆的另外两个地区：喀什和库尔勒，那里的知青也行动起来，取得与他们的阿克苏难友们同样的待遇。就这样，上海知青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然而，当这些青年朋友还沉醉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时，中央宣布不承认地方政府擅自作出的决定，并将游行请愿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上海当局则拒绝接收那些上海原居民，不予报进户口，当然也就不做工作安排。中央又命令兰州军区部队半途拦截回沪的知青。只有出示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出的特别许可证，才可以买得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在火车站的知青被逮捕，然后分送到不同的招待所，在那里有军用卡车把他们和孩子行李都送回原来出发的地方。几个月中，1万多名赴沪知青被劝阻、制止、收容。1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公开宣布逮捕9名知青领袖，另外43名扣押审查。

然而，还是有些知青成功地抵达上海，那一年的2月5日，他们与几千名春节回沪探亲的汇集在一起。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一共有大约2万名上海知青回了城[①]。大部分都想尽办法留在上海，但市政府拒绝给他们上户口，还责成公安局及派出所对他们施行监控，劝说他们离沪返疆。12月和1月都举行过游行请愿，可是在1981年1月11日那一次之后，上海当局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公开讲话[②]。其实，从12月起，中央就已经在考虑，想办法把仍在新疆的

---

① Kyodo（共同通信社），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

② 法新社北京讯，1981年1月15日及法新社香港讯，1981年2月2日，刊于*FBIS*，1981年2月2日。

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这个地区。3 月份，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双方经过协商，在 1981 年 3 月 30 日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那些详细的规定列出可以准许回上海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回沪顶替退休的父亲或母亲，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知青，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精神病的青年等（其实就是顶退、困退及病退）。为了避免城里接收过多的知青，有的规定非常细致：已婚夫妇，若只有一方符合规定，就不能两人同时迁回上海市，但可以调到上海所属的农场①。所以，在 1982 年 2 月至 1983 年 11 月期间，位于江苏北部直属上海的海丰农场就接收了 6 100 名知青和他们的孩子，还建造了新的居住区准备迎接其他陆续到来的②。总的来看，根据 1984 年 4 月的统计数字，1 万 6 千知青可以按新规定离开新疆，另外有 3 万最后必须得接受留在新疆。这后一个数字包括 1.7 万当时已经非法回了城的知青，上海政府借助派出所的压力、官方宣传的疲劳轰炸，有时甚至是父母（他们不太愿意因收留已为人父母的又没有就业前途的子女而自找麻烦），最后得以将他们送回原地。1 月 14 日起，报章，作为大事件那样，报道一位回沪探亲的女知青启程回新疆③。1 月底宣布有 340 名知青踏上回程之路，2 月中又宣布 1 000 多名，3 月底 3 000 名④，每一次都声明还有其他的准备跟着走。其实，尽管各方各级负责人都尽了最大的力量，下放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这说明已回上海的知青是铁了心的了，加上他们认为事实上已经跟新疆一刀两断。后来，政府不得不同意负担交通费以及买家具、生活用品的置家费，因为那些知青在离开新疆前把东西都卖了，现在回去就得自己重

---

① 由于各种差异，因此对不同的相关人士出现了不同的名词："单顶"和"双顶"。与 F. M. D. 的访谈记录，1985 年 7 月 21 日。

② 《解放日报》1983 年 11 月 20 日第 2 版。另一个资料来源称，有 1 万 4 千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在 1986 年底调去了这个农场（《明报》1986 年 12 月 26 日第 2 版）。与整个回城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相当大。

③ 《解放日报》1981 年 1 月 14 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81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

④ 《人民日报》1981 年 1 月 29 日第 1 版及 1981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文汇报》1981 年 3 月 21 日，刊于 *FBIS*，1981 年 3 月 31 日。

新购买或者让在上海的父母购置[1]。有一位上海女知青，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城，甚至跟她那个在新疆的知青丈夫离了婚。现在她就成了区政府的耐心说服对象，派出所还跟她原来的农场联系，让她的前夫与大儿子写信劝她回新疆。在回沪一年多之后，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在1982年4月回到农场，还跟她的前夫复了婚[2]。如同1979年，报章不断发表报道，说明回农场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3]。

在1982年及1983年报刊特别强调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力赞扬那些借着承包制多挣了钱的[4]，或者得以上调至负有重要责任的岗位的知青[5]。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交通，从上海到塔里木地区“只”需要7天了[6]。1983年还推出了一项协助建房计划，让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贷款以及低价的建筑材料来为自己盖房子[7]。上海当局仍继续动员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开个欢送会[8]。另外，还威胁那些从事非法买卖的青年，要采取司法手段告他们，其实就是要截断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后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合法机构得到工作，也不准搞个体户[9]。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劝解鼓励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这些非法回沪的人中，有20%还在那儿[10]。当局施加的物质及精神压力直至1984年才初见成效，那年1.7万知青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农场。

---

①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第1版及1981年4月15日第3版。

② 《解放日报》1982年8月14日第2版。

③ 见本书，162～163页。

④ 就好像“三芬”，那是3个上海女青年，她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芬”字；见《解放日报》1983年3月21日第1版，以及《人民日报》1983年8月31日第2版。

⑤ 比如有两位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第2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里的第一位女领导人（《解放日报》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

⑥ 《解放日报》1983年1月25日第2版。

⑦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7日第2版。

⑧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2版，1983年9月4日第2版，1983年9月20日第2版；《文汇报》1982年8月10日第2版，1982年8月11日第2版。

⑨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2版。

⑩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2版。

无论是这些严厉手段，还是最后的功效，若是没有中央的积极支持，就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可以给予其他知青的，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就无权得到。这些青年头三次行动过于迟缓，又有点儿迟疑不决，也许因此使他们错过了 1978 年底 1979 年初的宽松时期。当他们觉醒需要行动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城，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①。实际上，与 1979～1982 年间回城就业的 88.6 万知青相比②，新疆的 3 万知青不应该构成难以负担的重荷。我们觉得另一个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有意要发展新疆，并在这个地区留下尽可能多的汉人③。这种意愿从 1979 年起，就持续不断地显露出来，而且体现在由“双王”（一个是王恩茂，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是王震）组成的某种“新疆的压力集团”里。我们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队里的不满情绪以及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形势变得很紧张④。中央表示要严肃面对这一形势。王震在 1980 年 10 月、1981 年 1 月和 5 月到新疆去视察了 3 次。他接见了上海知青，并和他们交谈。8 月份，他又去了一

---

① 客观条件应该是行动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区辽阔，而且地处偏远，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大部分已经成了家，这就令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

② 见本书，184 页。

③ 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下放新疆的知青与众不同的例外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现今的领导人都当权（见《中国之春》1985 年 5 月号，30 页）。但我们从来未曾遇到过其他“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知青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在《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1 日第四版，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 1963 年下乡的女青年拒绝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机会。还有，20 345 名主要在 1965 年及 1966 年分别下乡到边境地区的山东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的原居省份；见田芳等，《中国人口迁移》，344、346 页。

④ 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特别是 1980 年初及 1981 年 10 月底在喀什，以及 1982 年初在叶城；见《人民日报》1983 年 1 月 14 日第三版，《争鸣》1983 年 1 月号，34～37 页。维吾尔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统治之间产生最多问题，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次，是陪同邓小平，那是邓第一次踏足这个地区[1]。就在这次新疆之行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王震安排负责新疆工作的王恩茂，重新把这个地区的领导权抓回来。他替代了汪锋，汪执行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政策，他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方便内地来的干部回去[2]。中央当局可能怀有一种惧怕：知青返城会不会引起内地来的专家以及基层干部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这些人跟知青相处融洽、情投意合，而且很支持青年人离开新疆的要求[3]。1982年6月重建了在1975年解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这就是中央要重新紧紧地控制这个地区的重要象征。从1983年开始，重点就放在了经济的重要性上，尤其强调要开发丰富的矿藏资源。当年的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几次亲身上大西北，特别是去新疆，他曾在那儿说过："到这个世纪末下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不可避免地会落在大西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共同观点"[5]。在他的一番讲话之后，赵紫阳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都到新疆来视察重申这一观点[6]。8月11日，他们抵达阿克苏，从那儿又乘车颠簸60公里直奔农一师第一团场。上海知青送上西瓜和葡萄，赵紫阳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丰富的水果、蔬菜和水产，又不贵。比上海好多了。大城市

---

① 见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10月5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第2版；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1月20及21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1及22日；新华社讯，1981年23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3日；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5月17日、1981年5月19日、1981年5月22日及1981年5月24日，刊于*SWB*，1981年5月21日、1981年5月23日、1981年5月27日及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讯，1981年8月22日，刊于*FBIS*，198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1981年8月29日，刊于*FBIS*，1981年8月3日。

② 《争鸣》1983年1月号，36～37页。

③ 路文写道，游行示威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占据了阿克苏的行政大楼，因为中下层干部都同情他们。另外，并不是新疆部队负责出面阻止知青回上海，而是兰州部队，因为中央政府不信任当地部队；见《争鸣》1981年6月号，12～16页。

④ 新疆电台广播，1982年6月1及2日，刊于*FBIS*，1982年6月3日。颇有意义的是，这是唯一一个重建的兵团。

⑤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

⑥ 新华社讯，1983年9月1日，刊于*SWB*，1983年9月7日。

有它们自己的问题。人人都去上海，怎么挤得下呢?”① 他还请青年代表回去向在该边疆地区安家的全体知青转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问候。

那个时候，发展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就已经摆在了优先位置，领导人同时也强调必须发展大西南（西藏、云南和贵州）以及所有的边疆地区。紧跟着的是要给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内地青年戴上各种桂冠。为此，1984 年 10 月 1 日，借着 35 周年国庆之际，《中国青年》杂志及另外 10 种青年杂志在王震的支持下，搞一场大规模的选拔赛，要“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在那个时期，只要是青年杂志，就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最出色的知青典型的文章或报道②。关于边疆地区工作的宣传并不仅仅限于替经济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得激励起爱国主义情怀，国家一步一步的发展说得好像是当年皇帝欲向西部扩张的延续。在一篇有关西藏的报道里，作者这样讲述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文成公主和她的大队人马永葬在西藏高原，但她所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却吸引着无数的后来人前赴后继。”③ 王震在 1980 年追忆往事时说屯垦戍边是历史上老祖宗从不忽视的，毛泽东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④。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 1979 年对王昭君的重新评价⑤。有一篇文章居然把王恩茂与汉朝的班超相提并论，将近两千年前，班超大将军两度出使西域，把毕生贡献给异域的治理，直至 70 岁才告老回京城。王恩茂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因为他是 70 岁才出使新疆。有一件充满温情伤感的事情，必须要记上一笔：王震公开宣布决定他死后火化剩下的骨灰将要撒放在天山，而王恩茂

---

① 新华社讯，1983 年 9 月 1 日，刊于 *SWB*，1983 年 9 月 7 日。

② 《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新华社讯，1985 年 5 月 30 日；《中国青年》1984 年 10 月及 11 月号，以及 1985 年 1 月、4 月、6 月及 7 月号；法新社北京讯，1985 年 6 月 16 日。

③ 《中国青年》1985 年 7 月号，7 页。

④ 《人民日报》1980 年 10 月 16 日，2 页。

⑤ 见本书，166 ~ 167 页。

则说死后一定要葬在乌鲁木齐[1]。他们两个都是想告诉大家，人不是非得回归故土才撒手人寰的，或者说人可以有好几个故乡。王震在当时也说过江西省的一个垦殖农场就是他的第二故乡[2]，所以加上新疆以及他的出生地湖南，他就有了至少3个故乡。

对边区工作的歌功颂德持续到1985年，胡耀邦在北京接见了1955～1956年间随“青年志愿垦荒队”下去的知青代表，并高度赞扬他们的行动。其实，胡耀邦本来就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他甚至建议要让今天的青年大唱特唱当年谱写的歌曲[3]。过了没多久，1985年8月2日，中央书记陈丕显在哈尔滨接见了1968年就到了黑龙江，现在仍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代表。据他说，原来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共有8万多上海知青，如今只剩下3千多一点[4]。陈特别指出：“留下的知识青年应当根据他们知识、文化和专长以及个人志愿来安排工作。”他又补充说：“对于不太安心边疆工作的知识青年，应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思想工作，最主是把经济搞上去，富了，许多问题就不在话下了。”[5]

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不满情绪不是只在新疆的知青中蔓延。1983～1985年间普遍实行承包制，又把大型国营农场分成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写的文章，文中展示出推行承包制以后，经济上得到极大改善，好一片令人鼓舞的景象[6]。然而我们很清楚，在新疆和黑龙江，这种

---

①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3版和1980年10月16日第2版。王震在1993年85岁时去世，之后他的骨灰真的用飞机撒在了天山上空；见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1993年4月7日第11版。

② 江西电台广播，1983年2月18日，刊于 *FBIS*，1983年2月22日

③ 新华社讯，1985年5月1日、1985年5月7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 *SWB*，1985年5月4日、1985年5月9日及1985年5月14日；《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4版及1985年7月30日第4版。

④ 实际上，总数超过14万（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5页）。官方对数字向来都是随随便便差不多的。

⑤ 《黑龙江日报》1985年8月3日第1版；亦见新华社讯，1985年8月3日，刊于《人民日报》1985年8月4日第4版，也刊于 *FBIS*，1985年8月6日。

⑥ 《解放日报》1986年5月18日。

大变动给知青造成许多困难，他们不像出身农民的那么容易适应新制度，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给他们撑腰①。1985 年黑龙江省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许多农场产量大减”②，因此这个省的情况特别困难。省政府不得不“按照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政策而采取措施，替复员军人或军官以及下乡知青寻找合适的工作”③。他们与上海市联系上，并取得上海方面的同意在黑龙江投资建立工厂，在上海青年中招工④。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在各种类型的知青中，对当局来讲，与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的问题特别复杂。根据上面介绍过的 1978 年底有关知情工作的全国会议的决定（后来写进了 1981 年 10 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的第九条里），继续尽力为他们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就是说非农工作）。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和北京，则在经济上资助地方来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获得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以及附近乡镇的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带一名 15 周岁以下的子女迁入市镇。然而，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偏僻农村的知青来说，找到非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已经万分失望只好向命运低头。1984 年 8 月 31 日，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通知再次指出，应当优先使用历年结余的知青经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余经费不足够的情况下，就业劳动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补助费。从 1985 年起，这类知青大部分都在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⑤。有的地方，另一方配偶也可以获得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及城镇户口，这样就可以解决子女的户口问题。丧偶的知青（通常是女知青），以及因配偶犯法判刑而离了婚的，在某些地区可获准许返回原

---

① 与 F. M. D. 1985 年 7 月 21 日，以及与 K. K. Z. 1986 年 6 月 30 日的访谈记录。

② 黑龙江电台广播，1986 年 2 月 17 日，刊于 *FBIS*，1986 年 2 月 19 日。

③ 同上。

④ 与 K. K. Z. 1986 年 6 月 30 日的访谈记录。

⑤ 有关这一段的资料，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2～214 页。

居城市[1]。尽管政府对知青表示了“关心”，其实就是想法避免他们带着配偶及子女回城，总的来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命运最坎坷，有的结局甚至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2]。

病（包括精神病）残知青的安置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很多是在无例外的人人都得下乡的 1968～1969 年间，被送到农村生产队的。有的是后来病倒的，或者在农村的一次工伤事故中致残的，不管是谁，他们全体都遭到城镇工作单位的拒绝，招工没有他们的一丝机会。长年以来，他们靠着村子的扶助得以生存。从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就不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有很多自己利用了“返城风”的机会而回了城。比如，在吉林省 1978 年初病残知青共 21 712 人（占插队知青总数的 2%）。省政府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其中 13 340 人得以在 1978 年底前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另外 871 名安置在邻近的城镇。到 1980 年 11 月，只剩下了 356 名仍在农村，其中 33 名 100% 残废，323 名 50% 身残。所有人都可以在随后那几年离开农村[3]。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设法来限制病残知青回京。1969 年，曾经有过一个决定，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在下乡插队之前就已经是病残。其实，在 1972 年，因工伤事故致残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 1979 年，回城的权利才被承认，而且得到一定的协助。1982 年 3 月解冻了一笔为数 80 万元的款项用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 1987 年，还动用了知青结余经费，在经济上帮助病残知青[4]。一般情况下，总是尽力替这些青年在当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父母的单位就得招聘他们。其他的会在民政部门管理的特殊工厂获得一份工作。

---

① 刘小萌，前引，839 页。在吉林省，1979 年以前离婚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回城。看来，暂时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有人仅仅为了返城而离婚；见《吉林省志》，98 页。

② 见本书，281～282 页。

③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97 页。21 712这个数字是经过“1973 年以来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可能里面不包括 1978～1979 年间“装病”而得以回城的，那个时候病退已经成了回城的一种例行手续，没有什么医疗疾病的意思。

④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51 页，以及《北京劳动大事记》，196 页。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

不满情绪还在全国几十万老知青之中蔓延，他们都是在1970年代上调到非农业工作岗位的。某些人获得的职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县或区一级当干部的，回到原居城市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定会差很多。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要求回去，起码在头几年①。但是，大部分都抱怨在当地总被人看作是“外人”而受到歧视，他们一直与原来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都希望回城，但一般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很分散，这就使他们只能个别找办法，而不能采取其他的诉求方法。应征入伍后又复员回到接待地区的老知青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之中的一位，王志刚，是1968年下乡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曾参军，复员后分配在该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工作。1980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火车站引爆了一枚炸弹，为的是抗议上面拒绝他回京城的要求。这桩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了10死81伤②。几年以后，留在山西的知青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更合理但没那么激烈的行动：在北京市委机关门前静坐。计有数百名参加者，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从1985年4月22日到29日③。他们高举4条长幅标语。有一条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还有一条写着“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他们向外国记者哭诉当局怎么不准许他们回家，他们怎么干着收入低微的活儿，而在那里还总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当众演讲。一位73岁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们的静坐行列，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一直在山西，现在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当时组织这样一次中外通讯都争相报道的行动？解释极可能就是，山西政

---

① 《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20页，该文谈到一名呼和浩特知青怎样成为一个盟（相当于地区）的党委书记。然而，在那些得到了比较高的职位中，有一部分后来是“为了子女”而要求调动工作的。肖复兴就举了一个例子；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329页。

② 新华社讯，1980年11月12日，刊于*SWB*，1980年11月15日，及*Le Monde*，1980年11月14日。

③ 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4月25、26及29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

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农业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据该次行动中公布出来的数字，3.6 万名到山西插队的北京青年中，1.8 万名还留在那边，占总数 50%，是很例外的情况[①]。北京政府对静坐的知青代表态度很强硬，至少表面是这样。经过和副市长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 4 月 29 日下午接见了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静坐，“尽快地”回到原单位，还把这次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流毒的表现”[②]。他们又指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依照“正确的政策”给这些青年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所有官方文章都称呼他们为“原北京青年”，而不是北京知青。数天后，报章宣布第二天就再没有一位青年到那里去继续静坐了，而且他们之中至少有 220 名已经返回山西了[③]。同时期，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表彰 20 世纪 50 年代“青年志愿垦荒者”。《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文，特别强调北京青年在山西省的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当上了企业干部或政治干部的山西北京人，还有作家，像柯云路[④]。然而，那一群人仍旧继续吵着要回城，趁着 1986 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在北京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没有上一年的多，2 月 7 日有大约 300 人，而 11 日 100 多人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前。后来，没闹什么事就散了，政府也没有接见他们[⑤]。不过，跟着那几年，虽然有来自警方的压力，他们还是继续组织在一起，呈交请愿信。下面这段心里话是他们向一位记者倾吐出来的，很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 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⑥]

---

① 《中国青年报》1985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顾洪章提供的下乡数字稍微高一些：41 300。

② 《人民日报》1985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③ 《人民日报》1985 年 5 月 5 日第 4 版。

④ 《中国青年报》1985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⑤ 法新社北京讯，1986 年 2 月 13 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 年 2 月 27 日，9 页。

⑥ 《动向》第 42 期，1987 年 9 月，10～11 页。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山西老知青在1986年展开了行动，那时中央刚明确表示要尽可能将他们稳定在当地的意图。快到春节的时候，北京市长和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特别是胡启立、李鹏、郝建秀、张劲夫），在1986年1月28日隆重地接见了一个名为“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团”。这个团由12名20世纪60年代末期下乡的北京及天津青年组成。来京之前，他们在山西全省各地巡回报告，参加了各种会议，并在会上讲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那些“感人事迹”①。

北京会议很明显是要与1985年4月请愿者们的反抗精神较量一番。但实际上，会议的议题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摆出一副给上山下乡运动恢复名誉的架势，还号召继续下乡。郝建秀为运动描绘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然后宣称：“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现代化建设中，支援农村、支援边疆，仍然是历史赋予的有志青年的光荣职责。”胡启立也重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支援内地和边疆”②。

中央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虑再次掀起一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呢？显然不是。“支援内地及边疆”这个口号仍然被高举，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迥然不同的目的。20世纪50年代及20世纪60年代下乡的众多典型其实不是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些年轻的干部、高校毕业生或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③，如同当年，1984年起，动员下乡的宣传对象不再是广大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小部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年毕业考之前，压力就来了，要求学生中绝大多数表态：毕业后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跟1960～1970年间的知青相比，

---

① 《人民日报》1986年1月29日第1版。

② 同上。

③ 这特别是1955～1956年间的大部分“青年志愿者”的情况；见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1950年代下乡的年轻工程师、医生及教师都被当作榜样；见《人民日报》1983年5月17日第3版。

真正下到边疆及农村地区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与20世纪50年代相类似，一般是每年几百名，最多也就是几千名[1]。为了使人比较容易接受到边远地区去，政府向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优厚的经济条件[2]，而且实行轮换制度，这些青年人仍保留自己的城市户口，在服务期结束后有权返回原居城市。政府甚至还请那些准备调往边远地区的毕业生亲自去实地看一看，让他们相信那里是“可以生活”的，而且在那里是可以有作为的[3]。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统一分配，但负责人总是希望让学生自动提出申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照胡耀邦的说法：“他们不会专心工作，只会扰乱军心。”[4]当时大学生之间盛传一条幽默流行语：“志在天南海北，不去新西兰。”意思其实是：“我下定决心要去天津、南京、上海或北京，而不去新疆、西藏，也不去兰州。”[5]

政府要继续将一些专业人员送往敏感的落后地区，并把相当数量的老知青和下放干部稳定在那边，这就能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新为下乡运动唱赞歌的奇景。在那个时期，负责干部们都热衷于展现一幅冲淡了的下乡运动历史画页，当时官方的话语可以这样概括起来：

> “文化大革命”以前，知识青年都是自愿而且充满美好的理想上山下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政策确实受到过‘左’的干扰，但即便在那时，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

---

① 北京的数字，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9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3年8月11日及1985年5月14日。不可混淆那些要求到边远地区去的新毕业生人数和那些真正下乡的。在北京，仅在1984年就有1 000名学生提出要求，但实际上从1981到1984四年间一共只有900人下了乡；见*Chinese Youth Bulletin*，1984年10月，11页，以及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

② 见胡耀邦在青海的讲话，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

③ 《青年一代》1985年第6期，9页。

④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

⑤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25日第8版。官方发出过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好儿女志在四方”，而那条流行语正是拿“四方”来开玩笑，明确指出学生要去哪四方工作。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以前已经有这种说法，不过没有提到“新西兰”，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2版。

年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有病、有困难的知识青年已调回北京，其他人也按照中央的政策由当地安排了工作。[①]

这种想把下乡运动的悲惨一面一笔抹掉的企图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当时有一部名为“WM（我们）”的话剧就屡遭禁演，话剧赤裸裸地描写了知青的动荡命运[②]。电视就上演宣传新路线的作品，像电视剧《当你18岁的时候》，目的就是批判青年中泛滥的怀疑一切的心态，他们怀疑20世纪50年代知青典型的存在，更普遍的是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理想。

这种宣传并没有影响到政府继续具体解决抗议者的部分问题。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干部“小组”，专责研究仍滞留在市外的知青们的困难。仍滞留在接待地区的老知青经常提出一个要求：准许他们的子女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读书上学，因为学校的水平一般都比外省小市镇的要高得多。北京成立的那个小组就说明首都是第一个接受知青这种要求的大城市。1988年10月15日起，北京市准许每户可以为一个既未婚又未就业的子女调回户口，唯一条件是要有一名近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姑叔舅等）在市内作为监护人。1989年上海及天津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随后浙江与湖北的一些城市也作了相应的安排。至1993年年底，有21.4万名知青的子女得益于这项政策，其中上海办回11.6万人，北京办回4.69万人，天津办回4.65万人。所有的这些子女都获得入学或者工作安排[③]。在1986～1990年间，北京干部“小组”还直接接纳了200多名原知青返回北京。此外，在1986～1994年间，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首都劳动人事部门共批准了

---

① 见《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4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7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瞭望》1985年5月13日，刊于*FBIS*，1985年5月28日。

② 《九十年代》1985年12月号，60～61，78～79页。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15页。

31 663 名老知青回京[1]，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大部分北京知青[2]。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知青因为不同的理由而没有获得准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返城，但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生活在原居城市。所以，到 1989 年，名义上留在黑龙江农场的老北京知青只剩下 3 900 名（最初一共有大约 10 万名）。然而事实上，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住在北京，但没有户口。根据一项调查，某农场理论上应该有 178 名知青，可只有 82 名是真的在那儿，在另一个，53 名中只有 23 名是常驻农场的。留在当地的知青比率可能只有 1.5%[3]。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其中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的处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令人不满，也引起很大争论[4]。在当年，工龄直接影响职工的日常生活，决不可忽视：工资级别主要由工龄来决定，连分配住房，子女入托儿所的名额，等等，都与工龄有关。从国营或军垦农场回来的知青工龄的计算法在 1975 年就已经通过。1978 年，在江西，因病或家庭困难从农场回城的知青工龄也准许计算，以前他们得不到这个待遇。这项措施 1980 年在全国实行[5]。1980 年 9 月，在 5 届人大第 3 次会议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通过法例来改正对待在城市就业的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事实上，与下放农场的知青相反，插队知青在农村度过的时日一概不予考虑，不算工龄。这种歧视在 1979 年 11 月的那次 40% 的工资调整中表露无遗[6]。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在 1982 年就提议所有知青的劳动时间都应该计算在工

---

① 《北京省志·劳动志》，52 页。1990 年突然加速批准回城要求，这应该是北京市政府在 1989 年后想改变形象的一种表现。

② 与一群老知青的访谈记录，2000 年 8 月 5 日于北京。

③ 杜鸿林，《风潮荡落》，420 页。

④ 有关这个问题，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206～212 页。

⑤ 《劳动政策法规全书》，第 2 册，371～372 页。

⑥ 《人民日报》1980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龄之内。但某些省市害怕经济负担太重，用了种种借口抵制合理的计算。一直等到 1985 年 4 月胡耀邦出来表示要强制实施这项措施[①]。1985 年 6 月 28 日劳动人事部颁布 23 号通知，才把该措施作为法例定规下来，按新精神确定工龄后，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照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这次调整没有追溯效力，过去的，就不再算老账。决定中一些比较特别的措施如何实施，由地方劳动局自己掌握，但直至 1986 年夏季很多地区还没有即时公布清晰详细的规章条文，一份上海报纸还需要回答读者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在上海，不管知青在农村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管接待单位是哪一类，规章能使他们全体都受益于这项措施。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②]。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 0.50 元，就是说一个有 10 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 5.00 元人民币[③]。

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 1 500 万人。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 5% 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 80 万左右[④]。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领导，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泽东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

---

① 一位在农村待了 14 年的湖南老知青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才使胡在 1982 年底决定接受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见《文摘》2004 年 2 月 6 日，2 页。

② 《文汇报》1986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③ 与 X. Z. 的访谈记录，1986 年 6 月 20 日。

④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 年 8 月 24 日。

一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泽东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轻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

第三部分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

第八章
沉重的启程

红卫兵这一代少年，从小就在学校接受特别的教育，要他们熟悉农村生活，并把一幅农村前途无量的远景展现在他们面前。从1950年代中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领导都紧抓两项工作：一方面把农村出身的毕业生送回老家，另一方面下放一部分城市毕业生到农村去，在此同时，学校课本大树农民的崇高形象。这个形象无处不在，就算供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儿童使用的小学课本里也能看到，“人物描写的背景总是农村，城市生活是不会出现的”①。学校还定期组织下乡，一般在假期中，学生参加农田劳动。从1963年起，某些普通中学还采用了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教材②。

在中学生中特别展开知青下乡光荣的宣传，而且还推出一些农村或城市出身的模范人物，像邢燕子、侯隽与董加耕③，他们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为了教育青年，当局出版了颂扬垦荒先锋队的苏联及中国小说④。

---

① R. Martin,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China and on Taiwan : An Analysi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China Quarterly*, 62, 1975年6月, 253页。

② 《人民日报》1963年6月20日第2版。

③ 见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6~22页。

④ 作家梁晓声认为，阅读这些小说，影响了他决定去北大荒；1986年9月21日的访问记录。另一位作家张抗抗则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她曾被一本小说深深感动，那是歌颂一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女青年的，以至于她本人甚至考虑要停学到新疆去；见张抗抗，《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53~154页。

然而，我们收集到的资料都显示出，这些有系统的思想准备工作似乎没有用，因为当年的大部分城镇青年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未来投身到农村去。宣传根本没能彻底改变城市人的价值观。此外，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有一小部分城市中学生表示可以接受这类宣传，并把走向农村当作是实现自我的另一条道路，但到了1968年这种学生就更少了。他们对农村的了解比以前强得多，那是因为一方面有了早期下乡而“文化大革命”中回城的年轻人的见证，另一方面大量红卫兵在调查旅行或大串联中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1]。

动员工作

所以，从1967年秋季起，自觉自愿下乡的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只剩下很少。

开始，建立了一项动员制度，逐渐就变成了强制性的了。军训组，后来是工宣队或军宣队以及由他们控制的三结合小组，他们在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进行宣传活动。有些学校的领导又拿出“文化大革命”前使用的三道板斧，就是尽量将下乡地点描绘成充满异国情调、田园风光的图画[2]。不过，一般来说，总是号召青年们要有革命的牺牲精神，要忠于毛泽东。因此，领导们首先努力说服先进分子，让他们去影响周围的同学[3]，又让第一批报名的贴出大字报表决心，把他们的名字登上红榜。这种精神压力还加上某些具体的诱惑：可以在学校提出的两三个下乡地点中进行挑选。这自然就产生出某种微妙的假仁假义手法：原则上，积极分子本应自愿选择去最艰苦的地方，结果却经常如愿以偿去了最好的地方，为的是让那些还犹豫不定

---

① 见 Autobiographie de Wei Jingsheng, *Perspectives Chinoises*, 1993年9－10月，第13期，52－60页。

② S. Fantanange, Yunnan Mini-Tragedy, *Asiaweek*, 1979年5月11日，以及 Liang Heng & J. Shapiro，前引，142页。

③ 这种方法在一篇文章中得到极好的描述，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1版。

的明白，最先报名的总能得到最好的照顾[1]。1968 年冬季，尤其是该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指示发表以后，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当初强大得多。“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2] 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样一句话不仅构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也给予了另一些更具体的压力以足够的理由。一方面，被领导决意强制报名的年轻人在城里根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尽快表示服从，他们的档案就会被转去他们父母的单位。单位即刻给那些父母们组织“学习班”，要他们说服子女下乡。有些情况下，停止给进入“学习班”的父母发工资，还以开除公职来威胁他们。街道委员会的头头们也插一脚进来施加压力。他们上门和那些父母“交心”，又召开街道大会小会，当然是表扬听话的家庭以及批评其他不顺从的。有些父母还受到威胁：这样下去，连他们自己都得下乡。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女知青拒绝下乡，一个工宣队员干脆住到她家里去，一直到她表示同意下乡才走[3]。

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一样，当局的号召一发表，跟着就有群众大会、敲锣打鼓、游行庆祝，特别是发布主席的最新指示之时，以及知青集体下乡临行前，这类活动总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后一种情形下，这些活动首先就使那些尚未决定下乡的知青感到孤立。

每个年轻“毕业生”的反应当然决定于个人性格，但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父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个年代的混乱局面下的政治身份。在少数真正志愿者中，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将上山下乡看作是革命的继续[4]。他们一心要表现出他们对得起党对他们的信任，并给他们的同学树立好榜样。那个时期就有一个清华附中的拔尖学生，出身红五类。北京物理研究所向她提供职位，但她谢绝了，报名自愿到青海去工作：她作为共产

---

① 与 C. B. 的访谈记录，1985 年 7 月 22 日；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载于《小说家》1986 年第 6 期，7 页。

② 《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5 日第一版。

③ 邓贤，《中国知青梦》，62 页。

④ 见 M. J. L. 一例，本书，35 页，注④。

党预备党员，绝对要成为运动的急先锋。她刺破手指写下表决心的血书。对这些红卫兵来说，为该选择而作出的个人牺牲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要“烧掉克林姆林宫的红星”、“唱着国际歌穿过巴黎的街道”，要去攻打“地球上最后一个白点：白宫”①。

然而，头一批报名的不是全部属于出身好的。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痛苦地体会到被红卫兵组织排斥的滋味②，因此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人表明他们并不比其他人不革命。有些则用这个办法来和他们的家庭“划清界线”，在牺牲中赎罪。其中许多人都怀有一个最微小的希望：政治包袱别再跟随他们下农村。由于他们自认没有丝毫机会能够抵制下乡，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走在前面，从而得到些许嘉奖③。另外有些人报名纯粹是为了能有口饭吃，因为当时无法继续生存，他们的家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散八方，有的则是他们自己与其断绝了关系④。还有一些青年，家庭没有政治问题，但很穷，他们下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供给自己生活所需⑤。

从1968年底起，面对不可扭转的现实，无论是出身比较好的（工人阶级），一般的（不红不黑），或者是坏的，城镇青年普遍所持的态度是无可奈何地接受。看见那些坚决抵制的同学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他们宁愿为自己也为家庭少添点儿不必要的麻烦。在一些个别情形下，

---

① 肖复兴，《柴达木作证》，《文汇月刊》1986年第8期，21页。王小波曾这样描述当年的理想主义：“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王小波画传》，16页。

② 可参考一段对这种遭受排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的激动人心的描写，见 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104～108页。不要忘记，“出身不好”者在以前已经为数不少，“文化大革命”后这一阶层的人数就更加庞大，因为又加上众多的运动受害者，如干部、知识分子。

③ 多次访问交谈记录。小说人物中反映这类倾向的，可以参阅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中的人物晓华，见卢新华，The Wounded，载于 *The Wounded*，9～24页。

④ 冯骥才，《当代于连》，《文汇月刊》1986年第11期，7页。

⑤ 浩然，《留下来的三个》，《报告文学》1986年第1期，66页。

当局毫不犹豫采用警察强制手段，即把顽抗者逮捕，武力带走[1]。一位广东青年开始的时候躲了起来，后来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到巨大的压力，就放弃匿藏走了出来。最后他不得不在海南岛的一个农场及主要的省劳改场（地处英德）两者之间选其一[2]。至于那些造反的红卫兵小头头们，“文化大革命”末期就已经给抓了起来，几个月后，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就算释放了，他们的户口当然也给转到下面去了。后来成为异见分子的广州知青王希哲，以及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小头头卜大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3]。那时候，有人被控阻止知青下乡，从而犯了“破坏运动”罪，结果被严厉镇压下去。曾经有过一个老媒婆，她把几个城里的女青年介绍给郊区的小伙子，那些女孩子结了婚就可以不用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结果那位大娘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处死了[4]。这里得特别指出一点：嫁了一个城市人并不保证可以获分配在城里。有些女青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结了婚，念完书，一样被下放到农村去，其中有的还怀着孕，或者已经是有了孩子的母亲。对待她们跟对待普通知青没什么不同[5]。

那些死顶着几个月甚至一年不下乡的，一般都是真的有实际困难的：本人在病中、父母有病，等等。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他们仍然受到种种压力，要他们尽可能快地下乡。如果那是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那就更不在话下了[6]。昆明有一个青年学生，黑五类出身，硬顶了一年没走：他的母亲因工伤事故住在医院，父亲已去世，他本人是家中长子。就这样，他依然不断地受到巨大压力。街道委员会给他以及其余和他一样有家庭困难的，组织了专门学习班。最毒辣的一招儿是：从 1968 年底起，克扣这些学生的粮票。这么一来，他们都不得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36 页。

② M. Frolic，*Mao's People*，197 页。

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 年 8 月 27 日第 2 版。

④ 王若望，《戏言不可以为法》，载于《民主与法制》1980 年第 1 期，25～26 页。

⑤ 与 M. Z. W. 的访谈记录，1984 年 12 月 29 日，以及《动向》第 42 期，1987 年 9 月号。这两项参考资料都是昆明市的，也许在其他城市也有送已婚女知青下乡的情况。

⑥ 访谈记录，及 M. Frolic，*Mao's People*，43～44 页。

不走，最后被送到离昆明不太远的农场或村子去。当这位青年表示“自愿”下去时，有关部门还给他相当于一年的粮票，这才使他能把债还清[1]。

假如他不是黑五类出身，他最后就有可能被分配在城里。总之，有没有特殊困难，政治条件好不好，这是中学毕业生能不能得到豁免下乡的两项主要准则。谈到年龄问题，我们见到过，有时会让一些不到16岁的再继续念一年书，不过1968～1969年期间下乡的，许许多多只有15岁，而且不只是黑五类出身的。1968年15岁下乡的或者1969年16岁下乡的，1966年才小学毕业，所以他们一般没有“真正”地念过中学[2]。在另一头，那些已经念完中学最后一年的，到了1968年底都是21或22岁的了。

因特殊困难得以豁免下乡的首先是伤残者及患病者。但同样的，除了极个别的例子，阶级成分和运气（得看地方干部的恻隐心有多大）起主要作用。一位上海女知青，因意外伤了腿，瘸得很厉害，但最后也得在1969年去了北大荒[3]。有的知青持有各类医生证明，不能操作重体力劳动，还是照样给送到非常艰苦的地区[4]。而那些能成功让人承认他们有残疾的青年，则经常得等好几年，没有工作，最后由街道工厂聘用，环境恶劣，工资微薄[5]。相反，有些青年根本没有什么紧迫的困难，可是有关系，就能挤进缺劳动力的工厂。过了一些时日，既成事实就可以被上级批准。

大部分的豁免是由学校领导通过正规的程序批准的。除了极少数学生得以继续念书之外，那些得到豁免的不是被招进城市单位（主要

---

① 与M. Z. W.的访谈记录，1985年1月10日。

② 见Yue Daiyun & C. C. Wakeman, *To the Storm*, 254～255页。

③ 钱怡，《爱在北大荒》，载于《当代》1986年第5期，149页。北大荒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北边，处于松辽平原及三江平原之上。其实，那里并不是沙漠似的一片荒芜，只不过长年无人耕种。

④ 与C. Y. X.的访谈记录，1978年7月7日。见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载于《当代》1986年第4期，31～32页；糜庶，《瑞丽江畔》，载于《观察家》1979年第9期，67页；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55～59页。

⑤ 与X. W. 1985年5月3日，以及与X. D. 1985年6月2日的访谈记录。

是工厂），就是参了军。那些领导的抉择主要是根据学生的政治条件，首先是家庭出身，然后是个人表现。因此，几乎所有参军的都是干部子女（其中军队干部的子女占很大比例），其余的则是工人出身的。而城市里的职位大部分让工人子女占了，也有干部子女，只有一小部分给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陈安妮（Chan）、斯坦利·罗森（Rosen）和安戈（Unger）在广州 55 个中学班级所作的抽样调查很能说明问题：42% 得到豁免下乡的是干部子女，31% 是工人出身的，大约 4% 是普通家庭出身的，1% 是出身不好的[①]。我们自己的资料没那么有系统，不过是有关几个大城市的，虽然豁免的总比例稍微低一点儿，但按社会阶层的分布大致相同[②]。

在每一个社会阶层内部，个人表现是最有决定性的，就是说主要看他是属于“好的”还是“坏的”红卫兵组织，对进驻学校的工作队作出多大支持，还有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是已经入了团。结果，红卫兵保守派里能不下乡的占着触目的比例（比如，在桂林就有大约 30%）[③]，而造反派则 100% 都下了乡。对高干子女来说，比起他们父母的政治分量，他们自己的个人表现次要得多。当然，如果父母一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他们就丧失一切特权，并沦为黑五类子女了[④]。有两位中学生，互为朋友，同样的家庭出身，是同一个重点学校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大致相同，可是他们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其中一位走的是这一代高干子女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参军，上大学，出国；而另一位则长年蹲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里。他

---

① A. Chan, S. Rosen & J.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 1980 年 9 月，图表 9，445 页。

② 我只向 9 位老知青提出过问题，他们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班级有多少个得到豁免以及这些同学的家庭出身。大致上是从 1.5% 到 17%，干部子女人数远远超过工人出身的，只有很小的比例是普通家庭出身的。

③ 与 G. M. 的访谈记录，1977 年 1 月 15 日。

④ 有问题的重要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农场里甚至成为特别监视对象（1986 年 6 月 16 日我们访问过 C. Y. L.，当年她跟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在同一个石家庄地区的解放军农场）。这一类高干子女还被集中在特殊的农场里，他们和外界的接触受到严密的控制；郑义，《凝结的微笑》，载于《花城》第 3 期，1979 年 11 月，1～11 页。

的父亲是那些被错指为国民党时期背叛共产党的众多干部之一[①]。这种命运的差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干部一经平反，就拼命把自己的子女调回来[②]。尽管大量文章号召干部要带头，“不要因为在城里当了干部，自己的子女就变得‘高贵’起来”[③]，但本来就已经是这样，再说也没用了。要说这些劝告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也不对。许多高干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感觉到必须将孩子送去农村，哪怕过两三年再调他们回来。干部们的这种态度并不让人惊讶，因为绝大部分的家长有办法的话，他们早就会去做，而不让孩子下乡。事实上，自愿送孩子下乡的父母比知青少多了，因为比起孩子，他们更清楚在农村会遇到什么困难，而且也并不怀有那么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

我们上面曾经谈过，1968～1969 年之后上山下乡政策还保留两个主要特征：强制性和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但是，豁免的范围有了重大改变，还加入了一项原则上与阶级成分无关的家庭标准：所有的父母都可以留下至少一个子女在身边。这一让步措施对每个家庭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但也有负面的。事实上，为了决定谁该留下，在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就出现了各种争执。当然，家庭本身能解决这些矛盾，不过有些子女就跟父母“摊牌商讨”今后每个月得寄多少生活费去乡下以补偿他们的“牺牲”[④]。有的时候，这类矛盾会演变得非常激烈：梁恒曾举过一个实例：一位男知青动手殴打他的继父和同母异父弟弟，为的是让后者同意替代他下乡[⑤]。

虽然在 1973～1974 年期间把送子女下乡的责任转移到父母的工作单位，但这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上山下乡政策的强制性，施加在各位家长身上的压力是最具决定性的。在那个时期，除去官方报刊上所宣传的，真正的自愿下乡者是极少的。怀抱早晚有一天能回来的希望，哪

---

① 与 L. T. L. Z. 的访谈记录，1979 年 9 月 21 日。

② 见本书，112～116 页。

③ 见《文汇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社论，刊于 *FBIS*，1968 年 12 月 24 日。

④ 与 H. Z. W. 的交谈记录，1984 年 6 月 10 日。

⑤ 梁恒（Liang Heng）& J. Shapiro，前引，237 页。梁恒没有说明是城市里坚持一孩政策导致这种行为表现。

怕这个日子并没有事先确定。这种希望令下乡变得容易接受（或者说没那么难接受）。

选择下乡地点

政府准许知青在几个下乡地点中作一选择，这一策略很重要，令他们最终同意下乡。

有两大类目的地：农村和农场。去农村叫插队，或者插队落户。队就是生产队，一般相当于一个村子或一个村子的一部分，从属生产大队管理，而后者则由公社领导。生产队实行集体生产制，并不保证社员们有固定的工资。每年庄稼收成与其他生产之所得，在社员之间根据个人所挣的工分来分配。而农场则属国家，保证职工（称农工）的月薪。这些农场有的是国营的，有的是从属于省市等行政机关的，也有的是属军区的（军垦农场）。我们提到过 1954 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其他按照该模式在 1968 ~ 1971 年期间建立的兵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军垦农场的前身就是国营农场。解放军把一大部分由农垦局管理的农场接过手来。这些农场中，很多在初期都是劳改场，尤其在北方地区。后来，由于 1968 ~ 1969 年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政府决定将所有的劳改场搬到黄河以南。接着，知青就在这些农场里顶替了劳改犯的位子，而且被看作是一批后备力量，以防万一苏联军队入侵。1974 ~ 1975 年间，因军队管理不理想，兵团解散了，农场又重归民用单位[1]。

知青所能选择的不是农场或农村，而是具体的地点。假如是由学校或者街道负责下放（一般的情况），那可选的地点就很有限，只有两三个，而且不一定能获得你所要求的。另一方面，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对那些地点都不熟悉，没办法进行比较。他们选择依据的标准首先是能挣多少钱，离家远不远。能保证固定工资的农场经常位于很远的

---

① 见本书，110 页，M. Frolic，前引，195 ~ 209 页，以及《黑龙江省志·劳动志》，194 ~ 254 页。

地方，一年或两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而郊区农场在1974年前比较少招工。大多数农场是，或以前是，垦荒农场，地处边境地带或者远离城市的条件很差的地区。对某几个大城市来说，把他们的一部分知青送出省外，那真的可以是很遥远的地方。这类省际移民主要涉及到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和上海，当然也有其他省级大城市（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和重庆）①。面对一个远在天边的农场和一个近在咫尺的村落，这些青年学生真是不知如何选择。一般来说，决定去农场的是那些不能够也不愿意依靠家庭补助来生活的。其余的都是惧怕环境的改变、恶劣的气候及艰苦的劳动，特别是出征到一个遥远的农场所意味的：从此与家庭亲友完全隔离。有时，得在两个同样遥远的农场及村子之间选择。那么大多数会挑选农场，但不是所有人。前面提到过的那个1967年就去了内蒙古的理想主义红卫兵，他本来是可以去黑龙江农场的。既然他下乡是为了与群众相结合，所以他宁愿去一个蒙古牧民队插队，而不去老有干部围着的知青中扎堆②。相反，自从农场转为军队管理以后，威望大增，人们又考虑到财政状况不会差，因而提高了吸引力。决定去北大荒的在临行前被授予“战士”（完全是形式上的）的称号，又分给每人一件威风凛凛的军大衣，这都是当时社会上令人羡慕并纷纷追逐的③。

对许多知青来说，不是在农场与农村之间选择，而是在两三个不在同一地区的村子之间选择。同样的，该村富不富、远不远，是主要准则。不过，其他的考虑也列入其中。比如，在广州，1968～1969年间的知青还不太多，后来就越来越多。可能的话，那些决定偷渡去香港的就选择靠边境的地区。许多不愿意去较远地方的后来非常后悔，因为他们后来也决定要离开中国。当然，总是有最积极的年轻人，真的想改造自

---

① 有关省际移民，见本书，179页。

② 然而很快的，他又回到了一个解放军农场，因为在1969年整个地区（靠近边境）都被军队严密控制；1986年6月30日与M. J. L. 的谈话。

③ 访问梁晓声的记录，1986年9月21日，及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255页。

己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1]。

在上述的总情况里，可选择的地点是限制在政府所指定的范围内的。而当政府已经有了一个决定，那么就有权不理会个人的愿望。然而，还是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那就是要求批准去一个有亲戚朋友的地方。这种方式叫“投亲靠友”，可以让不少青年学生去父母一方的老家，或者去哥哥姐姐或朋友已经落户的地方。这有双重好处：一方面，因为对这些地方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所以比较容易选择；另一方面，在那里并不完全是个陌生人，可以依靠亲戚朋友，这有助于融入当地的生活。在当地寻找依靠和保护是这种选择方式的要点，就是“投靠”[2]。在极少数的情形下，还有一种真正的政治意义。我们采访过两位广州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头头。为了逃避广东省对造反派特别严厉的迫害，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他们选择了位于湖北的一个村子，那儿已经去了一些武汉的战友[3]。这个例子说明，如果能去投亲靠友，就不存在什么限制。据我们所知，政府还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知青循这种方式下乡，就算政府事前已经决定了该名青年的下乡地点。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只有好处：有了亲戚朋友，学生就比较容易适应；更重要的是，政府本来最大的问题是要让农民接受某一定额的学生。现在一个城市知青自己想法儿取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对安排知青上山下乡的负责人来说，那简直是事半功倍了。在实际行动中，学生们想循这种方式下乡，首先必须在乡下有关系，然后必须做那些地方领导的工作。这些干部本来就不愿意把这一非强加的负担背上身，现在得说服他们同意。假使有与村民很近的

---

① 见梁恒和 J. Shapiro，前引，142～143 页，以及作家郑义给潘晓的信，刊于《中国青年》1980 年第 7 期，5 页。这篇见证相当发人深思，但是本人觉得郑义离着历史现实偏远了，他把当时个人的满腔热忱加之在他的同一代人身上。

② 从意思上看，“投亲靠友”与“投靠亲友”是一样的。但后来行政机关习惯于把那些单独从城市下乡来到有亲戚的村子里的知青叫做“回乡知青”。因此，所有的省志或年鉴提到的“回乡知青”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尤其是在他们的统计表格里。这样做很不合适，把这类青年跟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回乡青年”混淆在一起，后者是出身农村，在城里读完了书再回到农村的青年。

③ 与 C. W. H. 及 Q. Z. W. 的访谈记录，1978 年 8 月 8 日及 1978 年 8 月 20 日。

亲戚关系，地方政府就很难拒绝。所以这种做法在小城市、小镇或县城很普遍，那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戚在附近的乡下。这些亲戚愿意安排孩子下去，通常还收留住宿①，但孩子的父母一定得打点一切，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来回报他们。假如一个知青已在该村有插队的朋友或亲戚，或者在社员中只有远亲的话，地方干部同意不同意，得看双方的关系，可能是需要“商量商量”的。假如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又靠近大城市的村子，那么这种关照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在广州郊区的好几条村子里，队长从每个知青手上收取 500 元红包，最后落入他们口袋的 200 元安置费还未计算在内②。

既然知青在选择下乡地点上有相当宽松的自由度，他们也就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主意。这就是“V 形移民”，不少知青都是这么做的，尤其在运动头几年。这类转移大多数是由农村转去农场。在农村的知青根本挣不够钱过日子，又加上生活枯燥平庸，因此要求调往边远地区的农场，在那儿他们不仅可以享受有保证的固定工资，还可一尝垦荒者的奇特经历，又可发现一个新天地。就是这样，张抗抗去了北大荒，孔捷生去了海南岛③。另一个作家阿城还搬了两次。他很清楚自己是右派的儿子，一定逃不过下乡这一劫。有几个朋友跟他一样，他们想在一起，就决定离开北京，到山西乡下的一个村子去找熟人。他们带着户口到了那儿，可是当地农民一口就拒绝了他们。没办法，半年后他们又上路了，这次内蒙的一条村子接受了他们。过了半年，收到一位朋有从西双版纳寄来的一封信，告知那边农场好得很，每个月能挣 20 元。他们又提出申请转移，得到批准，1969 年去了西

---

① 有些地方，用这样的办法下乡的知青特别多。1968～1972 年间就有 8 万 3 千多名上海青年去了江苏和浙江“投靠”。当时没有组织任何集体下乡行动到这两个比邻的省份，而大多数上海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都是父母单独安排的，为的是避免子女被送到偏远的地方去；见《上海劳动志》，114 页，以及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305 页。

② 1979 年 9 月 12 日访问 S. L. H. 的记录，及 1978 年 7 月 13 日访问农民 M. W. C. 的记录。

③ 张抗抗，《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57 页；孔捷生，《南方的岸》后记，183～184 页。

双版纳[1]。

这类转移有时是在村与村之间进行的，不过很少，主要是因为农村干部对此持不鼓励态度。知青申请转移地点，是为了能比较靠近原来的城市，或者是为了能和兄弟姐妹在一起，也可能是为了去一个不那么穷的村子。正因如此，那两位去了湖北的广东造反派，不再惧怕镇压迫害，两年后得到批准转去了离广州很近的一个村子，他们也有朋友在那儿[2]。

选择下乡地点的自由度并不因时间的转移而加大。首先，农场已经饱和，从1973年起大大地减缩了招工人数，只接受本地区的小批知青，或者是个别前来与兄弟姐妹会合的[3]。之后，从1974年起下放知青的工作改由工作单位负责，一般就再也不能自由选择了。不过，说真的，下乡地点没那么远了，那里的环境也比较好了。

“文化大革命”后的几年里，陆续有青年学生到农村或边境地区去，他们的情形和当年的知青不差上下，但目的地不同了。一方面，一些年轻的毕业生报名是去矿山和油田，那里的领导特地在某些城市组织招聘会[4]。另一方面，有些干部进五七干校，或去军垦农场，或到普通农村去当下放干部，他们的子女若不满16岁，就跟着他们一起下去[5]。这些学生的经验与知青的部分相似，对他们的思想同样产生影响，不过只有他们满了16岁，才能正式划入知青的范畴。

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泪的启程

城镇青年学生一旦报了名、接到调令之后，真正的启程出发的大

---

① 与阿城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7日。

② 见本书，222页，注③。

③ 与W. S.的访谈记录，1986年11月23日，及《黑龙江省志·劳动志》，215页。

④ 见肖复兴，《柴达木作证》，前引，21页。

⑤ 1986年6月30日我们访问了诗人顾城，他在13至18岁之时曾与被放逐的父亲居住在农村。亦见梁恒（Liang Heng）和J. Shapiro，前引，第9章；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255页。

日子就来临了。在运动的最初时期，那些积极狂热的年轻人总要在出发前搞一个仪式：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在北京，誓师大会就在天安门前举行。一组一组青年学生，从单独几个到几百个，都在主席像前排好队，举起拳头，宣读誓词，正像1967年10月第一批启程下乡的知青那样，也就是曲折他们那一组。誓词说①：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
>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地忠实于您，无限忠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思想的红旗，前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②

自1968年底知青就不再有这种狂热了，宣誓也慢慢不再时兴了。出发启程只不过是普通的组织工作。在1968年到1970年初那一段运动最火热的时期中，全年都有好几批下乡的。后来组织工作逐渐改善，下乡人数也逐渐减少，出发时间也就集中在夏季之后，分期分批直至冬季。紧锣密鼓的动员工作则在春季开始，很快就到了学年结束之时。“出发的场面”，人人情绪激动万分，作为当事人，那是刻骨铭心的一刻，而作为旁观者，那也是终身难忘的③。我们所有的被访者都是特别深刻地回忆起那一天。这一代的作家无一不在他们的作品里，一而

---

① 见本书，78～79页。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99页。

③ 特别是那些还未到下乡年龄的少年人，他们看着自己的兄姐痛哭流涕，伤心欲绝地离去；见潘晓那封人人知晓的信件，载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3页。关于这封信的社会政治意义，主要参考 D. Ownby, Growing Alienation Among Chinese Youths, 载于 C. L. Hamrin & T. Cheek,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212～246页。

再再而三地描写那一场面，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自传[1]。

知青集体出发启程总是被政府看作是组织一场大型仪式的大好时机，可以借此突出上山下乡运动的革命性及光荣意义。到处一早就贴满彩色宣传画，到了出发那天，知青胸前戴着大红花，由他们的父母陪同，来到了，即刻被各校的学生包围住了，他们一面挥动旗帜一面高唱革命歌曲。一组乐队奏起革命音乐。各重要领导人讲话。在整个运动期间，当局都坚持在知青启程日大搞这种节日气氛。1977 年我们曾亲身在北京参加过一次那样的活动。一辆贴着“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习”大横幅的卡车在前面开路，好几辆载满知青的大汽车列队开进会场，受到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大喇叭传送着革命口号，不时被革命音乐打断。我们所见到的，比起运动初期的气氛，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67 年 11 月第一批大规模出发的是 1 200 名北京知青。当时的一位参加者向我们这样描述：

> 我们是从天安门乘坐 50 多辆漆得红彤彤的大汽车出发的。好几万人来送行，其中当然包括我们的父母。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锣鼓声、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本来有好几个领导人要讲话的，结果因为太乱了，没讲成，等我们的车队到了郊区，他们才讲。晚上到了张家口的一个军营，受到了热烈欢迎，第一夜就在他们那儿过的。之后，一共走了 10 天。每到一个地方，就有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到了内蒙，车队就分成了两队，一队往东走，一队往西走。几十辆大汽车穿过草原，那个景象呀，真叫壮观。在内蒙，骑马的牧民来接我们，一直陪同我们到达宿营地。[2]

在那充满革命气氛的场合，还要回顾毛泽东的年轻时代以及革命的最初年代，正像一张照片所显示的：知青双手高举著名的油画《毛

---

① 特别要提出食指的著名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载于《北京文学》，1998 年第 6 期，105 页。

② 与 M. J. L. 的访谈记录，1986 年 6 月 30 日。

泽东到安源》抵达延安[1]。

但是这种特意搞出来的革命欢乐气氛并不能遮掩分离的悲伤。到处都可以看到下列的场景：当载着知青的列车、汽车、轮船开动之时，那是真正出发之时，音乐口号声再强也盖不住月台码头上父母们的哭泣声[2]。即使是那些积极分子，他们本来负责在火车开动那一刻带头高唱战歌，不让气氛转坏，可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有的也挺不住了，哭着喊着和其他同伴一起扑向车窗[3]。

自然，离别的痛苦一过去，哭泣也就停止了，在积极分子以及陪同下乡的干部热情鼓动下，还代之以一片歌声和口琴乐声。许多知青是第一次坐火车或坐轮船。沿途风景令他们大开眼界兴奋不已。气氛当然不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串联相比。由于无法预测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又不知道会在农村待多长时间，所以即使是自愿者或半志愿者都感到心情沉重。有些真的相信是一去不复返，这就使他们悲痛欲绝，但大多数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只有16、18或20岁，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这么定下来。然而，他们也很清楚这次会走很长时间，离家越远，心中就越有今后永不能再归家的感觉。此外，他们看到的外面景物并不与原来想象的相一致。哭过了，唱过了，最终到了静思的时候了：

> 我下乡到北大荒的时候，正值暮春四月。原野还覆盖着厚实的雪被，山林看不出一点绿意。马车和大解放汽车，载着几百名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象远迁的部落一样，在茫茫的雪原上进发……北大荒令我们感到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从书本上看到的描写，老师在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时对这个地方的赞美，我们用浪漫的向往所描绘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图画，彻底被我们自己的眼睛否定了。歌声，早就停止了。笑声，早就停止了。交谈，早就停止了。从嫩江到黑河，一段没有铁路的上

---

①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6月，22页。正是这张照片作了T. Bernstein的著作（前引）的封面。

② 见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35页；与张辛欣的访谈记录，1984年7月2日；张抗抗，《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57页。

③ 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前引，34页。

千公里的途程——沉默、进发、沉默、进发、沉默……①

1970～1971年间第一批知青返城之后，尤其是1973～1974年间政策有了些许变动，这令不少知青认为一旦下乡便是一辈子的事，但这种背井离乡的期限究竟得多长，依然是模糊，甚至遥远的。另外，从兄长处早已对下乡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再也不新鲜了，兴奋、激动、狂热之情全都消失了。1968～1969年间真正的自愿者占下乡知青的10%或15%②，到了20世纪70年代几乎完全没有了，只剩下寥寥几个统计上不可忽略的特殊案例。

当局一直将自愿一说的神话坚持到底。在报刊上，这场运动甚至被描述为自发的得到政府支持的运动③。而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④，但是不再象1963年那样地说不应该逼迫拒绝下乡的人⑤。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会让这类神话骗倒，即使是那些真正的自愿者，他们心里很清楚，抗拒者会受到多大的压力。大多数都感觉到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而赶他们下乡实际上就是一种放逐形式⑥。

---

① 梁晓声，《北大荒纪实》，载于《天若有情》，84～85页。这不是一本纯粹的自传小说，但是作者向我证明小说里面的气氛完全符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身边朋友们的经历；与梁晓声的访谈记录，1986年9月21日。

② 这个剪刀差是不确切的，首先我们的样本不可能是有代表性的（Bernstein的也一样，他得出15%的比例），其次是因为“自愿”的定义不清晰。在官方的想象中，都是自愿的。相当一部分老知青诚恳地回答说，他们确实是自愿，然而与他们进行深刻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现实的时候，只得逆来顺受。

③ 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在第一版上有这样一段：“（会宁）革委会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积极协助居民委员会先后举办了115期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④ 见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B17页。

⑤ 见《中国青年》第23期，1963年12月1日，3页。

⑥ 在1979年出版的一本地下刊物中有一篇文章，作者将知青比作被流放或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及克里米的鞑靼人；见《北京启蒙》第二期，载于*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1979年5月10日，60页。1980年代，中国官方部分承认了“文化大革命”后下乡运动的强迫性色彩。下面这句话就是一个例子：“运动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见张化，《十年后的评说》，149页。

第九章
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

即使某些负责动员的干部着意描绘田园风光诗一般美丽的农村，官方似的宣传机器并不否认存在各种困难。报刊杂志也不隐瞒农村生活艰苦的真相，但强调知青可从中获益良多：他们可以借此“锻炼自己”，过去城市舒适生活所养成的以及修正主义教育所灌输的资产阶级思想亦可借此被冲刷干净。真正“革命化”了，他们就会完全适应农村环境，并与群众相结合，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毋庸多言，农民应该欢迎他们，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转变。由于这个转变对国家前途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即使知青受苦了，所有人（不仅是知青，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农民、干部）都为此竭尽全力，那也是值得的。

然而，现实与这种理想化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将介绍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中遇到的4大类困难，从而尝试了解其中的原因。为了叙述清楚，我们必须逐一探讨分析当时的实况及各类问题，在实际经历中它们经常同时出现，彼此影响，并互相贯穿。

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

第一次冲击：发现农村的落后面貌

当发现农村的真正面貌的时候，可能除了个别几个来自小镇的

之外，所有的知青，不管对下乡的热情程度有多高，全部都受到极大的冲击。他们觉得被抛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意想不到的落后，有时那个村子离他们原来的城市不很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需要长途跋涉的，好像 1968 年 12 月 30 名天津学生徒步 51 天到达距离 1 000 多公里的山西省的一个村子，又好像那些北京青年坐 10 天大汽车去到内蒙古，或者又像另外一些北京学生得去遥远的云南瑞丽[①]。

知青感受到的这种冲击有时是不可抑制的，即刻就爆发出来的。请看看一位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北京青年怎么描述当时的情况：

> 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当时还挺高兴的，因为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去一个新的环境，到大自然中去。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看见农民那个脏啊，还有那个偏僻的地方一片荒芜、破烂不堪。想到得在那儿度过后半生，我们就万分焦虑、极度恐慌。当没有外人时，我们就一起抱头痛哭。尤其是女生，简直就是号啕大哭。[②]

即使第一次反应不那么强烈，那么跟农村生活的日常接触就深深地震撼了知青的信念和观念。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农村的认识都只是来自学校课本上的感人描写，都是将今日的美好与旧日的贫困相比较。他们最多在邻近的乡村和同学一起参加劳动。这些短暂的日子就像夏令营，根本不能让他们真正地了解农民生活的困苦。上山下乡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不由分说地一下子把他们推到一个与他们所期待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令他们对一般的党的宣传产生怀疑。在此同时，面对从未想到过的落后程度，即使是最革命的也不禁自问：尽快改变农村面貌是不是有可能？过去，他们曾真诚地认为不仅可以打掉“私心”以适应更艰苦的生活，还可以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及贫困。他们之中的一位在 1968 年 7 月曾这样写道：“有人对我说安图水土不好，

---

① 见《人民日报》1973 年 7 月 5 日第 2 版；见本书，238～239 页；糜庶，《瑞丽江畔》，前引，64 页。

② 与 P. K. W. 的访谈记录，1985 年 7 月 7 日。

容易生克山病[1]。我想，水土不好，可以改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什么也不怕。"[2]

但大多数知青都有种感觉，他们在空间上的迁移就好像在时空中旅行。我们的被访者，如同知青作家一样，反复强调一种历史沉重感在猛烈地动摇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作家史铁生去了延安地区插队，在一部小说里，他画完了一幅该地区的春播图之后，就说："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3] 史铁生描述如何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才能获取城市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人工。他还谈到那些穿村过乡的失明人，他们就靠讲故事维持生活，别人愿给多少就是多少，他们讲的是古典小说的故事再加上几段毛主席语录[4]。

另一位作家朱琳，在安徽插队，那也是个穷地方。她描述人们如何坚持穷困传统：村长向结队外出讨乞的农民派发证明。这种外出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还得要锣鼓歌舞来欢送[5]。一位广东知青对我们这么说："当发现农业生产跟两千年前不相上下时，我就开始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6]

虽然她在光明前途的希望上投下了阴影，但发现社会主义建立了20年以后的农村状况，也不会不影响老红卫兵对中国近期历史的信心，特别是会对毛泽东的道路在农业发展上的优越性提出疑问。不仅他们亲眼目击的成绩乏善可陈，就连农民自己都主动地向他们诉说如何怀念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7]，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

---

① 这是一种地区流行的原发性心肌病，硒缺乏与发病的关系较密切。

② 《人民日报》1968年7月9日第3版。

③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40页。

④ 同上，45页。

⑤ 朱琳，《生活的路》，178～180页。

⑥ 采访Y. S.，1978年7月21日。

⑦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政策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推行的。这项政策令"大跃进"惨败后的农业生产明显地恢复了元气，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猛烈的攻击。见《红旗》1967年第16期，25页。

还谈到解放前[1]。他们也大谈“大跃进”时期连续不断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毫不隐瞒地指控责任全在上头瞎指挥，还要把这场灾害说成是自然灾害。那些年轻人当红卫兵的时候，曾大肆鞭挞刘少奇的农业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深信无疑，如今像是突然被人重重地敲了一记，一种相当痛苦的如梦初醒。

这种沮丧气馁的心情导致对革命价值丧失了信心，也对农村发展的巨大任务丧失了勇气。这令他们更难接受他们的生活条件。愚昧落后，如今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一场戏，是活生生的天天都接触的现实。

主要问题

由于知青早已习惯了城市的舒适环境，所以对他们来说，主观感觉农村生活条件要比对农民艰苦得多。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此才有了上山下乡的意念。然而，在农村，客观上，知青的生活条件倒也确实比农民差。

住房和生活环境

国家发给每个下乡的知青230元安置费（北方多加20元，为添置寒衣）。但是，除了一小部分钱（15至20元不等）作为旅费直接交到知青手上之外，其余的全部拨给接待他们的生产队。这笔款项是让队里能够解决住房问题，替他们置备农具，甚至保证他们在头几个月或头一年得到粮食配额及其他食物，因为他们还没有出过工挣到工分，原则上没有权利获得收成的分配额。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笔安置费虽然给出去了，知青并没有得到起码的住房条件。

这些新来乍到的年轻人按学校或者按所属城市分派到各个村子去。有时，来自附近小城的青年会加入到来自远方的某个大城市的知青堆里。这种安排所依据的准则很模糊，所以经常是很随便的，在某些情形下，知青之间是否意气相投也在考虑之列。还有些时候，当局遵照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59～61页；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前引，44页；及多个访谈记录。

明确的准则办事：我们的一个被访者就被分到一个知青组，组里的成员都是同一学校的团员或党员。领导人的目的无非是要树立一个“先进模范”典型[1]。

每个生产队的知青数目一般是3到12人不等，不过在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样本中发现，最少是2个，最多20个。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如广东省，每个大队可以有几十人，甚至100多人，每个公社几百或上千人。派瑞丝（Parish）和怀特（Whyte）在他们的有关广东的调查样本中发现：知青在他们所在村子的成年人口中的比例平均低于3%[2]。而我们的局限性较大的调查显示平均比例稍微高一点（总人口的3.3%），高低的差距相当大（从最低的1.6%到最高的15%）。

不管人数有多少，知青的来到给地方政府提出了住房问题，只有两种特殊情形例外：一种是投亲靠友的知青，另一种是来自附近小镇的，他们可以回家睡觉。那些提倡下乡的死硬派是看不起后一种做法的，不过算了，不计较那么多了，因为这可以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在浙江一个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就没有任何住房问题[3]。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农民不得不面对那突如其来的成群新迁入者。由于他们很少有空地方，所以就得求助于一些应急的解决办法。有的知青单独入住农民家庭，或者被安排住在非居住用途的地方：生产队队部、储藏室、仓库、工具房或者已改作他用的祖庙。

从思想上来说，分配住到农民家是再好不过的，而且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这至少可上溯到土地改革时期，提倡三同：下乡干部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4]。但是，长远来看，无论知青还是农民，都会对这种强迫性的同住一屋檐下感到不满意[5]。所以，在农民

---

① 访问T. R. C.，1978年7月15日。

② W. Parish & M.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42页。

③ 与H. Z. W. 的访谈记录，1984年6月13日。我的受访者就是跟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住在这个村子里。

④ Y. Lau等，*Glossary*…，351页。

⑤ 除非那些农民脑子里打着主意，想让自己的孩子跟同住的男（或女）知青结婚，见本书，280页。

家住，只能维持几个月，最多一年。而住在非居住用途的地方倒经常可以拖几年。住在粮仓的知青抱怨每天清晨4点就被农民吵醒，后来就把他们重新安置，是在牛棚[1]。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当然很差，就算作了一番整理也没用。知青得在这些地方忍受酷热、严寒、臭气熏天、房顶漏水、蚊子臭虫，等等。他们抱怨发牢骚，地方干部就解释说安置费不够盖新房子，而生产队又太穷拿不出钱来凑够数。事实上，这不全是真的。农民干部不愿意合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接待知青增加了额外工作，还得给他们开伙，安置费就是一种总补偿；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下乡运动会长时间持续下去。

当然，对调拨款项的使用没有任何定期检查，这本身就是鼓励挪用[2]。不过，这些钱倒没有被干部花在私人用途上，而是为了集体：买种子、买化肥等等。那个时期是鼓励每个村子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忽然来了几百或几千块钱，那还不是个好机会去购买必需品！直至1973年全国工作会议之后，中央政府才开始关注调拨给知青的款项使用控制问题。同年11月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清理城镇人口下乡经费的通知》[3]。随后，各省都展开有关工作，但涉及1968～1972年间的清理到1975年底前才结束。揭出来许多严重不合法的事情。在辽宁省，送了794 378名知青下乡，还有282 845名“城市闲散居民”及151 508名插队干部家属。国家一共拨款2.201 1亿元人民币，其中817万元（约占3.7%）被挪用了。大部分用于与集体利益相关的事业上。但也有一小部分进了个别干部的口袋里，或者加进了生产队员之间平分的收入款项里。颁布了一些规定，明确指示这些经费只能专款专用，而且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总的来说，跟以前大不同。尽管这

---

① 采访H. C.，1978年7月7日。

② 阿城的一篇基于真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就描述了内蒙古一个生产队的干部如何挪用安置费来大摆宴席。那一年，旗里（相当于县）要求所有的生产队都要在中秋节给队员们搞会餐，还派出检查员四处查探有无执行指示。拿不出钱来的队，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知青的补助费。相反从没有派出过一个检查员去检视那些补助费是否用得恰当；见阿城，《会餐》，收入《棋王》，179～185页。

③ 关于1973年的账目清理问题，见刘小萌，前引，392～393页。

样，到运动末期清理账目时，还是揭露出不少其他的违法行为[1]。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但在我们的被访者插队的村子里，一半以上最终都在几个月或几年以后，给知青盖了专用房。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像北京郊区，在1972年底只有30%的知青住在新房子里，30%住在属于集体的地方，40%住在农民家[2]。知青经常参加自己住房的修建工作，有时他们自己就是全部劳动力，在当地懂行的师傅督导下干活儿。不过，这些房子通常很简陋，有时还很危险，因为为了省钱就用了不合规格的大梁。用的材料跟农民一样，最通常是用秸秆糊上泥巴做墙，用干稻草铺屋顶。这些稻草屋顶需要经常修补，而知青们又没有材料，就铺块塑料布在蚊帐上挡雨，但这挡不住雨点落入屋内。结果每逢雨天，屋里夯实的泥地就变成烂泥滩。这些房子都很狭窄，只能放下他们的床，一个体积庞大的用砖砌的或用泥作的灶，此外只剩下某个角落放置锅盆碗筷、食物及农具。很多时候，农民自愿来盖这些住房，心存一个期望：有一天知青走了，就可以收回房子为己用[3]。所以他们是根据谷仓、牛棚甚至猪圈的样子来盖房子的。

因为知青的习惯想法不同于农民，所以就更难以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大部分村子是没有电的，这就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们晚上总想看看书写写东西，可是没有桌子，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简直没法看也没法写。另一种不便就是没有自来水。他们得跟农民一样去担水回来，有时得去很远的地方。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位女知青当年住在陕北的窑洞里，她得走3公里路去挑水。那个村子里住窑洞的农民几乎是不洗澡的。可是对这个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上海姑娘来说，保持起码的身体洁净是绝对必要的，结果她不得不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挑水[4]。

不管知青的住房有多小，状况有多糟糕，本来是做什么用的，那

---

① 见本书，188～190页。其他的例子可以参考省志，特别是《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93页，及《新疆通志·劳动志》，77页。

②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48页。

③ 这恰恰是所发生的事情，见本书，188～189页。

④ 与W. X. 的访谈，1979年9月9日。

可是他们重新组织生活的基地。当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集体户，那是指一个小集体和他们居住的房子。这个集体在组织日常生活及平衡感情生活两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年轻人刚刚离开的家庭圈子。一位老知青在一部话剧里感叹："集体户！……这个词儿现在都快被人淡忘了。总有一天，人们得从词典里去查它的含义。可我们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①

然而，直至1974年起推广株洲经验时，组织集体户差不多都只是由知青本人的愿望以及他们的自治能力来决定。农村干部顶多提点儿建议，比如说得选出一个"户长"来啊。有些时候，那些只有15、16岁的小青年，像被遗弃的孩子，简直无法面对组织日常生活的难题。不过，城市青年经过学校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的参与，都有一定的集体生活经验，因此不少集体户打一开始就成功地以相当有效的方式自动组织起来。大多数的集体小组是男女混合的，因为政府一向赞成不分性别，也许是为了方便分派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为了他们将来容易找对象吧。但是，在两到四个知青的小组里，在某些情况下，都是同一性别的，有时小组人数会更多。我们的一个被访者当年就是一个有10个女知青的集体户"户长"，她们来自同一个学校，要求女生在一起，不要男生。不过两年后，她们接受了其中一位的弟弟加入她们的小组。通常情况下，男女混合的小组，男生女生的卧室是分开的，有时是在两个不同的房间，当只有一个房间时，就想法隔开，比如说挂张床单。

当集体组织管理还存在的时候，主要工作是分配任务。家务劳动交给一两个人（通常是女生）负责，有时固定，有时轮流，这样就可以让劳动回来累得要命的人得以休息恢复精力。这就是说他们得部分共享一切收益。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些集体变成了真正的实行他们所称的"小共产主义"的群体。所有有关集体的问题都在"户长"主持下的生活会或者民主生活会②上经过辩论。一切都是平均分配的：

---

① 王培公，《WM我们》，《九十年代》1985年第12期，80～95页。

② 这类会议不是知青的发明，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见《党的组织工作词典》，115～116页。

作为收入的金钱及实物、自留地的收成、父母寄来的包裹款项，等。比如说，他们都把各自的脸盆拿出来，然后共用一个脸盆作洗浴（当然男女分开），用另一个洗米洗菜，再用另一个作菜（比如拌饺子馅儿），而另一个就用来给自养的牲口准备饲料，还有一个是半夜急需大小便时用的。知青这么刻苦，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渴望追随革命理想。当年先辈们不就只有一个碗当脸盆，什么都是用它，而最后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不就是“不怕累、不怕苦、不怕脏”吗？事实上，这类群体主要出现在自愿或半自愿下乡的知青之间，他们大多数都怀抱一种在“文化大革命”中孕育的理想，并且其中还出现一名极有组织能力的“领袖”。

这一代青年中有位作家将那些乌托邦的社团称之为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伊加利亚”①。这些理想主义的集体户确实没有比那些在德萨斯及伊利诺斯成立过的前身更成功。不管开始时集体化的程度有多高，全部的集体户都追随了一个总趋势：各顾各的生活，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集体户解散。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好几个：“文化大革命”价值逐渐却普遍的崩溃，以及随着出现能调往非农业职位与返城的机会，知青之间也出现了竞争。我们以后还会再来谈论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过，另外一种更普通更普遍的现象也可以解释集体户群体组织的失败：公正分配家务劳动上的困难。正像 1960 ~ 1970 年间西方年轻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集体户”，中国知青的群体组织经常陷于崩溃。原因不外是些小问题，平时有不少杂务劳动，像做饭、拾柴、担水、照顾牲口、种自留地，等等，在分配上免不了有些小争执，然后就种下忌恨，越积越多，最终不可收拾。艰苦的生活条件很难让人宽宏大量，想克服掉的“私心”不断冒出头。在这种情形下就分灶，各管各做饭，只跟个别人有关的家务事自己负责。要是碰上住的地方改作他用，那么这种分灶就会引致集体户散伙。这样，知青就又重新陷入孤独无

---

① 徐乃建，《杨柏的“污染”》，《盼》短篇小说集，75 页。Etienne Cabet 的“Nouvelle Icarie（新伊加利亚）”及几次为实现这种理想社会所做的尝试都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知青可能是通过批判而认识的；见马克思及恩格斯，*L'Idéologie allemande*（德意志意识形态），507 ~ 509 页。

援的境地，住在小茅屋或者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什么都得自己解决，就算病了也得自己一个人挺过去。也许是集体户里人与人之间空间太狭小，也许是因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受到冷落排斥，某些知青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被孤立的感觉。

然而，分开住不仅很难办到，而且在与农民及干部打交道上对知青是不利的。所以，知青通常继续住在集体户里，不过集体生活的范围缩小了，只限于朋友之间的交谈，或者搞些有点儿“另类”的活动，我们在第11章里将会谈到。

1973～1974年间的政策上的改动无疑使知青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安置费提高到480至500元人民币，这下干部就再也不能借口钱不够而不给盖房子。不过，这并不保证地方建筑的质量。早在1977年就有一位陪同干部写信去人民日报做过揭露，我们在上文已经谈过：

> 最近我们发现个别地方，有的同志对这一工作认识不足，以为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就要走，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没有长远打算，有的盖得又高又大，有的盖得又矮又小，以便知识青年走后，高的用来做仓库，矮的存放农具。对此，知识青年很有意见。[1]

幸亏知青还有“知青点”，在当时经常是由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或者至少是在单位的监督下建造的，这就有了一定的保障。至于日常生活的组织管理，引进株洲模式的经验之后，情况也得到改善，不过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集体生活的困难总是相同的，然而年轻人的革命理想及责任感一般还无法帮助他们来克服，因此这项任务就得交给一个具有一定权威的外人：带队干部。他的工作可不容易。其中有一位，本人是大学毕业生，是前知青，1978年接受了这项“不遂心意”的调动，为的是一年后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称心的职位。他曾做过下列的描述：

> 当时，我作为带队干部与17名知青住在知青点。我的前任已经把集体生活守则定了下来。女同学负责做饭，每周轮

---

① 《人民日报》1977年7月5日第2版。

流一次。捡柴禾也是大家轮着做，可是有的知青就拒绝去捡，搞得其他人觉得吃亏，也不去捡了。我刚到的时候，做饭用的柴禾很快就烧完。我的前任做的思想工作根本没有成果。得到上级的同意，我做了一个决定：谁拒绝去捡柴，大队就扣他的工分。事情就这么摆平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自留地上。由于有的同学不干自己份内的活儿，其他人也就什么都不做了，地就荒废了。我曾经建议把自留地分成小块，让每个人负责自己那一块，不过上级反对这么做。最后我决定作一个出工表，然后根据出工情况分配产品。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但不断有其他的出现。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人在那儿，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也没有任何理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尽快进工厂…… 而农民呢，1979 年当所有的知青都要跟我回城时，农民那个高兴呀！知青点重归大队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作坊。①

安置一个知青在农场或者把他下放到人民公社去，对国家来说，前者所需经费要多得多②。不止是安置费较高，而且国家不能指望农村集体来分担其他费用的重负。农场呢，大多数已是处于长年亏空的状态下，没有国家的援手，无法面对涌来的大批新农工③。另一方面，农场隶属国家机构，从社会主义角度上讲是比较“先进”的，“自然”应该享有特权。事实上，在许多地方，来了这类机构的知青似乎住得比农村好。很多都住在砖砌墙身屋顶铺瓦的宿舍里，几个人一个房间。这些宿舍一般都没有电，也没有厕所。为了应付突然涌至的大量知青，不得不加快建设，所以就招募了一些生手，那些泥瓦匠出的活儿常常是不合格的。我们的一位被访者就讲过这么一件令人不快的经历：当年他是被分到内蒙古的一个农场。第一天晚上他跟几个同学躺到砖砌

---

① 采访 H. Z. W.，1984 年 6 月 17 日。

② 一般是 400 元，而不是 250 元。1973 年以后，下乡到农村去的补助费提高了，但在那个时期到农场去的知情已经很少了。

③ 1968 ~ 1972 年间在黑龙江有 45 万知青下到解放军农场及国营农场，相当于原来职工总数的 120%；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215 页。

的炕上，不一会儿他发觉那张炕就在他身子底下塌了下去[1]。他说这种倒霉的事经常发生。但是，毫无疑问，对知青来说，住房条件最差的，甚至比农村更次的，还得数最落后的边境地区以及还未开发的地区。在落后地区，通常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是能住上类似当地人住的简陋小屋，就应该满足了。而在待开发地区，那就真是毛泽东所赞扬的“一张白纸”[2]，什么都没有。如果找到一块地方是可以盖房子的，知青得就地取材（树木、竹子、茅草和树枝）[3] 自己盖，要不就住在帐篷里等待也许会来的建筑材料[4]。

农场的居住条件有的比较好，有的很坏。农村之间的差别没那么大。至于一般的家务劳动及集体生活的组织管理，两种下乡方法之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农村的知青抱怨没人管，而在农场的就埋怨管的太紧。其实，大部分农场在 1968 ~ 1969 年间都转为军垦农场。从此，知青的生活就按军队的纪律和组织来处理，当时正值军队内部政治思想紧张化的时期。尽管知青很难接受纪律及思想控制，但是从家务劳动的分配及完成上看，军事性的组织管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然而，因个人利益而引起的小争执依然存在，比如食堂分肉，为什么他多我少；睡觉分配位置，为什么他睡热炕头，我老睡冷炕，等等[5]。不过这些冲突不会恶化，以至影响到团队的运作。

与此相反，在农村，住房与集体生活组织管理的恶劣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知青适应农村。这些城市青年人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无疑，许多农村干部把那些小青年当作“过路客”，所以给他们盖的房子像仓库或猪圈，干部的这种态度部分起了“自动应验预言”的作用：它令知青更难适应身处的环境，结果导致后来下乡运动结束，正中了干部们所预料的和所希望的。另外，住得那么差，又加上遇到的各种困

---

① 与 L. Z 的访谈记录，1979 年 9 月 21 日。

② 孔捷生，《南方的岸》，前引，23 页。

③ 见孔捷生，《南方的岸》，前引，24 页。

④ 例如，在北大荒的草原；见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作品集，17 页。

⑤ 与张抗抗的谈话，1984 年 7 月 4 日。

难，这些都使知青更频繁地返回父母家，而且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其实他们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样缺勤自然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前文提到的那个临近小镇的村子里，知青都没有住房，每天晚上都得各自回家，后来他们就慢慢习惯了连白天也待在家里，干脆不再回村了。当然，缺少住房并不是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其他住在农民亲戚家的知青就从来没有这样大量缺勤过①。同样的，工作任务的集体组织管理得不适当，不仅令知青的生活很不愉快，而且也妨碍了他们在发展副业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结果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知青完全不能自食其力，这是个大问题。后来知青本人以及全社会都表示否定下乡运动，上述问题起了主导作用。

工作、收入和伙食

即使是那些思想上准备好要深入农村现实“自我锻炼”的知青，从事完全依靠人力的农活儿也是一项需要经历的严重考验。他们的身体根本不适应要他们干的活儿。几个月下来，精疲力尽，腰酸腿疼，那是他们当然要付出的代价。即使一两年之后，也极少有知青能在体力及耐力上与同年龄的农民相比。这些城市青年经常得每天劳动 10 个小时以上，没有一天休息。在农忙时期，像收获季节，他们甚至要每天干 16 个小时，从凌晨干到天黑。过了些时候，他们可以应付那些体力活儿了，跟着来的就是难以忍受农活儿的单调。有些知青来到农村，希望照伟大领袖所说的“大有作为”，但在现实中绝难见到理想的影子。在下乡运动最火热的那段日子，有 3 位记者和一队模范知青想深入寻找体会“大有作为”的意义，但他们在乡下所能进行的活动不外乎是掏厕所、到臭水里去捞麻、学会分清五谷、让双手磨出茧子及自己学做饭，虽然这些都带有“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但是不像毛泽东的号召所形容的那么“惊心动魄”②。事实上，知青通常被安排做最没劲儿的活儿，因为地方干部对他们的能力没有信心。《蹉跎岁月》里的主人公下了乡一年半，还什么都没学到，甚至都没让他耕过一次地：

---

① 见本书，233 页，注③。

② 《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队长怕这些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崽把田犁坏了。"[1]

看来，似乎并不是劳动的艰辛与单调令在农村的知青灰心丧气。许多人都曾经尝试过，在一两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最终意识到，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去干活儿，也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其实，大多数知青在农村不能自给自足，其中有好几个原因。

根据社员全年拿到的工分，每个生产队一年分一次集体所得，有的地方是一年两次[2]。分的时候必须把上一年预支给社员的实物所值扣除掉。实物预支主要是粮食，不同地方不同年份还包括其他的食用农产品，如食油、食盐等。在一些不太富庶的地区，或其他地方，当气候条件恶劣时，生产值可以很低，这就影响到每个社员能分到多少，而分得的现钱就少很多，有时完全没有，甚至到了亏欠的地步。地区之间或者生产队之间的差距有时很大。我们曾纪录过，在广东省的一个贫穷村子里，干一天活儿只能挣 8 分钱，而在黑龙江的一个富裕大队里，一天的活儿值 1 块 7 毛钱[3]，大约是 1 与 20 之比。在同一个省份里，比如说广东，社员每天挣的钱在 3 毛到 1 块 2 之间，是 1 与 4 之比。这些差距的产生和有无设立地方小型工厂也极有关系。

如果农民已经生活在贫穷之中，自己都吃不饱，那不用说知青若无父母的援助就根本没法维持生活。即使农民仅够生活，知青一般也都不能自给自足。这有两个原因：他们从集体生产所得的收入（以工分计算）差不多总比农民低，而他们的个体收入（种自留地或饲养家畜所得）也总是比较低。给予工分的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得要看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多种：根据出工的天数与全体大会上定出来的每人每年出工等级表来计算，或者是看每天完成的任务，然后根据一个该任务的难度及完成的多少而定出的换算表来计算。也还有一些是混合了几种方法的。

---

①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9 页。

② 有关那个时期农村经济运作的详细介绍，见 W. Parish & M. Whyte，前引，48 ~ 71 页。

③ J. J. M. & Huang He，前引，41 页；Yu Luojin（遇罗锦），*Le nouveau conte d'hiver*，39 页。

结果一般都是一样的：壮年男社员每天得到的工分最多，妇女挣得少一点儿，老人及儿童就更少。大多数情形下，知青在与他们年龄性别相同的组别里不是挣得最多的。比方说，男社员挣 10 分，女社员 8.5 分，老人及儿童 7 分，那么男知青一般能得到 8.5 分，女知青 7 分。这是一个平均数，差距可以再大点儿或再小点儿。那些尽了全力投入劳动的知青通常会觉得不公平，可在干部眼里这是正常不过的事。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些城市小青年干活儿没农民干得好，这倒是真的，起码在开始的时候。另一方面，那是更深层的原因，他们的看法是：收容知青对他们来说是得不偿失。因为虽然增加了这么一批本来就不需要的多余劳动力，可生产并没有相应增长。同样，在按劳定酬的制度上，通常存在某种歧视，干部总是分给知青那些不要紧的活儿，也是最不值钱的拿工分最少的。

过了几年，有些生产队里，知青中最努力的一群终于可以挣到跟农民一样多的工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得到的收入跟农民一样，因为集体生产所得只占农民收入的一部分，即使是主要的，也只是一部分。工分只用来购买基本口粮的配额，一般只剩下很少工分用现金支付。而别的食物（蔬菜和肉类）以及其他所有的开支，农民首先依靠家庭生产：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可供自用，还可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钱；饲养家畜也同样可得到自用或供出售的肉类。可是知青的个体生产远不能与农民相比。一方面，他们缺乏有关知识经验，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时间去搞这些。由于体力耐力比农民差，他们就需要多点儿休息。他们习惯的是另一种生活，需要一些消闲活动，看看书、写写东西、搞点儿音乐，或者很简单的，跟朋友聊聊天。他们时间不够，也是因为集体户不是一个合理地分配任务的单位，不像农民家庭中各成员分工那么清楚。这些家庭通常是三代同堂有男有女，每个成员都习惯于在这么一个由亲情紧密联系的小圈子里各尽本分。要是一个知青在劳累了一天之后，还得去种自留地、侍候家畜、捡拾柴禾、做饭洗碗，这么一来他的工作日自然就很长了。然而，集体组织分配家务劳动又搞出许多问题来。所以，自留地经常没有充分利用，甚至完全荒废。有些知青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自留地租给农民，以换取一

部分农产品，当然，假如他们懂得又能够自己去种，那收益一定高得多。我们的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们一个既不费力又可以吃到蔬菜的办法：他把自己的粪便送给一个农民作肥料，农民就供给他一小部分个体生产所得[1]。集体户一般只是养些家禽。知青很少有时间，也没有残羹剩饭来喂猪。而大多数农民家庭的金钱收入来源是喂养一头或几头猪，他们一年的大部分肉食也是靠此供给的。

知青挣钱差不多都比农民少，可是花钱却花得多，花在哪儿呢？他们的休闲活动（买书、有机会就去看电影）、交通（他们回家之时）、个人卫生（农民比他们少用香皂、洗衣粉、牙膏之类的东西）、衣服、香烟（盒装的），等等。所有这些原因令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2]。1972 年在吉林只有 28% 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 60 到 100 元。到了 1977 年，由于 1973 ~ 1974 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 可以自给自足了[3]。在上海，197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 24 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华南相当于 120 元人民币，在北方相当于 150 到 180 元。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 80%[4]。江苏是一个富裕省份，相当多的知青有运气能在那儿进到地方小型集体企业工作，只有 40% 在乡下两年多的能自给自足（年收入 150 元），32% 是半自给自足者（年收入 80 至 150 元），28% 是完全不能自给自足者（年收入低于 80 元）[5]。

我们访问的广东知青一般都得向家里要钱（平均一个月 5 至 10 元），这还没算上他们探亲后带回乡下的食物，他们经常回家待相当长时间，在此期间全是吃家里的，也没计算在内。不过，这样倒可以在蔬菜肉食上补回不足，因为在农村伙食很差。自由市场上的蔬菜真

---

① 采访 S. G. C.，1978 年 7 月 19 日。

② 到下乡运动停止之后才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见《人民日报》1980 年 9 月 27 日第二版；谭宗济等，《十年后的评说》，151 页。

③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志》，87 页。

④ 《上海劳动志》，117 页。

⑤ 《江苏省志·劳动管理志》，136 页。

的很贵，即使他们有钱也不能总买到肉。这些知青自认为是“无业的”，城市舆论也这么看待他们。有些知青家里太穷，或者父母双亡，又或者父母都在坐牢或劳改，因此他们就得不到任何家庭的帮助，他们的境况非常艰难，通常是很悲惨的。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加倍努力试图摆脱困境，但极少能成功。他们从生产队那里获得了定额口粮，但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全部款项，结果欠下队里很多钱，处于超支状态。有时，生产队会借钱给他们，可是他们不能老是背着债。有的就冒险去搞些非法营生，我们在第 11 章会谈到这个问题。

多数知青没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这一事实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它引起了一轮恶性循环。因此原因在青年中普遍出现了灰心丧气的情绪，主要表现在厌恶劳动和长期故意缺勤。不出工的结果就是收入更加减少。一两年之后，有许多一个星期只干几天活儿，而且经常回家。有的在城里待上几个月，由父母负担一切费用，或者从事非法活动赚点儿钱，只是在每年分粮的时候才会回村一次。农民强迫他们一定要拿钱出来支付属于他们的定额口粮，因为他们出工太少，根本不够抵销。他们倒也不反对，用公价买回来的粮食，他们一转手在自由市场以高价卖出。在广东中山县，100 斤大米公价是 9 块多，可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就不断上升，从 1969 年的 18 块钱升到 1970 年初的 35 块[①]。这种非法买卖在当时是被认可的，而且持续了几年，后来农民就拒绝把粮食卖给不干活儿的知青。这就使这些年轻人完全依赖家庭或者从事比买卖粮食更应责备的违法活动[②]。

知青中的对下乡运动的抵触情绪主要是由自给自足无能为力的现实引发出的。后来，连那些在富裕生产队里靠自己的农活儿过得好好儿的小青年，也都普遍表示不满，因为在城里，他们的同龄朋友干的活儿没他们苦，可是生活水平比他们高得多。

本来知青们深信，如果某些农村的劳动习惯，尤其是农村政策能有所改变，那劳动就不会那么艰苦，农民也不会那么贫穷，但是现实

---

① 采访 J. S. G.，1978 年 7 月 8 日。

② 见本书，327 页。

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因此更令他们意兴阑珊。我们的被访者中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学过农业学的。他说简直不能忍受他们家乡农民的一种长途运送粮食的习惯，就是把很重的口袋放在肩膀上，然后走很远的路。其实，用扁担挑轻松得多，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可是背口袋的方法就不行，因为一个人无法将那么重的口袋放上肩膀，必须得另外一个人用两只手来帮忙①。一位法国农业家1975年访问了中国农村，他也大为惊讶，看到好像没有人有意去减轻人力劳动②。我们的被访者都把这种人力的浪费归罪于农民的思想意识：墨守陈规和对体力的盲目崇拜。有时知青敢于提议作一些改变，但农民责备他们太懒了。在学习大寨参加基本建设巨大工程中，效用不明显，他们就觉得是精力的极度浪费。张辛欣在她的一部作品里把这种思想感情描写得分毫毕现：

> 要想把黄河水引到沙漠深处去，得修很长、很长，很高、很高的大渠，那个累劲儿呀，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还在做着火热、纯净的梦！……无数担黄沙筑的大坝，经不起水轻轻施展一下它的自然属性。渠头只要有一个小孔渗水，拼死干了一年的整个长渠里，就滴水不见。再修！渗光了。再修。……多少年轻人在地球的这一小块地方，徒然地刻着无用的人工痕迹。③

见到当局强加的多种决定的执行结果，他们对毛泽东提倡的农村政策能否有成效的信心动摇了。上面强迫农民运用这种或那种荒谬的耕种方法，采用这种或那种种子，就像“反修七号”粮种，难吃得要命，农民就把它种在田边，而在田中间种上本地的一个好品种④。

更触及根本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整整一套政策要缩减自留地、自由市场、个体养殖及个体手工业，还要禁止一切有利于自给自足经济的商品交易。知青就在当地，所以能判断出农民的生活将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人力被大量浪费，而走出贫穷的道路似乎又被堵塞，在这

---

① 采访J. S. G.，1978年7月2日。

② R. Dumont, *Chine*, *La Révolution culturale*, 155～156页。

③ 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60页。

④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前引，21页。

种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再没有心思继续白费功夫了。

1973～1974年间政策改动的目的首先是让知青能自给自足，并保证他们有合理的收入。除了给在该政策公布之后下乡的知青带来某些好处，目的似乎并没达到。当然了，一律送往城郊的知青不必再面对极度贫穷与落后。知青自己独立成队，就再也不会在计算工分的时候遭人歧视。生活组织得比以前好，人数也更多，他们有更多机会种好自留地、饲养好家畜。可以预料到，假使这个时期的知青真的愿意，他们几乎人人都可以有很不错的收入（起码是根据农村的标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否定下乡运动的呼声那么高，以至很少知青仍然抱有这种愿望。大多数觉得被人捉弄了，等着过几年就赶快结束。因此，他们都没有太多顾忌，公开地尽可能少干活儿，向父母伸手，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为了不让自己将来的返城机会遭遇险阻，怎么也得遵守起码的规矩，表现不能太坏。但只要身在农村，他们就对他们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大感不满，因为他们是和城里比，而不是和比他们早来的知青比。

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1968～1978年十年间，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比农村优越，主要是因为每个农场工人都能保证领到月薪。工资的计算方法根据不同地区在1968或1969年有些改动。在此之前是净工资，就是不包括住房伙食的补贴，不过一般都很微薄。我们的一个被访者当年是在新疆北部的一个军垦农场，他说1965年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是3块钱，1966年是5块钱，1967年8块钱（女同学多5毛钱）。另外一位知青朋友在内蒙古的一个军垦农场，到了1969年初还只挣5块钱月薪。后来，薪金大幅增长，可是，不再是净工资，其中包括直接拨到农场食堂去的伙食费。那倒不是骗人的，因为增加的幅度远大于扣掉的饭费。这样，大部分在全国各农场的知青一个月可以挣20至24元人民币。一两年之后，他们就差不多达到24至28元的一级工资水平，再过一段时间就可提升到28至32元的第二级。有的还直接跳到二级。工资之外还有补贴，在海南，若处于“艰苦”的未开垦地区，基本工资为27或28元，加上各种补贴最后可以拿到38元。另一个例子，在黑龙江黑河，

一般月薪32元，还要加上因当地生活指数过高而获得的18元补助。通常，知青会交给食堂10至12元，实得的净工资大约在15到20元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场知青都能自给自足，这与他们在农村的同学正相反。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很满意。除了在头几年农场的政治思想抓得很紧之外，他们跟其他的知青一样都必须经历千辛万苦，有时甚至还更多，比如严峻的劳动强度，吃不饱，加上感觉自己的积极性被糟蹋了。

当然，农场职工原则上是享有工人的劳动时间：一天8小时工作，每周一天休息。在已经安排得较好的地区，如果地方头头不急于巴结上级表现自己，那么就不会像在农村那样大量消耗知青的精力。然而，通常情况下，不仅以各种借口缩短休息时间，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军队的纪律又不准许缺勤。特别是在从未开垦的地区，没有任何机器的协助，气候条件又极端恶劣，要用人力去清除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在死硬的土地上深挖坑穴以种下新的树苗、还得把处女地改造成良田。在许多地方，食堂供应的伙食不仅食而无味，而且根本不足够补充消耗的体力。一名老知青写下了当时的亲身经历：

> 到了北大荒，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太艰苦。第一个现实的直接的挑战，实实在在的挑战就是生活。很少吃细粮，都吃所谓苞米渣子什么的；偶尔上点白面，但很少很少。又是定量供应，每月30斤，劳动强度太大，根本不够吃，有时饿急了跑到马厩牛圈偷吃喂牲口的豆饼。……每天早晨三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干到天黑。这农场是水田农场，机械化程度特低，打翻地到播种再到收割完全靠人，人就是机械。东北在五月份就备耕了，先整地。那阵子就得穿一条短裤，上边穿棉袄。别看上边冰化了，就一层水，十几公分，下边连泥带冰，脚下去扎得慌。……冰水溅到腿上，拿风一吹，冻得全都裂成小口子，好疼。有一年春播完回到家，我妈头一次心疼得哭了，下半身全都是小裂口，横竖满是。[1]

---

①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7页。

有些地方的干部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强迫知青完成超指标，简直让人觉得是在劳改营[1]。而在其他某些地方，依然还充满垦荒者的先锋精神（至少在起初）。看到在处女地上犁出的第一片耕地，或者从那原是不毛之地里得到第一次收成，知青感到无比骄傲。可惜，通常是没有经过分析研究就决定种哪一块地，结果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过度耕种，开发的代价实在太大，最后不得不放弃。对浪费精力这一点上，在农场的知青比在农村的体会更广更深。下面那位在一个内蒙古农场待过的老知青讲出来的感受就很典型：

> 军队干部一般都没什么农业知识，因此我们种地的收成少得可怜。附近的农民笑我们，说我们收的粮食还顶不上种的。虽然我们每个月底都保证可以领到工资，但是听到原来辛辛苦苦干的活儿完全没用，这怎么能不让人灰心丧气呢？[2]

长远来讲，军队干部的无能有时带来很坏的后果。在海南，一个营长完全漠视专家的意见，命令要打破橡胶水的产量。两年后，那些橡胶树由于被过度采割而丧失了一部分生产能力，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3]。

农场是吃国家大锅饭的，经济上做出的错事蠢事不会直接受到惩处。所以毛泽东思想孕育出来的不切实际的政策在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梁晓声描写了在一个北大荒农场展开的“小镰刀战胜机械化”运动，他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了发扬延安及南泥湾精神[4]，宣布那一年（可能是 1969 年）的麦收全部用小镰刀，这有双重好处，“既获粮食丰收，同时也获思想丰收”，因为“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和汗水一起从我们体内排出”。每个知青都分到一块一米宽几百

---

① 见糜庶，《瑞丽江畔》，前引，66～67 页。

② 与 L. Z. 的访谈记录，1979 年 9 月 21 日。这种内心感受在当时很普遍。有时这可以推动人们的使命感，有一位优秀中国学生现今在美国研究经济，他就是当年的知青，在黑龙江农场劳动的时候开始对这门学科感兴趣：他想试图去了解一个农场怎么可以损失那么多钱；与 Kathleen Hartford 的谈话记录，1987 年 4 月。

③ M. Frolic, *Mao's People*, 198 页。

④ 见本书，35 页，注①。

米长的要割的“收割带”。大家都从同一“起跑线”开始。那是一场无虚无假的竞赛。为了不落在最后，人人都在自己那条长形麦地上拼出最大的力气。这种累死人的活儿让人觉得就是刑罚，而那些劳动者“被这种惩罚式的劳动彻底异化了”。最后，只收割了一小部分送入谷仓，雨季就开始了。镰刀倒真的打赢了机器，因为当收割机匆忙开出来时，已经晚了，根本无法在泡了雨水的泥泞地中行走。好大一部分的麦子就这么在地里泡了汤①。

总的来说，农场的知青都觉得，他们的大部分领导对发展落后地区是既没有能力也不是真心关怀。这就使那里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万分失望，就连当初最积极的那些也不例外②。

身染疾病与意外事故

各种疾病及意外事故对下乡青年的威胁比在城里大得多，而且农村的医疗条件又相当落后。农场和农村一样，体力透支加上营养不良就是各种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些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因为吃得很差，所以肠胃病是常见的，同样也带来牙齿的问题。作家叶辛当年被发配到贵州山区的一个小村子，在那儿过了一整年没有沾过一滴油，又过了一整年没有吃过一块肉，结果几年下来掉了6颗大牙③。

当年第一批自愿报名去云南的北京青年有55人，人们戏称“55”。我们的一位知青朋友那时就在西双版纳，他认识“55”之中的一个④：

> 这个男同学是在我们旁边的那个团队里，像许多知青一样，他曾经食物中毒。因他体力衰竭，无法康复，很快就去世了。那是1970年初的事。他出身不好，所以拼老命地干，白天当农民，晚上做会计，希望借此证明自己具有革命

---

①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第1册，249～254页。

② 见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1页。

③ 《青年作家》1981年5月号，76页。

④ 见本书，79页。

精神。[1]

有些特殊工作也会引致职业病。比如说，在水里干活儿，就是风湿病和慢性关节炎的元凶。

在乡下有大量对身体有害的生物，像蚊子、蚂蟥、臭虫，等等，都是很讨厌的。有时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海南，许多知青都染上过疟疾。我们的一位被访者当年分在这个岛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就是照顾那些患病的同学，清理呕吐物[2]。此外还有某些地区的地方病，如肝炎或狂犬病。史铁生今天已经是很有名的作家了。1969 年，他作为知青去了延安地区，两年后大病一场，带着两条瘫痪的腿回到城里[3]。

对女知青来讲，最大问题是月经紊乱或完全停经，原因来自气候及生活条件。这类荷尔蒙失调令在海南的女知青变得虚胖，而男知青就越来越瘦[4]。1972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吉林省一个人民公社里 70% 的女知青都有妇女病，主要是因为她们要求月经期间不干重活儿、不下水，而干部们认为她们“娇气”，因此强迫她们服从命令[5]。

某些地区意外的发生率很高。知青必须习惯战战兢兢地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遇上狼、老虎或者毒蛇。有的被咬了，就此丧生或落得终身残废。林区或草原上在旱季发生火灾是很频繁的，但灭火的方法却原始得很。知青们手持树枝扎成的大扫帚来救火，有的就献身于大火。另外，还有知青在水灾中淹死，还有的进入沼泽地深陷泥潭而被吞没。1972 年 5 月 5 日蒙古草原发生了一场火灾。连长带领知青投入了战斗。其中 69 名被困火场，活活烧死，后来被追认为“烈士”[6]。

在开垦区，有的是被大树压死的，尤其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没有

---

① 与 T. X. 的谈话记录，1985 年 5 月 28 日。

② 与 W. S. 的谈话记录，1986 年 11 月 23 日。

③ 史铁生，Vaincre la mort，*Littérature chinoise*，1986 年第 2 期，158 ~ 159 页。

④ 禾黛云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2 页；孔捷生，《大林莽》，《十月》1984 年第 6 期，184 页。

⑤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03 ~ 104 页。

⑥ 同上，104 ~ 105 页。

经验。现在每当老知青有机会回到这些地区，他们都会去死去的战友墓前拜祭[1]。我们的一位被访者就目击一桩惨剧：一辆由拖拉机拉着的大车超载，车翻了，压死了10名刚到几天的城市小青年[2]。最初几年致死意外的发生频率较高，也是由于当年官方宣传大力鼓吹对英雄及对个人牺牲的崇拜。不少青年就是为了学习英雄，并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去做无谓的冒险。金训华就是一例。我们谈过的这位"雷锋知青"[3] 是在一次山洪暴发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根电线杆）而在激流中遇难的。在意外牺牲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上写道："誓死保卫毛主席。"[4] 根据作家梁晓声调查，有200名知青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北大荒死去的[5]。他在名为《北大荒纪实》的短篇小说中揭露，这些无谓的丧生，责任在于当局强调牺牲意识，特别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那是必须自我救赎的意识在左右[6]。

另一位作家孔捷生，在小说《大林莽》中描写一群年轻人，对自己征服热带丛林的能力怀抱既盲目又不实际的信心，最终牺牲在森林里[7]。在另一本小说里，他带领读者深入一位知青的思想：他在一场森林大火中受了伤，这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只有20岁，可是他将死在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地方[8]。这些冤死者的同伴，也是这些惨剧的目击者，除了悲伤，他们时常还有一种荒谬感：怎么会这样呢？不仅是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浪费了，连他们的生命也被糟蹋了，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当干部该为发生的意外负全责之时，他们的感情就会转化为愤怒。一群西双版纳的知青曾在北京张贴过一张大字报，谈到一个干部强迫一位不会游泳的知青下河游过去追赶一头水牛。不用说，那位年轻人就这么淹死了。事后他的父母收到一笔为数一百零

---

① 见《青年一代》，1985年第6期，9页。
② 与T. X. 的访谈，1985年5月28日。
③ 见本书，27～28页。
④ 《红旗》1969年第12期，9页。
⑤ 与梁晓声的访谈记录，1986年9月21日。
⑥ 梁晓声，《北大荒纪实》，前引，101～103页。
⑦ 孔捷生，《大林莽》，前引，132～192页。
⑧ 孔捷生，《南方的岸》，前引，53～54页。

几块的汇款，而那个干部却没有过任何麻烦[1]。意外不只发生在边境地区。1974 年 1 月北京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要求郊区各县领导更加注意知青劳动的安全，特别是在冬季开展大工程的期间。这是因为他们接到太多投诉，意外太多了：工伤、触电、淹死、煤气中毒，等等[2]。

由于缺少医生，而现有的医术水平又太低，患病及意外的后果就更加严重。在农村往往需要跑几十公里路才能找到一个医疗站，或者一个设备简陋的医院。交通工具几乎等于零，有人病了或受伤了，只能背着他们跑去找大夫。像农民一样，在农村的知青并不享有医疗保险制度。如果他们住得离原来的城市不太远，病情也不太紧急，他们就可以回家，给多点儿钱就可以得到治疗，但是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能不能得到适当的治疗，那就得看运气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患病期间是拿不到工分的，可是他们得缴付医药费的呀。在农场，知青有可能到一些医疗站及已有的医院去，以较低廉的价钱获得治疗。不过，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责那些农场大多数医生无能、贪财以及面对病人的疾苦无动于衷。西双版纳的知青张贴大字报揭露出多宗医疗事故，由于医院地处偏远，加之医生无能，导致分娩女知青死亡或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3]。一位到新疆去的女知青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

> 1976 年我得了病，住进了农场医院，不过那儿的医生没什么专业水平。另外，要是你既没钱也没势，他们就对你没兴趣，不理你。他们充分利用手中那点儿权力。比方说，穿着白大褂去买东西。这样，人家就会热情地招呼你，买东西也会便宜些。在医院我见过一位 50 多岁的农民哭着给一个医生下跪。他得了胃肿瘤，已经很大了，但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给他看病。几天之内，在内科外科之间把他踢来踢去。他

---

①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206 ~ 207 页。我们的一位受访者亲眼见到 10 位知青惨死在一桩拖拉机意外中，根据他不太肯定的记忆，发出的抚恤金只有 300 元；见本书 252 页，注③。

②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24 ~ 125 页。

③ 1978 年 12 月在北京街头张贴的大字报，本书作者在 1979 年 2 月初照了相留存。

就睡在外面，在医院前面。他就在那儿死去的，到最后也没能让医院收留他住院。我还是比较走运的。我爱人靠着关系，送出了几个大红包，才把我转到上海的一间医院，我终于在那儿得到适当的治疗。如果还待在新疆的那家医院，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①

各种严峻的危险，加上农村恶劣的卫生条件，使知青缺乏安全感，这就令他们在与留城的青年相比较时，更加感到不公平。

娱乐和文化生活

农村缺乏工余消遣及文化生活不会有同样的骇人听闻的后果，但无疑会严重地影响知青的精神，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需要，然而在农村所有的知青都长期无法得到满足。

一个农民的生活，从日出至日落，一般是完全投入田里的农活儿和家务劳动，然后就是休息睡觉。他们唯一的空闲时间是下大雨的日子和冬季，而上级还定期地强迫他们在严冬参加基础建设大工程。他们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恢复体力。其实，他们是没有选择的，因为无论是他们的物质条件还是传统习惯都不会令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顶多是一些节日和红白二事（春节、婚丧等），而政府已经大量缩减了各种传统节日，并贬低其重要性。参加政治会议成了唯一的非生产活动，而且是一贯鼓励的。但是农民，包括生产队长，都对开会没有多大兴趣，只有在上级拼命施加压力的时候才会去应付一下。下乡运动的头两年，在相当多的村子里，当局组织过农民和知青同时参加的文艺宣传活动。一般是表演，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或者演几段样板戏。很快，农民和知青都厌倦了这些“文化”活动，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鉴于知青的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在城里养成的习惯，他们的生活不能只限于体力劳动和恢复体力。在农闲季节或雨季，没有任何消遣活动，这令他们特别难以忍受。“没事儿干，我们就赖在床上。有一次，

---

① 与 T. T. D. 的访谈，1985 年 7 月 21 日。

我们连着睡了两天。都给闷出病来了。"① 通常知青都回家过年，能走的就在家待上整个冬天。可是有些知青是没有机会走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太穷了，或者在"五七干校"，甚至在关押期间。对这些青年来说，农闲季节更是难熬。

他们是既不能忍受体力脑力完全停顿不活动，也不能接受只干体力活儿。所以，即使在平时的农业劳动期间，知青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留最少量的精神活动，哪怕耽误工作也得这样。想在农村环境继续生活下去，那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一位被访者作出如下解释：

> 捡柴禾是首要的工作：柴禾那么贵，要是花钱买的话，农民就会觉得是把一天的劳动所得用一把火烧掉。我觉得我们的工余时间已经很少了，还要浪费在捡柴这种活儿上，太不值得，太荒谬了。所以我就让家里给我寄钱买柴。我是村子里唯一一个花钱买柴的人。农民都笑我，我才不在乎呢：没有这一点儿争取回来的时间，我就变成了一部无知无觉的机器。②

在农场同样有空闲时间问题。工作日通常没有农村那么长，但是知青得花大部分时间去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会议。原则上，他们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年（或每两年）享有 12 天带薪假期，不过他们平时想无故缺勤，是很难的。

他们（在农闲时节）有太多空闲时间，或是（在平常）没有足够的闲工夫，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要在缺乏有利条件的环境下解决文化饥渴的问题。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即使在城里，中国的文化及精神生活都是极度贫乏的。而在农村，那简直就是零。除了我们曾经谈过的那些令人气馁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他可做的就是听广播，读《毛选》，读报（报纸通常得过了好几天才来，而农民是从来不读报的）。这些活动根本不够满足知青的愿望，就算是寥寥几场电影也起不了作用，放来放去总是那几部，而且环境条件都很差。电影巡回放

---

① 采访 H. C.，1978 年 7 月 10 日。

②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64 页。

映队有时需要使用脚踏发电机。那个人踩累了，电影的反映速度就慢下来，只听到叽里咕噜的怪声，不知在说什么，不过这起码可以在每场放映活动中添加一些插曲①。

正式的文化生活在农村如此贫乏，这种状况逼使知青自己寻找方法来补救：

> 在那僻远的地方生活时，我们不得不抓住一切和文化艺术沾边的东西，来抵抗精神的崩溃和生活的贫瘠。一个能把全套《基度山恩仇记》背下来的家伙，就成了我们几个月里的精神支柱，每天中午收工，顶着大太阳跑到分厂卫生所去会半个小时的伯爵。②

在那漫漫长夜，他们讲故事、促膝长谈（内容尽是非正统的）、玩吉他、唱歌，甚至自己谱写“萎靡”或“反动”的歌曲、收听外国电台、阅读禁书、写诗歌或写小说给朋友或给自己看，所有这些都是另类文化的主要表现。知青试图通过这类活动克服烦闷的情绪，同时也不让自己过分地为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担忧。王小波把这种心情描写得非常细腻：

> 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③

随着这种情绪而来的，通常是后悔不得已停了学。也有很少的知青继续啃书本。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坐在床上，手持课本苦读，完全不理睬干部批评他们走“白专”道路，也不理会自己将来重返学校的机会有多渺茫。这些年轻的自学者经常是知识分子的子女④。

---

① 阿城，《孩子王》，《棋王》，173 页。
②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前引，184 页。
③ 《王小波画传》，22 页。
④ 各次访问，以及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0 页。

课本，就像其他的文化用品，应该是从城里带来的。有些地区，找张能写字的纸都不可能。作家叶辛当年在中国西南的贵州，他得请朋友从上海给他邮寄纸张[1]。当时有一批知青，他们写作是希望有一天能正式出版，叶辛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是批判对象。他被指责利用文学逃离农村出人头地。虽然受到批判，虽然手稿都没出版社要了，他仍然坚持，因为他需要写作，“为了使自己极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生活有一种依托”[2]。

在农村，知青也觉得断绝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资讯，这倒不是因为不能及时收到报纸或完全收不到，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有一条新闻管道，而不像城里人总有小道消息。只有当他们返城回家的时候，才能听到一些消息。在知青脑子里，城市就是文化及精神生活的象征，而农村是一片“文化沙漠”。所以他们要充分利用回家的机会，不仅为了吃，也是为了尽可能地补充精神粮食。作家张抗抗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 我最盼望的就是回杭州探亲。每次探亲回到杭州家里，就像来到了书的乐园之中。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九三年》，还有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等名著，都是1972至1974年在杭州阅读的。父母想尽办法为我借书。[3]

除了文化活动，最简单的休闲活动，像体育运动、散步或集体游戏之类，在农村都是少见的。由于没事干，知青中很容易就自动冒出一些其他的活动，像抽烟、赌博、酗酒和男女调情等。为了抽烟，他们（当然是他们的父母了）得花很多钱[4]，不过在社会上，男子抽烟是被看好的。其他三项活动都是被正统思想谴责的，尤其是最后一项，那是社会道德不允许的。这些活动都非常不利于知青融入农村社会。

---

① 叶辛，《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十月》1982年第3期，240页。

② 同上。

③ 张抗抗，《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61页。

④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39页。

难以融入农村社会

由于知青得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因此必须保证招呼他们的农村社会能热情接待他们，而他们自己又最终能有归家的感觉。但是，这个目标因为重重阻力而未能实现。

主要障碍

农民不欢迎

农民一般都有自我封闭的倾向。他们可以热心地招呼过路的陌生人，可是一旦这位外人表示有意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那就有可能被当地人怀疑并排挤。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千名法国青年的亲身感受。他们当年抛弃一切去“回归土地”，梦想会受到热烈欢迎。坚持了七八年后发现依旧无法改变那种猜疑，结果大失所望。这种幻想破灭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回归土地”的浪潮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 虽然我们尽了全力，但是从来没能让当地人接纳我们。农民社会是一个对外封闭的群体。他们始终把我们看作外人。不错，我们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可是过了好多年，还是这么说……①

传统的农村群体对“外人”来掺和他们自己的事情特别反感。法国那些向往农村的人士对此深有苦涩的体会：

>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我们成立了一个联谊会，还组织了一次热热闹闹的活动，在这个村子里30年来都没有过的。结果呢，人们搞不清楚我们干嘛要自愿来干这些事儿！村长尤其害怕有人会夺去他的一部分权力。②

我们知道延安时期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年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好意想改变一下农村的生活，结果引起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被指责为

---

① Th. Quinsat, Le retour de la terre, *Le Monde Dimanche*, 1980年8月10日，IV页。
② 同上。

企图控制他们[1]。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并不比1949年前稍微开放一点儿。大部分的村子依旧是清一色的本村人，没有过与外来人的搀混。每一农村群体的内聚力非但没有被集体化所削弱，相反更加强了，因为集体化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通常相当于一个村子。

知青打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外人。我们采访过的好几个年轻人都说，他们待过的村子里全都是一个家族或两个家族的人。假如是两个家族，那就会分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说，他们分别住在村子两头）。就算在同一家族里面，每个成员的身份也是由该人在族谱中的地位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就更加显得是外来者了。

> 在我待过的那个村子里，大家都是同姓的……我们到了……就是外姓人，是不被人看上眼的。就算我在这个村子待上一辈子，也不会让人看作是自己人的。[2]

相反，蒙古游牧族看起来要比汉族农民好客（或者没那么好客）。谈到渔民或者渔农，我们的一位知青朋友认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像农民生活在完全或几乎完全是封闭的自足经济里，而是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3]。不过，总的来说，由于城乡之间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截然不同，这就更加证明了知青的外来者身份，因此受到排斥。在某个地方，农民就看不惯男女知青并排在街上走。在另一个地方，女知青卷起袖子露出胳膊或男知青穿短裤出去，都会激起当地人的反感，认为城里人真不要脸。但是，对这些知青也产生出一种羡慕之心，觉得他们有幸出生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城市，那儿人人都可以享福。这种心态主要出现在青年农民身上，他们比父母一辈更强烈地感觉到知青是看不起农民的。这种感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以后会谈到[4]。

提出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就令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地方干部，对

---

① 见本书，26页。

②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76页。

③ 与芒克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5日。

④ 见成正和，《我们都是年轻人》，《青年佳作》，192页；贺士光，《局长的女儿》，《观察家》，1980年第9期，61页。

他们更存有戒心及偏见。假使说这些城市青年得接受再教育，那么他们定是不怎么样的了。开始时，普通农民一般都有点儿害怕知青，因为他们把知青当作那些代表上级机关来监察他们的工作队队员。地方干部很快就纠正了他们的想法。这些干部虽然对上山下乡政策了解得多一些，可是他们是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进行解释的：这些城市青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坏分子，毛主席把他们送到农村来，让农民把他们带回正道儿上去。有了再教育对象这一身份，那些刚抵达农村的外来者自然不会让人看好。

然而，这些年轻人是准备来参加农村阶级斗争接受考验的。在那儿政治斗争确实热火朝天，因为在那个时期，尤其是 1969 ~ 1970 年间，政府发起了几场运动，主要是要说服农民放弃或减少个体生产活动，而投身到集体生产中去①。一部分知青，为革命的天真或个人野心所驱使，毫不犹豫地在这些运动中扮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当然并不是他们个人有什么威望促使他们插手地方政治斗争，而是被那些激进的干部们操纵利用了。这些干部万分庆幸找到了既敢于行动又能言善语的辩护者，这使农民厌恶之极。有时，一些人成为了某场运动的靶子，知青甚至还参加针对他们的残酷斗争。这种参加“阶级斗争”的方式当然不会改善广大农民群众对知青的看法。必须指出的是，这类积极分子只是少数，大多数知青都不太热衷于参加这种斗争。有的时候，知青还冒着招致政治麻烦甚至被捕的危险，为农民说话，反对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②。一位知青跟我们说，在内蒙北部一个地区，知青在荒唐的内蒙古人民党事件中的态度使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党是由中国共产党在 1925 年建立的，为的是贯彻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政策，1927 年解散了，其中一部分党员选择了一条和共产党不同的路，没有跟着共产党走。到了 1968 年，为了打倒内蒙主席、内

---

① D. Woodward, Rural Campaigns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xperience (1969 ~ 197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1 年第 6 期，97 ~ 124 页。

② 在赵振开的《波动》（29 页）可以找到一个文学创作例子；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46 页。

人党创立人之一的乌兰夫以及一大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蒙古干部，那些毛泽东分子没有任何根据就肯定这个党还存在，并进行着反革命地下活动。在康生的旨意下，掀起了一场“挖肃运动”，要揪出所谓叛徒[1]。1968 年底 1969 年初，运动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阶段。每个表示反抗的可疑分子都被严刑拷打，直到他们供出两个同党的名字，一个是上级，一个是下级。在一件又一件无中生有的控告之后，就是成千上万人的冤死及伤残[2]。由北京派去或遥控的军队及民政干部就企图利用知青的手去执行这桩“肮脏的任务”，因为这些青年是局外人，所以和蒙族群体不会有什么利害关系。在我们的朋友所在的地区，知青们都是头一批志愿者，他们不仅拒绝打击被控告的地方干部和普通牧民，而且还站到他们一边，替他们说话，驳斥顶撞中央派来的军队干部。他们认为，他们在那儿其实是为了与群众相结合，而不是为了施行全民反对的北京强权政策。这种态度后来就使得知青能够与当地人保持相当亲切的关系[3]。我们觉得这个例子是意味深长的，一方是要与群众相结合的真诚愿望，针锋相对的另一方则是一帮声称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群众利益的人。不过，应该指出那是很特殊的情况。

知青是汉人，不可能被控告属于这个成员全是蒙古人的党，因此那些青年人就有足够勇气去帮助维护当地人[4]，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在内人党这一特殊案例中，下放内蒙的知青也不是人人都持同一态度的。很多人只是避免积极介入运动（有一位女知青就找了个借口回自己家待了几个月）。有些则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连肉刑拷问都没错过[5]。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知青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

① 有关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可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第一册，57、185～186 页。

② 将近 1970 年代中期的时候，一支“万名寡妇队”在呼和浩特成立，目的是要求为这场运动中的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但直至 1979 年 3 月经中央批准才宣布平反；见与 R. C. G. 的访谈记录，1987 年 4 月 8 日；肖超然等，前引，186 页。

③ 与 M. J. L. 的访谈记录，1986 年 6 月 30 日。

④ 那些军队干部非常不满这次抗争行动，一有机会就报复，我们的受访者就有惨痛的经历；见本书，341 页，注①。

⑤ 与 R. C. G. 的谈话记录，1987 年 4 月 8 日。

后期的政治斗争，但无助于改善他们与整个农村社会群体的关系。

打运动一开始，农民就自然而然地把知青看作是待些日子就会走的“过路客”。后来，那些城市青年真的安置下来了，这可是从未见过的，也就不合常理。农民们没法相信这项政策具有永久性。还有另一个无疑是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去相信，这才是实质问题，因为这些“过路客”不仅是外来人，还特别是强加给他们的不中用的外来人。在大部分地区，农村干部是把知青配额当作是无法推卸的责任来接受的。一位曾担任知青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跟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看到基层干部毫无诚意，主持分配会议的负责人就说：“你们大队必须得接受那么多知青。这是政治任务。你们不同意，咱们这个会就没完没了地开下去。”① 今天，连官方资料都承认“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②。

农民们并不自觉自愿接待知青，首先是因为不需要他们。在知青下放的大多数村子里，人口已经过剩了。人多得连有经验的农民都只能达到微弱的边缘生产率。就像在广东台山县，那儿的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③。在这种情形下，再来一群毫无经验的城市青年，那对农民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无论是农田的收成还是有限的自留地，都得分一份给这些青年。所以，农民觉得知青“抢了他们的饭碗”。过了些时日，不少心灰意冷的城市青年开始拒绝定时下田干活儿，这时候农民就公开指责他们是“寄生虫”或“占便宜、不劳而获”。的确，自 1971 年起，一部分知青被调去非农业岗位（教师、会计、赤脚医生④等），他们的才能可以大派用场了。但这只惠泽到少数知青，而在众多地区，人们并不需要知青来做这些工作，因为当地就有受过教育的青年，当有工作分配之时，自然优先考虑他们了。1973～1974 年间多项政策重整，接待知青的公社得到更多补贴，紧张关系才得以缓和。但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农民依然认为

---

① 与李庆善的谈话记录，1985 年 8 月 21 日。

② 张华，前引，151 页。

③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39 页。

④ 见本书，45 页，注②。

他们是赔本的（只是比以前少赔点），他们仍然希望停止下乡运动政策。

要想解释清楚农民对知青的不同态度，上述的最后一个障碍在我们看来是最主要的。事实上，我们收集的资料并不能印证伯恩斯坦根据直觉做出的判断，他认为知青在最现代最先进的村子里会受到较好的接待，因为最传统的落后村子比较容易对外来人采取地方主义的歧视态度①。我们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总的来说，知青在落后的村子里受到较好的接待。原因可能是“地方主义的歧视态度”非常普遍，地方虽不同，区别并不大（在某些宗族势力强大的村子里，这种态度更厉害些）；但知青有用无用的程度倒是随着不同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分别。通常情况是，在贫穷落后的村落，特别是在山区，没有人口过剩的现象。因此，那些村民对从外面来一批额外的劳动力不会怎么反感。此外，他们一般都缺少能读会写的人。对他们来说，知青就很有用，可以做那些非农业工作，还可以帮助干部搞好和上级政府部门的关系。当然，农民对外来人总怀有戒心，因而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愿意让数量过多的知青占据农村集体内部的掌权职位，不过，可以说，不管使用价值的高低，知青大致上都受到比较好的接待。农民采取什么态度，关键就在有没有使用价值。这主要取决于每个村子的土地与人口的比例高低，以及对有一定教育水平人士的需求大小，同时也取决于知青本人在农田或其他岗位上作出的努力以显示他们确实有用。然而，不仅是生活条件，还有融入农村社会的种种困难，都经常影响年轻人的良好愿望，并动摇他们的坚定意志。

令知青缺乏持久扎根意志的阻力

上山下乡的强迫性质构成最大的阻力。由于不是心甘情愿的，知青们就感觉是被流放到一个不是自己选择的地方。所以，在两大家庭团聚的传统节日（阴历年和中秋节）期间，只要有机会，他们就非要回家。春节刚好是在农闲季节，所以一般是有可能的，但也不一定。许多农场，两年才给放一次假；有的地方那些城市青年必须等三四年

① T. Bernstein，前引，141 页。

才得到批准回家探亲。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则通常是没有钱回家，或者是因为家里人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遣散到了全国各地，结果无家可归。只剩下几个知青留在集体户或空无一人的宿舍中，这时，一种无名的思乡情绪紧紧地缠绕着他们。中秋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不能在家过，对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知青就自己在村里或农场里组织一些怀旧节日的活动，中秋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地方政府倒出主意决定让知青到农民群众中去过“革命化的春节”，这就更加重了他们的思乡病。我们不清楚领导人的真正意图。那个时期全国交通拥塞，此外又有意利用那农闲时节来搞搞基础建设，这些都是很可能的。反正是要割断知青与家庭的联系，从而加强与农民的联系。得到的结果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知青只会更加思念家庭，然后将一肚子气都撒到那个不理会他们的意愿而把他们扣下的村子头上。那些不遵守规章的，一旦被抓住了，就动用武力押送回村儿①。知青申请返城的第一条理由经常是家庭团聚，不仅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离家十万八千里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这也违反中国的社会伦理。在后来的游行队伍中有一条口号是“要求骨肉团聚”，引起公众舆论的同情②。

正像上面谈到的，根本问题在于，从一开始，尽管知青表面上是自愿，其实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来农村的。可别相信只有“真正的自愿者”努力融人农村社会。好多青年本来是想上大学进工厂的，后来看到大势所趋才不得不违心顺从，试图尽他们所能去适应新的环境：“我本来是想上大学的，后来眼看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就希望做一些对农村有用的事情。”③ 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低头屈从的”知青的态度，又正好与某位“真正的自愿者”的想法相似：“我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74～75 页。过“革命春节”总像是与激进派的一场攻势连在一起；见 SWB，1974 年 2 月 5 日，B/II/2～3 页。

② 云南省参加罢工的人把这条口号与其他的都张贴了出来；见《当代云南大事纪要》，474 页。

③ 采访 Y. S.，1978 年 7 月 21 日。

嘛，只要是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有用处，我就准备在乡下渡过我的一生。”①

很清楚，无论是对知青，还是对农民来说，最本质的问题是他们待在农村有没有用。即使当时的宣传一再强调对知青的再教育，可他们自己依旧认为有没有用是取决于他们能给农民带去什么与众不同、新鲜、特殊的事物。知青们的这种来自内心的辩解得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说他们上中学的年代。他们决心要在和群众相结合的同时，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为人民服务”、推广文化科学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然而，他们遇到的现实绝少能与那种期待对得上号。在某些地区，知青可以派得上用场，还受到热情的接待，但那一般都是些生活条件上有严重问题的艰苦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知青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待在那儿是不受欢迎的，而作为农田劳动力，他们可以竭尽全力，拼命干活儿，减轻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至于他们作为知识青年的特殊才能，虽然他们中不少在开始时有过雄心壮志，但最终利用率极低，或者完全没能得到发挥。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无用武之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限于几个会读、会写、会算的人，很多接待知青的村子已经有了具备这种才能的本村人。农业专家倒是极有用的，但知青当然不能以此自诩。头两年，有的参加了科学试验（提高农产量或改良品种），不过是使用了很特殊的方法才取得一些成绩的。最常见的是，农产量真的提高了，原因是施了极大量的肥料，那当然是事倍功半了，所以这类试验很快就被放弃了。许多知青原想在发展农村机械化或电气化上做出点儿事情，起码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水平去研读有关书籍并学得一手技术。过了几年，有些知青真的可以一显身手了，可是只有极少数。一方面，各个村子在财务上已经捉襟见肘，过剩的劳动力并不利于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民一般对知青没有足够的信心，从而不敢把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们。

知青在推广文化及宣传方面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因为农村干部不重视这些活动，而且还认为这与青年人的“被再教育”身份有矛盾。

---

① 采访 T. R. C.，1978 年 7 月 15 日。

因此，知青只能在工余时间给农民上夜课或者参加文娱宣传队的活动，但都是挣不到额外工分的。有时，干部还反对知青搞这些活动。有一次，在黑龙江的一个解放军农场，整一个业余宣传队被赶回去参加生产，“他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一名干部就这样大声喊叫①。

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一些态度好的知青居然攀上了“毛泽东思想辅导员”或者“妇联主任”这类位子，但这些职务都是有职无权的。真正的领导岗位绝少落到既是外来人又是再教育对象的知青身上，生产队做出的重要决定是不容他们置喙的。

> 我们建议买一部花生播种机。农民说我们想偷懒。我们就继续用手一颗一颗花生那么种。我们提出的建议总是给驳回来的。②

> 开会的时候，假使我们提出的意见不是紧扣政治路线及干部的决定，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立刻就扣到头上来。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那就会很危险。我们很快就明白最好是沉默不语。③

在积极分子会议上，有些知青试图让别人承认他们不仅是“再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来进行改造的”，“当他们完成自我改造之时，也应该去改造农村”。省里和县里的干部并不都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基层就不能接受，更别提去发挥了。开初几年，有些知青尝试去阻止某些陈规陋习。在山西的一个县里，每场婚礼就是集体羞辱新娘的机会，人们强迫她脱衣服，还逼她跟新郎当众做出一些亲热的动作。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决心要破除这种恶习。在某次婚礼中，突然闯进，从而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仪式”。他们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但是农民对他们简直是怒不可遏。为了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这些年轻人在他们宿舍大门的两边贴上两条标语，一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

---

① 张辛欣和桑叶，《逗哏》，《北京人》，426 页。
② 采访 T. R. C.，1978 年 7 月 20 日。
③ 采访 H. C.，1978 年 7 月 10 日。

再教育”，另一则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毛泽东的这两条自相矛盾的语录正好描述了他们所处的尴尬境地。

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起，上级政府鼓励地方领导充分利用知青的才智。因此，一部分调去了非农岗位作教师、会计、赤脚医生、广播站广播员，等等。可是作教师的得满足于教给孩子对发展农村没什么用的千篇一律的口号和毛主席语录。有人想抛开省政府制定的课本，教一些联系实际的有用的东西，结果就给送回生产队[2]。同样，赤脚医生只接受过很简单的训练（通常是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课程），只具有极少的治疗办法：阿司匹林药片、他们自己采集的草药和几根针灸用的针。不管怎么样，知青中10%或15%得到这类职位的[3]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自我感觉到是有用的，而他们的大多数同伴可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一位知青如何表达他心里的感受：“下乡运动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可是我们的文化一点儿用都没有，而又没有人需要我们去做体力劳动者[4]。”

第二次冲击：发现农民的“落后”意识

最积极自觉的知青都怀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愿望，看来实现的机会很少了，那么他们大概可以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全力以赴地进行自身的思想改造吧！事实上，虽然任何一位知青都不会仅仅抱着接受再教育那么自虐的意向到农村去，那些想给农民带去点儿东西的，正是那些准备好“跟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这也包括了从他们身上学习革命道德精神。但是，很快，所有知青都发觉真正的农民跟宣传中赞扬的理想农民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在他们发现了农村落后面貌之后受到的第二次冲击。

> 到了村子里，我们发现农民不仅是没有文化，而且思想上还很落后。他们对政治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其实，他们都

---

① 《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19页。

② 阿城，《孩子王》，前引，129～178页。

③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零碎的统计资料；见T. Scharping，前引，287、329页。我的这个推测的根据是官方的零碎统计与本人在访问中收集到的数字。

④ 采访X. C.，1978年7月3日。

很自私，老是想着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而我们呢，受过教育，习惯于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很失望。[1]

农民的确是辛勤劳动，但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是，能不能吃饱穿暖；到快去世的时候，他们只想能不能得到一件衣服和一副棺木可以让他们体面地离开人世。[2]

我们对农民的心胸狭窄和斤斤计较很反感。他们可以为了一丁点儿自留地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3]

所有插队到农村去的知青似乎都感受到类似的大失所望[4]。他们发觉现实跟千篇一律的同一调子的官方宣传正正相反。那些前地主富农，还有他们的子女，既不富裕，也没有什么势力，更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们好可怜呀，一有运动就被拉出来当靶子打，其实他们早就吓得哪怕一点坏事都不敢干了。看到这些情形，年轻人心中的疑惑就更大了[5]。

看破农民的真正精神面貌带来了最严重后果，那就是令当年下乡运动最根本的目标“再教育”无法自圆其说了。有的青年倒也还承认农民具有刻苦耐劳的品质，但所有知青都一致认为，农民没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许多人甚至公开地蔑视他们，称他们为“乡巴佬”。

---

① 采访 X. C.，1978 年 7 月 6 日。

② 采访 H. C.，1978 年 7 月 7 日。

③ 采访 M. Y. S.，1978 年 8 月 1 日。

④ 这种失望可以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所体会到的幻想湮灭相比拟，当时他们发现俄国真正的农民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而且农民群体跟米尔这一个几乎是共产主义的设想村落组织完全不是一码事。尽管有人仍然决心在乡下长期待下去，但其他的都在 1870～1880 年间回到城里去了。一些知识分子随后认真地研究俄国的农村现实，还出版了有关著作，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沮丧心情；R. Wortman，前引。知青和他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中国青年人并不是自发地产生、怀抱他们的幻想，而是官方的宣传从小就往他们的脑子里灌输出来的。

⑤ 多次访问记录。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前引，8 页。有些地方，这些遭难倒霉的人被戏称为“老运动员”，当然不是指“体育运动”了，而是说每次政治运动都把他们揪出来，成为运动的打击对象。Bennett 曾经引用过这个词语，但没有理解其中的戏谑之义；G. Bennett，China's Mass Campaigns and Social Control，前引，133 页。

当时出现了一批贬意的称谓，最流行的像“阿乡”、“老乡”、“土佬”等。在广东地区则叫“扑佬（poklo）”。对这些欠缺文化、又生活在如此困难条件下的农民，有些知青倒产生同情，或者说是一种藐视与同情的混合心理。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对农民表示器重及尊敬。那可是他们想自我改造成农民的起码条件。他们害怕有朝一日变成那样的农民，像机器或畜牲那样干活儿，害怕身陷于一个既无文化又无情感更无理想的单调的困境里。他们拒绝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上述的那种担心。农民的这种形象自然会影响在当地结婚成家的知青，他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自己也慢慢儿地沉沦在“具有农民特色的心胸狭窄”之中①。这里应该指出，知青所看到的，已是在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改造之后失去了部分传统文化的农村。他们见到的农民既不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英雄，也不是保有千年文化的农民，而是当局企图把后者改造为前者的一大败笔。

和村民们的近距离接触，不论是什么形式，都无法令这些城市青年接受下乡运动。赵文词在“陈家村”里，谈到“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知青，他们的实例证实了发现农村意识造成的冲击影响深远②。在这个村子里，头一年（1964～1965）知青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队，在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劳动。这使他们依旧保留他们的理想以及他们的毛泽东式道德。第二年，他们就分散到各生产队，与农民肩并肩劳动。这时，他们的幻想就灰飞烟灭了，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农民思想上另一特征也引起了知青的反感，那就是他们的“消极意识”。我们所有的被访者都指责农民无条件服从干部。当上级领导作出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决定时，他们的态度却是听之任之。一句话，他们缺乏造反精神。农民只会用消极与沉默来表示对抗。比如说，上面突然颁布政令，要求所有生猪都得按低于自由市场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就乖乖地把猪只送上，不过产量也就慢慢下降了。假使某个知青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80页。

② R. P.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118～125页、145～148。

出来抗议这种措施，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农民非但不会支持他，还会叫他闭嘴[①]。不管农民采取这种态度的客观理由是什么，总之，那些最积极的知青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们自忖：很明显，想帮助农民脱离贫困，可现在什么都做不成。

农场知青融入接待群体的问题与其他的相比，有些不同。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多样。知青在不同农场所占的比例相差非常大（在我们的样例里，介于10%与80%之间）。他们通常集中在某几个连队里，这样他们就成了主要劳动力，其余“战友”则是复员军人以及少数当地的农民。干部是军官或者是国家农场的老干部。在这种情形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仅仅是个口号而已了。融入或者说打成一片这个问题提得很特别，农场本身在周遭的环境中就是个外来的单位。知青主要是与两类人直接有关系，一般来说还是相当难处的关系，第一类是军中长官，他们因得到农场领导这么个太不起眼的职位而满腹牢骚；第二类是复员10或15年的军人，他们因未能调进城里而忿忿不平。头一类倾向于把知青看作是“娇生惯养”的，必须狠狠地整治一番，而另一类则认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必须让他们安分守己，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些城市青年并不觉得受到良好的接待，同时又担忧有一天自己也变成像这些复员军人那样粗俗不堪、尖酸刻薄[②]。在农村的知青想到有一天会变得像那些农民，也同样忧心忡忡。许多农场的前身是劳改场，或者靠近劳改场。知青也就跟那些服满刑期留在当地的劳改犯有所接触。他们发觉，这些被轻蔑的人（诨名“二劳改”）受尽了歧视与侮辱，但却像其他人一样，是值得同情的，有时甚至是值得尊敬的。跟这些人，尤其是跟一些过去的政治犯的接触，使那些年轻人对自身的是非观念重新作出设定[③]。

觉得自己无可作为的想法在下放农场的知青中相当普遍，特别是

---

① 见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80页。

② 多次访谈记录。孔捷生，《南方的岸》，前引，25页。

③ 张抗抗，《白罂粟》，《1980年短篇小说选》，496～513页；梁晓声，《北大荒纪实》，前引，84～109页。这两篇小说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史实，而且是作者亲身经历的（1984年7月4日及1986年9月21日分别采访过张抗抗和梁晓声）。

在那些亏空严重的地方。甚至在边境地区的解放军农场，知青们似乎也并不深信他们在那儿可以起战略意义的作用。大多数情形下，军事演习并不是要训练年轻人打仗，而主要是为了“锻炼”知青，及制造一种“军队”的气氛。我们采访过一位下放内蒙的知青，他说：“五年中我没有摸过一次枪，不过倒扔过一次手榴弹。10 个单位，只有一个是有武装的。那里全都是出身好的。当年如果苏联打过来，真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①。”然而，正像我们看到的，仅仅为了“锻炼”而浪费在农村的时日，知青是不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的。他们必须自觉到有用武之处才有斗志。

下放知青与接待群体的关系

建于现实利益上的关系

在上面描述的情况下，双方是无可奈何地被拉在一起的。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好，但也不会太坏，因为知青不想把跟农民，尤其跟干部的关系搞坏，这没什么好处。而干部们也清楚知青自己既不能决定来不来，也不能想走就走。想方设法逼他们离开是无济于事的，反而搞得很僵。所以总的来说，双方的关系是不冷不热，大家都很现实地理解这种状况，是外界强加的结果。

根据政府的指示，农民应该“把知青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尽力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上的再教育，同时还得教会他们干农活儿，必要的话也得让他们学做家务，像做饭、缝补之类的。农民也必须关心这些青年的日常生活：替他们盖房子、供给他们蔬菜（在他们还没种出之前）、病了就带他们去医院，等等②。实际上，农民没有扮演好这个代父母的角色，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很积极主动去做，也是因为在繁重的田间集体劳动之外根本没有时间来照顾知青。教青年人干农活儿，那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总得学会自己搞生产。一般来说农民不怎么愿意给他们盖房子。至于其他的，那就是知青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

① 与 L. Z. 的访谈，1979 年 9 月 21 日。

② 《红旗》1969 年第 1 期，24～25 页。

除非他们是住在农民家。因此，这些城市青年在适应新环境方面不得不遇到重重困难，可又得不到通常由父母提供的协助和建议，结果给他们之中许多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些，制造出各种问题。把知青扔在一边，让他们自生自灭，有时到了极端的地步。有30名知青下放到云南佤族居住的落后地区，靠自己赚取的工分根本不够过日子。最后他们离开各自的生产队，搞起一个原始公社似的组织，以打猎捕鱼为生①。

说到那些进行再教育所必须的政治会议及思想交流会，一般的农民都不感兴趣，大部分知青也一样，反正他们本来就认为农民无权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在这方面的政治活动，其实只是跟很少数的积极分子以及村级以上的干部们有关系的专门活动。普通农民评价城市青年时，首先根据他的劳动态度。即使出身不好的知青，虽然平时受惯公开的歧视，但只要他们在地里艰苦劳动，也可以得到农民的尊敬（不会是干部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②，然而，知青在农闲季节回家几个月，村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他们相反倒很满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知青不会来跟他们抢工分。

农民和知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政府的大原则来决定的，而是受牵扯到利益的具体问题左右的。两者之间总是保持一段礼仪性的距离，互相瞧不起，可又不表露出来。当出现一些对双方互利的情况时，这种关系就会热火起来，但一些特别的利益冲突又会即刻把它冷却下来。

在可能的范围内，所有的知青都会尽力跟农民维持一种恰当的关系，因为他们能否回城或者在当地能否调去一个非农岗位，农民的意见是有一定分量的。因此，在这种互利的思想支配下，知青是准备为他们做些事情的。比如说，替他们从城里带回一些农村供应数量有限的物品（衣服、布料、便鞋、香烟、食盐、电池、灯泡等），有时帮助他们的孩子念书做功课。作为交换，农民就送给他们蔬菜和肉，或

---

① 白桦，《“听槽居”盛衰记》，《七十年代》1981年6月号，87页。

② 冯骥才，《当代于连》，前引，7页。

者帮着干些活儿，像担水之类。这些交换活动使双方能维持一种睦邻关系。干部是掌握大权的，年轻人的命运以及日常生活几乎都由他们说了算，双方的交换就明显地不平等。知青给他们带回来东西，经常是礼物，有的是他们点名要的，可事后又“忘记”还钱。他们很懂得利用知青的学识才能来为己所用，譬如要他们帮自己起草讲话稿或者公文，有时甚至是自我检查稿①，不过这些都不会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干部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和这些城市青年的距离，只在很例外的情况下才会把责任重大的职位托付给他们。然而，这些干部不会忘记把好处留给那些送礼给他们的，以及对他们有用的，像有人脉关系能搞到某些设备或其他支援的高干子弟。在推广株洲模式之后，受宠的便是跟社队挂钩的城市单位干部子女。我们的一位被访者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他整天躺在床上都没问题，还可以念书复习准备考大学而不出工。村里的干部都不吭声。当他们为能得到某种设备或支援去见该生的父亲的时候，就竭尽谄媚奉承之能事，夸奖其子如何刻苦勤劳，其实那位父亲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②。虽然这些农民的态度不“道德”，但很可以理解：他们反正不需要帮手，那位懒汉不出工给他们造成了损失，但他们可以从他父亲那里获得充分的补偿。

即使双方都有意保持应有的关系，而且尽可能是互利的，但不可避免会不时爆发严重程度不等的冲突，那是由于他们依旧处在下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互相看不顺眼的状态下。我们谈过，农民将知青看作是负担，为了减少损失，他们试图侵吞知青的安置费，还克扣他们的工分。那些城市青年当然对这种歧视大为不满。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各种尖酸刻薄的话语都用上了，谁也不愿让步，结果演变成对骂。不过，知青在公开的抗议中不能去得太远，以防来自干部的报复。所以，小偷小摸就成了他们表示抗议的主要形式。从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又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这不但成了他们补足伙食欠缺的手段，也是对农民以及对他们自己那倒霉命运的报复。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22 页。

② 与 M. X. Y. 的访谈记录，1979 年 9 月 17 日。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偶尔的偷盗愈见频繁[1]。那些偷农民东西的知青一般没存什么坏心眼儿，只不过是当作开玩笑，甚至是像完成一件壮举似的集体行动。大多数情形下，偷是为了改善伙食[2]。受害者通常是他们特别要报复的某个农民或干部，事后所有集体户的知青都可分得一杯羹，哪怕他没有参加“行动”。有的时候不是偷，而是抢回自己的东西，因为农民也偷知青的，可能并不常见，但时有发生。根据我们手头上的材料，有些村子在上级施加压力以后，那里的知青获得相当于或几乎相当于农民的工分，而农民频频偷窃知青的事情大多数发生在这些地方。主导这类行为的思想与动机是“要补偿损失”，这也是良心上的自我辩解。农民经常趁知青回家探亲，就去他们的粮食、衣服、鸡蛋、锅碗瓢盆及其他工具。一位女知青跟我们说，有一年回家过年，待到回村后，发现集体户的门不翼而飞：“我们上大队去告状。他们居然说我们不该回广州。这一来，双方就骂开了，不过没有搞得很僵。我们没有因此回过头去偷农民，因为我们之间有些矛盾。其实，我们之中不少来自邻镇或者在村子里有亲戚”[3]。

即使知青间意见一致，知道是谁偷的，他们也只能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去偷回那个偷他们东西的人，须知知青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如果知青在偷窃现场被抓住，农民就会聚在一起对他施以饱拳。这时知青通常求助于自己的生产队或大队、甚至当地其他大队的同伴。他们经常只求停止殴打，所以扬言要进行报复，特别是要烧房子，以此威胁农民。不过，有时就开始打群架，之后又变成了双方摆出阵势的大打出手，最后有人严重受了伤，或者死了人[4]。在农场，由于干部、复员军人、当地人和知青各自分别结成群组，常常又以不同籍贯分开，所以事情就比较复杂了。

---

① 下面我们会谈到定期小偷的问题；见本书，327～328页。

② 当时在知青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偷吃的不是偷。”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文集》第1册，164页。

③ 采访Y. S. 记录，1978年7月21日。

④ 见梁恒（Liang Heng）和J. Shapiro，前引，199～200页，以及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35～136页。

农场内部的偷窃行为似乎并不构成问题。但是，农场职员、知青或其他人、以及附近的公社社员之间的公开冲突就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及湖南的老知青跟我们说，包围农场的少数民族认为整个地区的土地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因而他们有充分理由拿取地上面的任何东西。这种偷盗行为自然引起冲突，而上级领导则尽量在不直接得罪少数民族的前提下进行调解，结果有时就令汉族人感到不公平①。

有限的相互影响

纵使每一群组都坚持己见，拒绝让对方改变自己，但长年居住在同一村子里，并肩工作在同一块土地上，这种情形必然会在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亲自收集的资料证实派瑞丝（Parish）和怀特（Whyte）的结论：知青在农村的现代化及政治化中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②。不过，他们在好几个方面影响了农民，不是很深刻，那倒是真的。

首先，他们担当及扮演了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让村民见识一个从未知晓的或知之甚少的世界：城市。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无知与好奇在知青的眼中倒成了他们的可爱之处，同时还肯定了被再教育压低了的城市人的优越感。农民的这种可爱的天真在下面节录的一位知青与一位农村姑娘之间的对话中表现得一览无遗：

>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唉，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③

有的时候，知青还会带同跟他们很合得来的农村小伙子到城里去

---

① 多次采访，及 M. Frolic，*Mao's People*，207 页。

② W. Parish & M. Whyte，前引，43、329－330 页。

③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前引，43 页。

看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农民很少离开他们的村子，通常最远只会去到邻近的乡镇。

知青也向农民传达在报纸上读到的政治新闻。乡下人在这方面的愚昧无知令这些青年人深信自己确有某种优势，以致有时达到愚弄嘲笑他们的地步。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曾下放在云南乡下，他说知青为了好玩儿，跟农民说林彪的罪行还包括他有“一群（叶群的近音）”女人以及出逃之前偷了“三只鸡（三叉戟的近音）”①。

知青是以他们自己的例子向村民展示某些城市人的生活习惯，有时还教他们怎么做。受影响的主要是年轻农民。在卫生上，刷牙令农民啧啧称奇。这个城市人的习惯倒也被一些青年小伙子接受仿效，引致其他人哄堂大笑。然而，最常见的是农民并不相信有什么用处②。很例外，知青对家庭卫生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某个村里，有一队模范知青，一些农民就跟他们学会先净化了河水再烧开，也学会遵守厕所茅房的基本卫生规则③。知青还教会他们抽盒装的香烟，以替代自卷烟。又让他们喝汽水，体会那种刺激性的乐趣。女作家王安忆就曾描述过一位农村青年怎么喝了知青送的汽水差点儿呛着，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打嗝儿把气吐出来④。有些村民，特别是女的，也受了知青穿衣服的影响。比如在广东，他们就不再穿农民老穿的黑衣裳，而穿上颜色鲜艳的，虽然容易脏，但比较好看，也没那么热。有的年轻农民都不穿棉袄了，穿上容易打理的毛衣。而姑娘们，有的把辫子剪了，留起短发，方便干活儿。

青年农民接受城市人的习惯，觉得很实用，那只能是次要原因。主要应该在于他们要“赶时髦”的愿望，想模仿知青的“现代”派头。那些城市青年虽然社会地位不怎么高，可作为城市人，在农村青年中还是有一定魅力的。有时连他们说话的语气、使用的语汇都被争

---

① 与 M. Z. W. 的访谈记录，1984 年 12 月 29 日。

② 他们可不是唯一这么想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说毛泽东也一样：见 Li Zhisui（李志绥），La vie privée du Président Mao，130 ~ 134 页。

③ 访问 T. R. C.，1978 年 7 月 20 日。

④ 王安忆，《麻刀厂春秋》，《小鲍庄》，10 页。

相仿效。在某些情形下，城市青年对农村青年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在上述的模范知青的村子里，根据风俗习惯，要求新娘第一次进入夫家的时候必须向丈夫叩头[1]，这几个城市青年曾经成功地说服了好几个当地姑娘拒绝继续这种陋习。不过，城市青年能够影响到农民家庭习俗的例子很少。相反，知青的某些另类的非法的行为对青年农民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广东省就是一例，像收听外国电台、偷渡去香港，我们在第七章会谈到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采访过的农民所愿意承认的唯一来自知青的影响。

"我看不出我们向那些懒鬼可以学习什么。他们的确成功地带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去听敌台里的黄色歌曲，还一块儿唱[2]。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们教青年民兵游泳，并说服他们一起偷渡去香港。"[3]

要说知青们的正式文化活动对农村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他们的非正式活动在某些地方似乎就不同了。比如说唱爱情歌曲、听故事。那时知青们在农村，长夜难熬，经常聚在一起讲故事，农民都爱听，只要有时间就去听。那些外国小说或中国古典小说被简化了再讲述出来，有时为安全起见还走了样，不过没关系，有些农民听得如痴如醉，没有知青，他们永远也不会享受到这些精神食粮[4]。

我们刚才谈到知青给农村带去某些城市文明元素，但这远远不能构成改变农民风俗习惯的重要推动力。相反，城市青年也没有被农民深刻地"再教育"过来。不过农村环境给了他们一定的影响。最突出的是知青对信仰产生了兴趣，而且亲身参与一些迷信活动。虽然他们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可他们之中许多人却开始相信命运及冥冥中之诸神，求助于各种宗教活动，希图参透他们那些神的意向，并求得他们的支持[5]。诚然，我们下面会谈到，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

---

① 访问 T. R. C.，1978 年 7 月 20 日。

② 其实就是香港、澳门电台播送的香港、台湾通俗爱情歌曲。

③ 采访 N. M. W. 的记录，1978 年 7 月 16 日。

④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 年第 6 期，20 页。与阿城的访谈记录，1986 年 7 月 3 日。

⑤ 见本书，347～349 页。

知青本身，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加上他们到了一个宗教迷信活动还很活跃的地方，很自然就被熏染了。住在农村的那段相当长的日子使知青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某些行为作风，而接受了其他一些。因此，久而久之很多知青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得较前克制，穿衣服也朴素无华了，然而同时也失去了一部分好习惯，比如守规矩、讲礼貌。这些变化其实都很肤浅，尽管当他们回城探亲时，确实感到为了必须适应农村日常生活的环境而作出的小小转变，一旦返城定居之后一切都自自然然地消失了。

有限的融合

发现只有极少数的知青真正融入农民群体，这绝不足以为怪。好多位受访者都跟我们承认，与年轻的农民曾经有过朋友关系，但永远不会像对自己的知青同伴那样亲密、那样信心十足。不少城市青年对朝夕相处的农民万分同情，有些对环绕着他们的农村社会生出极大的好奇心以及极度的依恋。然而这种好奇心以及这种同情心都是属于人种学研究范畴的。那是来自外来的观察家，他们并无意要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作家学者张承志兼二者于一身，我们认为就很有代表性。他的短篇小说可能都是抒发对下乡时期的无限怀念以及对接待过他的农民的深深留恋（他曾在蒙古牧民中生活过4年）。

他自己是回族人，一直对蒙古语言及文化极其感兴趣。但是，像其他知青一样，他也希望能够回到出生的城市北京，1972年得到一个罕有的机会可以进北京大学考古系，他当然没有拒绝。1975年毕业后，他没有回内蒙，而进了首都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进了民族学院研究生班，后来就成了专门研究元朝时期中亚历史的学者。他大约一年一次出差到中国西北去，像他最怀旧的短篇小说《绿夜》[1]的主人公一样，回去探望下乡时期认识的牧民[2]。不过，无论对蒙古人及对其他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有如何深厚的感情，他，张承志是一个北京人。他是在那儿工作，在那儿成家立业。同样的，不少其他知青作

---

① 张承志，《绿夜》，《十月》1982年第2期，130～137页。

② 与张承志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1日。

家大量地描述他们在下乡期间认识的农村世界，他们能成功，正是因为周遭环境完全把他们吸引住了，可是他们仍旧处在这个世界之外，也许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农村社会感兴趣并不意味着有可能甚至有意愿融合其中。正像我们以后会谈到的，接受一个小小的干部职位并不等于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愿。与此相反，跟一个当地人结婚就证明了他（她）准备在农村待一辈子，他（她）愿意完完全全和农民打成一片，融入这个群体。实际上，一旦结了婚，这些男女城市青年都再也无法将他们的户口重新迁回城市。如果是一个男知青，他就得离开集体户，搬到女家去住。所以从 1974 年开始，当局通过宣传机器，拼命鼓吹这类婚姻。有一位北京女青年，白琪仙，高中毕业生，不顾家人劝告，拒绝和一城里人结婚，而下嫁给一农村青年，因此在全国报刊上受到了表扬①。

这种“混合式”的婚配毕竟不很多。在农村，这种婚配似乎比知青之间或者是知青和城镇居民结婚的个案多一些②。不过，对这个年龄的群体来讲，知青的总结婚率是很低的。至于原因，那就是他们拒绝永远待在农村③。由爱情发展出来的“混合式”婚配也有，但是很例外的④。他们必须跨过城乡之间的鸿沟，这并不容易，正像叶辛所写的：

> 一般地来说，远方大城市来的知青，和当地山寨青年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大的。他们可能交朋友、可能相处得很好，要相爱却不甚容易。这里除了需要感情的基础，双方思想上还要跃过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理由是极简单的，却也是唱

---

① 见本书，119 页。

② 没有全国的数字，但似乎就是我们手头掌握的地方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情况；见刘小萌，前引，511～512 页。

③ 见本书，310 页。

④ 《回首黄土地》中就描述了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北京知青和一个延安的农村姑娘谈恋爱，结果男知青给调走了，而姑娘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农民。戴思杰也讲述了一段美丽的知青与农村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也是以分手告终。见 Dai Sijie（戴思杰），*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

高调的人们最易忽视的。我们国家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悬殊的。即使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经济状况的家庭，和贵州山区偏僻村寨上最好的家庭比，也要好出几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

事实上，大部分的“混合式”婚配都是理性的婚姻或者是被迫的婚姻，而且主要涉及女知青[2]。经常是年轻的女学生，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孤独一人，没和其他知青在一起，又没有了家庭的支撑。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她们表示关怀，加上小伙子的家人在一旁怂恿，以一种既稳定可受保护的家庭生活对她们进行诱惑，她们自然深受感动。但在某些情况下，女知青是主动的。一位北京女同学跟我们说，当时她是自己去勾引一个蒙族年轻农民，后来就和他结了婚。她挑选了村里身体最强壮的，每天可以挣 10 个工分，他而且还是出自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因为政治原因被放逐，远居他乡，只剩她孤身一人。当第一年粮食分配额都完结之时，她就意识到那是她唯一的生存途径。摆喜酒的前一晚，她哭了一整夜[3]。

农民一般都很希望娶城市姑娘为妻，因为普遍认为她们比较漂亮，而且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们不要求聘礼聘金，可农村家庭娶媳妇儿都得给女家下一笔可观的聘金[4]。此外，有头亲家在城里总是有用的。有的地方，忽然来了这些天真无邪又毫无抗拒力的大姑娘，人们觉得简直是上天的恩赐。事实上，中国许多贫穷的村子常被人称作“光棍儿村”，青壮男子汉很难找到老婆，因为当地的闺女都想法儿嫁到条件较好的地区，而外村儿的又没有一个愿意嫁到这儿来。这些男光棍儿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个被拐骗的女孩儿。在这种村子里，女知青就受到极大的压力，包括逼婚的暴力行为。一

---

①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80 页。

② 1998 年有过一篇文章介绍 7 位嫁给农民的老女知青，其中似乎没有一桩是爱情婚姻；见田小野，《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国妇女报·家庭周末》1998 年 5 月 22 日，1、3 页。

③ 与张玲的访谈记录，2000 年 8 月 6 日。

④ 聘金的多少决定于地方的贫富以及姑娘的条件，达到 1 000 元是很平常的事。

且成亲，婆婆就千方百计替儿子保住这天上掉下来的宝贝，新媳妇儿从此也就被迫与外界隔离，并处在严密的监视下[1]。这些女知青有的变疯了，有的自杀了，那可不是个别的情况[2]。这类有相当强迫性质的婚事并不只发生在很穷困的村子里。到处都有女知青因为被农民（尤其是干部）强奸了，而不得已结婚的。为了自己的名声，她们不愿张扬告状，而接受了那么一头婚姻，心里想着：反正自己不再是黄花闺女，那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即使条件并不那么糟糕，女知青的父母极少会满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个农民，通常会极力反对。但也有例外[3]。

其他知青试图劝解这些女知青，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可是她们自己却疏远了其他知青。上面谈到的那位嫁给蒙古人的北京女知青就是一例，她的同学尽了全力“挽救”她，也没用，大家都觉得她发了疯[4]。结婚以后，这些女知青就完全被婆家、田间劳作和家务劳动吞噬了，不过她们在村子里有了一个稳定的地位，而且是受保护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中不少人就发现夫妻之间很难相处，那是由于双方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思想精神上的差距。很多后悔结了婚，尤其是当她们看到老同学一批批地回城了，她们的悔意就更重了。对所有跟农村青年结婚的男女知青，下乡运动的结束就成了一项严峻的考验。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似乎已经融入了农村社会，他们结了几年婚，有的已经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的父母，但依然无法抗拒城市的诱惑力。结果，有的离了婚，有的干脆回了城。只需懂得撒谎以及让有关人等

---

① 一个婆婆居然想到把媳妇的结婚证烧毁，企图以此来保证媳妇今后无法离婚；这就是王真那一案例，见田小野，前引。

② 上面提到的田小野在文章中介绍了多个案例，有一个叫孙宝华的孤儿，被送到内蒙的一个“光棍儿村”，共有9个（有两个是姐妹）北京女知青在那里插队，一年以后8个都结了婚。孙被婆婆及丈夫禁锢，无法忍受，变疯了，到1998年她还住在那个村子里。

③ 一名大学毕业的女知青，出身不好，1968年时已经22岁。她插队到蒙古的一个村子后不久，就跟一个贫农结了婚，她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借此婚姻可以洗刷政治污点；与R. C. G. 的访谈记录，1986年1月23日。

④ 另一个被送到相当远的村落插队的北京女知青，也听说在那儿有一个女知青“精神错乱”，非要嫁给一个蒙古人；与田小野的访谈记录，2001年8月22日。

得到好处，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后来，有些还成功地把自己的户口迁回了城里，甚至替孩子报上了户口。有一位北京女知青带着一个小孩从东北回了城。她自称为单身，重新得到城市户口。可是当她要把女儿的户口迁来北京时，就被拒绝了，因为这跟她的单身身份有矛盾。后来，她的家人很会做，送出了必不可少的礼物，矛盾就解决了①。……其他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离开对方的知青，心里总是存有一肚子苦衷，以至于长久地腐蚀了他们的夫妻生活②。

1978～1979年间，在农村或农场还有一些知青，他们之中，有的结了婚，有的在当地已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他们都不想或者原则上不考虑回城，可当年掀起的那一场返城潮对他们全体都是一场考验。可见虽然他们已经融入了农村生活，但是这种融合是脆弱易碎的，一有风吹草动就面临瓦解。不管阻力有多强，牺牲有多大，大部分仍然竭尽全力争取回城。许多人在最后达到了目的，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论述过。当然有知青真的融入了农村环境，但为数极少。可惜，我们没有机会遇上。根据我们手头的资料，有些知青在接待地区获得了领导职位，留了下来，但如果说他们是心满意足，不如说他们是听任命运摆布③。

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

既被贬低了身份又被贬谪的群组

1949年革命成功并没有消灭城市高于农村的观念。经济社会化，

---

① 肖复兴，《啊，老三届》，《文汇月刊》1987年第8期，24页。

② 我们有两个朋友曾有机会在1986年8月走访过广东省的一个村子，那儿刚好有一个农民自杀了。他是跟一个女知青结婚的。后者婚后痛苦异常，觉得自己是上了当，受骗了，所以就让丈夫没法过日子。这个农民是在村口的一棵树上上吊死的，为的是让他妻子后悔一辈子。事后，这个女知青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广州市，但他们的户口仍然在乡下。在那个时期，守寡并不能改变户籍；与G. M. 及T. L 的访谈记录，1986年11月2日（可能后来她的寡妇身份可以让她迁回户籍）。

③ 见田小野（前引）文章中彭皓方一例。

粮食定量分配制度以及户口制度令城市人的身份在物质范畴内甚至比以前更具有吸引力，由于很难获得，因而更显珍贵。大部分知青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就觉得是降低了等级。政府当局很清楚这个问题，不过寄希望于再教育，可以使城市青年改变这种价值观念。

> 如果从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来看，如果我们心怀贫下中农同样的思想感情，那么就一定会明白，能够到农村去劳动，那是一种运气，是一种光荣。①

我们已经谈过，知青并没有从内心里改造成农民，不过由于跟他们进行了大量接触，从而发现原来他们也一样，认为城市比农村高出一等。乡下人被捆绑在土地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有什么“光荣”。幸亏来了知青，使他们得以对城市有些了解，此时他们的反应往往与那位去广州旅行回乡的乡下大姑娘相似：“广州，那真是好啊！我呀，我要是中学生或大学生，宁死也不会让人把我下放到农村！”②

知青对农业劳动的鄙视可以从他们的某些用语中表露出来，比如说，在地里干活儿就是“修理地球”，在水稻地里插秧，大家都排成一行行，双脚双手都在水里，那就是“赛狗”③。这么说话其实是一种自我嘲讽，流露出他们被贬的心情。当农民光荣之类的夸夸其谈并没能改变干部们的行为，他们仍然是不停地把派去干农活儿当作惩罚的手段，而派去干非农工作则是奖励手段。因此，“表现好”的知青可以得到非农工作，一旦他们犯了政治错误，那就被贬回大田劳动④。各式宣传从1955年起就开始了，尽管用上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社会舆论依旧认为农民是最低贱的职业。

---

①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②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56页。

③ 第一种说法很普遍，第二种只限于广东省的某些地区；见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29页。

④ 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小说家》1986年6月，5～13页；阿城，《孩子王》，前引，129～178页。

而城市青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1]比农民还要低。主要因为他们是被教育者。在某些情形下，还有些特殊措施限制下放插队知青不可回城探亲，甚至不可到其他大队去访友[2]，也许是为了减少知青之间的联系吧。这些年轻人觉得别人把他们当作流放的犯人来对待，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危险的阶级”，有什么坏事就怀疑他们，这种态度的确很难让人接受。就因为这样，每当发生盗窃事件，头一个被搜查的准是知青的住所。这些城市年轻人的低人一等的身份也可以从农民对他们使用的语言看出来。有一位作家就指出，在农村，所有的男女老幼都一样，对外来的知青一律以“小”字打头称呼，就算那位农民年龄比知青小也一样，但一般情况下，只有对比自己年纪小的才那么叫[3]。

有些知青的档案里纪录着家庭出身不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问题，那么他们的身份低贱就更明显了。他们绝对是歧视的对象，而且受到人为的排挤。他们一到村子，就有人预先告诉农民及其他的知青：这些是坏分子，不应该跟他们来往。分配给他们的住宿地通常地处偏僻，远离集体户。很自然的，时间长了，其他知青与普通农民对他们的排斥就会逐渐减弱，到最后甚至会全部消失。但是在分配任务、提干以及返城问题上，他们仍然遭到歧视[4]。这种来自官方的歧视制造了一批真正的贱民，他们甚至只能与他们的等级内的人结婚。确实如此，政治成份会影响到周围许多人，就算一个农村或城市青年同意跟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结婚，而不计较这会给自己的身份带来什么后果，但很难不去考虑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一旦成了亲，

---

① 社会地位一般是由社会舆论赋予的，而政治身份则由当局决定，政府对各个社会大众阶层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之间固然有联系，但并不相等。因此，一个贫下中农的政治身份要比他的社会地位明显地高得多。

②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75～76 页。

③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54 页。

④ 有些甚至被剥夺了回家探亲的权利，就像那位革命前回国定居在厦门的日本人的儿子，他无端地被怀疑是“间谍之子”，带着这么一顶帽子，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获得批准在春节回家；见《青年一代》1982 年第 3 期，10～11 页。

全家都会跟着倒霉[1]。

一般来说，插队知青已经很难忍受在农村的低人一等的身份，回城探亲时，城里人对他们表露出的藐视或者怜悯就令他们更加痛心。几年之后，那些还留在农村以及还没“上轨道”[2] 的总是让城里人生出一种蔑视的同情。1973 年政策改动之后，这种蔑视显得更加严酷，尤其因为那是来自同一代人，他们可是靠了兄姐的“牺牲”才得以留城的[3]。当年在城里出现了不少贬意十足的词语，用来称呼插队知青，最流行的是“插兄”和“老插”。有些城市里还有自己特有的称呼。在杭州，下放到黑龙江去的知青就叫做“黑鬼”，或“北老乡”，或“北佬儿”[4]。通常是把他们当作“土包子”，不仅因为他们是理论上的农民身份，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无论在举止行为还是衣服穿着上，都跟潮流中的城市青年差了十万八千里。有些插队知青不能忍受这种环境，宁愿缩短假期回乡下。作家叶辛曾经讲述，他回上海探亲，一天他想进市立图书馆，可是人家不许他进去，因为他没有工作证，他因此不快之至。报刊上总是把下乡形容为极大的“光荣”，可现实里，下了放插了队的知青连进图书馆的权利都没有[5]。在一个大部分财富资源是根据身份来进行分配、到处都需要出示各类证件、本儿和证明的社会里，回城探亲的知青的处境很不容易。对于那些贫寒家庭，就是难上加难了。他们住家里，吃家里，令人觉得他们回来是给家人增加了负担。

因此，过了几年，很多知青感觉任何地方都没有他们的位置，到处都把他们看作是外来人。一位少有的选择不回上海的女知青这样说：“在北大荒，人家叫我们‘小上海’，在上海，老同学又叫我们‘北大

---

① 这种情形造成的悲惨结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描述；见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54 页；卢新华，*The Wounded*（伤痕），The Wounded，9 ~ 14 页；Jin Yanhua & Wang Jingquan，Cries from Death Row，*Stubborn Weeds*，96 ~ 114 页；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农村短篇小说选》第一册，1 ~ 24 页。

② 叶辛，《写作三步……》，前引，242 页。

③ 张抗抗，《塔》，前引，10、33 页。

④ 同上。知青之间喜欢互相称呼“龙江哥儿”及“荒友”，其中没有任何贬意。与张抗抗的对谈记录，1984 年 7 月 11 日。

⑤ 叶辛，《写作三步……》，前引，242 页。

荒人'。"[1] 身份低下，加上觉得处处受排挤，许多插队知青感到被社会遗弃，成了一种"新型的流氓无产者"[2]。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插队知青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城里，有时甚至一整年，倒形成了一个名实相符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搞些不太合法的生意或者依靠父母朋友的接济勉强过日子，还得一天到晚为频繁的查户口担惊受怕：在大搜捕中落了网的，不由分说一律送回农村，或者像犯人那样被判劳动教养[3]。总之，社会舆论把插队知青群体看作是一个另类阶层，有潜在的危险性，但又值得同情。所以，有的时候在火车上，检票员碰上没买票的知青，会网开一面表示能够理解可以原谅。路上，货车司机也会免费让知青搭一程车。这些年轻人有时就采取一般"搭便车旅行者"的办法：女生站在路旁招手示意，男生就躲在道边的沟堑里。反正一定得有男生陪同，因为中国的长途汽车司机常有人所共知的一招儿：抛锚[4]。要是只有女生一人，那就麻烦了。不过，女知青遭强奸的危险主要来自干部，普通农民很少。其实，对下放插队知青来说，社会地位卑微引至最坏的后果是，面对干部滥用权力，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他们只能听任专制独断的干部以及风云莫测的政治形势来摆布。

一个无法自卫的群组

当知青敢于对这种或那种决定提出异议时，有些农村干部就直截了当地跟他们说："是毛主席把你们送来这儿接受我们的再教育。就算我们叫你们吃大粪，你们也得乖乖地给我吃。"[5]

对被管治者，特别是对那些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像黑五类分子及知青，基层干部实际上掌握着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各种印把子（经济、政治、行政、司法、治安）都攥在各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公

---

① 钱怡，《爱在北大荒》，150 页。
②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4 ~ 15 页、127 ~ 139。
③ 见本书，358 ~ 359 页。
④ 张贤亮，Xor Bulak，*Littérature Chinoise*，1985 年第 1 期，182 ~ 184 页。
⑤ 访问 R. C. T.，1978 年 8 月 4 日。

社）主要负责人手中。他们只需向顶头上司汇报。而由于他们大都是得上头照应才坐上官位的，因此除了特殊情况，他们也就很自然地处在庇护之下了。这些基层干部就像土皇帝、土霸王，而且经常是贪污腐化的。毛泽东所营造的“革命”气氛使这种趋势愈加严重，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场政治运动就是一次机会，可以让他们跟那些试图或者不要命也要挑战权力的人算账。有些地方甚至还宣扬“以专政办农业”的方法。相当多的插队知青都跟“专政队”① 以及其他的民兵打过交道，那些组织是负责逮捕、监禁、拷打所有土皇帝看不顺眼的人。只需一个简单的行政决议，有的青年就被送进“改造队”或其他专门的集中营去做苦役。若有知青胆敢对某个干部提出批评，或更利害些，索性揭发他们的贪污行为，那么镇压行动头一个就对准了他②。即使不走到公开镇压这一步，那些干部还有好多“秘密武器”给知青制造麻烦：分派给他们既令人厌恶又少得工分的活儿，随便找个借口就克扣分配的口粮，尤其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在当地得到提升，或者抽调返城，或者受推荐进大学。

面对这些专横刁难，插队知青往往是毫无自卫能力还击的。当女知青被干部强奸时，更得忍气吞声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种现象层出不穷。我们的受访者中，大部分都听说过在公社或农场里，要不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队或大队发生过同类事件。一位担任过某黑龙江农场干部的老知青曾接触到这方面的文件，他回忆道，该省 100 多个农场，每一个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③。至于投诉“受迫害”（其实大部分是强奸），在 1974 ~ 1978 年间，每年的案例是以千计的。过去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可以估计出最多的案例发生在运动初期，在未有成文的镇压措施之前。当然，数字只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大多数的强奸事件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受害者一般情愿保持沉默。一位女受访者是这样解释的：

---

① 甘肃电台广播，1978 年 8 月 4 日，刊于 *SWB*，1978 年 8 月 10 日。

② 见《人民日报》1979 年 5 月 12 日第 4 版。

③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0 页。

我们都很年轻，习惯在家庭中生活，受到父母的保护。我们对生活是愚昧幼稚的，对性事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是最容易上当的。[1]

那些干部很清楚这些女孩子害怕坏了名声、丢了脸面，如果想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她们总是犹豫再三的，所以更易成为欺侮的对象。人们通常还认为这些受害者也有部分责任，或者责任全在她们[2]。一位广东女知青奋力抵制对方的奸污企图，大声叫喊，四邻八舍都听见了，结果她的名声就一落千丈。幸亏负责干部没有对她进行追究，可是村儿里的其他男人就围着她转、讨好她，因为从那件事情之后，他们都觉得她是个轻佻淫荡的女人[3]。干部们也知道他们手中的权利能压倒一切，根本不怕被揭发强奸；他们说的话总是比女知青说的有分量。此外，他们有本事使用威胁手段逼迫受害者三缄其口，任其为所欲为："你要是喊，就一辈子别想回北京。"[4] 这句话在许许多多的小说以及证词中出现过，只是回去的城市名字不同罢了。因此，当事人直接去揭发很少见。有些已经揭发了强奸者的女知青，考虑再三之后，宁愿重新改过自己原来的证词，因为她们不想这一事件记录在档案里，然后跟着自己一辈子，特别是会影响到自己将来找丈夫[5]。

强奸事件如果被揭出来，那通常都是因为女方怀孕了，或者在经受此一打击之后变得反常了（情绪低落、噩梦不断、离村出走等），或者因为有人看见了。在我们的受访者的大队里，揭出了一桩强奸案，因为那个犯罪的干部当时根本没有理会受害者的六岁弟弟也在现场。那位女生只有16岁，家庭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打散了。她被当作知青（或者说是社会青年，因为1966年时她还在上小学）送到这个村子里来插队，她把没人能照顾的弟弟带在身边。由于

---

① 访问H. C.，1978年7月10日。关于当时城市里众多15～16岁的女青年对性事的一无所知，见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43～44页。

② 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9页。

③ M. Frolic, *Mao's People*, 52～53页。

④ 糜庶，《瑞丽江畔》，《观察家》，1979年第10期，84页。

⑤ 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0页。

她的态度好，就让她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值夜班。一个已婚的治保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半夜里偷偷潜进了仓库，把女孩儿给强奸了。第二天，小姑娘什么都不敢说。由于她不停地哭，她弟弟又亲眼目睹了一切，事情最终传到了公社领导的耳朵里，就决定开展一场调查。然而，这些头头们得出结论，认为是那位女同学的错，原因很简单：她的出身很坏，而强奸她的人是出身红当当的治保干部。不过，到了1970年底，就是事情发生后几个月，中央下了文件，要求处理惩治这类强奸犯。那个干部因此被抓起来，在生产大队关押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放了。事件就这样算定了案①。这位女知青的不幸遭遇是很典型的。另一位到内蒙去插队的北京女知青所获得的则是一把辛酸泪。开始时她和一家蒙古牧民关系良好，直至某一天他们的儿子得到全家人的协助，又在全家人的眼皮底下把她奸污了。在这一据说是当地的风俗习惯的痛苦经历之后，她非但不能投诉伸冤，还被迫作自我检查。由于她出身不好，父亲又还未得到平反，人们就指责她“蓄意引诱贫下中农牧民”②。必须指出，汉族农民家庭虽然不至于到出动全家人的地步，可也是使劲儿鼓动自己的儿子去强奸女知青，令其就范，目的无非就是捡个便宜媳妇儿。普通农民犯强奸的比较少见，因为他们不像干部，既没有强制的办法，也没有保护伞。然而，有另一些人，他们看到女知青处于弱势地位，就轻易地大捞一笔③：那就是有权开病假条的医院干部。想回城，这张条子是必不可缺的。

---

① 采访Y. S.，1978年7月26日。

② 张辛欣和桑叶，《文凭》，前引，417页。张辛欣从其他插队到蒙古的北京女知青那里听说了不少类似的事件，就把这种风俗习惯写进小说，结果受到了统战部门的批评。蒙古人对强奸的宽容在张承志的小说里也有描述，见张承志，《黑骏马》，《老桥》，52～129页。书中有个名叫希拉的人物，当地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强奸惯犯，但并不那么担心。但是，不应该过分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总的来说，知青与蒙古人的关系似乎比跟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关系要好。

③ 这里说的不是女知青。相当例外的，男知青也会遭到性侵犯。陆天明的小说中有一个成了某新疆农场畜牧主任的老犯人，作者讲述该犯人如何试图引诱男青年。这个粗野的人只知道暴力的支配关系。他开始给那个男知青讲在劳改场男人之间干些什么事。幸亏那位男知青会灵活地运用他的匕首，才能顶得住；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前引，74页。

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干部们想在插队女知青身上占到便宜，不必总是诉诸暴力。有时他们只需满口应允一些好处（在当地可以得到提干，尤其是可以返城等），碰上对方拒绝时，就加上点威胁的话语。那些城市女青年在农村待了好几年，对能否回城已经绝望了，可是当她们确有紧急的理由得回去时，比如说父亲或母亲病危，那就不得不听天由命去屈从干部的意愿，因为他们是唯一有能力改变她们命运的人。有时，城市方面会派“慰问团”下乡来给插队知青提供具体的帮助以及表示支持。然而，有时基层干部几句许诺倒成功地“慰问”了“慰问团”里的干部[1]。不过，这些主要是农场干部，他们手下控制着几百，甚至几千名知青，因而他们得以在一大批女知青身上占到便宜。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得手以后却自食其言，而上当受骗的女生又没有任何追究的办法迫使他们实践允诺。干部抢占这些女知青的初夜权令城市青年人极度不满，也引起她们父母的极度焦虑[2]。因此，当局决心要打击这种现象。我们已经谈过，在 1970 年和 1973 年，发布了中央指示，要求将奸污女知青的强奸犯绳之以法。问题波及面那么广，以至在司法判刑上出现了两组新词来定罪：“破坏上山下乡罪”以及“奸污女知识青年罪”，这两条罪状是同一性质的，另外还有其他的[3]。可惜，就像当时的许多其他政策措施一样，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只见几滴雨，那仅仅是一场虚张声势、虎头蛇尾的运动。其中倒也抓了几个当靶子，杀鸡儆猴，但没有触动到坏事的根源[4]。

---

① 与插队延安的北京女知青 C. L. S. 的访谈记录，2000 年 8 月 3 日。

②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29 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刑法个论》，118 页。在下列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判刑的案例，见 *Issue and Studies*，1975 年 3 月，111 ~ 115 页；《匪情月报》，1976 年 1 月，23 页；《观察家》1978 年 11 月，27 页；《明报月刊》1979 年 7 月，50 ~ 51 页。

④ 为避免干部滥用权力所采取的方法毫无成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见 B. Schwartz，A Personal View of Some Thoughts of Mao Tse-tung，Ch，Johnson，*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361 ~ 372 页。

这样，一些定为强奸犯的干部被判重刑坐牢，他们之中很少人被枪毙[1]，但根本问题，即是说干部对知青拥有绝对权利以及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从来没有触及到。因此，强奸与以性要挟的事件依然继续发生。1979 年 7 月，一些坚持要推行上山下乡政策的领导人还在要求努力“保证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人身安全”[2]。1974 年的政策改动也许使这类事件减少了一些，但并不是从根本上的。在成立了“知青点”和“知青农场”之后，初夜权的问题仍然存在。到了 1979 年底，又有一些女知青被奸污或者被调戏，她们的父母在报纸上公开要求惩处某知青农场的领导[3]。

知青必须给基层干部送礼，这也使他们想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作家梁晓声当年得知自己的名字进入了推荐上大学的名单，然而他却陷入了意味深长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多亏了他出身好，表现态度又好，所以才有这个好运，可是他很清楚，光有这些远远不能保证自己的名字不被刷下来。他只好提笔给在四川当合同工的父亲写了封信，让他寄 200 块钱来。可怜的老爸筹得了这份钱，也寄来了。梁把钱分成两份，各 100 块，分别装在两个口袋里，一个准备给团长，另一个准备给政治指导员，然后他就去见他们了。但是，他心里觉得这事儿太恶心了，想到他父亲辛勤劳动一辈子，从来没有央求过任何人，想来想去他最后也没勇气拿出那准备好的贿赂金。他从那座房子出来，就跑到一个角落大哭起来，因为他想到一定会错过上大学的机会，对他来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已经 25 岁，是报大学的最大年龄了。他还是走运的，他的名字一直在名单上，没有被刷下去[4]。

当然，知青并不是农村干部贪污腐败的唯一受害者，不过他们吃

---

① 见本书，106 页。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5 ~ 13 页。必须指出在后一个案例里，那个被枪毙的干部之所以被惩处，是因为在那十几个受害人中有一个女知青的父亲是当时失势的地位很高的高干，一旦平反了，就会从上面派人下来地方调查。

② 黑龙江电台广播，1979 年 7 月 10 日，刊于 *FBIS*，1979 年 7 月 13 日。

③ 《中国青年报》1979 年 11 月 15 日第 3 版。

④ 与梁晓声的访谈记录，1986 年 9 月 21 日；见梁晓声，《父亲》，《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81 ~ 183 页。

的亏肯定比普通农民大得多，只需考虑到下列几点就可以明白：干部能对他们的前途施以决定性的影响，知青家庭给予的物质上的援助带来各种可能，但是，农民大多都有家族或远近亲戚的支持，而干部是要和这些人搞好关系的，所以总有些避忌，可知青并不是在这种处境中①。政府在1978年倒也承认有些干部“大发知青财”②。我们都知道，知青办公室负责人这一职位，在追逐贿赂红包的人眼中，是一大肥缺。它可以让贵州省一个落后县城的领导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穿上上海裁缝度身定做的衣服③。

不管是强奸，是动粗，是刁难，是不公道的惩罚还是勒索“礼品”，反正下放插队知青没受到过中央的保护。对违法干部的镇压措施成效甚低。而劝阻措施也不见得更高明。“慰问团”的工作之一就是看看知青生活得怎么样，如有必要就收集一些冤情，但很少人吐出真心话。知青们心里很明白，慰问团来了又走了，可是那些基层干部还在，原封不动，一纸投诉可能带来的麻烦要比好处多得多④。有陪同干部在，也许有点儿用，但并不是可靠的保证。他们之中有些是真心要捍卫知青的利益（但没有什么办法可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⑤，也有一些和地方当局同坐一条板凳帮助看好“羊群”。

《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封信函，投书者认为，当发生以违背中央精神的“地方政策”来迫害知青时，那两类干部其实是一丘之貉⑥。

因此，插队知青普遍感觉是属于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阶层，不能自

---

① 在一篇分析相当深刻的文章里，Jean C. Oi 却忽略了知青和农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中这一很重要的一面，她反而肯定地认为知青不像农民那样非得要靠着生产队长，因为一开始他们就享有国家的特别津贴，也因为他们不在乎自留地；见 Jean C. Oi,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XXXVII (2), 253 ~ 254 页。

② 见本书，138 页。

③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6 期，172 页。

④ 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前引，68 页。

⑤ 见本书，238 ~ 239 页。

⑥ 《人民日报》1978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是有关一些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还断然拒绝那些知青报名参加高考，而中央一再强调所有知青都享有这个权利。

卫，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中央政策以及地方干部土皇帝摆布。一年又一年过去，对前途的忧虑就更令他们心情沉重，上述的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一群广东知青插队到了靠近香港边界的地区。当上级要强迫他们全体“自愿”到海南岛去的时候，他们一致抗议：想从那个地方逃亡到英国殖民地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们觉得像“一群鸭子”，随人家赶来赶去①。同样的，可以在知青文学中找到许多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身陷干部手中不得脱身的愤愤不平②。想到这些干部都是些既没有文化，又自私自利，还粗鲁无礼的家伙时，知青更觉得是处在一种令人处处感到耻辱的环境中。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象征式的，知青与干部（或者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正像古华在他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里所描写的城市青年的感受。作者曾作过如下的简述：“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被暴君压制。”③ 这种状况其实在下乡运动的计划中已经有所体现了。在这篇基于真实的小说里④，那个凶神恶煞的守林人用自己的话解读了毛泽东的精神：“我是个老粗，他可是个老细！如今这世道就兴老粗管老细，就兴老粗当家！”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专门对知青说的话：“莫要忘记领导放你进绿毛坑，是来接受教育、改造的。”⑤

团结互助与相互竞争

面对身份低下带来的各种不愉快，知青之间的相互依赖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主要的支持力量与最好的保护屏障。这些年轻人远离各自的家庭，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他们感情上真正需要的就是友情。有关知青生活的故事道出众多充满这类友情的例子，有的类似喜剧讽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77 页。

②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6 期，237 页；徐明旭，《调动》，前引，206 页。

③ 古华，La littérature et moi，*Littérature Chinoise*，1983 年第 1 期，171 页。

④ 同上，169 ~ 170 页。

⑤ 古华，*Une maisonnette couverte de lierre*《爬满青藤的木屋》，*Dix auteurs modernes*，160 页。毛泽东语录，见本书，24 页，注①。

刺剧①，有的是感人肺腑的场面，尤其是当有人身染重病或与世长辞之时。一位老知青曾经这样叙述亲身经历：那是春节期间，我独自留在一个北大荒农场的村子里，当时还有一位女知青，但她突然病倒了，还很严重。我先把她送到几十里路远的一个医院，后来因为停电，又送去县医院，那里的人给她做了检查。由于她的造血系统出了问题，我就输了大量的血给她，可是她只熬了9天，最后还是死了。9天里，我没有离开过她。临终时，她一边哭一边望着我，不愿松开我的手。医生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也哭了，那不过是因为眼看一位同学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离开人世，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母②。

插队知青之间的友谊往来远远超出集体户和宿舍的范围。年轻人经常从这村到那村互相探望，到了一些特定的日子就互相请客："我们杀了狗，就把附近的知青都请来。要是我们剩有骨头内脏之类的，就给他们拿回去喂牲口。"③ 他们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因而互不相识的知青走到一块儿也总会有话说，需要的时候就互相伸出手拉一把。这种深厚友情与患难之交很快就消除了阶级偏见，突破了省份界限。当然，如果是来自同一城市，或者同一学校，这种交情更容易建立起来。在农场里，像其他职工那样，他们习惯结成地方"帮"，像上海帮、北京帮、四川帮、浙江帮，等等。可是，一旦他们意识到面对干部必须团结一致，那种结帮念头就消弱了。我们看到这种团结的力量在与农民发生冲突争端，甚至打架的时候，是起着重要作用的④。

这种力量在和干部的关系中，或者在和一般的上级关系中，也有同样的表现。如果某位知青让干部欺负了，他就完全可以求助于其他的同伴。这里举个例子：一位老知青为照顾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城里待了一个月，回村以后，生产队长毫无理由地克扣了他的口粮，据说是

---

① 见王安忆，《麻刀厂春秋》，前引，28页；阿城，《棋王》，《棋王》，51、64～65页。

②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1～12页。

③ 访问C. Z. L.，1978年7月4日。

④ 见本书，274～275页。

为了惩罚他。结果在其后整整一年里，他的同学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了他。这位老知青说："我们是被流放到了世界尽头，都是同一社会阶层的，有着同一命运，这种阶级感情是唯一的精神慰籍。"① 这种团结互助精神是以抵抗当局为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在广东知青逃跑到香港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应该藏匿起来或快饿昏了的逃亡者，他一般总可以得到素不相识的知青伸出的援手，很简单，就因为这是处于困难中的知青②。在知青为数众多又相处融洽的地方，干部想欺负女同学，也不得不迟疑再三。有的女知青面对干部或农民的逼婚，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对她们来说，其他知青给予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是特别有用的。叶辛在他的一本小说中就描写一个女知青的遭遇。她是个积极分子，别的知青都有意避开她。在十分孤独的情况下，她中了计，接受了一门不是真心情愿的婚事③。相反，在另一个村子里，知青之间的团结互助力量帮助一位女知青摆脱了一桩强加于她的婚姻：

> 我们公社妇女队队长的哥哥是个光棍儿。为了少花钱，家里想让他讨一个女知青作老婆。他们邀请了一位18岁的女生到他们家去住，跟着就不断地向她施加压力，要她答应这头婚事，最后她不得不点头。可是，一办完登记手续，女孩儿就悔恨交加了：她发现这个农民丈夫又蠢又粗鲁，还有点儿聋。我们大家决定帮她，就去找大队的负责干部，要求批准他们解除婚约。那些干部一口拒绝，说什么婚约刚刚签下没两天，不行！我们就写信去县级人民法院，详细列出所有的细节，以证明女知青受了骗上了当。法院后来派了人来村儿里调查。我们同时还跟那位女同学的父母联系，让他们请他们的工作单位出面。事情前后拖了3年，不过，最终公社不得已只好同意他们离婚。这次，我们赢了，是靠全公社插

---

① 平明，《碟仙》，《北斗》第3期，出版日期不详，50页。这篇短篇小说是完全基于真实的。

② 关于外逃，见本书，360～370页。

③ 郑璇是叶辛小说里的人物，见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2期，1～148页。

队知青团结互助发挥出的威力，尤其是女知青们，她们尽了全力。[1]

当知青中某一位受到干部的欺压时，他们群体的团结之力就会以“阶级报复”的形式出现，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事前也无法预料。这类报复行动引起的恐惧对某些干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2]。在 1978 ~ 1979 年返城潮期间，有人趁乱算老账。一些过去对待知青特别凶狠的农场干部就成了集体复仇的对象。有的甚至被活埋了[3]。

知青间的团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集体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冲突还不致于对其有严重影响，因为那都是群体内部的事。然而，某些知青的积极性倒会危害他们面对干部时的一致性，那些积极分子几乎总是被引导去公开批评，或甚至揭发自己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前，这类积极性似乎就是妨碍知青团结的重要阻力[4]。但“文化大革命”后头几年，积极分子的比例大幅下降了，原因是知青的数量太大了，加上他们能希望得到的光荣职位减少了。另外，对公认价值的信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眼中的积极分子不过是些野心家和伪善者。他们一旦被认定是告密者，就会被驱逐出群体，其他的知青通常会团结起来对付这类“叛徒”。知青之间继续保持团结一致，不过那些积极分子排除在外。至于那些没有打过小报告的积极分子，相互关系好一些。只要他们不做危害他人的事情，一般都能理解他们表现这么积极，无非是企望早日脱离身处之境。大家因此还能继续抱成一团。就像下面举的这个例子：一位积极分子被选进了生产队的民兵组织。一天，队里派他去看守鸡场，他就通知了兄弟们，好让他们无惊无险地偷走几只鸡。当然啦，当他守夜归来之时，他的那份战利品正在炉火上等待着他呢[5]！

---

① 采访 T. R. C.，1978 年 7 月 15 日。

② 叶辛，《风凛冽》，295 页。

③ 1986 年 9 月 21 日与梁晓声讨论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的一个片断。见《今夜有暴风雪》，前引，276 页。张抗抗的名为《残忍》的小说中也谈到这一类型的复仇，*L'impitoyable*，13 ~ 59 页。

④ R. Madsen，前引，譬如 138 ~ 146 页。

⑤ 访问 R. C. T.，1978 年 8 月 4 日。

头几年，表现积极不会影响同志之谊以及互助精神给大多数知青些微鼓励与保护。但是，当返城之举成风之时，事情就有变化了，那是从1973年起，有些地区更早一些。知青之间的竞争不再限于少数希望能在当地得到提升的积极分子之间，而是关系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所有知青都强烈地企盼回城。除了家庭出身很坏的，大多数则能期望在一段稍长的时间之后达到这个目标。所有的资料证据都谈到了这一点：自从第一批知青回城后，那种团结互助的精神虽说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真的开始瓦解了。过去，在知青中占主导地位的互爱互助充满友情的气氛被无可救药地“污染”了①。我们下面会谈到，在某些地方，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已经让位给了弱肉强食的法则，到处风行“人人为我”的行事准绳。当时，知青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各出奇谋，看谁的本事大；送礼、搞关系、拍马屁、巴结奉承，什么手段都用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名字登上城市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的名单。知青当时甚至都不能得到社会上其他被排斥被迫害的那群人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不仅是一个最低下的社会群组的一部分，而且属于这一群组的意识根本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安全感及认同感。有些眼看自己的同学走了，可是对自己的前途却没有任何把握，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其实，除了广东省，从来没有执行过一套公正的轮换制度②。他们之中很多在农村待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可他们早在运动初期就已经被送来插队了，主要是已婚知青，没后门可走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或者是有政治污点的。常见的是他们没办法回去，因为他们的父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放逐到农村去了③。为了振作精神，他们试图逢年过节组织一些活动，但那勉强装出来的快乐气氛其实是很恐怖的，最后有时是以泪洗面，悲惨凄凉地收场：再深的情谊也不

---

① 徐乃建，前引，74～85页。

② 在吉林省有27 050名25岁以上的未婚知青，他们之中96%是1972年以前下乡的，到1979年他们还在乡下；见《吉林省志·吉林综合管理志·劳动》，96页。

③ 经济学家秦晖的经历就是一例。出于政治理由，他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赶出南京，贬到广西农村。他自己在1969年选择到一个离开父母很远的村子去插队，直至1978年考上了大学才回城。与秦晖的访谈记录，2001年11月26日。

能让人忘却个人的沮丧绝望[1]。

1978～1979年间，出现了转机，一些集体行动令大批返城有了可能，这时互相帮助又重新替代了相互竞争。尽管组织罢工游行得冒个人风险，可是他们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最后成功了。知青的团结力量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一场旨在令自己摆脱知青身份的运动中：那是颇有意义的[2]。总之，无论是知青之间的相互支持，还是相互竞争，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适应问题。他们的团结一致，全都是针对农民、干部以及下乡运动本身，而竞争主要是为了返城，连呱呱大叫要融入农村社会的积极分子也不例外。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根据不同地区），回城确实就成为绝大多数知青的主要忧虑，也是他们真心愿意瞻望的唯一“前途”。

个人的发展与前途问题

梦想成泡影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突然敲碎了大部分城市青年的前途美梦。为了说明何来此一重击，必须追溯到1965年，该年45.6%的高中毕业生有幸进入高等院校[3]。大城市里的“好”学校，能达到80%～90%的为数不少[4]。由于在一般人眼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身价倍增，所以相当一部分高中学生下定决心非上大学不可。1966年6月，高考在开始前夕被宣布取消，这一消息令那些已取得高分的高三学生非常失望。跟着，他们就像其他人那样，被卷进了“文化大革

---

① 甘铁生，《聚会》，《中报》1980年6月，104～107页；徐乃建，前引，84页；赵振开，《波动》，前引，106～107页。

② 见本书，148～157页。

③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69～1 001页。在20世纪50年代，比例数还更高些（比如说，1957年达到56.5%）；同上。

④ 我们的一个北京受访者当年所在的中学，1965年的比例数更高达87%。所以，作为好学生，她认为自己将来进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与R. C. G. 的访谈记录，1986年1月23日。

命”，但仍然是满怀沮丧心情。“旧日的理想被死亡与鲜血冲涤的荡然无存了”，有一位当代作家这样形容当时的心境，他本来是渴望成为一个建筑师的①。

当然，不是所有的城市青年都可以指望上大学的，因为不是人人都能上到高中。建国初期那几年，曾经有过一次婴儿潮，以至20世纪60年代考上高中的比例大幅下降。从1960年的47.7%降到1965年的26.4%②。虽然如此，几乎每个学生都起码可以期望得到一份工作，可能在国营工厂或者行政单位。到1968年，很多人还抱有这种希望，特别是那些在被军队看好的“好”红卫兵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甚至在某些红卫兵小头头的心里还激起了新的政治野心。但是，1968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下乡运动，大部分的希望就此都落空了。城市青年原来的前途计划一扫而空，从此他们得制定新的，是在农村范围内的。

就此面向黄土一辈子?

正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号召年轻人要有牺牲精神。但农业劳作很难让他们感到是在从事一项真正有用的工作。1969年，《红旗》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必须交付重任于知青，为的是帮助他们在农村扎下根③。在1973～1974年的政策改动中，又再一次强调这种必要性。提升知青到政治层面的负责干部职位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位，的确有助于他们适应并接受农村生活，因为这令他们感觉到更有用，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也可以借此提高社会身份，很多时候还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当然，某些职称或职位要比其他的更重要，也更吃香。

在“政治”层面上，“积极分子”或者“先进分子”的称号就像

---

① 郑义，《向往自由》，《远村》的编后记，477页。另一个作家孔捷生本来想学理科，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优异，但他说：“那时，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见《中国青年报》，1980年11月11日第4版。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 001页。

③ 《红旗》1969年第9期，64～65页。

共青团团员那样，是响当当、令人尊敬的，但也让人想到能得到的更物质性的回报。共产党员的称号高贵得多，令人慕而仰止，伴随而来的通常是个干部职位。搞基层宣传不能免去体力劳动，不过可以有小小名气。能进到民兵里那就表示对你信任，还可以得到某些好处。要是当上生产队长或大队书记，虽然还得干农活，但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公社或县一级的干部就更不得了了，还可以脱产，不参加劳动。至于专家的职位，没有下田劳动那么累人，一般酬劳也比较高，尤其是对知青来讲，靠这样的收入，虽不能赚大钱，但起码可以自给自足。一个民办学校教师跟一个一级劳动力得到同样多的工分。在县级学校教书的则由国家发给 18 元的月薪，还有权享有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供应。民办公助学校的教师也可领取 18 元的月薪，不过由生产队分配给口粮。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和会计的工作都可以让人获得别人的尊敬以及相应的好处，但那也是划分行政等级的（从县到生产队）。名声待遇上稍为低一点儿的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工分记录员、商店售货员以及仓库管理员。拖拉机手与货车司机的职位也相当抢手，不过只有在农场才有。应招去工厂当工人也是争相寻求的升迁，假如是县级工厂，那就太理想了，因为那意味着：除了享有“工人”这一崇高的地位，还将会有固定的月薪及城镇粮食定量供应。

可惜，提干只能惠及一小部分的知青。这类措施在 1970～1971 年间开始执行，在 1973～1974 年间得到快速的推广。根据政府当年的统计数字，1973 年底全部下放知青中有 10.4% 入团，到了 1974 年底这个比率跳升到 14.8%。1973 年底只有 0.75% 入党，1974 年底也只有 0.7%。1973 年底，3% 的知青得到提干的待遇，1974 年底为 2.9%。从 1974～1977 年，入团和入党的人数比例有些微增长，但被提升到基层“领导班子”的并没有增多。然而，此后者才最能体现出知青融入农村的程度，至少可以看出农民干部对他们的信任。这个有关比率从来没有超过 4.3%①。

提升知青到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等职位的全国范围统计数字

---

① 见刘小萌，前引，865 页。

一直欠缺。不少省一级有关1973～1976年间的数字都显示出是在10%上下①。获得干部或“专家”工作的知青比例为10%～15%②。农场的比例一般比较高，可能是因为没有青年农民跟他们竞争，加上干部的职位比农村多。

上列的数字清楚地显示出不是所有的知青都能得到提升机会的。此外，选拔标准远不能制造一种健全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阶级成分在分配职位中起着主导作用。“黑五类”子女跟干部子女完全相反，很少有机会得到提升。我们的一位被访者就叙述这样一件事：在她当年所在的生产大队里，一位出身很好的知青，到了农村不久，就被派去搞专案：掌管各场政治运动斗争对象的档案资料。在开始负责这项重要工作之前，他几乎没有下田干过活儿。1971年他被上调到公社去，1972年就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然而，对于工人家庭出身的（属于“一般红”一类）子女，还有“不红不黑”的年轻人，就得看他们的个人表现了，不仅要看在农业劳动中能否吃苦耐劳竭尽全力。还要看政治上是否积极。最突出的积极分子可以被提升到县一级的干部职位，甚至更高，不过竞争很激烈，尤其是与农村出身的青年之间的竞争为最甚。教师的岗位主要看学历。读完高一的同学自然比没念完初中的机会多得多。县一级的招工一般得通过考试。大部分的职位能否获得主要取决于有没有跟干部打好关系，而礼物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方便”、“帮忙”。则起关键作用。对大多数知青来说，得到提干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并不完全以他们的意志来决定。

谈到城镇青年适应农村生活这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就连得到提干的那些知青也没有把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当作可以奉献一生的事业。我们手头所有的资料都一致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绝大部分晋升者就已经开始日思梦想返城。大量的积极分子、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非法逃跑去了香港，他们表露出内心极度不满的情

---

① T. Bernstein，前引，186～187页；T. Scharping，前引，图表33至38，320～342页。

② 在我的没有代表意义的样例中，所有数字都在这个剪刀差之内（自1973年起），除了在农场会高一些。

绪，同时也指出他们表面上良好的循规蹈矩并不意味着同意终身待在农村[1]。提干本来应该是奖励那些尽力融入农村的青年，但实际上只看阶级成分或关系，结果一般都成了脱离知青行列的通行证。尤其是入党，那就更是捷径了，一跳就上了大学，或进城当上了干部。知青传记的研究显示出他们之中某些人像是坐上了直升机[2]。

就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即使待了好几年，知青都适应不了，也做不到将农村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一句话，他们就是无法在农村或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3]。他们唯一接受考虑的前途是返回原来的城市，或者在迫不得已时应招至接待省份的大城市里。在农村找不出新路子，他们又拾起“文化大革命”前破碎了的梦想，那就是继续学习，或者起码在城镇范围找到一份工作。1973 年李庆霖告御状一事虽然在知青中引起了小小的震动（那是第一次最高领导对问题的大部分予以承认），但并不令他们兴奋万分或者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心中唯一牵挂的是返城的可能有多大。然而中央文件并没有谈到这点[4]。

知青适应的意愿因政府对上山下乡的期限及意义有着双重解释而受挫：一方面，号召城镇知青到农村去插队一辈子，还禁止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回城；另一方面，却又准许某一些回城，并不把下乡运动说成是最终的命运安排，而是一种暂时的考验。假如普遍照第二种诠释行事，像通行世界的服兵役的轮换制度那样，情况就会很明朗，抵制也会少很多。我们采访过的老知青都断言：如果他们肯定以后是可以回来的，那么就会自愿接受（起码没有太多抵触情绪）在一定时期内（长一些也可以）到农村去劳动。但是在原则上是终生的下乡运动机

---

① 我在香港访问的老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过去都是积极分子、宣传委员、教师、赤脚医生，甚至是公社干部，他们逃跑到香港。其中一名还利用到东莞去参加“先进分子大会”的机会来部署逃跑。到了香港以后他给干部们写了封信，解释他外逃的原因，还感谢他们为他所作的一切……与 M. Y. S. 的访谈记录，1978 年 8 月 1 日。

② 沙飞等，《苦乐年华》。

③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69 页。

④ 多次采访记录。M. Frolic，*Mao's People*，48 ~ 50 页。

制中，存在返城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逃脱困境的办法，并不鼓励真正融入农村，同时也形成一个缺口，令所有（或几乎所有）知青都纷纷被卷了进去。这种可能显得如此可贵，因为它不是赋予所有的人，也因为很难有把握得到。

回城途径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想回城，但最初几年只有少数运气好的或有特权的能获得机会，随着时间过去人数不断上升，至 1978 年也还没达到大多数。我们没有 1973 年前的回城人数，我们掌握的是 1973 ~ 1979 年间关系到 1962 年以来全体下放知青。根据那些数字，返城比例从 1973 年底的 43% 升到 1977 年底的 47%，1978 年底攀升到 68%，而到了 1979 年底更飙升到 84%①。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实际回城的人数以外，这些比率还包含在当地提干或招工而改变了身份的。

有四种合法返城的途径：被录取进大学、被城镇单位聘用、因病回城以及因家庭困难回城。只有最后一类是有部分客观标准可循的。从 1973 年起，在全国实施父母可以把一名子女留在或调回身边的政策②。根据不同地区，在执行中不考虑社会阶层政治身份③。总的来说，都能遵守这条标准。然而这只能惠及一小部分知青，在他们这一代人中独生子女并不多见。其他的回城办法包含相当大的侥幸及随意因素。即使真的病了，也不那么容易得到批准回城。首先得想法收买一个甚至几个医生，之后别忘了让基层干部也得些好处，不然没人会理会那张病假条④。相反，就算没病，跟好心的医生打好关系，也可以拿到病假证明。被录取进大学及被录用在城镇，这两条途径是最受欢迎的。只有这两条路才能通往真正的“前途”，就是说他们得到的是国家单位的职位。因病或家庭困难而回城的知青则必须自己想法儿去

---

①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110 ~ 111 页。见本书图表 2 及 3，178 页。

② 见本书，107 页。

③ 与 B. X. 的访谈，1977 年 5 月 10 日。与 N. Z. 的访谈，1981 年 5 月 28 日。

④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2 页、339。N. A. Chance，*China's Urban Villagers—Life in a Beijing Commune*，91 页。

找工作，而经常只能到一些街道工厂去。

许许多多知青认为自己的学习被中断了，继续学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因此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我们采访过不少非法偷渡到香港去的，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一再肯定，是想继续学习的愿望构成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或者说是动机之一。1977 年和 1978 年两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远远超过高校收生额，这也说明他们那种愿望所产生的巨大动力①。然而，1977 年以前，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进大学简直就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其实，需要跨越的各种障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

想取得一个大学名额，知青首先得提出个人申请，并由本单位的群众推荐，然后这份推荐必须经过各级领导（从生产队到县）批准。接待单位最后点头同意之前，还得审查档案、与申请人谈话，或者根据年份和省份，要求申请人参加学科考试，以测定该生的知识水平。每个省的教育局都把名额分配给各县市，然后各县市再往下分（公社或城镇单位）。申请人的年龄一般要求在 20 到 25 岁之间，必须是单身的，至少工作过两年，不过也可能有不符合这三条规定的例外情况②。

事实表明，这种制度给行贿受贿以及邪门歪道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庞大的知青（和其他青年）申请入学的人数与极低的大学收生的数目完全不成比例，这就加剧了角逐有限学位的竞争，而且把进入高校变成极少数精英专有的特权。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高校入学考试（或者仅仅是走过场），竞争就仅仅限制在跟生杀大权掌握者打好“关系”的场地上，最后，赢得“关系”最多最过硬的胜出。面对选拔考生进程中貌似“民主”的原则，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所造成的现状占尽了优势：由基层推荐再经层层上级批准的做法其实是很特殊的。通常的程序反倒是由相对比较高的某一级先作出决定，然后为了走走形式，发下去让下级来批准。有时，干脆连这一步都省去，到了某位知青要走的那一天，基层干部才知道这位同学获准去上大学。不是所有

---

① 见本书，185～186 页。张抗抗曾描述多年后再次进入教室看见黑板时的激动心情；见张抗抗，《从读书到写书》，载于王蒙等编《走向文学之路》，164～165 页。

② S. Pepper,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 年 9 月，864～869 页；T. Bernstein，前引，250 页。

想考大学的知青都能分到入学申请表的，只有那些领导决定要推荐的才有资格取得。鉴于这个制度是由上而下地分配学额，如果一个知识青年跟县委某位干部关系超常，他就能拿到申请表，并得到县一级的推荐，不必征求公社干部的意见，有时这些基层干部在此之前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额。同样的，一位公社干部跟上级关系打得火热，当他需要照顾安排某人之时，他可以使一个原本是分配给另一个公社的名额转到自己公社名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会在各个层次引发冲突及交易，而且还鼓励了知青去当“关系学”专家，他们拼命寻找、钻营并维持尽可能好的“靠山”，而不是努力学习，也不是干好农活儿。

城镇工作的分配制度也同样提供多种机会让人“走后门”。全国招聘人数是由国家计委决定的，然后一级一级分配下去，直至基层单位。每年，城市单位都分到一个招聘配额，有权在管辖的城区之外的一个或几个县进行招聘。这些县是由上级指定的，但单位可以参加商议确定名单，这就提供了第一个徇私行贿的机会。分配给县的名额再由上而下地分配下去，就像大学录取的途径一样。得到推荐的知青的档案送到城市单位代表那儿，他们是被派往当地进行筛选的。最后交易的时刻来临了：城市单位代表手中一般都有几个需要特别照顾的知青名字，那是一定得招上去的。不管这几个青年的表现怎么样，地方干部同意放他们走，唯一条件是该单位也必须聘用他们自己要照顾的对象。一旦大家都对这些“享有优先权者”达成协议，如果还有剩余的名额，那就分配给那些只有生产队长的推荐作为“靠山”的知青，而他们的“条件”也符合单位的要求。

因此，进大学和进工厂一样，关系愈多，关系层次愈高，得到录取或聘用的机会就愈大。可想而知，在任何情况下，高干子女总是头一批走的。在“工农兵学员”中占的比例特别大①。高级干部毫无困难就能替他们的子女在大学或工厂弄到一个名额，因为每个干部都很清楚，他可以向另一个有同样势力的人提供好处以换取某些东西。因

---

① 一位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中70%是高干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百分比更高达90%，见邓贤，《中国知青梦》，168页。

此，在某些情况下只需打一两个电话，就可安排好报名入大学事宜，就像钟志民的例子那样①。曾经有过高干开着吉普车到某个村子或农场去接他们的孩子，而那边的干部居然都不知道该知青已经被这个大学或那个城里的工厂录取了②。

比起“关系”来，高干子女享有的优先权确实是有根有据的：那是在执行阶级路线。这条原则令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取得回城的第二优先权，当然那是假设他们另外还与基层干部或城镇工厂的干部保有良好的关系。对一个知青来说，父母中若有一方是某企业的职工，而该厂又恰好有权到他所在的县里去招工，这在当时就占了很大的优势。至于那些出身“不红不黑”的，要想跳出农村，首先就得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替自己找关系，或者能不能表现出他们作为积极分子的虔诚之心。只有最有办法的和运气最好的才会达到目的。而那些返城希望最小的，那些当别人都走了可他们还留在农村的，都是成分不好的知青（最常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偶尔是因为个人犯过政治错误）③。

知青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出身，还取决于他们贿赂能力有多强，这后一点使许多知青感到不公平，感到特别的令人沮丧。一位北京老知青这么说：

> 当高干子女都走后门返城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政府对下乡运动的思想宣传。我们心里都想：“为发展农村贡献一生，真的很高尚，不过，你们呢？你们也去做呀，官老爷们！”④

---

① 见本书，113～114 页。北大荒的知青有这样一段歌谣：“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见金大陆，《世运》，37 页。

② 与李庆善的访谈记录，1985 年 8 月 21 日。

③ 即使在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阶级出身仍然继续影响着高校收生。第一篇公开批判“血统论”的文章是关于一个出身不好的知青，虽然他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分数线，但大学还是将他拒之门外；见《人民日报》1978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④ 与 N. Z. 的访谈记录，1981 年 5 月 28 日。一篇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也是这样谈论一个总是鼓励她献身祖国和革命的干部。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革命’刚好需要他和他的亲眷们留在城里，而我则一定要到漆岩去。”（贺士光，《局长的女儿》，前引，60 页）

返城的种种条件令大部分知青忧心忡忡，觉得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唯有“革命干部”子女一般得以免除这种对前途的焦虑。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只在那儿等待回城的机会来临，有句俗语说得好：“表现好上好，不如有个好爸爸”①。有一些人很有野心很有理想，居然使出谄媚巴结的浑身解数。他们深知，如此这般就可积累小小资本，以防他日回城之时大派用场。其实，这些高干子女所奉行的与当时正在批判的刘少奇腐蚀知青的“下乡镀金论”何其相似乃尔，这简直是最大的讽刺。根据该论，一个中学毕业生可以在农村的几年间靠着自己的“牺牲”闯出名堂，然后再返回城市②。

然而这些特权分子也不总是被命运眷顾的。有些知青本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朝夕之间就成了毫无返城希望的贱民，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林彪集团的，被揪了出来。相反，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20 世纪 70 年代恢复了名誉，他们的子女熬过了好几年的艰难困苦，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在城里重获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即使是其他阶层的老百姓，他们的阶级成分也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恒久地一成不变。有争议的案子就先挂起来，其他的可能突然复审而得以平反。一个知青有没有返城的希望，这得取决于他父亲或祖父的政治身份，而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官僚机构审查程序最后才能定下③。

至于走后门、找靠山，那可是一门艺术，比起政治身份来，更加无法把握，更加靠运气。就算自己已经讨得了某些干部的欢心，那还远远不够，还得看有没有位置，这些干部有没有过硬的权力能够说了算数。就算该知青的名字上了推荐上大学或者应招进城的名单，那也不能保证到最后关头不会被后台更硬的另一位挤下来。因此知青普遍感到很无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 知识青年好像是在火车站上等待列车的旅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即将乘车远行的旅客……不同的是这个旅客还没有

---

①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6 期，171 页。

② 见本书，74～75 页。

③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6 期，186 页；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1 页。

买票，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旅行。他怀着急切期待和茫然若失的心理等着列车进站，随时准备跳到任何一列愿意载他而行的火车上去。[1]

知青对前程如此胸中无数，那是基于两条自己不能掌握的不可言明的提升选拔标准：阶级成分与关系网。但凭表现好坏来决定提升的机制也不能激发真正愿意融入农村的决心。当然，能够在当地得到提升对真心向往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来说可以是一种鼓励，不过表现好而获得的奖励却是一个返城名额或大学学额。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自己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把下乡看作是命运安排还是经受考验，这两种几乎同时产生的观念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结果就引出了那么一种似是而非的悖论，鼓励知青口是心非。政治积极性高以及劳动表现好，都不过是条简易的门道儿，为了自己的档案里多几句好话，也为了跟干部打好关系，最终目的不外是能比较容易获取提升返城。这种状况导致道德败坏，令人沮丧。有些积极分子几年来夸夸其谈要在农村待一辈子，还劝说其他人向他们学习，但知青眼看他们先后都走了，自己不免也有样学样、厚颜无耻。孙洪敏，一位出身红五类（军人）的女知青，原是沈阳一所好学校的学生，1972年和80名同学一起来到辽宁的一个农场。她担任共青团书记一职，是上级看好的积极分子。像其他人一样，下放前她表明要“扎根农村”。可是后来她觉得农民那么落后，非常失望。有一次在当地，她拒绝当众应承待在农村一辈子。当时农场领导逼她表态作出抉择：假如她公开宣布在乡下待一辈子，她就可以回城，不然就回不了。他们甚至还给她父亲打电话，要求他给女儿施加压力。这位女知青坚持己见，拒绝说假话。最后，由于她父亲掌有相当的影响力，1976年她是返回了沈阳，进了一家工厂[2]。

婚姻问题

在一个几乎不存在同居的社会里，对每一个预计自己将来的知青，

---

① 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前引，124页。

② 与辽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孙洪敏的访谈记录，2000年8月8日。

婚姻问题就肯定显得十分重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就变得迫不及待了。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农村结婚的知青比例相当低。1977 年底是知青结婚最多的时候，那也不过占当时在农村全体知青的 10%，如果把曾经下放过的全都计算在内，那就仅占 5%①。不能将这些比例形成的根由归于知青必须遵循城市青年结婚的规定（女 25，男 28），因为在婚姻这一事上他们是跟随农村的。农村规定的年龄比城市低（女 23，男 25），但实际上大家都不太遵守②，而在城里，虽然政府掌有多种施加压力的方法，但还有很多年轻人（大概是一半）能在法定年龄以前结成婚③。其实，从 1974 年起，政府就鼓励知青结婚，以此证明他们扎根农村的决心④。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一直保持单身身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结婚，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究其原因有二：首先，倘若双方都是知青，那就有极大的物质上的困难；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结了婚就会造成返城的障碍。

我们前面谈过有的女知青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嫁了给当地人⑤。而知青间结了婚正相反，带来的是更多的困难。婚后，他们两人一般都离开集体户，可是农民通常没有任何额外合适的地方，结果年轻夫妻的住所条件比其他知青更差⑥。另外，结婚以后跟着来的经常是生孩子（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女方怀了孕才不得不结婚），两位年轻人又陷入带孩子的问题难以自拔。在农村（在城市里通常也是这样），父母工作的时候，一般是爷爷奶奶照看孩子，必要时是孩子的姐姐帮忙。知青就没有这个条件，当妈妈的很难保证全天出勤，因此收入就

---

① 见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42～43 页，引用在刘小萌，前引，867 页。陈永贵 1978 年底在全国会议上提出 5.3% 的比例，是根据全部下乡人数（粗略地）计算出来的。

② 根据 M. Whyte & W. Parish，前引，163 页，在广东农村，农民女青年结婚平均年龄在 20 或 21 岁，而男青年则将近 24 岁。

③ 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111～117 页。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们的抽样调查中，36% 的城镇的男青年在 27 岁以前结婚，而 49% 的女青年在 25 岁之前；同上，113 页。

④ 见本书，118～119 页。

⑤ 见本书，279～280 页。

⑥ 这个住房问题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在农村知青结婚的比例会比在农场低。

减少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小宝宝要吃要穿，家庭开支增加了，急需钱用。

由于知青夫妻离开了集体户，又得做许多家务事，结果他们就远离了他们的同伴，不过倒也没更融入农村社会，他们心中充满着强烈的孤独感。当地的基层干部一般不再叫他们去参加知青会议，把他们看作是普通的农民家庭。1973～1979年间，中央政府多番促使地方干部给已婚知青提供特别的援助，不过除了几个模范县，似乎没有得到多少反应①。

然而，老知青并不认为是这些困难构成他们拒绝结婚的主要理由，准确些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知青间结婚不像和当地人结婚那样，那并不意味放弃任何重新获取城市户口的希望，不过确实是极大地减少了回城的机会。城市单位确实很反对招聘已婚知青，主要是因为涉及住房、托儿所、产假等问题。单身的总是比较受欢迎，聘用他们付出的较少，而且他们是可以随时待命出工的。女知青，即使是单身，也不像身体健壮的不会请产假的男知青，想被招进工厂要困难得多。当城市单位处于根本不愁招不到工时，已婚知青是完全没有机会在他们返城之时能获得两个职位，除非他们有特别的关系。高干子女当然可以逾越这些障碍。出身不好或者一般出身的知青（男或女都一样），如果跟一个出身特权阶级的结婚，那就是一个得到返城机会的好办法②。

但是，除了这个特殊案例之外，与一名知青结婚就会减少许多被招进工厂的机会，上大学的机会也同样降低。就算不遵照只招单身入大学的规定，而当例外来处理，那也不容易③。假如已婚知青夫妻来

---

① 关于其中的两个模范县，见《人民日报》1979年4月10日第4版。四川那个县帮助知青养猪，这对一个有夫有妻的家庭已经不容易。即使在这个模范县，尽管提供了各种协助，也只有90%的该县已婚知青能做到自给和“基本自给”。

② 冯骥才，《当代干连》，前引，8页；《争鸣》1984年9月，65～68页；《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婚姻案件100例》，8页。

③ 我的受访者之一进入了大学，当时他已经跟一位女知青结了婚。我还知道另外两种相似的情况，但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已婚知青（男或女）而对方是出身农村的进入大学。

自两个不同的城市，返城的障碍就更大了，因为原则上只准许他们回到各自原来的城市。因此，大部分知青都不考虑在农村建立家庭，因为他们并不准备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认为那些人结婚就是一辈子“慑服”于下乡运动。“结婚安家”就是当局用来指称在农村结婚的专门词语，其实“安家”包含了双重意思，一是“安置一个家”，另一是“安家落户”。然而，尽管如此，这类知青中相当一部分依然抱着有一天能回城的秘密奢望，就算爱情、成家的心愿或者仅仅是意外怀孕会令他们有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种梦想。

结婚固然有问题，保持单身也同样有其他的问题。那些坚持不结婚的知青就被迫过着一种无法令人满足的情感生活及性生活，从现行的社会标准来看，那也是不正常的。像所有其他同年龄的年轻人一样，知青也感受爱情，加上集体生活更增加了异性接触①。但是，在他们绝对不愿意回城之前结婚的情形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没有一种能让人称心如意：完全克制性欲，或者光谈恋爱（至少暂时）不结婚。头几年，绝大部分知青都采用第一种办法，这既符合他们曾经接受过的清教徒教育，也不会违反周围环境的道德准则。在下放农村的整个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这样抑制感情及欲望。谈到爱情，他们就往后推，“以后再说”，这当然不能令他们幸福愉快，而且在生活中还失去一定的平衡。

——“天哪！你简直没有意识到是女人！”

——“我太意识到是个知青了。②”

这是一位新一代的少女和一位老女知青之间的简短对话，充分反映出当年选择那么一种生活态度的知青所特有的问题。不仅是他们的心理平衡受到了干扰，他们而且有可能一辈子单身，因为“以后”，也许太晚了。尤其是对女知青，情况就愈显严重。在中国，30 岁的闺女（甚至还没到 30 岁）若没出嫁，就被人称作“老姑娘”，很难找对

---

① 然而必须看到，由于大部分知青从心里就不愿意跟当地人发生关系，而知青在村子里人数又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对象的范围就大幅度缩小了。

② 徐乃建，《因为我是 30 岁的姑娘》，《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第 3 册，475 页。

象[1]。随着岁月流逝，女知青们就愈加意识到她们的境况如此反常，身边的农民，特别是远方父母分外“关心”，不断催促她们。她们中很多人像徐乃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回到城里找丈夫非常困难[2]。因此，一年年过去，难怪不少年轻人就自我克制开始谈恋爱，而且越来越多。知青根本没有能力掌握甚至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使他们的恋爱关系变得既不稳定又无把握。一对已经公开恋爱关系的男女青年随时都可能因其中一位调往他方而分手。在这种情势下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瞬间风流韵事。不过，这样乱搞并不符合大多数知青的恋爱观，也会引起社会上的严厉谴责。年轻人最普遍是寻找一种专一的稳定的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那两位青年之间，经常是面对外人，就好像订了婚的未婚夫妻。然而，不能结婚，又有可能至少短时间的分居两地，这就使他们的关系的前景蒙上疑惑的阴影。王安忆小说中的一位人物这么说：“你知道知青谈恋爱的苦楚，我们公社上百对知青的恋爱成了悲剧。”[3] 一对恋人之中的一位调走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跟着来临，那经常导致关系破裂，因为离别时间的长短是不确定的，甚至不能保证有重逢的机会。很少有人能顶得住几年甚至7年的天各一方的生活，而仍然保持着恋人关系，作家叶辛就是一例[4]。最常见的就像一位老女知青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

> 几年以后，他被招工进城了。开始，我们虽然相隔迢迢，但仍是心心相印。不久我发现来信的感情发生了变化，隐隐约约可看出，他把还留在农村的我当作“负担”了……我忍

---

① 我们这里说的是城里的标准。在农村就更低了，姑娘25岁还没嫁出去是很例外的。

② 见本书，352～353页。

③ 王安忆，《小院琐记》，《青年佳作》1981年，298页。

④ 《青年佳作》1981年5月，78～79页。叶辛的未婚妻1972年调走了，但不是回原居地上海，而是去了贵州北部的一个发电站，他们两个到1979年才得以团聚结婚，7年间他们鱼雁往来，共写了600多封信。这一事实可能就是王安忆讲述的故事的素材，见王安忆，《小院琐记》，前引，298页。其实两位作家互相都很熟悉，1980年都参加了为期5个月的文学创作讲习所；见叶辛，《王安忆和她的小说》，《文汇月刊》1982年11月，34～35页。

痛毅然决然地将几年的情谊尽付东流。[1]

引致关系破裂的原因不仅仅是无法确定能否有一天双双都调入同一城市。调动会造成两位年轻人社会身份不同，这也会令情况变得无法控制。比如说，其中一位被录取进了大学，这时两位之间的差距就似乎难以弥补了。假如留在农村的那位不快点儿想办法回城，可能的话，也争取到一个大学生身份，那么关系破裂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2]。

因此，是调动造成了知青感情上的创伤。准备走的一方处于情感、道德良心以及要去开始一种新生活的愿望之间，左右为难，备受折磨。而留下的那一方则痛苦不堪。他们诅咒命运，将个人的不幸归罪于下乡运动。有些女知青早就和她们的男朋友有了性关系，现在却被他们抛弃了。由于她们不再能以处女身去面对婚事，关系破裂的后果就尤为严重。而那些被抛弃又怀了孕的，她们的结局悲惨无比。想偷偷把孩子打掉，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关系，那只有高干和医生家庭才具备。如果年轻的母亲把孩子留下，或者做了人工流产可又传了出去，别人就会蔑视她，谴责她[3]。女知青意外怀孕的情形不是个别的，因为未婚者是得不到避孕工具的。

即使一方知青调动没有令事情恶化，感情深厚的双方总还有性欲问题：当年依旧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固然可以帮助这些男男女女实行禁欲，但是根据我们的受访者所讲述的以及小说中所描写的意外怀孕，还有性关系，都显示出许多知青都抵受不住肉体的呼唤。做得到的那些就不满意老是将过正常夫妻生活的可能无限期地往后推。而那些顶不住的就犯下大错，会引来一身麻烦。如果两位知青被人捉奸在

---

① 刘心武等，《让我们来讨论爱情》，48 页。

②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75 页。

③ 许多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都描述这类年轻妈妈的悲惨遭遇；例如，孔捷生的《普通女工》，《普通女工》，155～247 页；赵振开的《波动》，前引，1～138 页；在叶辛的《蹉跎岁月》里，女主人公听说一个女知青在火车上让一个解放军战士替她抱一抱婴儿，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孩子的爸爸没良心，孩子的妈妈是知青，孩子送给了解放军……"（见《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43 页）

床，他们双双都会被拉上群众大会进行批判，跟着可能会送到警察局，还会告到法院去。一位女知青怀了孕，没能及时找到办法去偷偷堕胎，最后陷入了极其难堪痛苦的境地。她的错误被揭发出来，就开会批判她，给她施加压力，逼她供出罪魁祸首。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与涉及青年的年龄，结果就不一样。有的时候，准许女方去堕胎，但是犯错者必须分开，接受批判以及严重程度不等的惩罚。他们的个人档案上自然就此落下了污点，直接影响今后返城。有时，女方为了不背叛自己的男朋友，拒绝说出是谁“引诱”她，因为一般男方受到的刑罚比女方重。所以女方就得单独承受一切耻辱以及处分。还有以下这样的情况：强迫两位恋人在农村把婚结了①。通常，如果已经私情深厚，他们就会答应，反正那是早晚的事。在女方怀孕一事未被发现之前，他们主动开始去填表办手续。

农场的情况不差上下，不过但也不完全一模一样。最初的时候，特别是在军垦农场，革命清教主义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村可是望尘莫及。谈恋爱是令人反感的丢脸的事，只有“同志爱”、“阶级兄弟情”才可取。社会压力大到全面干涉每一个人的私生活。全天候的监视，来往信件全被拆开检查，假使发现有谈情说爱的，就公诸于众，召开批判大会，揭露“阶级敌人”仍然在大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这种紧张气氛引致多起自杀和逃亡外国事件②。可是，过了些时候，当农场被地方政府接管以后，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那里知青的平均年龄比农村大，因为大部分是1968～1970年间去的。还有一点不可不提，农场知青比较集中，鉴于回城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流动不大，比较稳定。那儿最低生活费有保障，知青因此就越来越多地搞对象。他们结婚人数的比例明显地比农村高：1977年是17.3%，而在农村只

---

① 但男方并不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现实。在广东台山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男知青令一位女知青怀孕了，别人就强迫他答应娶她为妻，结果在结婚前他跑到香港去了。那位女知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嫁给了一个愿意接受她和她的孩子的农民；访问M. W. C.的记录，1978年7月16日。

② 在《北大荒风云录》里可以找到不少见证文章，特别是10～12、133、181～183、195页。

有 8.2%①。最明显的是同居现象很普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令人吃惊。根据云南知青办公室的一份内部报告，同居的百分比达到 50 或 70，在省内个别农场分场更加高达 90%，只有在发现女方怀了孕之后才会去结婚的。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78 年头 5 个月里，景洪农场就有 232 个女知青未婚怀孕，108 个婴儿诞生。在黎明农场，有 51 名私生子出生。

在所有农场，每年都有好几宗因私自堕胎致死的案例。报告解释说，这种情况应归咎到干部管教不严和知青思想颓废沮丧，但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结婚，一旦结了婚就不再享有探亲假的权利，也失去种种离开农场的可能机会②。

上述知青在农村碰到的各种困难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几乎完全否定抵制下乡运动。几年之后，返城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就好像是唯一的解决前途问题的办法，也好像是一种理想，为此他们值得付出一切努力。宣布有人获准回城经常就是大肆庆祝的日子，有幸被点名的纵情欢乐，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给大家分喜糖，就好像人家生孩子或结婚那样。如何解释这种强硬的否定态度呢？适应农村的问题是那么难解决，以至令人完全灰心丧气，还引起了负面反应，这一结果倒过来又使适应问题更趋严重。这么一种不适应和否定的恶性循环一旦成立，就很难打破。1973 ~ 1974 年间对运动作出的修改不仅远不足够，而且太晚了，没有能改变绝大多数知青要回家的深切愿望。

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掌握重要强制手段的政府强加于人民的政策，后来是一年比一年厉害。由于是强制手段，也由于对下乡运动政策作了某些调整，运动才能持续十几年。但它激起了整个社会的抵制，带来的后果是不可忽视的。

---

① 见刘小萌，前引，867 页。这个比例数字在新疆、宁夏及甘肃农场分别达到 63.1%、57.1% 及 55.9%，原因是几乎所有知青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到那儿的，所以都超过 30 岁了；见刘小萌，前引，510 ~ 511 页。

② 《情况反映》，是 1978 年 10 月出版的内部刊物，邓贤引用在《中国知青梦》，157 ~ 158 页。

第四部分
社会上的抵制

上山下乡运动产生出了那么多问题，又遭遇到老百姓那么强烈的抵触，人们会问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怎么能持续如此长久。那自然就得从当年统治全国的社会控制体制中去寻找答案了。我们将会先对这一体制作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体制的真正效用其实是有限的。它并没有阻止多种形式的消极抵制出现，而由此导致的反常结果在社会人伦扭曲变形及社会道德失范败坏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控制体制一放松，一种积极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抵制就出现了。我们也将试图论列出这场公开抵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并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抵制作一比较。

第十章
社会控制制度

为使知青俯首成为国家对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统治者们拥有一整套既复杂又阶段分明的社会控制体制[1]，其中包括思想灌输、对思想及行动进行监督、奖励、批评以及镇压。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只是使用过的方法，而不是付诸实行的组织、群体与个人。从全国来看，正如我们前面所见，为上山下乡展开的宣传活动一直在各种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中占有重要的位子。发表一篇文章或者一条最高指示只不过是第一步。跟着来的是，必须把作为宣传对象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对这篇文章或那条指示进行学习、讨论和公开表态以示赞同。分组政治学习（当然也包括讨论毛泽东的这篇或那篇文章）是思想改造的一个主要途径，不过，在农村没有像在城里或农场里搞得那么轰轰烈烈。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在下乡运动的头两三年，曾经试图设置政治指导员与毛泽东思想辅导员，后者是辅助前者的。他们中的某些人专门负责知青的思想工作。可是在林彪去世后，这些工作就逐渐被舍弃了，群众的政治工作就由生产小队或大队的会议来执行。在这些会上，大多数参加者都很消极，他们只是一边打瞌睡，一边听听负责人讲话，妇女们则抓紧时间打毛衣，最后他们就对上面要他们表态同意的事情，无精打采地表示赞同。一般来说，每年有一两次在公社或者在县里特

---

① 有关社会控制的概念及在中国和苏联的实际形式，可参考 F.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309 ~ 364 页。

别为全体知青召开大会。另外也有专为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而组织的。1969～1970年期间这些会议变得更频繁，而且被冠以“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之名，那是出自林彪给小红宝书写的序言：必须“活学活用”[①]。后来，这些会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日子才举行，比如说，又要发起一场新运动了，或者又到了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指示发表的周年纪念日[②]。

无论是小组政治学习或是大型会议，目的都是想一再肯定下乡运动的终极价值、给支持过运动的人唱颂歌、揪出那些与运动唱对台戏的或者支持不力者。授予积极分子或先进分子称号则是鼓励全体知青好好表现的“红萝卜”。这一称号不仅带来荣誉，而且还许诺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物质奖励。然而，积极分子的身份并不怎么令人羡慕，也很难激发人们去追求。他们的角色就是以自己的言行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下乡运动价值的合理依据。所以他们总是得做出榜样，严格遵循各级领导的指示，同时还得紧跟每一次政治变局。他们的活动空间很窄。在那些积极分子会上，模范单位的“代表”其实是由领导指定的[③]，他们的发言也是事先由领导查阅过的。一切不完全符合当时“路线”的文字都得删除或者改写。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老一套令大多数知青对这类会议望而生厌。但是他们又很难不去参加。如果不去，不但领导会对你有看法，而且还会失去工分，因为开会是有报酬可得的。此外，那也是一个机会，可以重见住在远处大队的知青朋友。

在农场里，尤其还是解放军农场的那个时期，思想改造抓得更紧。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政治学习，有时星期日的部分

---

① 关于对“30字原则”的批判，见 *Beijing Information*，1979年2月5日，16～19页。

② 同时也庆祝1955年12月27日发出的同样内容的“最高指示”；见吉林电台广播，1975年12月19日，刊于 *SWB*，1975年12月30日。

③ 如果那些积极分子中的最虔诚者出身不好或者口无遮拦出了名的，即使由基层提名，照样很少有机会参加这些大会。与R. C. G. 的访谈记录，1986年1月23日，以及孔捷生，《大林莽》，前引，141页。

时间都得牺牲掉[1]。开初几年，知青们还得一边操练正步走，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政治思想斗争的气氛浓厚。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就算在原始森林里，政治指导员都会提醒知青们小心毒蛇、野兽……和阶级斗争[2]。其实那些头头们并不满足于改造知青的思想，他们想方设法在知青的谈话和行为中发掘一丝一毫的异常，然后展开大批判。积极分子就需要帮助领导做这些工作，监视他们的同伴，打小报告。

不间断地利用对某些思想及某些人的批判来教育广大群众，连一般的政治学习会都一样。就是这样，通过宣传轮流指控刘少奇、孔子、林彪、邓小平、“四人帮”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把敌视运动的思想与行动都归罪于当时的“坏分子”，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要吓唬在内心深处可能也有类似感情的那些人，然后找出替罪羊，来说明这种思想感情为什么会存在。在“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要是有知青拒绝下乡，或者表现自私懒惰，那就不仅刘少奇是罪魁，连知识青年们在农村接触的“阶级敌人”也是祸首了[3]。面对那些斗争阶级敌人的大会，又亲眼看见对他们施尽侮辱欺凌及镇压惩治，知青们打消了任何表示相反意见的念头，更不用说什么提出批评了。农场里基本不存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阶级敌人，知青就成了领导们营造斗争气氛的活靶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首先被盯上的。他们必须避免与当地的阶级敌人有任何接触，以防万一被“卷进去”。他们得不停地去证明自我改造的决心。他们其中的一个就这样说：“（我）一定要彻底背叛我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4] 对其他的知青也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所以，为自己轻轻地哼首爱情歌曲，把别着毛泽东像章的帽子丢了，在食堂吃饭掉了一颗饭米粒儿又没捡起来，看本禁书或者同一个异性知青散散

---

① 在海南岛的一个农场，半年之间每天下午都用来政治学习。那些负责人希望借此可以促生产，来个大跃进，结果当然是相反的了；见 M. Frolic, *Mao's People*, 202 页。

② 孔捷生，《南方的岸》，前引，23 页。

③ 见《红旗》1969 年第 9 期，61 ~ 62 页。

④ 《光明日报》1970 年 7 月 10 日第 3 版。

步，这都可以引来一场群众大会上的大批判①。

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势必导致镇压性的处罚。在“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气氛下，一句牢骚话就会轻易地被当作是反革命言行，又或者在工作中一时失手，那就是有意破坏。犯罪分子即刻被抓起来，交给群众进行大批判，然后送去劳改营关押起来，或者去劳动队监督改造。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头两年，解放军农场都经历过一场真正的大扫牛鬼蛇神，到处抓反革命。大多数的逮捕都是在粉碎“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进行的。大多数的逮捕都是在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进行的。1967～1968年间，揭发出了一个神秘的“五一六兵团”策划的所谓阴谋，以便清算一些被认为是极左的（反对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了1970年这个运动传遍了全国，特别是在军队内部，当然也包括解放军农场，目的好像是为了处理几个落了网的前造反派小头头。结果极度扩大化了，牵涉到了千万无辜的人 我们采访过其中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下放河北，另一位在内蒙，他们都是当作“五一六分子”给抓起来的。当局的做法是先把那些老造反派积极分子都关起来，然后要他们“承认”参加了阴谋活动，并供出“同伙”的名字。供词都是通过逼供信逼出来的，有时甚至到了严刑拷打的地步②。有些单位里的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任何人的名字都随时有可能被某一个因折磨得“精神崩溃”的朋友点中。河北的那位知青告诉我们，在他们那个队里面，一共80个知青，被抓走了30个，其中只有5个（包括他自己）坚持到底拒绝承认犯罪。林彪去世后，追捕行动中断，但被抓的知青并没因此得到平反。我们的一个采访对象是那个时期放出来的，不过一直到1973年都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下。另一个多亏了他那个北京高干父亲出面干预，但也等到1974年才放出

---

① 多次访谈记录，以及张辛欣与桑叶，《逗哏》，前引，425页；张抗抗，《塔》，前引，15页；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43页。在梁晓声的农场里，跟一个异性知青一起走走，也会被看作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干部们说知青来这儿是“为了进行自我改造，而不是搞什么散步之类的资产阶级玩意儿”；与梁晓声的访谈记录，1986年9月21日。

② 我的两个受访者中只有一个真的被上刑了。

来。没有任何人向他们赔礼道歉，也没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①。类似的其他案件令解放军农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1970年，在西双版纳，成千上万的知青被卷入一个名为“社会党”的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案子里。其实，那不过是几个年轻人开的玩笑。他们看完了《列宁在十月》那个电影，就闹着玩儿说什么组党，还自封为“主席”、“书记”，等等。结果让人揭发了，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不得不招假供，而那假供词就像滚雪球那样，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幸亏某几个牵涉入案的北京高干子女得以告知他们的父母，那案件一年半后才搁置下来②。

1969年初，在北大荒，就在知青刚刚抵达后不久，展开了一场大抓苏联间谍的行动。一位哈尔滨青年平时有一些政治不太正确的言论，生活态度又自由散漫。兵团领导看不顺眼，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他抓了起来。调查组头头儿向他的共青团员女友施加压力，要她写信给她的男友提出断绝关系。头头儿威胁她，如果不服从，就把她也告上去。这位姑娘只好同意写了信，心里希望她的男朋友能够理解她这么做是不得已的。谁知道，那位男知青在当天夜晚就自杀了，只有20岁呀！而那些负责人却声称他是畏罪自杀。后来，这位男知青一直没有得到平反③。

林彪死了以后，恐怖气氛淡化了，不过在农场里思想控制依旧很严格。在农村被镇压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直至1972年还是相当厉害的。一句所谓“反动”言论或者跟某个干部有些微冲突，都可以招致牢狱之祸。20世纪60年代初期送去农村的知青中，很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他们就成了镇压的主要牺牲品。1969年在广东的一个公社里出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位老知青跟一个农民吵架，装出要打他的样子，结果其他农民以此作借口，把他告了，要判他20年徒刑，最后县里判了他8年。

---

① 1986年1月8日与C. Y. L. 以及1986年6月30日与M. J. L. 的访谈记录。

② 与T. X. 的交谈记录，1984年10月25日。

③ 这次事件是由一位目击证人叙述的，他现在是记者兼作家；见贾宏图，《重新说起是为了不再发生》，载于沙飞主编的《苦乐年华》，17～26页。

跟我们讲述上述案件的人认为，判处重刑，其中除了想报仇之外，还有恐吓知青的存心用意①。那个时期，有些年轻的城里人被控回城探亲过于频繁，或者被怀疑密谋逃往香港，他们都得参加公社或县里组织的“学习班”②。1971 年之后，对知青思想及行动的控制在农村比在农场松弛得多。推广“株洲模式”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纠正知青相应无人管的状态。不过，知青点的管理干部虽然尽力加强思想道德上的控制，但似乎并不那么成功。报刊上不少文章都谈到干部们的无能为力。一位前带队干部跟我们讲过：

> 晚上，我得组织知青读报学习，可是他们常常出去，只剩下两三个人参加。他们之间谈情说爱。我真怕出事。要是有一个女知青被发现怀孕了，那可怎么办？我有责任呀！我要求他们不要太晚回来，可他们觉得我是多管闲事。③

在中国，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最有特色的，就是户口制度，上文已经论述过④。就知青方面来说，监控他们的居留就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农村，假使知青不遵守强迫居留的规定，就是说在准许时期之外回城，那有时就会被强力制止，而且经常受到处罚，得不到粮食分配。总之，在某段时期内没有了工分，就是没有了收入。就算这样，也阻吓不了相当一部分知青。因此，城里的各级政府就不得不积极开展工作，劝说返城探亲的知青，还得监视没有得到批准而滞留在城市的那一群，对他们施加压力。监控的主要方式是由警察与街道积极分子“查户口”。他们出其不意地来到可疑分子的家庭查户口，以核实是否在场的各人都有户口。有些情况下，这种查户口可以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虽然对知青思想、言论及行为的监控力度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不过，无论如何总是足以阻止对下乡运动本身及对执行该政策的负责人作出公开抵制。思想和组织是社会控制制度的最突显

---

① 采访 J. S. G.，1978 年 7 月 8 日。

② 采访 M. J. Z.（1978 年 6 月 28 日）及采访 N. Y. S.（1978 年 8 月 5 日）。

③ 采访 H. Z. W.，1984 年 6 月 13 日。

④ 见本书，68～69 页。

的组成部分，背后就是镇压①。在正常时期，领导人只是例外地采用这种手段。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那么镇压就是起惩戒作用了。领导人是坚决地执法作出榜样，正像通行的当众处决那样。也就是中国俗语常说的“杀一儆百”。在紧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必须采取恐怖手段，就是说只有杀掉五个、十个甚至二十个，才能阻吓一百个人。然而，镇压从来都不是单独进行的，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运动。对在农村的知青的社会控制当然也不会例外。问题在于下列两点：一方面，社会控制虽在阻止公开抵制上是有效的，但仍然无法说服知青下乡运动是正确的，应该接受的；另一方面，那种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大部分的知青中引起的只有反感和抵触。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是落后的农村以及紧迫的个人问题，因此对于那些被迫不得不参加的政治活动，心里只有一种宗教仪式的假惺惺的感觉。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党内高层的广泛权力斗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最终令年轻人对官场政治厌恶至之。

“就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我才有了去香港的想法。如果那就叫做‘为人民服务’，我心想那他们是拿我们开涮啊。从那以后，年轻人不仅不再觉得当积极分子光荣，而且还自问那值不值得，因为政治反复太多了。”②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所能得到的只有表面上无可奈何的接受，而在此背后深深隐藏着多种形式的消极抵制。社会控制的消极作用（即制止作用）才是真正有效的，而其积极作用（即引导作用）反而无效③。

---

①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 F. Schurmann 的知名著作的标题（见本章 317 页，注①）。Schurmann 认为“能使（共产党中国）屹立不倒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1 页），但他没有触及由公安司法镇压部门以及各种辅助警察构成的那个机制。本人觉得，从词语的本义来说，它们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存在的这个根基具有强大的势力，但一般又隐蔽起来显得很神秘，这就让社会控制制度更加坚固，而一眼看上去好像很高雅很文质彬彬。

② 采访 X. C.，1978 年 7 月 6 日。

③ 我在下面两章所要谈到的看法，与 Whyte 关于中国“小组”及政治仪式的职能与效率的研究结果是相互一致的，见 M. Whyte，*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230～235 页。

第十一章
消极抵制及其结果

对下乡的抵制在历年间都经常有所闻，市政府的遐想定额从来都没有百分之百满过。1968～1969年第一个大潮之后的低潮时期，抵制行动特别强劲。1970年开始，招工的可能性增加了，第一批“走后门的”返城引发一片沮丧气氛，因此出现了一些俗语，比如“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意”、“谁有后门谁回城”。这种抵制行动有时直至使用暴力对付“动员”干部。1972年在苏州，为了让124个知青到农场去，有98个干部不间断地工作了两个月。有的干部挨了打，拒绝继续干下去，最后只有24个知青走了。同一年，哈尔滨市原计划动员35 000个知青到农村插队。当局甚至把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群众拉去举行欢送知青仪式，那也没用。尽管如此，那一年只有700个青年下了乡[①]。很清楚，1970～1972年间下乡人数大滑坡并不仅仅因为工厂重新开始招工，社会抵制也是原因之一。

下乡之后就出现了其他的消极抵制，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不肯依从当局对他们在乡下应有什么表现的要求，另一类是拒绝留在农村。第一类主要缘由生活条件、融入农村及社会地位引发出的种种问题，而第二类则是对个人前途问题的反应[②]。

---

① 见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13页。

② 见本书第九章。

异端言行，违法乱纪及另类文化

我们已经看到过，“文化大革命”结束，红卫兵遭镇压，被迫下放农村和农场，然后发现农村及农民思想的落后，这一切都使知青们对党和国家一向鼓吹灌输的价值观念丧失了信心。加上对遇到的物质及精神上的困难感到深深的不满，他们因此就拒绝依从领导所要树立起的行为模式。这种属于“玩世不恭”的态度及异端言行在知青中广泛地流传开了，而且经常是采取集体形式。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言行甚至会诉诸于犯罪活动，尤其是当个别年轻人陷入了特别困难或者毫无出路的境地时，或许也是由于监察系统太过软弱，无能为力。

玩世不恭与异端行为

官方报刊承认经过了初次接触和亲眼目睹的第一阶段之后，所有知青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往下滑：激情不再、懒散怠惰、无故缺勤、集体生活中不是口角吵架就是放任自流，还有频繁返城，这些都典型地刻画了当时多数知青的态度。其他所有的资料都肯定，他们在下乡后不久就普遍士气低落。多数知青并没有向上头树立的榜样学习，他们满足于过一天是一天，既无理想亦无热情，中文就用一个字来表达：混。混客①们尽可能少干活儿。他们经常不上工②，以极强的惰性来对抗出工的召唤：“我们睡懒觉不出工的时候，队长就来叫。我们便假装什么都听不见，或者作出要起床的样子，然后又再重新躺下接着睡。”③ 在农场里进行这类抵制活动就比较困难了，知青们使用别的办

---

① 这个词语有点儿像法文俚语里的 glandeur。以前人们叫怠工，但混客们不仅混工，什么都混，一天到晚就是混日子。

② 在农场不得批准就回城的通常都会受到惩处。有些知青就让人给自己发电报，假称家里有人过世，或有人得重病等等。有的时候干部们烦了，就索性勒令一个都不许走，就算有正当理由也不行；见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第2册，292页；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0页。

③ 采访 M. Y. S.，1978年7月24日。

法来取得额外的休息时间，比如说收买负责监督他们工作的农民，要不就是特意把一些农业机器搞坏①。

假如不是某些知青之间团结一致的态度，那些反常的行为是没有可能出现的。知青们消极抵制的集体性在政治文化的异常现象以及他们的“普通性质”的违法乱纪行动中都可以看得出。这是由于他们在农村社会里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这种地位一方面迫使他们非得团结在一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免于遵从外界的行为方式。他们远离家庭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是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行事作为的；与落户农村的家庭的子女完全相反，他们也不可以在那些接待他们的地方像他们的同辈们那样生活，或者应该说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根本拒绝同化。他们因此是在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就好像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似的。所以面对外界时，团结及其内部的凝聚力有多么重要，先来者对后来者所施加的影响也很大②。

因此，大部分知青所犯下的“普通性质”的违法乱纪行为都是集体性的。我们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偶尔偷偷农民的家禽畜牲或财物就是这种情形。我们也指出过，这类偶尔的犯法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知青的经济困难，同时也是表示对自己命运提出抗议以及对社会行使报复的一种形式。一位被采访者曾告诉我们，有时知青会把刚刚偷来的东西烧掉③。

另一种常见的小规模集体违法行为就是，当他们到公社或县里开会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偷跑出去吃小馆儿，仗着人多，吃完不给钱就走。这个例子也是知青违法乱纪另一面的特点：他们总是避免在自己的村子里作案，而是去没什么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下乡运动令农村地区的违法事件增多了（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不只是因为知青们遇到了生存的难题，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感觉与他们生活的农村地区格格不入，那是因为他们比起其他人

---

① 张抗抗在《塔》里面就讲到怎么特意堵塞一部脱粒机，让它没法运转；见张抗抗，《塔》，前引，10 页。

② 有关青少年模范问题的争论，见 M. Mead, Le Fossé des générations，第 2 章。

③ 与 T. X. 的访谈记录，1984 年 10 月 25 日。

有更多条件可以随意走动，从而游离社会控制制度之外。因此，知青中最普遍的违法活动之一就是干非法买卖，或者说是投机倒把，主要是在城乡之间。我们已经谈过，他们之中很多人把用公价买来的粮食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另外，在每一个地区分配制度都有不完善之处，有些知青就利用这一点，将从一个地方买来的物资，以高价在另一地方出售。比如，在广东最值钱的是建筑木材及打造家具的木料，这在某些地区和大部分城市里就非常紧缺。还有电线在农村地区总是短少不足的。这种非法营生通常还是原始的不定期的，就好像两三个知青不时地把一些鸡鸭或者一大捆木料绑在自行车后架上，然后蹬上车就四出运送，只要避开大路就行了。有时规模可以比较大，好几个知青，一般是和城里的失业人员一起，组织地下运输公司，当然这得要串通一个或几个农村干部才能行事。另外一种有组织的违法活动形式则是属于知青中的流氓帮。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这类群帮似乎主要在落后地区发展，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偷盗活动，而其他的知青自然就成了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有些可恶的男知青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或者为了报复那些揭发过他们的人，毫不犹豫就诉诸暴力。从流传到香港的一些死刑布告中，我们得知一个被送到云南建设兵团去的成都男知青搞了一个知青十人帮。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拦路抢劫或进入宿舍大肆行窃。若有人对他们的行径稍有责备，他们就进行报复决不手软。在同一地区，有一次六个青年被人发现正在偷另一个单位的某个知青的鸡，当天晚上他们就回来把告密者打了一顿还刺了几刀。在这两个事例里，这些流氓帮也都惯于跟就近的缅甸搞走私活动①。别的群帮还会开设地下赌档②。心怀恶意的小子使用暴力并不只是为了吓唬那些无辜者或者

---

① 《明报月刊》1979 年 7 月，51～52 页。这些群帮的头头，一个都没死，都被判了 5～20 年徒刑。一个受访者讲述了另一个案例：两个知青在水坝上偷了大量的电线拿到农村去卖，后来被判 6～10 年徒刑；与 X. C. 访谈记录，1978 年 7 月 3 日。

② 这是叶辛在小说中描写的贵州知青流氓帮的活动之一；见《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4～83 页及第 6 期，156～254 页。叶辛对这个群帮的详尽描写完全符合上述两份死刑布告中提到的细节（见上一个注释）。

也许是揭发他们的人，更多的应该是对在农村所忍受的既单调又令人沮丧的生活来一个纵情发泄。作家阿城跟我们说云南知青帮的主要活动就是互相打架。据他所说，打架并不是由于地头儿的冲突（知青是外来者，也没地头儿），而是出于偏爱暴力。开始的时候，总是因为一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因为一个表错意的眼神，就推推搡搡地打起来，到最后索性搞起决斗，还使用武器火拼，那都是缴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火药人工手枪。这些武器不上枪弹，而是装铁弹或玻璃弹，一般是打不死人的，不过伤人伤得相当厉害，特别是因为他们不敢到医院去寻求医治。他们只好指望同伴的“外科”技术，而那是一位拿剪刀当手术刀使、拿盐当消毒药用的“外科大夫”①。大家都看得出，有组织的违法乱纪都是“男人的事”，但是也有少数的女知青通过卖淫的方式参加了流氓帮的活动。不过这种现象在城里要比在农村普遍得多。

这些城镇青年在农村搞的“普通性质“违法乱纪活动毫无疑问给农村负责干部摆出了一些问题，然而对青年的精神思想上的长远影响是很难估计的。当然，下乡运动中产生了少数很危险的亡命之徒，他们后来还组织成打劫帮在各中国城市活动，甚至到了香港②。不过，从知青总体来讲，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就算在农村干过犯罪活动的知青中也算是少数。就大多数来看，似乎仅仅是一时的违法，没有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为人处世态度。然而，对国家来说文化及政治上的异端言行所起的作用就更重要、更长远、也更严重。

> 不组织他们参加正当的活动，他们免不了搞些无意义的、甚至有害的活动，这就给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青年大开方便之门。③

这是一个负责知青事务的干部在1978年总结经验时说的话。实际

---

① 与阿城的访谈记录，1986年7月3日。阿城讲述了知青之间的武斗，见《棋王》，前引，58～59页。另一位作家老鬼也详细地描写了流氓知青的活动和精神状态，他并不讳言自己以前也是其中一分子；见老鬼，《血色黄昏》。

② 见本书，358～359、369页。

③ 《人民日报》1978年4月10日第2版。

上，早在运动初期另类文化就在知青中出现了，而且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得到发展，这就填补了一个空缺。这个空缺不只是因为缺少文体活动而造成的。它也是知青对规定活动嗤之以鼻的结果，或者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当局的思想文化与知青们的情趣憧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结果。我们谈过政府曾经试图以样板戏来推广农村的文化活动。那要是真有效，知青们就会投身进去。他们也就会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说教节目，阅读报刊、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然后在政治学习会上发言并参加讨论。但这一切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向往的是别的。张抗抗这样写道："想读的书没有，不想读的硬着头皮读，真正浪费时间。"①

很多其他的人甚至都不会强迫自己去做。想消磨时间或者忘记自己的问题，知青中最普遍的办法是，打扑克、抽烟、喝酒，有的时候是谈恋爱。这类所作所为就是混客族那一套，也就是知青"另类文化"最低级的表现。那些陷得很深的被看作是颓废分子。相反，也有人拼命学习。这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并付出极大的努力，在最初几年这种学习却也被看作是异端行为。其实，书本知识已被公开贬得一钱不值了。而想读书的常常不得不偷偷地读，特别是在思想纪律严格的农场，那就更不得了了。有时，干部和农民索性把他们看成是怪人。有一个北京知青就是属于这种情形。他初中就开始学法语，在黑龙江农场一直坚持听法国电台的节目进行自学，在那个地区听得特别清楚。他的决心和毅力最终令他如愿以偿，1975年就把他调去当翻译了②。

知青之间彻夜神侃应该是最普遍的工余活动。虽然这种活动表面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由于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所以就经常成为发表异端思想的特定场所。在那些无眠之夜里，年轻人把他们的见解、感情、抱负都摆出来，通常是几乎无所保留的，除非是有些无人不知的探子在场破坏气氛。有的时候，晚饭吃不饱，那么这些夜间聚会就成了"精神聚餐"。知青们聚在一起回味过去吃过的美食，还津津乐道

---

① 王蒙等，前引，161页。

② 与S. M. W. 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2日。

列出所有的准备细节[1]。集体怀旧的题材不光是精美小菜。还有以前看过的电影、看过的书都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交谈内容。有些同学绘声绘色地把他们记得的娓娓道出，令在场听众如痴如醉。就这样，这些年轻的城里人把已在城市里消失了的说书艺术传统重新发扬光大。知青们不时穿梭在各个村子之间，看望各自的同伴，受到热情的接待。就算吃饭不是非得给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饭后来个段子。农民们偶尔也凑过来听故事，甚至还请“说书人”吃饭。故事有时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武侠小说；不过更多的是取材于世界文学古典名著，在当年这些是被列作反动的、资本主义的禁书。为了安全的理由，或为了填补他们忘记了的那段情节，知青们亲自动手改写素材，结果他们又变成了口头文学的创作者。后来，他们之中，有的真的拿起笔杆子来进行文学创作。作家阿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公认为优秀说书人。他毫不掩饰地承认，当年给他那些西双版纳的知青兄弟们讲故事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这种生活经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地下文学的出现

被禁的或者是有嫌疑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在口头上流传。有些书籍逃过“文化大革命”一劫得以存留，知青们则互相交换，把那些俄英法文学名著、中国古典小说或者近代的像巴金著作的书皮都用不起眼的纸张包好，然后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也许主要是因为这些书谈及时间与空间上遥远的文化，所以年轻人们如获至宝。王小波曾成功地带了几本书下乡，其中有奥维尔的《变形记》。他们队里的人把它

---

① 多位受访者跟我谈到这类“精神聚餐”，文学作品里也有描写；见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第4册，173页；阿城，《棋王》，前引，41页。

② 与阿城交谈，1986年7月3日。在冯骥才的见证文章中还可以找到另一个专攻文学的知青说书人，见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前引，6～22页。至于一个绝妙说书人可以用自己的本事赚得的好处；见戴思杰（Dai Sijie），*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

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成了“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的生产队的人把它借走了，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最后“它是被人看没了的”[1]。这种活动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起码在村子里不会，因为村干部们没有能力分辨好坏。对知青来说，主要问题是到手的可读书籍过少。因此，他们就合伙儿把那些书用人手一字不落地抄下来。当他们回城探亲时，就想法儿搜罗新书带回乡下。假使走后门可以买到，那么他们是不会吝惜钱财的。当时官方倒确实出版过相当多的小说，有一部分还是特别针对知青的[2]，但是这类宣传性的文学在所认定的读者群中没有一点儿市场。

青年人并不止于热衷阅读另类文学，并大加推广，有的还自己创作。许多知青需要抒发己见、需要思想交流，但是这种需要在公开场合下无法得到满足。同伴间相互探讨以及互述奇闻逸事就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但也有人情愿执笔写作。对其中的一部分人，那只不过是深入思维，或自我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他们写日记，然后小心地藏起来，有时写了，可又把它烧了，因为害怕万一落入某个干部或者警察手里，到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不是挨批就是坐牢。可是这些日记又往往是写给亲朋密友看的。知青间通信频繁。日记与书信无形中就成了文学创作练习的平台，有时还在一群朋友中传阅，大伙儿还对写作的形式以及内容逐一指点。同样的，大家也会评论他们之中某些人所完成的纯文学作品，像诗歌、小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一如既往，凡是在政治迫害时期，诗歌总是流传最广的文学形式。它一般比散文短小精干，因而便于藏匿，也易于秘密散发流传。它诉诸于一种含蓄的表达，字里行间含义万千。尽管这样，相当一部分知青仍然因写了被定性为反动的诗歌而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有的甚至被判了重刑。其实，个人文件、特别是个人日记或诗歌被没收，还被干部们撕成一片片，亲眼看到这些恶行的不仅有因散发文学作品而被捕的，

---

① 李银河、郑宏霞，《王小波画传》，22 页。这些书对知青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后来就成了戴思杰小说的主要题材，见戴思杰，前引。

② 有一些专集，像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上山下乡青年读物》。

还有所有被怀疑有落后思想的人以及因这种或那种原因在公安局挂了号的那些人[1]。不过农村被抓的风险没有在城里那么大，城里的思想控制就像一张织得密密麻麻的大网。相反，在农村干部们既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能力去监管知青看了什么，写了什么。危险只能来自县级政府的介入，那总是因为有人去揭发了或是为了某个理由。所以地下文学在知识青年中特别得以发展。知青小组间守望相助，他们又和其他村子、其他地区或留城的同学们保持紧密联系，这些都使他们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文学创作及推广网。这些年轻人通常并没有特定的意图，也没持什么感情去搞地下文学。他们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很清楚，只有非常谨慎小心才能不惹祸而完成心愿。因此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搞出了地下文学[2]。

以上所述是导致知青地下文学活动发展的外在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内在因素的存在，那就是知青中很多人对文学感兴趣，而且有创作意愿。一方面，这是主要的，他们亲身经历过那种既艰苦而又与众不同的生活，因此渴望以这群人的身份站出来说话，来作证[3]；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从事一种能激发人心的脑力活动，来填补他们充满烦恼的生活所产生的精神空虚。就像孔捷生，他自述本是个扑克迷，后来定下来，才在文学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头脑[4]。当然，有些知青想法出版发表自己的作品。但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得向宣传部门作出很大的让步，这就使多数知青气馁万分，他们宁肯用维持本来面貌的方法来自我表达，哪怕只对着有限的一小众，心里也愿意。而那一小众都是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反正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和作者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及憧

---

① 肖复兴，《在北大荒和在北京》（代跋），《北大荒奇遇》，342 页。从一个布告，我们得知 1971 年在西双版纳的一个上海知青被判了 10 年徒刑，因多项“反革命”罪行：写作“反动”诗歌、绘制“反动”画；见《明报月刊》1979 年 7 月，50 页。

② 与吴旷的交谈记录，1978 年 7 月 16 日。吴是本书，333 页，注②提到的文集的编辑者、序言撰写者，也是某些诗文的作者。

③ 稍后会谈到，见本书，410～411 页。

④ 孔捷生，《我的回答》，《中国青年报》1980 年 11 月 11 日第 4 版。

憬，而且往往发现他们也在写作。在这个非正式的小圈子里让别人认同你的才华是相当愉快的一件事，而且感受到个人价值之被肯定。这些边缘小群体里弥漫着艺术竞争气氛，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地下酝酿，为从1978年起因政治环境变动而出现的新文学作准备。最好的例子就是诗歌小组，他们是北京之春时期出现的非官方文学刊物“今天”的核心。芒克是1969年被送去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北京青年。他和同一地区的其他知青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组织了一群朋友相互交换诗歌。1971或1972年，经一位朋友转介，他的一首诗到了北岛的手上。而北岛业已经开始从事诗歌写作，不过是在北京，1969年他有幸留下在那儿当工人。这两位年轻人就此联系上了，互相欣赏各自的才华，最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北岛还特意到白洋淀的知青点待了几天。到了1978年，形势比较缓和些，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文学杂志来发表他们自己与朋友们的作品。首期出版后，全国跟他们同样遭遇的年轻作家都纷纷与他们联系，并把稿件寄过来①。其中一部分诗篇曾经长年累月非法地在一些极有限的年轻人圈子里秘密流传，如今可以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了。1979年以后有些甚至还被转载刊登在公开出版的刊物或选集里。也有一部分在1974年后由逃跑成功的广东知青在香港出版②。

我们不能在这里对这类诗作进行分析③。我们只想扼要地指出，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它们不仅与当时出版的、甚至与1949年以来出版的都截然不同。这些青年诗人处于社会边缘，他们没有可能也不希求让官方文坛接受他们，因而他们就有了充分的自由去钻研和革新，结果则是别出一格的独树一帜，开创了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中国诗歌

---

① 1986年6月25日与芒克，以及1986年6月26日与北岛的访谈纪录。在廖亦武主编的书（《沉沦的圣殿》）中可以找到有关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的相当全面的资料。

② 吴盱等，《敢有歌吟动地哀》。

③ 这是长期以来禁忌的题材。杨炼在他的著作中对1960～1970年间的地下文学作了历史性的文学分析；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及《中国知青文学史》。

历史的新纪元①。

同一时期，某些知青也开始写非正统的中短篇或长篇小说。如果不小心，这种活动更危险，因此城里很少人会去做②。就算在农村，知青们也是冒着险干的，总是害怕被人揭发。王小波是在夜里，就着月光写作的③。《生活的路》④ 是第一本公开发表的比较现实的反映下乡运动的小说。作者竹林在安徽插队的时候，写下了第一稿，可是她亲手把它烧了，后来才又重新写过⑤。而别的知青就不但写小说，还向他们的朋友朗读自己的作品。聆听者则把这些小说广为散发，有时是亲手抄写，有时甚至复制几十或几百份。有些作品已名噪全国，但作者却湮没无闻。他们深知一旦暴露，这类刑事罪的判决很厉害，因此心甘情愿隐名埋姓。最有名的地下小说《第二次握手》是由“文化大革命”前下乡插队知青张扬写的。这本书一直名叫《归来》，但并不是关于知青的，而且居然胆大包天地叙述一个爱情故事，给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特别是像女主人公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远赴重洋学习深造。故事还牵涉到周恩来，作者为他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就把姚文元气得火冒三丈，下令要立案追查。结果张扬在1975 年初被捕判刑。“四人帮”垮台了，他才幸免于死。后来，好几个记者不遗余力上下呼吁为这一冤案平反。他等到 1979 年才得以出

---

① 关于这首新诗，见 B. MacDougall 有关北岛的文章，尤其是 Bei Dao's Poetry：Revelation and Communication，*Modern Chinese Litterature*，1（2），1985 年春，225～249 页；另外还有 D. Goodman，*Beijing Street Voices*，*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W. Zafanolli，Le nouveau cours littéraire：Portrait d'une génération individualiste，载于 *La société chinoise après Mao*，155～228 页。

② 作家冯骥才回忆在那个时期写下了大量作品，但“读者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后来他把写成的作品都烧掉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让人放心地方来收藏。见《九十年代》1987 年 2 月，94～95 页。

③ 《王小波画传》，24 页。

④ 竹林，《生活的路》，《生活的路》。

⑤ 竹林，《我的起步》，《十月》1982 年第 3 期，246～247 页。

狱。他的小说手抄本历经磨难辗转全国，终于出版了[1]。后来写作《枫》[2] 的作家郑义在山西插队时，则是运用惯常的计谋来传布他的第一本地下短篇小说：他把两位在北大荒插队的知青的悲惨故事移植到西伯利亚，还在小说开头加上一个“译者按”，说明译自一本苏联杂志，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苏联作家[3]。到 1979 年客观形势许可之下，他才把故事改回原发地点，并在一本官方杂志上发表[4]。

当时传阅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及政治意义。它们通常是以“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武斗及后来的上山下乡作为题材。不过更多的是爱情小说和色情短篇[5]。有的时候，同一部作品使用不同的名字，传阅中又出现内容相似的几种版本。这足以证明流传有多广、且多么受欢迎。张扬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佼佼者。某些青年甚至不满足于抄写别人的著作，还试着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完善它或者重新安排情节。一部作品流传得愈广，被改写的机会就愈大（也许改得更好，也许是相反）。根本没有可能去判断这些地下小说流传的范围有多广。基本上只牵涉到城里的年轻人，主要是插队知青，而不是留城青年。接受我们访问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曾经读过至少一本，而所有人都听说过这些地下文学。即使流传范围不那么广，这种独立文学创作意图的存在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否则就无法解释 1978 ~ 1979 年间突然出现的小说出版热潮。那个时期无论在地下刊物或是在正式出版社发表的大量作品，其实都是几年前写就的，起码是起草的，而且通常是在农村完成的。

---

① 刘小萌，前引，624 ~ 629、697 ~ 699 页。

② 这篇揭露“文化大革命”时荒谬透顶的暴力行为及对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的短篇小说，1979 年 2 月 11 日在《文汇报》一登出来就引起了震动，后来更在 1979 年 8 月的《连环画报》登载了连环画版本。

③ 郑义，《向往自由》，478 页。

④ 郑义，《凝结的微笑》（前引），1 ~ 11 页。

⑤ 《明报》1980 年 1 月 8 日第 12 版；丁望乙，《中国大陆的地下文学》，载于《黄河》第 3 期第 18 ~ 20 页、第 4 期第 29 ~ 31 页以及第 5 期第 18 ~ 24 页。这篇文章给 5 篇长短篇地下小说作了一个概括介绍，而且引述了一些诗歌、信件和日记的片断。

怀旧之歌成犯罪佐证

知青犯罪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已经见过绘画也可以是“反动的”活动，遭致牢狱之灾[1]。有些知青是演玩乐器的。他们之中有的就弹奏西方古典音乐的曲调，这可是正式批判的对象。我们没听说那些音乐爱好者们因此惹上麻烦。一般来说，知青中最普遍的文娱活动是唱歌，不时带有招致批判入罪的另类因素。他们经常单独或者集体咏唱“文化大革命”前的歌曲，几乎都是爱情歌曲，也有革命歌曲，不管是哪种都是禁止的。有些甚至还唱战前大歌星周璇的爱情歌曲，那都是被视作“黄色”歌曲的。在广东，就有很多学唱从外国电台听来的民歌。收听外电是犯法的，很可能被公开批判，然后在个人档案上记上一笔，连累终生。但是在广东和云南，很普遍，人们照听不误，地方干部也懒得理睬。一些懂音乐的广东知青把在港澳电台里听来的歌曲纪录下来，然后跟同伴们大唱特唱，有时还用吉他伴奏。这就变成了那些“资产阶级颓废思想产物”的重要传播手段。

知青们唱的中国老歌或者是外国歌曲大多是谈情说爱的。它们固然带来音乐的美感，而且更能让人抒发被官方文化强制压抑的内心情感。不过，青年们也利用歌曲表达本身命运激励出的复杂感情。他们借用已有的歌曲，像一些怀念祖国的苏联民歌[2]，或者像《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怀念家乡歌曲[3]。轻声哼唱这些歌曲，而不是《垦荒战士之歌》，这就已经是一种抵制形式及一种表达方式[4]。到了1978年下半年，和1979年一整年，所有知青的嘴里都在唱来自印度同名电影的《流浪者之歌》。这部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一时的电影在1978年夏天居然重新放映。这首歌的中文译词有点儿凄切委婉，当时在大街小巷哼唱的以及又再出现的小摊贩所售卖的

---

① 见本书，332页，注释①。

②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5页；徐乃建，《杨柏的“污染”》，《盼，短篇小说集》，84页。

③ 见舒婷的文章，载于王蒙等，前引，283页。

④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前引。

是20世纪50年代版本：

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活在世界举目无亲和任何人都没来往……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你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1]

知青们也自己创作歌曲。大伙儿一块儿唱，晚间唱、田间也唱、坐在牛车上唱，坐在摆渡上也唱；唱，可以让他们发泄内心的感情；唱，可以让他们忘记劳动时或下工后的疲累。这些歌曲构成了知青们集体表达的最重要形式。唱歌比起诗歌或小说来有个优点，那就是更加委婉含蓄。不需要用笔写，学了就很容易背下来，这便使那些老想告他们的人找不到把柄。尤其是在很多情形下，都是些改写的歌曲。知青们聪明地把全新的歌词配上熟悉的曲调，特别是家喻户晓的毛泽东语录歌。这些语录歌，加上革命样板戏的唱段，是当年官方音乐艺术创作之大成。好了，现在知青可以纵情地发泄他们最“反动”的感情，却让农民和干部们以为他们在歌唱革命热情。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们并不能避开政治警察的盘根究底。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就像《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所遭遇的那样。这首歌又名《南京之歌》或《知青之歌》，是最成功的一首，是南京知青任毅在1969年5月谱写的，当时他插队落户到江苏刚刚五个月[2]。该首歌曲以惊人的速度即刻在全国流传开。8月，一位收听“敌台”的朋友告诉任毅，他的歌配上了乐队伴奏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频道播出。在那个中苏关系紧张的时期，这可赋予了这首歌原本没有的政治色彩。其实，歌中既无公开批评亦无造反意味，只有作者对南京、对母亲、对学生时代的思念，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一丝不安。这不过反映了几乎所有知青在下乡几个月后开始泛滥的思乡情绪。然而这也恰恰是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虽然任毅从没有夸耀自己的创作，还把所有的文字记录都烧毁掉，但

---

① T. D. Gold, Back to the City :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 1980年12月, 756~757页；《明报》1979年11月1日第8版。本人自己在1979年也发现这首歌非常得人喜爱，还有人把歌谱照下来，以两张小相片的形式销售，本人在北京街道上买了一套。

② 见任毅，《生死悲歌》。

1970年2月19日深夜他还是被逮捕了。在审讯中，审讯人员向他抛出许多个《知青之歌》的不同版本，有的内容都篡改了。在传唱的过程中，有些知青对原作进行了略微的改动，从而使得歌词带有了明显的政治批判意识。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其中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逼任毅承认当初写的是“深陷”。他坚决不承认，整夜整夜地向他们保证确实写的是“深浅”，而不是另一个词。这一字之差可关系到他的生命啊！他被南京公检法机关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还对他开了几十场批斗会。执掌终审权的江苏省法院最后给他改判为10年徒刑，“仅仅”10年。他差不多服满了整个刑期。过了9年，到了1979年，他才得到平反，离开劳改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因这首歌而遭殃的。在军垦农场，只要是唱过的知青也同样大难临头。一个当年的积极分子回忆他在黑龙江农场，怎么绞尽脑汁为控诉这首歌的群众大会写揭发材料。他真的看不出有什么罪行。然而，对他的上级来说，把知青真正的感情抒发出来本身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是一种“破坏春播”的恶劣行为，因为当有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女知青的宿舍里传出了哭泣声①。

其他的歌曲或歌词片断也没有被人遗忘②。只有《知青之歌》是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给人印象顶深的是，尽管距离遥远，相隔十万八千里，但创作的歌曲却惊人的相似，有时甚至是用不同的方言写的③。歌词内容雷同，那是由于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但连使用的词语也都不差上下，真是异曲同“心”啊！可见知青地下文化是涵盖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④。

---

① 《北大荒风云录》，118～120页。

② 这些歌曲中有几首曾经在香港的两份昙花一现的杂志上登载过，那是游泳偷渡出来的老知青办的刊物（见《黄河》2、3及4；《北斗》1、2、3、5及6）。梁晓声把其中一首写进了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收入《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第1册，251～252页。本人自己也从记得谱子的两位受访者那儿收集了几首。

③ 本人收集的歌曲中有4首是用广东话唱的。

④ 例如，“修理地球”这一专属知青的隐语，无论是在黑龙江知青唱的歌中，还是广东知青创作的歌曲中，都可以听得到。

这些歌曲所咏唱的内容主要是对出生成长的城市、对父母、对女朋友的思念，自然也有对当时生活环境的不满，及对前途的忧虑；他们感叹自身的命运。梁晓声在他的小说[1]里引述的一首歌就活生生地表达了这些情绪：

昏暗的油灯下
我们想念着爸和妈，
迎着太阳出，
顶着月儿归，
劳累得像牛马，
谁来可怜我们这些城市娃？
爸爸和妈妈呀，
后悔当初不听你们的阻留，
到如今只有沉重的修理地球，
命运像苦酒，没有欢乐只有愁，
何日是个头？
何日是个头？

这首黑龙江知青所唱的歌与另外一首用粤语唱出的何其相似：

自怨条命曳，
今生今世去捞泥，
出勤无工分，
预住个锄头去修理地球，
辛辛苦苦去搵食，
今生今世无希望，
叫我点去做人，
唉！难渡过呢一世！[2]

（怨自己命苦，一辈子担泥锄地，出工没工分，背着锄头去修理

---

① 见上页注释②。

② 个人收集。除了在别处见到的题材，大多数广东知青的歌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那就是日夜萦绕他们脑海的：逃到香港（见本书，368 页）。

地球，辛辛苦苦去挣钱，这一辈子再没希望，叫我怎么去做人，唉，怎么度过这一生呀。）

《知青之歌》的歌词比起这两首没有那么明显地不满意下乡运动，它主要是抒发思乡情绪。根据该首歌曲的副歌部分，任毅一开始就把它命名为《我的家乡》。但是，在当时对过去的怀念本身就是“反动”的，因为那带出了对前途明显的不安情绪，就像下面两句歌词所表达的：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知青们的反叛也可以表现在其他没那么感伤的形式上，那就是对文化，尤其是对政府的政治文化采取一种嘲讽的态度。就是这样，广东知青把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歌词改换成“睇佢两只眼睛，秋水盈盈好似会讲话。腮边一对酒涡向君浅笑，露出副小白牙，哎！”[①]（睇：看；佢：她）他们在此所得到的乐趣不仅是展示出一幅“情欲”的画面，而且是敢于亵渎圣物的满足感。有一本结尾异常悲惨的中篇小说，描述一群知青为了打发时间、摆脱压抑、忘却困境，把那些带有嘲讽意味的或者是荒唐透顶的另类歌曲辑录成册，令人赞叹不已[②]。他们在言谈中嘲讽严肃的正统政治，尤其是针对政治口号及人物来开玩笑。有些广东知青就是把织毛衣叫做“路线斗争”[③]，另一些就用偷听学来的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开播曲调，加上如下歌词：“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偷渡去香港？”[④] 一个被采访者说他们还玩游戏，输了的得倒掉一个尿盆儿同时大叫“毛主席万岁”。这些学生开的玩

---

① 这首歌在广东是很大众化的。受访者差不多都会唱。

② 乔瑜，《孽障们的歌》，《当代》1986 年第 6 期，4～50 页。

③ “路线”和“线”都是“线”。

④ 陈伯达原是“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1967 年起开始受到左派们的攻击，1969 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我们”那场话剧里有另一种这类的嬉笑怒骂：一个刚刚偷了只鸡的知青模仿林彪的高八度的腔调，在同学面前大喊：“红卫兵小将们！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见王培公，《WM 我们》，《九十年代》1985 年第 12 期，83 页。

笑搞不好就会惹上杀身之祸。在那个时期，不少人遭到严重的迫害，并不因为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社会控制体制表现无能为力去阻止知青中的这种政治异端行为，至少在农村是作不到的。

政治异端行为

冷嘲热讽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唯一表现形式。一部分很活跃的老红卫兵是带有明确的目的到农村去的，他们意图在同伴之间继续政治大辩论，如果可能，就继续进行某种独立自主的活动。当时的政治形势没能让他们行动起来，但是小组辩论依然进行。下乡发现农村的落后贫困，“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个人崇拜及恐怖气氛，跟着就是林彪外逃堕机身亡，所有这些都令人产生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铺天盖地的虚假宣传其实是在年轻人的思想中造成一片空白，他们极度彷徨，因此其中一些，通常是那些当年最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那一群，就企图冲出樊笼寻找新的思想依据。虽然大多数知青早已厌倦了政治，但仍然有少数在继续思考，尽力寻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互相交换阅读，然后讨论交换意见。有几位还提笔写下政治理论评论，传给朋友们看。这些随意形成的思考小组有时胆子非常大，居然抵制某些政治活动。我们访问过一位 1967 年去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所属的 21 知青组就拒绝在他们之中进行林彪当时强加的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仪式。政治上的异端行为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某些情形下，知青们相当团结，以至使告密组织系统不能得逞，不过在最初几年，基本上还是这个系统占上风。我们的朋友就是这样在 1970 年被捕的，原因是，他们小组里一位小弟弟写信给他姐姐时，不小心提到小组讨论时对林彪的反面意见。他姐姐收到信，非常害怕，把信交给了农场领导，并要求他们揭发毒害她弟弟思想的坏分子。我们的朋友就决定挺身而出，为罪行承担一切责任，这可让领导们高兴了，因为他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1]。

---

① 见本书，261～262 页。

就像那些歌曲和文学作品一样，有些政治新闻或者文章也在知青之间传来传去。在边疆地区，收听外电可以得知官方封锁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在官方还没内部传达之前，知青们就已经获悉了林彪堕机摔死的消息。政治新闻传播网络遍布全国。我们认识的一位知青在中国北方内蒙极偏远的地方插队，他居然可以读到李一哲 1974 年在最南边的广州贴出的著名大字报。文章是由他们队里的一位知青从北京带回去的①。事实上，这种地下政治活动最终发展成公开的政治表达形式，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点②。

上面所介绍的思想、精神、文化，以至政治方面的各类异端行为表现，说明了存在着一种知青另类文化。在中共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人数比较多的社会群体标新立异，创造出一种与正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一群体抱有特殊理由摒弃充满虚伪及谎言的官方主导思想，他们在精神上与物质上被遗弃，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他们被迫离乡背井、远离家庭。这一群被边缘化了的青年，虽然人数众多，需要创造自己的文化才能继续生存下去③。为控制国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以及镇压一切异端活动，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因此知青们不可以公开宣扬他们的文化，更不用说把它发展成一种反文化，提出为建立与现今主流模式相对立的社会的总规划，并有能力向其下战书。然而，有没有独立的而且是真正的思考及表达空间，在独裁制度下，是事关重大的。相对来说，这种空间在农村要比在社会控制严密的城市大一些，因而形成一个地下萌动基地，从该处涌现出崭新的思想、价值观和作品，最终能公之于众，在创造新文化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

① 与 M. J. L. 的访谈记录，1986 年 6 月 30 日。关于这张大字报，见本书，374 页。

② 见本书，371 ~ 379 页。

③ 也可以叫它边缘文化或者副文化，本人宁取“另类”来给这种文化定位，为的是强调它与官方文化发展在不同层次，而且两者互不相通。

各自逃命及其后果

过了一些时候，返城就成了“知青梦”[1] 和“知青聚会的话题，尽管无拘无束，海阔天空，但轴心总离不开上调”[2]。但是他们根本不能公开说，也决不能提出回城要求，否则会引起更多的麻烦。因此离开农村的共同愿望没有导致出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动，而是引发出了一种逃命式的行为表现。直至 1978 年，知青们能做的就是中国老话所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们诉诸于种种消极办法来表达对下乡运动的抗拒。要么使用多种战略，旨在重新合法地获取城市户口，要么索性非法逃到城里或者逃往国外。

为取得合法返城的战略

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及牺牲，为的就是要取得那一片纸：户口准迁证。

花招百出，诡计多端

当局对知青返城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我们前面谈过，最理想的回城方法是被选送上大学，要不就是被一个城市事业单位招募雇用。那些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机会的就只好施点儿小诡计，以告病退为名从而取得返城资格。这些生造出来的或夸大了的可以让人告别农村的疾病被称作“救人的疾病”[3]。有些人既无关系又无必需的能力拿到证明，他们有时会走极端，故意弄残一只手或者甚至吞下一颗螺丝钉，这样在 X 光照肺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阴影[4]。事实上，一部分知青看到离开农村完全无望，因而变得疯疯癫癫。“调动就是他的生命，

---

①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 年第 5 期，4～83 页，第 6 期，237 页。

② 徐乃建，《杨柏的污染》，前引，82 页。

③ 张抗抗，《在丘陵，在湖畔》，《张抗抗中篇小说集》，421 页。

④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小说家》1986 年第 6 期，12 页。一位伤残知青不无感叹地回忆，他的同学中不少都羡慕他可以有“最好的借口”回城；见钱怡，前引，149 页。

他的信仰，他的上帝”①。要求回城的执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让人精神错乱。在浙江某乡，一位上海女知青本来已被大学录取，后来她的位子却被别人抢走了，她因此变疯了②。不少研究显示出在当时通常是以神经或精神疾病来抵制某些政策，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③。这些疾病的症状本身就是一种抗议，不过不太有效，结果抗议者就成为首名受害者。比如，一位女学生开始时提出自己失眠、头疼和头晕，所以绝对不能下乡。尽管干部们有所怀疑，她还是留在城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那并不是假装的无意识反映是有效的。但12年后，这位女病人仍然忍受着病痛。自杀也是消极抵制的一种形式④。在当年，自杀是被看作犯罪的，因此“不想活的人甚至无权去死”⑤，除非想死后当“现行反革命”，连累全家人⑥。

只有很少数的知青由于表达了他们回城愿望而丧失了理智或生命。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倒是真的失去了中学时代的“天真精神”。其实，对大多数知青来说，唯一的出走办法是走后门。出身高干家庭的就尽量利用父母的关系网。其他的，为了得到干部们的恩惠，就只得采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法：阿谀奉承，收买贿赂，提供各种服务，甚至性

---

① 徐明旭，《调动》，前引，213页。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上海大学毕业生，1970年被派往“三线”，去到贵州省的一个偏远小镇。虽然从严格意义来说他不能算是知青，但他为争取返城所经受的悲喜交集的考验及经历与知青们的非常相似。

② 采访H. Z. W.，1984年6月17日。其他的被逼疯的例子，可见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77~84页。文学作品，可见白桦，《听橹居盛衰记》，前引，87页；虞雪，《广阔天地》，《北斗》第2期，出版日期不詳，19~27页。

③ A. Kleinman & J. Kleinman, Rememb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Alienating Pains and the Pain of Alienation/Transformation,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141~155页。在作者列出的7个案例中有4个跟下乡运动有关。

④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81~84页。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知青自杀的例子；譬如娟娟（见竹林，《生活的路》），艳茹（见叶辛，《风凛冽》）以及秋霞（甘铁生，《聚会》）。

⑤ 采访H. C.，1978年7月12日。

⑥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81~82页。

交易[1]。为了达到目的，有些真的准备豁出去了。在一片失望中，他们的道德线快速向下降，直至堕落地步[2]。更多的知青是不接受超过自己划定的底线。不过，大多数都不得已做过一些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让人丢脸的事情。当然，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我就是为了办回（杭州）来，而平生第一次去送礼的，送过了就会了。"[3] 在他们的回城战略中，广泛采用送礼的方法，以至于创作出一批讽刺贪污的俚语，他们借用打游击的术语，把送给干部医生们的烟酒等礼品比喻作用来轰炸某个敌人"山头"的"武器弹药"、"手榴弹"或者"炸药包"。可见此种送礼在知青生活中是如何普遍，而且是不可或缺的[4]。

对很多知青来说，撒谎骗人、贿赂收买都是见不得人的、很难作得出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需要，他们也就不再犹豫采取这些办法了，因为下乡运动的经验告诉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尊重维护道德伦理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下不了地狱，也就上不了天堂。"一本小说的主人公就曾这样说过[5]。在和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瞎话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知青跟官僚干部们之间的游戏规则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肖复兴在他的一本报告文学里就生动地描述了这场没完没了的"猫捉老鼠"游戏[6]。知

---

① 另一个办法是假扮高干子女，这样就能回城，随便做些虚假的应允就能得到一些好处。这就是沙叶新笔下的知青采用的手法，见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第2册，272～301页。这出戏在1979年还没有禁演以前取得极大成功，尤其受到知青的欢迎。而这个戏剧作品所根据的真实故事1979年9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可见这种事例绝不是个别的。不过想用这个办法而得到成功，一定得具有特殊的本事，才能招摇撞骗而脸不红心不跳。

② 陈冲（Joan Chen）1998年出品的电影 *Xiuxiu, the sent-down girl*（《天浴》）就展现了一个成都女知青悲惨遭遇，极度失望之中走上自杀之路。

③ 张抗抗，《塔》，前引，37页。

④ 见徐明旭，《调动》，前引，182～219页；许子东，《可怜的人》，《百花洲》1981年第2期，46页；王培公，《WM我们》，前引，85页。

⑤ 徐乃建，《杨柏的污染》，前引，81页。

⑥ 肖复兴，《啊，老三届》，156～165页。

青们每出一招儿，就引出一条新法例来对付他们，而他们又再想法儿钻这些法例条文的空子。一位下放到内蒙农村的北京知青，由于在京城没有住房，而错过了回城大潮的良好时机。后来他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了，他则深感懊悔。起码是为了不耽误这个孩子，他准备搞假离婚，然后搞假结婚，对象是个从来没存在过的鬼影。有一阵子，他甚至想学学别的知青，索性“死过去”算了，当然那只是在证明纸张上……不用说，只有给了地方干部某些好处，这一切才有可能，可又在申请全家合法返城的每一关上遇到新难题。结果，这位知青到了40岁了，还没得到批准。肖复兴如实地反映了当年连篇长篇累牍的谎言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非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后来在这一代人中泛滥成灾，下乡运动是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运动最初几年，当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变成了离开农村的理想方法。所以知青们产生了对政治的普遍怀疑以及政治犬儒主义。

知识青年们目的为返城的一切所作所为也改变了他们之中许多人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利他主义，然而这种情操并没有能在他们所处的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坚持到底。眼看那些最投机的两面派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其他人不禁自忖：学习他们才是唯一的出路。当得到某些有关离乡办法的消息时，他们据为已有，守口如瓶，将秘密当作奇货可居搞贿赂，不仅如此，有的还采取诽谤告密的手段进行讹诈，或者感情的要挟，甚至到了想销毁竞争者的肉体的地步。一位北京知青被他曾爱过的女知青耍了，因为这位姑娘暗中诬告了他。后来他就成了弱肉强食世界的斗士，利用所能取得的任何方法，包括敲诈勒索和身体暴力的手段，为的是重新夺回本应属于他的上大学的名额[1]。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

---

① 见张辛欣和桑叶收集的见证，《第三次浪潮》，《北京人》，151～158页。

(Darwin) 和于连 (Julien Sorel)[1]把相当一部分知青中作为思想准则及行为模范的孔子、毛泽东与雷锋替换下来。这些年轻人在这些外国模范人物身上所寻找的，首先是证实他们决心要做的事情正确无误：抛弃一切道德原则从而得以应付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里继续生存。然而那也是一种世界观，能够体现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20 世纪 80 年代中，几位描述那种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象的作家备受指责。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反映了知青普遍的思想蜕变，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列宁特别重视的教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是斯派沙 (Spencer) 和撒莫 (Summer) 的教本[2]。

实际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从他们本身的生活经验里得出了结论，"假使你不去进行个人奋斗，你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到死为止"[3]，另外，想在一个绝无道德可言的社会活下去，就必须得去适应它。就像在最恶劣环境中生活的孟加拉老虎，他们变成最强有力的，也是最凶暴残忍的[4]。他们曾经特别接受毛泽东的教导，必须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个人牺牲；然而他们却发现必须在社会上为自己进行战斗，这种必须性也可以看作是振奋人心的乐趣。

虽然这些知青在搞诡计上非常积极，但他们同时也是宿命论者。

---

① Machiavel (马基雅弗利) 就像 Darwin (达尔文) 都在徐明旭的《调动》(前引，182～219 页) 里提及过。有关 Darwin (达尔文) 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文章的介绍则出现在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前引，74～85 页)，在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收获》1981 年第 6 期，172～233 页) 及在平明的《碟仙》(前引，50～52 页)。法国作家斯汤达著名小说《红与黑》主人公 Julien Sorel (于连) 的名字则出现在竹林的《生活的路》(前引)，在《调动》以及在冯骥才的《当代于连》(前引，6～8 页)。上列的书单当然遗漏了许多。

② 20 世纪初严复翻译了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介绍给中国人；见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亦见 V.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严复的译作当时一定在地下传阅之中，不过数量极少 (徐乃建曾提到一位女知青阅读 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见《杨柏的"污染"》，前引，81 页)。至于法国小说《红与黑》，那是相当流行也很受欢迎的。于连之所以成为典范，是因为他在迈向成功的路途上遇到巨大的艰难困苦，知青们看了之后对相似的遭遇有着无限感慨。

③ 采访 H. Z. W.，1984 年 6 月 13 日。

④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收获》1981 年 6 月，228 页，等。

这一代人本来对迷信活动从来是一无所知或者是极力反对的，但却不影响这类活动的大回潮[1]。这样一种掺和简直令人惊奇，特别是当我们想到迪尔凯姆（Durkheim）提出行为失范与宿命论根本是对立的[2]。但是我们倒认为相当容易解释。实际上，周遭环境对知青来说就是失范的。因为完全不存在有关他们回城的“既明确又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条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能回城的人数却是有限的。除了高干子女，他们所取得的办法并不保证有效[3]。虽然他们不遗余力地去争取，但是依然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感受到命运的压力，而为了减轻对前途的忧虑，他们就去算命。在知青嘴里经常听到“命运”这个词，在知青文学中也经常看到。他们之中很多都觉得违背意愿地留在农村这一事实正是一种“厄运”。而他们尽力搞回城或越境外逃则是试图“转运”，不过只有命运本身才知道是否以及何时能成功。因此，相当多的知青都算命。有时他们去找那些在城里经已消失而在农村还大量存在的算命先生。不过，最常见的是他们互相你给我算，我给你算。有的看面相或者掌纹[4]。有的则在夜间举行招魂聚会。有一种叫“碟仙”。可以向她提问题，她就通过反扣在一张写满字的纸片上的小碟来回答。这得在一个黑屋子里进行，各个参与者把一手指放在碟背上。其他的神仙就用画了符的签在一张铺满了白色粉末的桌子上作答。

---

① 迷信属于红卫兵要大破的“四旧”。

② E. Durkheim, *Le Suicide*, 264～311 页，尤见 311 页，注释 1。R. Boudon & F. Bourricaud 对反命题作如下的简述：“当个人的行动再也不能循着清晰的受约束的标准去控制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他们会大胆地给自己定下超出能力的目标、沉迷于追求实现最高的情感愿望、听任妄想。当标准极度限制了个人在选择目的与手段上的自主权的时候，就会有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Sociologie*, p. 21）。混乱与宿命论思想同时存在并不一定是例外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那就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把握的。对出身很不好的知青来说，阶级成分就决定了无可改变的命运。因此他们的态度一般都是听天由命的，因为他们只能希望有个假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变动，实际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在边境地区越境到外国去，那可能是一条出路。

③ 见本书，303～308 页。

④ 见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前引，160 页。一位第一次偷渡香港就被捕的老知青对我说，关在拘留所的时候，知青们就互相相面，看看谁最有运气逃出火坑；访问 X. C.，1978 年 7 月 3 日。

他们也会使用不同的传统手法[1]。有些知青还发明了他们自己的预测方法，比如说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里去发现将会来到的成功或失败的兆头[2]。有些更试图对命运施加影响，他们佩戴吉祥物或者拜佛[3]，甚至求到耶稣上帝，希翼得到帮助[4]。

就是这样，这些青年人当初来到农村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反迷信活动，到了最后却成了求神拜佛最虔诚的一群。某些知青虽然自觉到如此行为可笑至至[5]，但又需要这种获得精神支持的方式。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一些人，尤其是当一切如愿，或者命运真的如预示所言的时候，他们对所拜的神佛的存在就深信不疑了[6]。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些种类繁多的迷信活动是有增无减。

为获得回城的权利而不得不采取的各种手段伎俩不仅影响了知青们的精神面貌，而且使整个社会意志消沉。似乎就是在那个时期受贿在农村干部中成了很平常的现象。下乡运动自然不是这类趋势的唯一原因，不过对干部来说，那可是最好的受贿机会之一。一位云南知青发现自己的名字在第一批招工返城的名单中消失之时，他赶紧采取措施补救自己的过失：向生产队长的老婆送去几尺丝绒布，与此同时还让全村人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为的是给那个队长施加点儿压力。村里人会认为，既然这个小伙子“付出”了，那么假如他得不到他想要

---

① 在《观察家》1980年1月号第40~41页上，有一篇报道，叙述知青之间的一个通灵之夜。平明在《碟仙》（前引）里也描述了这样的一次活动。作者插队中山县时曾参加过一次类似的神奇之夜，亲身的体验促使他写下了这个短篇（与平明的访谈，1978年7月30日）。其他的占卜方法，可见M. Whyte & W. Parish，前引，322~323页。

② 见徐明旭，前引，200页。在斯汤达的《红与黑》中可以找到这种类型的迷信行为。当时于连想象自己是根蜡烛，结果那根真的教堂大蜡烛被会长吹灭了，这就预示了他不久之后的死亡。

③ 见遇罗锦，前引，142页。

④ 《明报》1979年5月5日第8版及1980年9月27日第18版。

⑤ 访问X. C.，1978年7月3日。见徐明旭，前引，200页。

⑥ 这就是《碟仙》（前引）的作者平明的情况；与平明的访谈记录，1978年7月30日。

的，那就是“不正常”的[1]。要求回城的越来越多，特别是1975年以后，这只能给干部们增加更多的受贿机会。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的，下乡运动同样也给城里的医生和各级干部提供了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而那些知青的父母们，一心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弄回城里，许多都不得不作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给干部送礼[2]。有一些想到要“走后门”就犹豫了，但接受了子女们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之后，看到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他们最终不再坚持而随大流了：“开始的时候，我父母是反对走后门的。他们不喜欢这种行事作风。他们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前，这种做法并不普遍。……最终他们意识到，不走后门，就什么都没有。”[3]

就这样，由农村干部组成的、目的为慰问城市家长的“慰问团”开始收礼收到手软，三天两头的宴会吃到肚皮饱胀，满口应允“一有机会”就安排他们的孩子返城[4]。换句话说，是那些由城市干部陪同的家长到当地去“安抚”他们的孩子，这些父母当然不会两手空空而去的。

至于父母本身就是干部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前面所谈过的，他们则几乎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自己的下一代调回来。假使一个干部无法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调回城，就会被看成是“窝囊废”[5]。20世纪70年代末，官方都承认干部及党的威信已大跌。干部走后门把孩子调回城这个现象就是一个重要原因[6]。

知青们的精神品行的转变像传染病那样在城镇市民中散播开了。

---

① 与M. Z. W.的访谈记录，1984年12月29日。

②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1～332页、367～377；在该书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描述为了把孩子弄回城，父母付出多少宝贵的精力。精力和时间付出得那么多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工作。

③ N. Chance，前引，91页。我的一位女受访者也讲过类似的话；与R. C. G.的访谈，1986年1月30日。

④ Yue Daiyun & C. Wakeman，前引，338～339页。

⑤ 《争鸣》1984年9月号，68页。

⑥ 《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1版及第4版。《红旗》1979年第8期，62页。

贿赂、走后门，这些“不健康行为”的形成是由于某些急需的事情太难求得解决。而在当时，对城市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留城或返城更重要的了。所以，下乡运动虽不是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唯一成因，也应该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知青们也给城镇带回来一些从前很少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风行一时。主要表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新获得承认，就是说放弃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而肯定个人奋斗。这在城镇青年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潘晓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那封名噪一时的公开信中①，不仅明确地指出这一现象，而且大表遗憾。同样的，在那个时期，城市里迷信及宗教活动复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不过，与一部分知青相比，那就晚了好几年。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那些知青不只在农村进行这类活动，就算回城探亲那短短的假期中也不间断。他们进庙上香，那时有些寺庙仍然开放，而且继续从事某些勉强被允许的活动。广东佛山祖庙的一个水池里有只石龟，龟背露出水面，不少年轻人就往那上面扔硬币。同时许愿：要是钱币掉在龟背上，而不是滑落水中，那就预示在户口调动或者逃往香港一事上会有好运②。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宗教活动更放宽了，这时外国观察家乃至中共当局都惊讶地发现参与者远不止于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信众的大部分是知青；其余的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担心不能留在城里或者考不上大学，还有就是那些想找工做的失业者③。诚然，这些年轻人各有各的参神拜佛的理由，但不可否认是知青给他们树立了榜样。

独身主义，离婚，有利可图的婚嫁

同样在婚姻大事上，下乡运动也有长期的反效果。那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了一定年龄的而又拒绝结婚的知青、对那些已经

---

① 见本书，225页，注③。

② M. Whyte & W. Parish（前引）在他们的书中谈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里，扔下去的钱币铺满了水池。本人在1974年底到那里去亲眼见证了，还给这只著名的背驮灵蛇的乌龟照了相。我的受访者都说，去那里扔硬币的人有许多是知青。

③ 《解放日报》（日期不详）的文章，转载于《明报》1979年5月5日第8版；《明报》1980年9月27日第18版；《广角镜》1980年11月16日，12页。

在当地结了婚可又想返城的知青、还对那些为了回城而嫁给了随便一个城里人的女知青。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接近或超过 30 岁的单身人士数量比以前大得多。问题对单身女性来说显得更为严重，因为在这个年龄找到丈夫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就这个问题，报刊上登载了文章，专家们发表了学术研究，连最高层的领导当局都被惊动了。胡耀邦、陈云发出了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了有关会议①。惧怕该问题会导致社会上的不良后果，必须从速解决，于是在各大城市成立了婚姻介绍所，现代媒人的角色也时兴起来了。

下乡运动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好多项调查都显示出大龄单身女性的大多数是老知青。单身男性较少受到困扰，年龄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而且一般都是丈夫比妻子年长。然而，由于工厂通常都偏向于招男工，所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滞留在农村的女知青要比男知青多，问题就愈加显得严重②。许多在农村待了好几年之后才回城的女知青又得拼命找工作，到了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之时，她们摽梅已过，在此年龄能找到另一半是很不容易的了③。还有一些，她们在 1977 年或 1978 年考上了大学。照规定，学习期间不得结婚也不得谈恋爱。毕业之后才发觉年龄都成了不利条件。其实，男性总是比较喜欢比自己年轻，可又没自己能干，没自己学历高的女性④。

下乡运动还带出另一个问题：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城里都欠缺男丁。政策准许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子女留城或返城。结果许多父母都情愿把女儿留在身边⑤，一方面是想到女儿照顾他们比较好，另一方

---

① 见《人民日报》1984 年 6 月 11 日第 1 版；《北京晚报》1984 年 7 月 4 日第 1 版；《中国妇女》1984 年第 7 期，14～15 页及第 9 期（有关这个问题的专刊）。

② 在吉林省，从 1979 年起，26 463 名 25 岁以上回城单身知青中，有 16 856 名女知青，占 64%，年龄最大者为 36 岁。见《吉林省志》，96 页。

③ 《新观察》1981 年第 8 期，24～25 页；《社会》1984 年第 3 期，27～29 页；*Beijing Information*，1986 年 2 月 10 日，15～19 页。

④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海淀婚姻介绍所的“困难户”中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高达 46.5%。海淀是北京高校集中的一个城区；见《新观察》1981 年第 8 期，24 页。

⑤ 《新观察》，同上，25 页。

面是觉得把女儿送去农村生活，那太苦了也很危险。20 世纪 70 年代的北京城里是姑娘多于小伙子，与正常情况掉了个个儿。直至 1979 年知青回城，情形才有变化，重新找回平衡点，就是说男青年的人数稍稍高于女青年①。不过，男性数量不足够，持续了多年。虽然他们返城时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但他们还是愿意选择 30 岁以下的女性。下乡运动无疑是构成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下乡运动固然给那些不愿考虑婚姻大事的知青带来重重困难，同时也给那些已婚的制造了诸多问题。相当多的知青本来跟当地人结了婚，最后以离婚或中断婚约告终③。有时，为了达到目的，夫妻双方不得不搞假离婚。一名上海女知青嫁给了一名住在江西南昌的货车司机，两人就住在这个城里。但是女方没有户口，就说服了她丈夫同意搞一张假离婚证，好让她回上海。那位丈夫一直希望他老婆以后可以取得南昌户口。谁知那位女知青拿着假离婚证，居然以顶替为名回到

---

① 《北京日报》1980 年 5 月 31 日第 2 版。这个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男多女少”的问题似乎跟 1978 年底的现实有矛盾，那个时候，回不了城的女知青比男知青多。实际上，这两件事没有矛盾：这些被“遗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运动初期下乡的，就是说在 1973 年政策变动之前。比她们年轻的那些运气就好得多，可以躲过下乡。

② 在其他因素中，晚婚政策以及“革命清教徒”式的性爱观似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口专家并不否认这些因素，他们试图主要从文化及人口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来解释那种现象：文化因素是指，丈夫比妻子年纪大的夫妻起码占总数的 80%，平均差距是两年；人口因素是指，直至 1963 年人口增长飞速。然而，事实上，与比她们年长两岁的男青年相比，每一个年龄段的女青年人数都要高一些。主要见：郑叶夫，《北京城区男女婚配比例失调原因初探》，《社会》1982 年第 2 期，20 ~ 25 页，以及郑叶夫，《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人口研究》1983 年第 5 期，47 ~ 49 页。那两种因素当然应该列入考虑之列，但还远未能说明问题。这些参考系数在城市与农村基本上是同样的，但仅仅在城市里存在女青年长期处于单身状态的问题。例如，在上海市，1979 年底 30 岁以上女性中 24% 是单身，而在郊区县城里，该比例为 3%，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比例还要低。北京的情况也相似。见《社会科学》1980 年第 6 期，36 页，以及《北京晚报》1984 年 7 月 4 日第 1 版。

③ 一本官方的集子提到两个案件。是讲两个上海男知青在农村交上了当地的女朋友，并和她们发生性关系，但为了回城，他们要求断绝关系。在公安当局及司法部门的干预下，他们只得同意结婚，不过，在同时之间他们仍然成功地转移了户口。结果是，他们被迫结了婚，但很快就有一对以离婚告终，有一对就处于实际分居的状态之下。见《婚姻案件 100 例》，8 ~ 9、10 ~ 14 页。

上海。她自然就在那儿安居下来，还跟一位相信她是真的离了婚的男人结了婚。然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得知后，就把她告上法庭，要强迫她回去。这桩欺骗行为就此被揭穿。这位女知青不但被工作单位解雇了，还因重婚罪而被判一年半徒刑（缓期一年执行）①。更惨的是那些离了婚，可又已经有了孩子的。在1980～1990年期间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没有过的社会现象：老知青的孩子进城寻找亲生父母。这个现象不但引起很多悲剧，而且在法律上是个难题。有一本小说就是讲述被上海父亲遗弃在西双版纳的孩子如何万里寻亲，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后来还改编成了电视剧②。

至于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他们离婚倒几乎都是真的，但是短时间的，因为他们只等双方都取回城市户口，就复婚。城市间调动户口总是比较容易的，可以令夫妻团聚。不过，我们在前面谈过，从1978年底开始，就再没有必要搞这类离婚了。然而，同一城市的夫妻团圆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份有关1980～1982年期间北京以外人口流动的研究这样谈到："在迁往天津的辗转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北京上山下乡的女知青。由于在上山下乡期间已经与外省青年组成家庭，导致她们在返城后又发生新的迁移活动。"③

总之，从北京"往下"迁移去另一个城市是可行的，反过来就很难了。1981年我们在北京遇到一位在北大荒度过10个春秋的老知青。他妻子是哈尔滨知青。拿不到北京户口，就违法待在北京，当然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丈夫给派出所管理书报亭，他们俩就住在那儿④。多少知青夫妻长年累月住在大城市，就像他们那样，可是妻子没有当地户口，是来自其他城市或者农村。1986年我们在北京又认识了另一位知青，妻子是蒙古族人，成了北京的非法居民。他们倒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令他们最担忧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生孩子，因为根据规定，

---

① 《婚姻案件100例》，114～115页。
② 叶辛，《孽债》。
③ 《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5期，36页。
④ 与Q. Z. 的访谈，1981年5月29日。

孩子的户口自动跟母亲①。

对女知青来说，另有一种拒绝下乡的方法，那就是找一个居住在本城的对象嫁过去。这种做法相当普遍②，也出了不少问题。她们委曲顺从听天由命，无论在社会层次还是道德层次上都感到脸面全无。她们不仅堕落到去完成一头只有功利而无爱情的婚事，还接受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文化水平又比自己低的，或者是有身体缺陷的残废者作自己的丈夫③。她们觉得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只因为她们没有城市户口，而“她们的价值仅仅就是一个女性”④。

女知青的这种摆脱农民命运的可能性促使了人际关系间功利主义的发展，这从当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⑤。它也促使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离婚案例的突然增加。事实上，这种婚姻

---

① 与C. B. Y. 的访谈，1986年6月15日。

② 这就是我的一位女受访者所经历的（与R. C. G. 的访谈，1986年1月30日），也是冯骥才所采访的一个老知青的同学的遭遇。据他说，许多女知青选择了这条路（见《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2页）。另一桩轰动全国的话题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两次婚姻。她第一次利用结婚从一个穷村儿搬到一个富村儿。后来，离了婚，又以结婚为手段回了北京。当她1980年第二次离婚时，她的第二任丈夫指责她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他。后来法院批准了他们离婚，接着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来遇罗锦写了本书，阐述自己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全国报刊上引起种种批判。见遇罗锦，前引，以及她的名为《春天的童话》的自传的第二部分，载于《花城》杂志1982年第1期；亦见《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1期，26~29页，及同年第2期，13~22页；《工人日报》1982年5月17日第5版；《羊城晚报》1982年5月20日第2版；《南方日报》1982年5月14日第4版。

③ 1986年1月30日与R. C. G. 的访谈及1984年5月25日与G. M. 的访谈。也有文学作品涉及这个问题，见Liu Feng, Bonne chance!, *Le retour du père*, 200页；徐明旭，前引，212页。

④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前引，12页。

⑤ T.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104, 1985年12月, 657~675页。在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照本人看，Gold对历史的继续揭示得还不够，就是说从1966~1978年间的功利主义到后期的人际关系的商业化。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讲求一己私利的特性依旧如此，但以前是讲身份（城市或农村出身，阶级出身等），市场经济和消费物品生产发展之后，讲求的就直接变成了金钱与物质。

极少有什么幸福可言。一旦女知青得到了城市户口，就准备提出离婚。她们虽然这么做，但内心并不快乐。她们心里很明白，一个过了30岁的离婚妇女想要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机会是很渺茫的。她们的处境要比那些一直保持单身的女知青困难得多①。

非法外逃

有些知青舍弃我们上文介绍过的不同战略战术，而是采取更直接了当的方法。1969年张辛欣来到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虽然已经开了荒，但仍然是一个生活很艰苦的地方，蚊子叮人要人命。她有好几个跟她一样很年轻的同学，对那个新环境非常失望，于是迅速拟定了计划准备开辆卡车逃离该地。当然啦，这个儿戏似的计划以失败告终。而参与者则当坏分子处理②。

在那个时期，在那种地方，即使有那种本能的反应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不过，几年之后，特别是身在农村的知青就不同了。想回城，得不到批准，在某些地区，想要逃离农村生活，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非法越境逃亡。

非法回城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有的知青对能够合法返城回家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们就决定无限期延长探亲假。一年最多回生产队一次购买属于他们的粮食配额。因为他们是在城里非法逗留，加上户口又在农村，所以被人称之为“黑人黑户”。他们的人数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仅在1975年这些“黑人黑户”在全国就已经达到几十万了③。

---

① 访谈记录：1986年与R. C. G. 以及1986年7月8日与K. Z.。

② 1984年7月2日与张辛欣的访谈。由于张辛欣拒绝参与那个不现实的计划，就被看作是听话的好样。反正一年后，由父亲帮了忙，张转去了部队。

③ 多次访谈。见R. J. R. Kirkby, *Urbanization in China*, 27页。本人觉得很难找到更准确的数字。既然当年官方的数字已经很不可靠，那么面对那些有关本来就无法计算的“黑人”数目的谣传，还能说什么呢？曾经说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20甚至30万非法回城的知青住在上海。多次访谈。见*Libération*，1979年1月5日。即使真实数字不超过10万，那也占了全部上海下乡知青的10%，可能是还留在那儿的知青的15%或20%。

这种现象的不断扩大显示出城镇户口监管制度并不严密，这部分知青消极的但是众人参加的抵制行动倒是相对有效的。根据当局1979年3月的统计，10年间有1 500多名上海知青从新疆私自跑回来[1]。然而，知青想从农场，尤其是新疆农场逃出来，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些场长们总要想方设法把他们抓回去。这和生产大队不一样。而负责监视居民活动的派出所及街道委员会的头头们，最后对非法返城装作看不见，也许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强力遣返明知几个月后又会回来的知青，也许是因为他们对经过非人生活锻炼的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产生了惧怕之心，也许也是因为他们同情知青的困难处境[2]。不过，他们免不了要不时和警察局一起搞搞大规模的清查户口行动。通常都是在农历年前后。在这些大扫荡之时，大部分知青都能在他们的父母朋友帮助下藏匿起来。

对付黑人黑户最厉害的杀手锏并不是查户口，而是禁止工作单位招聘他们，以及不发给他们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必须要有的各式配给票券（粮票、油票、布票，等等）。这些措施也施用在那些拒绝下乡的知青身上。这种“经济封锁”政策确是可以阻挠大多数知青回城，但也带来一大弊病：导致城里出现一批游手好闲的社会边缘人，他们聚众闹事、违法乱纪。

其实，政府组织的文娱活动比在农村丰富得多，可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搞自己的另类活动，好像在农村生活的知青那样，打牌赌钱、男女调情、偷看禁书，等等[3]。不过，他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1977年，上海知青特别嗜好听周璇歌曲的旧唱片和搓麻将，这两样在当时都是被禁的活动。因此，他们就想出一整套掩护的办法：派一个人放哨，要是发现他们那里的街道积极分子来了，就立即通知伙伴们，让他们有时间把唱片和麻将放入一个篮子里，然后按动机关

---

① 《新疆通志·劳动志》，67页。

② 这些负责人大多数是退休妇女，她们“爱指挥别人，又爱管别人的事”，不过可能也会有惧怕或些微的同情心理。多次访问。见M. Whyte & W. Parish，前引，259页。

③ 在广东，很多都准备逃到香港。

把篮子升到楼上去①。

有一些知青靠着关系能找到一天一块钱的临时小工，比如在建筑工地上②。另一些就去卖血③。他们之中不少人都从事过这种或那种非法买卖：有的倒卖黄牛戏票，有的自制家具出售，有的钓鱼或养宠物去卖钱④，有的还自己组织有相当规模的黑市，在广东更有的仿造假证件卖给那些想去香港的人。

我们好几个访问对象都认识在广州成了小偷的知青。他们专门在公共汽车上行窃，而且挑选上下班时间，特别是发工资的那天⑤。用刀子威胁来抢东西的并不少见。一位上海高干的女儿对我们讲述她的亲身经历：1978 年的一天，她就是这样被迫把手表给了一个抢劫者，这个人不知是想自我辩护还是想恐吓她，居然坦承自己是一名知青。而我们这位朋友完全没有自卫，因为她的一个朋友不久以前就是企图反抗，不让打劫者得逞，结果挨了一刀⑥。就是在这个时期，流氓帮派猖獗，有时他们为了争地盘大打派仗，最常见的是动刀，也有用到“文化大革命”时偷来的手枪。至于“黑户”的女知青一部分偷盗，更大部分当娼。直至下乡运动末期，城镇娼妓活动似乎主要由非法返城的女知青操持的。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这种现象在广州可以轻易遇到，那些“摩打”们（妓女的别号）毫不迟疑地向来自香港的中国游客兜客。一次，一位香港嫖客就被扣了 15 天，罚了款，最后因其 1979 年期间与一名在广州卖淫的 19 岁女子多次发生性关系而被驱逐出境⑦。

---

① 《争鸣》1984 年 7 月号，70 页。

② 采访 J. S. G.（1978 年 7 月 9 日）及 M. Z. L.（1978 年 7 月 18 日）。

③ “北京之春”第 2 期，1979 年 1 月 27 日，载于华达（Widor），前引，166 页。

④ 在广州，有些人从事“养殖海陆空”（金鱼、狗和鸽子）；访问 J. S. G.，1978 年 7 月 9 日。

⑤ 当年，发工资都是发现金的。

⑥ 与 N. G. G. 的访谈，1979 年 10 月 4 日。

⑦ 《明报》1980 年 1 月 9 日第 2 版。亦见《明报》1978 年 7 月 22 日第 14 版读者来信；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12、116 ~ 117 页。在果丙的短篇小说《晚间》（载于《观察家》1979 年第 10 期，74 ~ 76 页），有一段是作了妓女的知青的自我辩护词。

城市当局虽称神通广大，但面对知青以及其他的失业青年，却是无计可施，拿不出任何办法。由于惯常的监控镇压的措施都告失效，所以警察开始采用更加凶狠的手段。从那个时期起，凡被抓进公安局的轻罪犯人也都会不由分说地被毒打一顿。在广州当扒手的知青一旦被抓，就先在警察局饱餐一顿拳打脚踢，然后送去沙河看守所蹲些日子，等候发配回县监狱，最后被押回他们所在的生产队。那些武装抢劫犯，或者属于有组织的偷盗集团或从事大规模投机倒把的偷盗集团，他们屡次三番犯案，一旦落网，即被判好几年劳改或被送去劳教①。而那些娼妓一般被送去劳教一两年。然而这些措施还是不能煞住犯罪活动的歪风，持续着的下乡运动不断地运送新的犯罪分子。当局感到无计可施了，便抛出最后的杀手锏：组织政治运动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目的是杀鸡儆猴。1977 年，一场这种类型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运动期间判刑极重，还判了不少死刑②。

下乡运动期间，非法返城的知青“对城镇社会控制制度构成最严重的威胁”③。这些年轻人需要在合法范围外找到生存空间，加上他们守法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基于这两点就能解释为什么上述现象如此普遍④。事实上，就算他们采取非异端态度，也同样无法获取他们渴望得到的：准许回城以及工厂招聘。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能让他们躲开农村的苦日子，就值得去冒被抓被判刑的风险。城市中那一时期的违法乱纪活动变本加厉很大一部分应该 归罪于下乡运动，更明确地说，是归罪于这场运动把涉及到的那部分人打入另册。不仅因为非法回城的知青是这些违法乱纪活动主要策划者，也是因为中学生们认为，无论在学校或在街道上表现有多好，最终也得到农村去，这样的前途

---

① 判刑的尺度变化很大，得看当时的政治气氛、被告的悔过程度、与法庭的合作态度，还有受害人的身份。所以有一个知青，因为偷了一个解放军的东西，在 1977 年被判了 15 年徒刑；见《百姓》1982 年 3 月 16 日，27 页。

② 见 W. Zafanolli, Hua Guofeng justicier, *Esprit*, 1977 年 7/8 月，49 ~ 65 页；《明报》1977 年 5 月 29 日。

③ M. Whyte & W. Parish，前引，257 页。

④ 青少年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大为增加，我的受访者都认为这是事实，连官方的有关专家也承认，但他们提供的数字五花八门，因此最好承认这种现象是无法估量的。

怎么也激不起他们对法律规章的尊重。这种个人态度与社会对此的惩罚之间的不一致成了1968～1976年间的主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气氛恶化的原因①。

后来虽然学生不用去农村了，但下乡运动对城里违法乱纪活动的影响仍然持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知青回城，从而使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更严重了。1980年1月至4月间在广州逮捕了122名妓女，年龄在15～25岁之间，其中只有7%是还没取回城市户口的知青。比率如此之低，那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得到批准回城了。不过，122名中的50%是“待业”青年②，自然包括了合法回城但还是没有工作的知青。那些年纪最小的也是下乡运动政策的受害者，因为如果有职位空缺，总是优先照顾知青，轮不到他们③。

出逃外国

虽然非法回城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只涉及一小部分知青。大部分认为这样回城不能解决前途问题。想取回户口和找到工作，“黑人黑户”的机会比留在农村的知青更少。相反，在边境地区有一个“脱离苦海”的彻底得多的解决办法：非法越境，逃离中国。

只有广东青年逃至香港在当时成了群众热潮，而在所有的边境地区有一些知青选择到国外去。听说有的去了北韩及蒙古，可是没有一点儿资料说明④。倒是有很多谈到下放东北的知青逃亡去苏联⑤，不过相当例外。跑去苏联是被看作“叛国”的，抓回来的知青和许多被苏

---

① 从这个角度看，本人觉得高干子女在同一时期违法乱纪活动的增长与非特权阶层子女的犯罪记录增长都是源自同一个原因，而M. Whyte & W. Parish（前引，257页）却认为内中有矛盾。其实，这些受他们身份保护的“纨绔子弟”可以偷盗、非法倒卖、奸污妇女，甚至胆大包天地杀人，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也一样，行为表现与在社会上所受的待遇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② 《广角镜》1980年11月16日，10页。

③ 见本书，384～385页。

④ 与B. C. G. 的访谈记录，1984年1月10日。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76页。

⑤ 访问K. K. Z.，1984年7月11日。1977年与一位苏联汉学家的访谈（见下页注释①）。亦见刘小萌，前引，509页；张抗抗，《塔》，前引，7页；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前引，12页。

联当局下放回来的都判了很重的刑[1]。就算成功了，他们的出逃也会给家人朋友带来麻烦。从福建偷渡去台湾也是叛国，因为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理论上还处于战争状态[2]。冒险跑去苏联和台湾的知青似乎并不光是为了逃离农村生活，还因为他们持有特殊的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至于从云南广西跑去越南的，以及从云南跑去老挝，特别是缅甸的知青，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下乡运动的头几年里，那似乎是一种英雄式的抉择，从此告别沉闷的农村生活。正像一本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所说的："我活得很没劲，好一个没用的人……那时我想假如发生了战争就好了。"[3]

在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都怀抱参军的理想。那一代人是在对战争英雄的无限崇拜中成长的。由老知青制作的一部纪录影片这么形容："老三届从童年开始就被灌输战争神圣伟大的思想。各类宣传不断向他们显示战争是通往光荣的道路。是战争将他们的父辈造就成英雄。"许多知青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一个被访者相似："打一打，起码可以变一变。要死，死在战场上，谁知道呀，当个英雄，总比憋死在这个破地方强。"[4]

此外，这些年轻人，就像毛泽东当年那样，深信中国应该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和司令部"[5]。很自然，他们都想去那三个进行过"反

---

① 一位在1977年认识的有名望的苏联汉学家向我证实了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说苏联当局将大部分"非法移民"送回去，因为害怕他们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间谍。就算那些获准留下的也成了特别监视的对象。

② 与这段内容有关的，本人掌握两份见证材料。第一份的作者是个害怕惹上政治麻烦和卷入下乡运动的红卫兵。第二份的作者是有政治问题的老知青：Ken Ling, *The Revenge of Heaven*, 384～396页；阿老，《脚印》，319～334页。

③ 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文集》第1册，168页。

④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33页。

⑤ 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152页。这部著作是一部纪录长片的电影剧本，介绍了各种各样知青的经历，包括几个去了越南、老挝的老知青。根据一位参加出这部电影的人的解释，由于包含有这种输出革命形式的资料，所以这部纪录片从来没有在电视播出过。但是有影片的录像盘（一盒十片）；与P. H. Z. 的访谈记录，2000年7月27日。

帝”武装斗争的邻国。全国有很多知青抱有这个梦想[1]，可惜只有在东南边境地区的才有可能实现。有些知青是“切·格瓦拉崇拜者”[2]，国际斗争勇士的精神激励着他们去了越南。那些去了缅甸的，一般都加入信奉毛泽东主义的缅甸共产党军队，而无其他选择[3]。知青们准备着为“毛泽东思想红遍全球”的伟大理想献身[4]，或者至少是为了当农民不如当兵。下乡运动的最初几年，中国当局对他们的越境行动的态度是既不积极鼓励，也不禁止，只是姑妄由之。没有办法知道多少知青出走他国。不仅在当时，那些越境是不为人知的，到了今天依然是国家秘密。正像一位当年在老挝作过战的知青所说：“我们这代很多人把青春交给了那个地方，当时也不为大家所知，现在连当时的痕迹都消不存在了。”不过在越南战死的“烈士”家庭倒是被承认的[5]。在那个地区，似乎最多人越境去缅甸，无疑是由于两国之间的边境线很长，缅甸当局不可能控制这些边境地区。布满热带丛林的山脉就是边境线，翻过去就到了缅共控制的地区。越境出逃的知青各有各的理由：有的只是因为跟上级吵了架，或者是恋爱受挫折。那些不愿参军的就被送回中国边境[6]。其他的就当了兵，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加入缅共。但是他们的晋升机会很有限，因为缅甸人（准确地说是克钦人，在那些地区缅共党员全部是他们）执意要把所有重要的职位留

---

① 一位曾下乡海南的知青这样回忆：“我幻想着哪一天世界革命爆发，我们知青便可以告别农村，杀向欧美。”见《亚洲周刊》第26期，2000年6月26日，46页。

② 白桦，前引，87页。

③ 1979年10月5日和1986年1月23日，与M. Z. W.的两次访谈以及1981年6月19日与M. X. Y.的访谈；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64页；陈明杰，《一个红卫兵参加缅共的故事》，《九十年代》1984年10月号，68~72页。这篇小说掺揉了真实的报道与虚构的故事，作者是插队云南的老知青，后移民美国。他在德宏当知青的时候，他的表哥和好几个朋友都过到缅甸去了，但一半以上，包括他的表哥，都永远长眠在那异乡了。

④ 陈明杰，前引，68页。

⑤ 晓剑、郭小东，前引，152页。赵建军是战死在越南的知青，纪录片里访问了他的母亲（同上，151页）。

⑥ 可能是由于缅共与中国当局密切，有一位被警察追捕的西双版纳知青宁肯舍弃近在咫尺的缅甸，而逃往遥远的苏联，见他的判决布告，转载于《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50页。

给自己，中国人只能得到一些副职。当兵很危险，他们之中许多不是死了，就是受了伤。当有人在战场上被打死了，缅共军队就会给他颁发一张“烈士证明书”，还寄回他家里。不过，中国并不承认这个“烈士”称号，也不会给他们的父母家属任何优待。1975 年，缅共内部发生大争执，面临崩溃，那些已经属于缅共一分子的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中国去了。他们却不再被视作一般知青：昆明有一个专门负责安置他们的办公室，设在军区行政部门所在地。而那些留在缅甸的都离不开一个恐怖的悲惨命运。有些走投无路，就在当地混进贩卖毒品的帮团①。最初，有些知青跑到缅甸去，就是希望最后能到泰国，再从那儿也许可以到西方去，但是很少人能成功。至于选择这条路的其他人在开始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多，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一切幻想②。后来，所有想去缅甸的都是抱着这个目的，然而边境线的防守控制也更严了。

毋庸置疑，香港对知青的吸引力最大。因此，虽然偷渡去此英国殖民地得冒很大的风险，但仍然成为广东青年中的一股热潮，其他省份的知青很少有机会能安全到达边境③。对知青来说，那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迈出逃往外国的重要一步。几乎所有的原籍广州的及插队到珠江三角洲的知青都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偷渡去香港④。从 1970 年起，英国政府发现非法进入该殖民地的人数持续上升。根据官方估计，非法移民从 1970 年的 7 000 人上升到 1971 年的 12 000 人，

---

① 一名四川作家，他在云南当知青时，曾经流窜到缅甸那边，待过一段时间。他在 1998 年回到该地旅行，收集了有关他的那些同伴们最终命运的材料；见邓贤，《流浪金三角》，2000 年。

② 这正是一位去了台湾的女作家的遭遇，她用小说的手法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曾焰，《闯荡金三角》，2002 年。

③ 有些知青取道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但这个小城只能是往香港途中的短暂停留之地，因为若被警察抓到，就会被遣返中国。到达澳门的逃亡者得自己想办法找到一种特别的专搞偷渡的船，然后匿藏在船的底仓中。如果有亲戚在香港答应付钱，那倒不是太难的事。

④ 某些广东知青下乡的地方很远，尽管如此，他们也能成功偷渡。他们利用探亲长假期，在广州或者另一个南方城市进行出发准备。在我那些偷渡到香港的受访者中，有两位是插队到海南岛去的，另一位是去了雷州半岛的。

1972 年的 20 000 人，1973 年的 25 000 人，及至 1974 年的 30 000 人[1]。这些移民里知青肯定占大多数，若想去确定所占比例，或者进一步推断在广东知青中偷渡来香港的比例那是不现实的[2]。1975 ~ 1976 年之后，大部分广东知青都获准返城，而再去插队的知青都得到可接受的条件，这种情形下逃亡者中的知青比例骤降。在那个时期，农民替代了知青的位置，占了绝大多数。在这里我们只对广东知青偷渡香港的准备及方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在我们已经出版了的一本书里，对此题材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看有关章节[3]。

有些红卫兵感到极度失望或者害怕会有麻烦就在 1967 ~ 1968 年期间去了香港。有的知青是 1969 年才去的[4]。主要是从 1970 年开始，特别是 1972 年，知青才大批偷渡去香港，他们将此当作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对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甚至成了活下去的理由，非达到目的不可。偷渡香港不是一件个人单独的行为，而是地下的集体行动。为了能够相互照应并壮壮胆，他们经常几个人（两个、三个、四个，或者更多）一起行动。就算那些单独行动者也需要通过其他人得到一些消息或者某些装备。偷渡因此成为朋友间的重要话题。他们一起讨论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和最稳妥的路线，从各种门路寻找必须通过地区的详细地图。他们购买或者自己亲手做指南针或假边区通行证件，

---

① 见香港入境处处长所编写的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转载于 A. Chan，前引，237 页。文中数字的可靠性是基于当时的事实：越境到达香港的中国人被看作是难民，不必害怕被遣送回中国，因此他们全都非常愿意并主动到移民局去申报，然后获发身份证。1970 ~ 1974 年间录得的数字显然高于 1950 年代初期。只有 1962 年例外，那一年有 142 000 人非法越境，主要是农民。但这两种情形是不可以比较的。1962 年时，在 4 月底到 5 月底之间，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放弃了边境控制，让那些遭受“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苦难的农民自由出境。绝大部分的逃难都是在这 6 个星期内进行的。见 Hong Kong Government，*Hong Kong*，*Report for the Year* 1962，211 ~ 213 页，及 *Hong Kong*，*Report for the Year* 1963，231 页。

② 我的广东受访者并不都住在邻近中港边境的地区，谈到比例数，他们认为在他们生产队的知青里应有 30% ~ 75% 偷渡了。但这些比例数没有普遍意义，因为偷渡经常是集体行为，很多人被拖进去的一种现象。

③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55 ~ 181 页。

④ 见 G. Bennett & R. Montaperto，*Mémoires du garde rouge Dai Hsiao-ai*，236 ~ 250 页。我的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在 1969 年作第一次尝试，但失败了。

此外还不忘制造橡皮艇需用的橡胶材料，等等。各种小买卖因偷渡活动而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知青可不是唯一涉及在内的①。

下定决心非走不可的知青，为一共同而且是秘密的目的，组织起来称兄道弟捱义气，颇似帮会。与那些争取合法回城的知青相反，他们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更关心的是互伸援手，交换地址和秘诀，曾经偷渡失败的甚至拿出经验与大家分享。不过，一定得非常谨慎小心，不能让他们的计划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所以就出现了像黑话似的“K 城”一词②，指香港。如同其他知青，他们也以歌曲表达他们决心出逃的心情。广东知青的大部分歌曲都围绕着逃往香港这一主题，就连那些还没决定要走的也爱唱③。看到存在逃往香港的可能性，广东知青异端文化的反叛性就更强了。如果传播这种文化的人能解决政府当局强加于他们的各种问题，这就与反文化类似了。也可以说决心出走的知青形成了一个反社会，既然对政府不再有任何期待，他们就可以漠视某些正式的规定及官方的价值观。我们得悉曾经有一位广东女知青公开要求性自由，那是唯一一宗。她与另一名同一大队的知青正在床上，被干部们闯破了，然后就被逼写检查，并揭发“勾引她的男人”。她竟敢回答说自己是自愿的，而且那根本就是她个人的私生活，跟他们没关系。这桩事件的解释很简单：两位小情人早就决定要出逃，小伙子尝试过一次，失败而归。他们当然让干部们狠狠地批了一顿，几个月后，双双逃跑去了香港④。另外，那些准逃跑者使大部分知青团结起来与警察公安势力对抗。我们听到相当多的这类守望相助的事例⑤。

---

① 有专门帮助越境的人（大约 500 元，对知青来说，太贵了）。农民和渔民就卖他们的船。一个广州动物园的职工因为经常卖给知青老虎的粪便而被捕了。据说那种臭味儿可以阻吓那些追捕知青的警犬。

② K 这个字母得照英文发音。

③ 这些歌曲中，本人有 7 首的曲谱，其中 5 首发表在《黄河》及《北斗》杂志上。见本书，338 页，注②。

④ 采访 Y. S.，1978 年 7 月 26 日。

⑤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34～135、137 页。

那些准偷渡者也是最倾向于用各种迷信方法去试探影响命运的一群[1]。事实上，他们实现计划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也很讲运气。每一次偷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悲壮行动[2]。如果被抓了，他们遭遇到的问题没有出逃去苏联或台湾的那么严重。假使没有牵扯上别的事，这些逃亡者就不会被起诉，不过会被关押进收容所，一般是一个月或两三个月，对某些非初次偷渡被抓者可能会时间长一些[3]。

惩罚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也许就是因为牵扯面太广了（偷渡的人太多了）。政府一不想加重监狱的压力，二不想随便扣“反革命”的帽子。香港是被英国人暂时管治的中国领土，居民大多数是广东人，与生活在那个脱离了不是很久的省份的家人还保持着联系。广东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传到香港，然后从那儿就传遍全世界的华人集聚区。香港同胞与华侨一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对象，双方都想赢得他们的政治支持，并得到经济上的合作。那些知青大部分都有亲戚在香港，严厉镇压他们而令香港同胞心怀不满，这种做法很不恰当。另外，凡是知青，都可以从轻发落。这些逃亡者经过了一段难以忍受的拘留，但为时很短，就被送回他们的生产大队，农民通常对他们表示同情，干部们一般只对他们简单训斥一番就完了。不过他们的企图出逃会纪录在档案里，这就会影响今后申请合法回城。对这些不幸的准偷渡者来说，这样的惩罚根本不足以阻吓他们重新来过，相反倒起了鼓励作用。所以再次偷渡的比率很高。大多数知青都是经过两次、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失败以后，才成功的[4]。

---

① 见平明，前引。

② 1973 年，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亲眼目睹了两位“自由泳”选手如何在深夜到达香港海域内的小岛平洲。第一位来自中国内陆，途中被民兵追击，他不得不丢下中弹的兄弟；第二位是与一友人同时出发的，可是他的同伴游泳技术不佳，一直都没能到达目的地。逃跑到平洲的艰难经历在下列两篇小说中都有讲述：洪翔，《海咒》，《敢有歌吟动地哀》，257～265 页；Liu Feng, Bonne chance!, *Le retour du père*，前引。书中描写的知青逃跑香港的动机及准备，与本人得到的资料完全吻合。

③ 有两位越境的知青，带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弄来的手枪，向边境士兵开枪，没有打伤他们，但被捕判 20 年徒刑；采访 M. W. C.，1978 年 7 月 14 日。

④ 我的受访者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第一次越境就成功的。

这些知青因被捕[1]而任人羞辱，又引来大堆烦恼，但为什么他们毫不计较，仍然要冒生命危险偷渡去香港呢？当时的香港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不时提到在广东人们传说香港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我们的被访者都不肯定有这种传言，省港两地关系那么密切，怎么可能呢？顶多是一部分偷渡者在行动前低估了香港的情况，他们没想到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才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但总的来说，我们认识的知青都觉得 K 城的生活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艰苦。不应忘记，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几十万大陆中国人逃难到这个殖民地来，大部分是广东人，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又回到中国去了，其中原因有反殖民主义，也有因为香港生活不容易[2]。这些人中有的就是知青父母那一辈。我们的好几个受访者就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对香港的坏印象。其他许多人则只看到繁荣背后的负面：穷人，尤其是新来乍到者，生活条件艰苦，缺乏安全感，人人都只为自己。香港和广东农村生活水平的差异是众人皆知的，这也就是 K 城吸引人的一点，但是光是这点还远不能说明知青们的选择。与他们在中国毫无希望的情况相比，香港似乎是一块充满机会的自由土地。政治自由，那是无疑的，特别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个人生活及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算为此需要艰苦奋斗也有这个自由。而对许多知青来讲，来香港就意味着有希望再进学校，哪怕是夜校也行，学好英文到外国去，或者从商干一番事业。总之，所有人都企望找到一种新生活。

不过，走还是不走，那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抉择。除了偷渡所冒的风险，还涉及到连根拔起的困扰，与父母亲人朋友从此分隔两地，也许是永远呢。有一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左考虑右考虑，怎么也拿不定主意。特别是独身子女或者是未婚夫（妻）不愿意一起走的那些。有时，决定那么难做，以至把人逼疯了。有这样一件事：一位男知青希望他的女朋友跟他一起去香港，要求她在 24 小时内作出答复，

---

① 知青在被捕期间，有时被民兵打或者被警犬咬。拘留所的条件很差，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

② H. Leuwen (ed), *Hong Kong / Macao / Canton*, 118 页。

结果那个女孩儿给逼疯了，这么一来，上级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1]。

广东知青的歌曲很能反映出逃跑者出发前所体会到的不同感情。从中听不出天真的狂喜，而是一种变化不定的复杂心情，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得已离开国家和亲人爱人的悲伤，发誓永不忘记他们，有一天会回来探望他们；其次是希望在香港找到自由，并决心战胜逃跑过程中的一切困难；再其次就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是被命运逼迫远走他乡的无奈心情。下面两首歌的歌词正正反映了这些[2]。

夜奔

在这漆黑的夜晚，我乘着小舟，
静静划动双桨奔向远方。
大海汹涌在怒吼，
四处一片白茫茫。
啊，汹涌的浪潮滚滚把我抛向远方；
啊，汹涌的浪潮滚滚向自由海岸。
再见，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故乡，
为了自由，我只能和你分离。
不管飘泊在何方，
往日情怀永不忘[3]。

小路

夜啊，夜啊，没有星星，没有月，
只有这一条小路，
静静地躺在那荒野上。
走啊，走啊，也许这小路没有尽头，
既然我已失去一切，
就向前走，向前不回头。[4]

---

①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83～84 页。

② 《再见了，广州》这首歌很长，不适宜放在这里，但最能表达第一种情感；见《黄河》第 3 期及《北斗》第 5 期。

③ 《黄河》第 4 期。

④ 《黄河》第 2 期。

即使是成功逃到了香港，这些年轻人的境况并不很顺利。极少数真的后悔背井离乡，而且想回去（对香港的生活不满意，就想移民去另一个国家），许多因流亡而造成的精神创伤远未愈合，极其盼望回乡与家人团聚。直至1979年，回大陆依然是冒风险的。一群逃跑过来的知青在1979年2月曾写信给《明报》："最近春节回乡探亲的人很多，其中也有一些是我们这一类的人，闻说有些能安然回港，有些被扣留，一些则被当地罚款了事。……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中共驻港机构，能向中共政府请示，明确公布对大陆逃港知识青年的政策，好让我们安心回乡观光探亲，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愿望。"①

虽然中共政府没有公开答复他们的要求，但是第二年知青就可以回国，不必怕被逮捕或者被没收身份证使他们无法返回香港。

从当政者的角度来看，逃亡，对内是对政府的一种挑衅，而对外就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广东，知青还给农民树立了很坏的榜样。20世纪70年代以前，企图逃亡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干部。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10年里，普通农民也参加逃亡了，他们跟在知青之后，有时还得到后者的援助。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某些边境地区惊呼缺乏男劳动力。对香港政府当局以及当地居民来说，知青的非法逃亡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并不是由于来了新移民（正像他们的先行者一样，他们挤在这片弹丸之地，也为当地的繁荣做出贡献），主要是因为他们之中少数人参加了名为"大圈仔"的黑社会组织，作案时心狠手辣，因而引起各种议论。他们之中许多青年出身不好，从小就被人歧视，尝遍了辛酸、贫穷和绝望。香港的警察和监狱绝对吓不倒他们。他们比本地的歹徒更轻易地出手杀人，而且比他们更讲义气，没那么容易被警察打进内部②。

在所有有关人士（知青、他们的父母、农民、还有地方干部）之中，下乡运动引起了很深的，而且是全面的抵制。这场抵制由于不能

---

① 《明报》1979年2月18日第10版。原文最后一句话就是含义模糊的。

② 《争鸣》1983年12月号，33～35页上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宗司法案件，作案者就是这类黑社会打手之一。

公开进行，就采取了隐蔽迂回的方式，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下乡运动负面结算的一部分。

即使政府面对这场抵制的态度是坚决否认或者推搪责任，指责别有用心者的阴谋，但总不能完全漠视。对知青采取的温和政策（特别是1973～1974年间）就说明至少有一部分领导人意识到需要作出让步。整个社会对这场运动坚决否定，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过了很久之后，政府大致上还能顺利地强加了它的意志。但这场消极抵制的负面效果肯定对作出最后决定终止运动有过影响，而公开对抗的出现加速了决定的出笼。

第十二章
公开抵抗

一个时代终结带来的震荡

1978 年以前，中共设置的控制全民机器还能阻止社会大量公开地抵制下乡运动。但不要以为，从 1968 年底到 1978 年底整个社会实体只是求助于间接和消极的办法来表达他们的意志。部分群众，特别是知青，组织过请愿和抗议行动，不过规模有限。

文学作品倒是给我们描述了栩栩如生的行动事例。比如，在一个地方工厂工作的知青组织了一场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①。还有另外一例，在云南建设兵团一个连队工作的知青，在他们的一位伙伴因公去世后，掀起了一场造反运动，运动要求处分有关负责干部、执行正常的劳动时间表、保证必要的医护治疗，等等，其中部分最后被接受了②。1972 年底，中央认为城里招工太多，决定要求部分知青回农村。在福州，部分被正式调到城镇工厂的知青拒绝重新被遣返，他们占领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坚持了好几个月，最后得以留城，但所得工

---

① 王安忆，《麻刀厂春秋》，前引。

② 糜庶，前引。

资微薄[1]。

由于新闻控制严格，这类有限行动根本得不到全国响应。同样的，传统的抗议办法就是写信给中央，报告反常的情况，要求中央给地方施加压力，从而解决问题。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传遍全国，只不过是因为中央领导意欲利用该信改变知青决策[2]。一般情况下，那些信在民众中不会得到任何反应。相反，通常还会给投信者惹来一身麻烦，因为上级机构总是简单地把它们转回到地方干部的手中。所以，那些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想照李庆霖的办法去做，结果都遭到了镇压[3]。

一般来说，知青请愿都是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但从 1977 年起，有一些就敢于干脆提出要回去。黑龙江的上海知青利用批“四人帮”运动，在张贴到上海的大字报上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们解释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反张春桥，所以才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在这些大字报里也公开了他们在农场所遭受的折磨[4]。他们似乎并没有胜诉，不管引用什么政治理由，提出这种要求的时机还未成熟。

1978 年以前，主要是在涉及知青范围以外的其他青年的行动中，知青会明确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改变政策。不少在京知青参加了 1976 年 4 月 5 日的游行[5]。这次事件中，北京青年提出要结束毛泽东专政，这是众人皆知的[6]。可是很少人知道广州附近的白云山登高事件。1974 年 10 月 23 日，10 万多青年趁着一个纪念先人的日子聚集在一起[7]。那天是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8]，没有清明那么重要，但也

---

① 李一哲，前引，83 页。有关知青对采取这种抗议方式的犹豫态度，见 J. J. Michel & Huang He，前引，176 ~ 177 页。

② 见本书，99 ~ 102 页。

③ M. Frolic，*Le peuple de Mao*，136 页。

④ T. Bernstein，前引，288 页；S. Rosen，前引，70 页。

⑤ 见《北京之春》第 2 期，载于华达（Widor）编，前引，194 页。

⑥ 见本书，122 ~ 123 页。

⑦ 《南北极》第 30 期 1976 年 3 月，43 ~ 44 页；M. Frolic，*Le peuple de Mao*，247 ~ 253 页；访问 J. Q. W.，1977 年 5 月 16 日。

⑧ S. Rosen 把该事件放在 1974 年 9 月 9 日是错的，他混淆了阴历和阳历；见 S. Rosen，前引，69 页。《南北极》那篇文章的作者将两种历法搅和在一起，错误地写成 10 月 9 日。

是一个传统，人们习惯去扫墓拜祖宗，那些祖坟都在山坡上。即使那些不为该目的而去的人，也喜欢在那天登高，因为据说这样来年就会有好运。而那些觉得自己运气很差的人，得围着山转一大圈，这就可以转运。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放到天上去，越高运气越好，同样的，得让风筝在天上上下翻滚，意味着转运。政府不愿鼓励这类迷信活动，所以那天不放假。但是，1974 年 10 月，不知道谁出了个主意，在广州人一直到全广东的知青之间，都传言“今年本省南部全体青年到白云山去”。一大群人那天就去爬山了。大部分是广州的年轻职工，他们没得批准就请了假，还有许多知青来自全省各地。他们运用各种办法，甚至在路边截车。人们在特定日子及特定地点聚集，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对当局的藐视，发泄不满情绪。很多年轻人在公开争论中阐述他们不满的原因。干部享特权，缺乏民主，各项政治运动以及权力落入“文化大革命”既得利益者之手，都是议论的内容。下乡运动当然也被批了。另外，在山顶，几百个风筝放上了天，有的上面还清楚地写着风筝主人的愿望：成功逃跑到香港。那些文字都是押韵的句子，像“顺风顺水去到尖沙嘴”①。有些年轻人在一块写着“南”字的墓碑前烧纸钱，别忘了香港是在广州的南边。有些工人看不过眼，就大声喊：“离开中国就是反华。我们今天在这儿聚集，是为了中国的事情变好，不是为了作祖国的叛徒。”② 这时，那些准备出走的青年就和工人吵起架来，然后就动手打起来。将近中午，这场登山一游行的消息传到了广州的工厂，其他工人撂下活儿就赶来参加，还都搭上厂里的大汽车。对此行动当局显然是蒙在鼓里，到了下午才派出几卡车的工人纠察队和驻防的解放军到达现场。他们堵塞了道路不让汽车通过，但无法阻止“行路登山者”。只有几个青年在打架的时候被抓，押上了车。那几辆公共汽车本来是要送乘客回城的，结果把那几个青年直接拉到工人纠察队总部。一部分人得留下姓名和单位名字，其他

---

① 《南北极》1976 年 3 月，43 页。尖沙嘴是香港的一个游客区，位于九龙半岛的南端。

② M. Frolic，前引，252 页。

人给验了验票就完了。警方看起来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理这件事。第二天，《南方日报》强烈谴责事件，而当局则逐一寻查有哪些参加者，不过没什么结果，因为群众拒绝合作提供线索①。

几乎在同一时期，1974 年 11 月 11 日，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在 4 月就已经张贴过一张比较短的大字报②，所以重阳那天人们都纷纷议论。白云山事件与张贴大字报都是同一政治形势下的产物③。中共广东省书记赵紫阳表示理解年轻人对改革的众多意见，因为符合他指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这种相对的宽容大概可以说明白云山的登山者为什么居然斗胆包天。年轻人真正的精神思想大暴露肯定令各级领导印象深刻，他们已经在忙着处理逃亡香港人数日益增长的问题。这不大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当时下乡运动已转为一种轮换制度，而在广东省下了乡好几年的知青不久之后就开始被调回城里④。除了这次特殊事件之外，我们知道很少有关“文化大革命”结束至 1978 年期间知青公开抗议的事例。1974 年 4 月在南京曾经有过比较重要的游行示威，不过，似乎除了知青，主要是

---

① 《南方日报》1974 年 10 月 24 日。

② 李一哲，前引，2 页。关于李一哲、他们的大字报、他们的被捕与释放的经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分手，见漆豪写的引言，载于李一哲，前引，1～44 页；亦见 S. Rosen（ed），The Rehabilit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Li Yizhe”，*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1981；A. Chan，S. Rosen & J. Unger（ed），*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1985。李一哲 3 个主要成员中，只有李正天不是知青。他出生于 1944 年，年纪比其他人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他正要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因为他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所以 1968 年被捕。1972 年释放后，在原来的学院担任临时图书馆管理员。1949 年在四川出生的王希哲 1966 年时，他是广州十七中高中生。1968 年，因参加李正天的红卫兵组织而被捕，蹲了几个月的拘留所之后，被送到英德县农村插队，不过 1969 年他就合法返回广州了，可能是家里在后面帮了一把（他的养父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陈一阳和王希哲是同校学生，1968 年也被送到农村去插队，是在紫金县（访问王和陈的老同学 S. G. C.，1978 年 7 月 19 日）。

③ 也是在 1974 年底，复员军人在广州组织了几次抗议行动，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见《中华月报》1975 年 8 月，31～34 页；《南北极》1975 年 10 月，19 页。1974 年 12 月，本人在广州街头见到由抗议者刷在墙上的标语口号，还照了相。

④ 见本书，122 页。

其他阶层的下乡人员。1976 年 4 月在河南开封，民兵要将非法居民遣返回农村，其中包括知青，因而爆发了两者之间的强烈冲突①。

1978～1979：当权者与社会的较量

自 1978 年底起，知青趁着政治形势比较有利，公开表达对下乡运动的抵制。他们几乎运用了一个社会团体要否定一项政策时所采取的一切方法：贴大字报、发传单、请愿、成立各种委员会、罢工、绝食、和平或激烈的示威、占领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堵塞交通，等等。在大批人回城时冲击交通工具造成骚乱，又在 1979 年初春节后大家都拒绝返回农村，这些也都构成集体性的抗议及抵制。我们已经指出过 1978～1979 年间各种公开抵抗活动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骆思典（Stanley Rosen）的观点。他写了一本很精彩的书，讲述广东老知青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中的角色。在该书的后记里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知青请愿行动与 70 年代末的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同样的“结构性的限制”②，所以都是没有作用的。这种观点的形成肯定是由于撰写该作品的时间太早，没有足够的历史距离来看问题。然而，比较这两个时期是值得的，可以再进一步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形势下到底有些什么新情况。

骆思典（Rosen）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行动毫无作用，因为他们是分散的，加上人数不多。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及各种不同情况下被送去农村插队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体。有些为了说明自己要求回城有道理，甚至还想法儿证明自己不是知青。1978～1979 年间的形势就很不同。知青人数多了很多，我们觉得在当权者及异见者的对比关系中以及在城市舆论对知青的支持度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因素。到了 1978 年，这个问题差不多牵扯到城里所

---

① S. Heilmann, *Turning Away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Political Grass-Roots Activism in the Mid-Seventies*, 1996 年，17 页。

② S. Rosen，前引，66～76 页。

有人[1]。此外，所有知青都自认是该同一群体中的一分子。他们之中存在不同身份，比如说，农村知青和农场知青、已婚的和单身的、农业工和非农业工，等，当局对他们的待遇就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知青，而那些在官僚行政部门中不被划作知青的（农场青年、已婚者或非农业工）全都强烈要求恢复该重身份，他们有时和其他知青在一起参加示威请愿活动。骆思典（Rosen）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身不由己地卷入红卫兵的派性斗争，因此他们就不得不与愿意支持他们的组织结盟。1978～1979 年期间知青并不非得要加盟哪一个政治组织。他们自己的运动和民主运动两者既各自为政，亦互相补充。他们的要求是纯社会性的，但也是和关于民主与人权的政治话语一致的。两类运动互不介入，却相互支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来提高自我身价的极端做法使得个人或部分人的诉求无法如实地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时期的知青不能对根本上是毛泽东规定的知识青年要下乡这个原则提出质疑，只能在刘少奇的执行方式上做文章。相反，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知青毫不犹豫地大力批判下乡运动本身，还要求将它终止废除。面对政府，他们的表现强硬得多，不仅因为他们人数多了，也是由于他们的诉求清晰明确。

毫无疑问，两个时期之间也存在类似之处，骆思典（Rosen）的“似曾相识”的感觉[2]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尤其正确地强调当局执意要分化社会，把社会分成几派，然后就惩治那些企图在派系之间串联的任何人[3]。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权者仍然准备对社会施行严厉的控制，经济现实主义却迫使他们部分改变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就像 1957 年及 1966～1968 年间，只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使 1978～1979 年间的社会抗议行动成为可能。在那种形势下，政府中的一派，

---

① 领导云南罢工的一些头头准备，一旦他们什么都争取不到，就发动北京、上海、四川父母所在的单位罢工；见《中国之春》1987 年 4 月，83 页。

② S. Rosen，前引，1 页。

③ 本人认为他也完全有理由肯定地指出（75 页），这种社会分化是由政治强制而产生的，不是因文化感染而致。

为了解决内部危机，主动鼓励社会各界发表意见[1]。1978～1979 年的危机最终不是以大规模逮捕（1957 年和 1968～1971 年间），也不是以大屠杀和强迫大批人下乡（1968 年）来解决。虽然当权者继续执意压制社会民众对言论与结社的诉求，并强烈要求成为社会利益的唯一代表，但它实际上不再企图强制人民群众照着最高领导幻觉出来的某种乌托邦模式行事。所以 1979 年的社会请愿以及政治诉求的示威游行没有像 1957 年及 1968 年那样被粗暴地打压中断。

在 1978～1979 年间，知青和政府之间建立的关系代表一种新的分牌法，持续了相当长时期，一般来说甚至持续到今天。在那个时期，已经不像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动不动就“反革命”帽子满天飞。当局也不再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社会民众的抗议活动。可是，对那些在媒体上没法根本不提的请愿行动就进行大批判，说那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游行，足以证明“四人帮”的毒害仍顽固存在。他们强调由此造成的破坏损失，以及对老百姓带来的不便。他们又断言这些行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党不会在压力面前退让，也不会改动正确的政策路线[2]。就像《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有的人以为可以用闹事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领导机关突破现行政策规定，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根本作不到的。”[3]

当局总是想方设法揪出“煽动者”，施以惩处，或者要他们写检查，并声言他们是欺骗群众。通常，只是在请愿活动结束之后或者是

---

① 有关这三个时期的比较，见 J. P. Béja & M. Bonnin，“La Chine ou la crise comme mode d'exercice du pouvoir（1949～1981）”，*Le système communiste : un monde en expansion*，1982 年，127～140 页。1974 年的白云山事件及李一哲在广州街头张贴大字报，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是符合这个模式的。

② 见《解放日报》1979 年 2 月 7 日第 1 版；《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9、10、11 日第 1 版及 1979 年 10 月 22 日第 1 版；《工人日报》1981 年 1 月 31 日第 1 版。在当局与知青后来的矛盾冲突中依然使用同样的词语和论据；见新华社讯，1985 年 4 月 29 日，刊于 *SWB*，1985 年 5 月 2 日，及新华社讯，1985 年 5 月 4 日，刊于 *FBIS*，1985 年 5 月 6 日。

③ 《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22 日第 1 版。

参加者写完了检查，报章才会登出报导，并且是尽可能闭口不谈，免得替他们做宣传。如果有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记者，在场目睹一切，那么这种扼杀新闻的战术就很难施展了。所以，中共当局就给外国记者，特别是请愿者施加压力，不让他们互相接触①。中国报章从来不会阐明请愿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形容为“无理的要求”，还竭尽全力发起一场宣传运动，为的是制造对请愿者不利的舆论②。要是承认抗争者不满是有某些理由，就立即提醒他们：仅仅为了这个而制造混乱是不必要的，再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当权者不断地重申他们才是唯一能够维护全民利益的，同时给每一次情愿行动的答复都是：小局服从大局。

面对政府的战略措施，知青示威者的态度还是同样的。他们揭示他们受的待遇是如何不公平，还引用公开讲话来加强说服力，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力图使领导，甚至舆论，相信他们请愿的合法性。比如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他们肯定在城里会比在农村贡献大得多，或者“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③。这第二种战术既不新鲜也无效，因为它等于要借对手的武器来打仗，而对手反而很容易指出那些都是不成理的说辞。不过，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人有意控告为“反革命分子”还是必要的。相反，他们决不会让“大局利益”的幽灵吓住。杭州知青曾经在北京贴出过一张大字报，上面有这样几句：“老是跟我们说‘小局要服从大局’。但别忘了大局由小局组成。而且知青问题并不是小局。”④

为了避免容易遭人指责或操纵的无纪律行动，知青们经常成立结构严密的组织，还选出拥有真正权力的各级负责人。这些头头们只能是那些准备自我牺牲的青年人，因为即使行动成功，当局也不会放过

---

① 法新社北京讯，1985 年 4 月 26 及 29 日。

② 见 1979 年表扬杨永庆，以及 1985 年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志愿垦荒者进行表扬。见本书，165～166、199～201 页。

③ 新华社讯，1985 年 4 月 29 日，刊于 *SWB*，1985 年 5 月 2 日。

④ 1979 年 1 月 20 日张贴的大字报，署名“杭州知青”，本人 1979 年 2 月在北京民主墙上照下来的相片。

他们。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承诺付出这种或那种代价。很自然，这就少了人想当头头，而让那些愿担当责任的人享有一定威望。社会行动的结果会怎么样？尽管官方总在不停地论证那不会有结果，但相当多的群众还是相信会有成效的。这从当局揭露出来的一些民间谚语中可见一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①

从1978年开始，社会游戏规则里面多了一条，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双方都作出退让。请愿示威者不会指控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也时常接受作自我检查，而政府虽然坚持永不让步以及要最大限度地控制坏事，但当两方势力较量需要之时，还是偷偷地接受某些可以是重要的让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云南知青罢工事件所采取的方式②。对待请愿活动外紧内松的处理方法，使当局既挽回了面子又避免了当地的事件向外蔓延。当然，绝对控制所有的传媒是该次战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这种垄断手段不能阻止消息口口相传或书信来往，不过总能大力度地限制传播的速度及范围的扩大，这就减少了异地同时爆发相应事件的可能性。

当时的形势准许设立一种，与以前分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使公开抗争有了可能。当然，政府继续拒绝建立自为的社会，即是有自己的合法代表，可以结社，并与当局对话的公民社会。但为了获得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相对政治社会和谐及经济能动性，必须作出让步，承认社会是一个有利益、有需求的实体，因此就接受了一个自在社会的存在③。当把经济目标置于首位之时，当局要比以前更加注意社会的任何不满情绪和抵制行动。另一方面，即使在社会控制制度最穷凶极恶的时期，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也不是完全可任人随意操纵的实体。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社会就开始更强烈地向政府显示它的存在。所以，就算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改变，10年后发动再一轮像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

① 《工人日报》1981年1月31日第1版；新华社讯，1985年4月29日，刊于*SWB*，1985年5月2日。

② 见本书，150～152页。

③ 见上海一干部的声明，在本书第147～148页。

第五部分

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前一部分讲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恶性后果，现在我们来做整个运动的一个总结。为此，我们会将第一部分提到过的发起运动的四种主要动机倒着再进行一次分析。

第十三章
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

减轻城市压力问题

上山下乡与城市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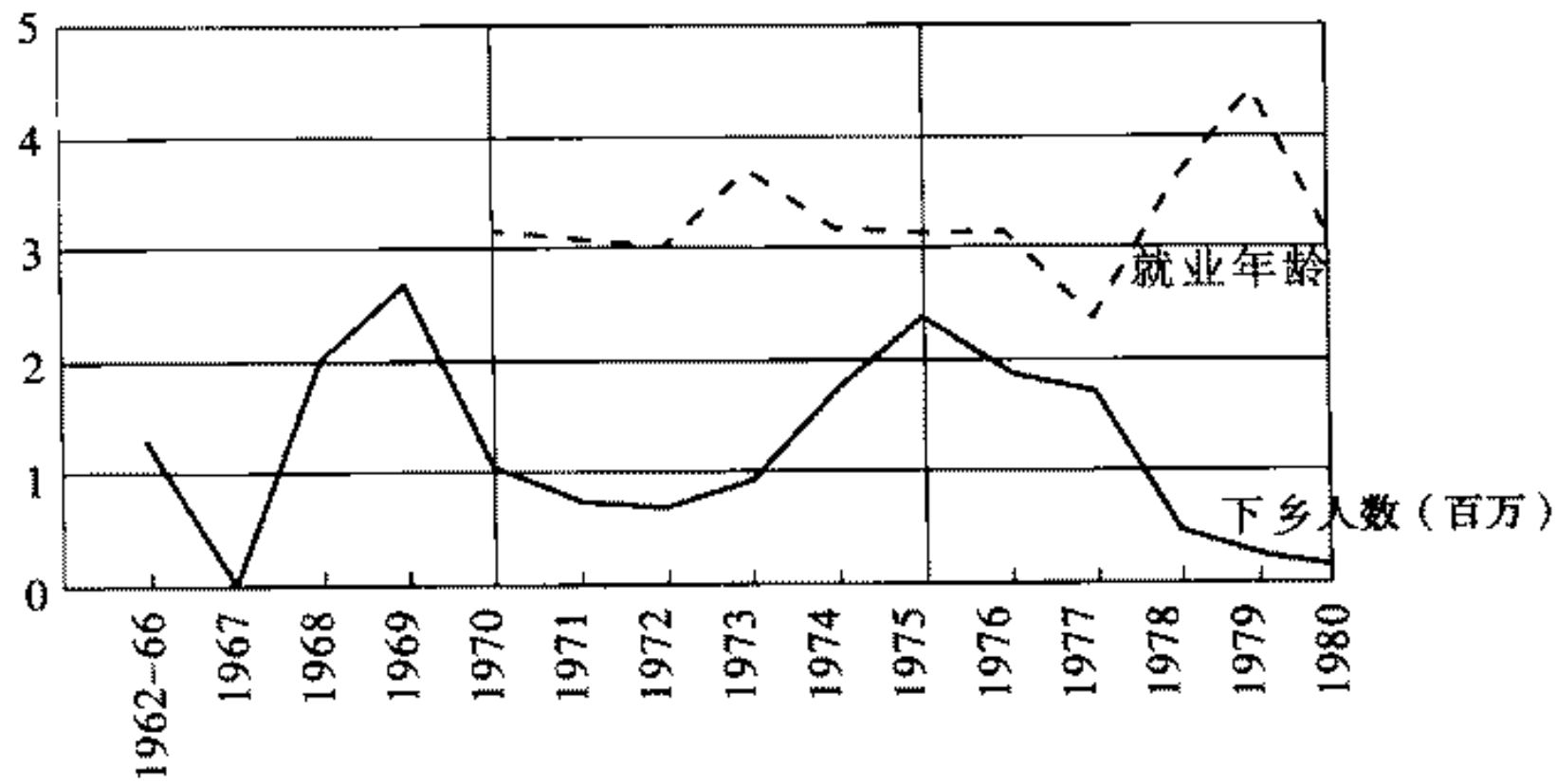
当年“文化大革命”令几百万城镇青年骤然变成了“待业青年”，1968年下放农村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然而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人口或经济，而是来自政治。人所共知，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城镇出生人口数量庞大，从而导致1966～1976期间进入城镇就业市场的人数居于高位①。1961年出生人口曾有过轻微下跌，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另一个更险峻的高潮令劳力市场人满为患。原因是1962～1964年间城镇出生率达到高峰，1963年一年间就有440多万新生儿，打破中国历史至今为止的年出生纪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城镇劳力市场的人数仍然超过两百万，但自那个

---

① 进入年龄为16岁。原则上16岁是进入就业市场的最小年龄；见庄启东等，《劳动工资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98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数据显示，在全国大多数人口中的确是这个年龄。运动初期大部分知青也是在16岁的时候下乡的。当时，大部分城市青年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然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大城市里高中的课程普及了，可是因为整个小学和中学课程缩短了，所以实际的工作年龄只推迟了一年，大城市里大多数青年都是在17岁开始工作或下乡的。

时期起紧张局势得以明显的缓和[1]。假如上山下乡运动真正是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途径，那么这个政策就该持续二十几年。

但是大规模的下乡运动仅仅持续了十几年，当险峻高潮中出生的儿童到达就业年龄的时候，出现了知青大批返城的现象。从人口分析角度来看，1979 年是中国历史上城镇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最多知青返城，而下放知青的人数依然处于 1978 年开始的急遽下降趋势中。



图表 4　下乡知青与进入城镇劳动市场的青年

此外，1966～1977 年间，如果不是因为下乡运动禁止任何单位招聘离校的城镇青年，他们中的大部分，或者说他们全体，都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其实，正当下乡运动将八九百万知青长期摒弃在城镇就业市场之外的期间内，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之不相上下[2]。是下乡运动令城镇劳力短缺，因此必须雇用农村劳动力。当年已经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也算在这部分劳动力里面，而更大量的一些农民亦乘机挤了进来。一位人口学家对部分知青回城问题曾经这样论述："在招工过程中，农村青年也通过各种关系纷纷挤入，这样'出一进

---

① 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592 页；《中国统计年鉴》，105 页以及 H. X. Wu,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年 9 月，672～673 页。

② 见本书，52～60 页。

二'，反而加大了迁入城市人口的数量"[1]。在云南，为了重新启动城镇生产，1971～1975年期间从农村招了150 790名工人，其中知青68 108人、农民82 682人[2]。1974年山西省城镇移民人口增长的53%是作为固定工招上来的农村人口，他们有的是直接招来的，有的是先当临时工[3]。自然，从农村小范围招工是无可避免的，特别是工矿的需要，但后来扩展到了各个工业部门[4]，而且不再是小范围了。

我们已经分析过，雇用农民的最大理由就是成本低。如果是招临时工或合同工，那倒是真的，但对招固定工来说，收益不大。唯一的好处就是农村来的工人无权把家人带入城镇，因此减少了国家为住房、子女教育等而付出的费用。但是，如此这般赢得的利益依然远远低于为下乡运动付出的代价：1968～1979年间所付出的占国家预算的1.6%，这还没加上知青家长和农村集体的支出花销[5]。必须提出的是，如果说下乡运动主要是降低工业化成本的一项措施，（我们并不认为是这样），那么表现出来的决不是有成效的，因为1967～1977年间工业生产率总体上是向下的，直至1978年才重新超过1966年的水平，另外，1966～1976年期间在国营机构工业投资的盈利减少了44.1%[6]。

在那个时期，用一个农村劳动力来替代一个城镇劳动力不仅不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政策，而且假使以后原城镇居民返城的话，还会引出很多麻烦。问题确实就是这样产生的：城镇居民回来了，农村来的也没走。事实上，那些农民已经成了固定工了，谁也不能把他们赶走。他们甚至有权在退休的时候让农村子女中的一个进城来顶替他们[7]。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使得广大城镇居民忿忿不平，他

---

① 《中国人口·湖南分册》，184页。
② 《云南省志·劳动志》，70页。
③ 《中国人口·山西分册》，151页。
④ 有些征地农民，就是说土地被征收去盖工厂的郊区农民，会被招进这些工厂。
⑤ 见本书，189～190页。
⑥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224页；Beijing Information，12，1984年3月19日，26页。
⑦ 见本书，58页。

们认为那些农民工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失业青年的家长们到处诉说他们的不满，更在报纸上揭发黑工[1]。其实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严禁招聘农民。1979 年 4 月国务院甚至还决定将 200 万计划外的工人送回农村。从长远来看，下乡运动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令问题更严重了。在北京，1979 ~ 1980 两年间，总共有 80 万青年提出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下乡运动，就只有 32 万人，因为 1962 年只有 14.8 万名婴儿在首都出生，而 1963 年也只有 18 万名[2]。从全国范围来看，1980 年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只占城镇求职者总数的 27.27%[3]。

就算知青不是大批返城，下乡运动也不能被看成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治病良药，那不过是把城镇问题转嫁到农村去。在大部分乡村，安置城镇青年其实是加重了农村人口负担。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但是，对城镇家庭来说，他们的知青子女根本就是半失业者，没有外援就无法生存。至于那些非法返城者，他们就形成了一支几十万未经登记的失业大军。所以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比如 1966 ~ 1977 年间，出于意识形态要求，缩减了第三产业，并取缔了 170 万个城镇个体劳动者）[4]，还助长了既不适应经济需要又非常不平等的招聘制度。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固定职位都是由官僚主义的中央统一分配，企业不得挑选适合他们需要的职工，而职工也无权根据本人的兴趣特长选择工作[5]。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统一分配制度”（其实不是铁饭碗就是下放农村）在两种不同命运之间制造了那么宽

---

① 《北京日报》1981 年 4 月 4 日第 3 版。

② 钱玲娟等，《北京市的人口发展情况和当前的任务》，《人口研究》1980 年 1 月，41 页；郑也夫，《北京城区男女婚配比例失调原因初探》，《社会》1982 年第 2 期，20 页（那个时期，在北京进入就业市场的年龄一般是 17 岁，而不是 16 岁）。

③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2 年第 1 期，132 页。

④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5 页。

⑤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前引，131 页。

的一道鸿沟，为了从坏的一边跳到好的一边，好象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都有合理的依据。

下乡运动没能成为就业问题的真正解决良方，但运动戛然而止却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1979 那一年，需要在城镇提供 2 000 万个职位，这是不可能办到的①。几百万青年人因此不得不连续多年失业，没有任何补助，有的就去干低酬劳的临时工。他们之中，是大多数近期的中学毕业生，可也有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了五六年，现在不但住在父母家里，还需要依靠他们才能过日子。这些知青只有等待机会，要不然就摆摊儿卖饮料、报纸、明星相或其他杂物，再不就去“劳动服务公司”干活儿，赚取包括奖金在内 40 块钱的月薪②。经过一段时间，大部分知青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甚至住房。虽然他们并不十分满意，但却认为问题是解决了。然而，对那些 1979 ~ 1980 年间还得不到准许返城的知青来说，依旧困难重重。1987 年有篇文章曾报道，有的知青得不到批准，坚持返回上海，当然是没有户口，只好打黑工，做些违法的事情。这些人之中，不难发现大量远嫁或者下放去新疆的知青。其他获得准许返城的并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年轻人是下放到城郊农场的，又没有在当地被招进工厂，而在引入责任制之后又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农活全都给外来农民承包了③。在那个时期，大部分知青都被城镇的工作吸引过去了，结果是加重了后来的一批又一批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④。

在这方面，下乡运动遗祸久远，它迫使政府当局从 1978 年起采取了与现代化高效率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下下策，就是顶替制度（工

---

① 见本书，180 页。

② 见《明报》1979 年 10 月 27 日第 9 版及 1980 年 8 月 22 日第 8 版；另见 AFC（法中友协）访问上海后所作的汇报，题为 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 services publics，前引，本书 180 页，注④。本人也曾在 1979 年作两度中国之游，与许多在街头摆卖各种小商品的知青交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满意自己当前的境遇，但所有人都宁愿这样过日子，而不待在农村。

③ 陈甬沪，《无证经营为何屡禁不绝》，《社会》1987 年第 3 期，24 ~ 26 页。

④ 见洪英芳，《试论我国……》，《人口研究》1987 年第 5 期，26 ~ 31 页。

人退休之时，其职位由其一子女自动顶上）和归口包干制度（年轻人的招聘由他们的父母所在单位负责）。必须指出，由此引致的职位世袭现象，不仅对保证劳动力质量及经济生产效益是有损无益的①，而且也是违背毛泽东派们决意抑制社会不平等的代代相传的原意的。这两种制度的发展直接与下乡运动相关联，一方面是由知青返城造成的紧迫性所导致；另一方面，下乡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使家庭成为更重要的城市经济基本单位，这一事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该两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大部分知青确实都需要父母的援手，家庭收入状况就成了最根本的现实问题，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在家庭全体成员中引起激烈反应。李庆霖 1973 年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就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李庆霖非常担心，有一天他自己退休，少了一部分收入，到那时候他的那些在农村的孩子怎么生活②。如上所述，“顶替”就正好为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答复，因为那是“一项旨在保证家庭收入的政策”③。

虽然下乡运动的突然结束引起了这些问题，但是社会和政治的情况让领导人们不得不同意终止这场运动。从经济角度看，运动的告终倒也不只是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些负责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僵硬的低效率经济制度，从而尽力加速建立一种更适于实现现代化及促进经济的新制度④。中国的专家和负责人都承认就业问题对经济改革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消除了政府对第三产业，尤其对私人与集体企业，所持有的偏见，甚至废止了有关的禁令，同时也加强了发展轻工业的决心。在这儿只举一个例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

---

① 一些中国专家列举一个沈阳公司的例子。那里在 1980 年招进的 2 248 名职工中，有 22 名违法乱纪分子、33 名明显的伤残者，还有一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不仅本人干不了活，而且一发病就拖累三四个人照料”。专家们还举了一个例，也是在同一个城市的某餐馆，50 多个职工中有一半来自同一个家庭（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29 页）。

② 见本书，99～100 页。

③ Lin Zili, Initial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0 年第 3 期，182 页。

④ 见本书，180 页。

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我国在解决城镇知青就业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比较，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党和政府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从1979年至1981年全国共安排了2 600万人就业。"①

上山下乡对城市扩展的影响

除了就业困难，人口过分稠密（导致供应、住房、交通，等方面都万分紧张）以及犯罪问题都构成将一部分青年从城镇疏散出去的最好理由。

上山下乡运动确实为城镇减缩了一部分人口。运动开始一年半后就达到了500万，是城镇人口的5%左右。自1974年起，在出发与回城的人数几乎相抵消之后，这部分离开城镇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1977年底达到了大约9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7.5%②。这个外迁人口数字要比"下放"的干部及知识分子数字高几倍。另外，这些移民是几年以后就该成家、要求分配住房并生儿育女的年轻人。

虽然有组织迁徙到农村去的城镇居民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这还不能持续地降低城镇总人口。1968～1977年间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数字显示出，在那个时期内，迁出城镇的知青、干部、知识分子及"闲

---

① 张化，前引，153～154页。有关就业问题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亦见庄启东等，《劳动工资手册》，10～13页。另见1980年8月有关就业问题大会的汇报（新华社讯，1980年8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8月13日）。

② 见本书第178页图表2。G. White, Urban Employment and Labour Allocation Policies in Post-Mao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10（8），1982，615页。《中国人口年鉴（1985）》，813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VIII－3页。这里谈到的城市人口当然是非农业人口，是唯一牵涉到下乡的。1982年以后经常用到的这个定义包含了大量的郊区农业人口，其实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当谈到下乡问题的时候。

散人员”的总数与迁入的几乎相等[1]。这些迁入者主要是作为固定工招来的农民。那几年间，尽管一边在通过下乡和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运动进行人口迁移，另一边城镇非农业人口却不断地增长。既然迁入与迁出相抵，城市人口的增长就等于在当时不算高的自然增长。

我们得到的有关20世纪70年代城镇招聘及人口的正式数据都清楚地表明，以城镇就业和人口压力问题为理由是不可能说明为什么要发起下乡运动的。在运动收场前那整整一段时间里，就是一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和人口大交流。由一部分人去替代另一部分人，结果得益并不可观。

假如从1968～1980年这一个完整的时期来看，政府的政策甚至似乎是完全不合理的。在初期，还可以说被强迫迁离城镇的几百万知青、干部和知识分子与迁入城镇的等量农民相抵消。但是，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在1978～1980年间返城了，结果是1968～1980年这一时期，非农业人口的净迁入数目大约为1 550万人。知青和其他被放逐在外的人士返回城镇，上面曾谈过，引起诸多问题。一位中国专家谈到上海时这样写道：“‘大化大革命’10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08万人，最后还是不得不又返回城市，这种人口的大出大进，给城市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就业、婚嫁、生育、住房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这个教训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是值得认真吸取的。”[2]

本来，知青下乡，真的给国家省了一大笔钱，他们的婚嫁生育等大事都毋须国家负担（对知青来说，就得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3]，他们返城了，政府的得益因此部分消失了。当年，知青们一回来，就纷纷抢着结婚、抢着生孩子，然而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法国人口学家雅克·卡罗（Jacques Calot）指出，与他的中国同行们所断言的相反，只用1980年的新婚姻法无法解释当时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上升[4]。很明显，在城镇里，知青大批返回应该构成另一个因

---

① 同上一页，注释②。

② 田方等，前引，310页。

③ 见本书，308～315页。

④ *Aujourd'hui, la Chine*，第33期，1984年9月，9～10页。

素。这些年轻人由于不愿在农村生活而推迟了他们自己的婚事，一旦回到城里，物质条件又许可的话，他们就赶紧办好婚姻大事。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掌握任何总体调查材料，不过下面两个 实例似乎很说明问题。1979 年在北京，有 13.9 万对新人成婚，但 20 世纪 50 年代每年的新生儿从不超出 14.3 万（1957 年数字）[①]。就是说，结婚的人数比人们本应预料到的多出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说那是因为 1980 年的婚姻法。至于生育问题，我们提出上海卢湾区为例。在这个城区，20 ~ 34 年龄段的妇女在 1952 年占全体生育年龄女性总数的 49.42%，1973 年占 31.68%，1977 年微升至 40%，而 1980 年突升至 53.03%[②]。固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这群生育能力最强的妇女人数的变化，但是如果不考虑下乡运动这个因素，那是无法解释这些变化的。在减轻城镇人口给养的负担上，上山下乡运动所能得到的成果极其有限，后来干脆被运动结束时产生的困难抵消掉了。必须指出，费用高昂的城乡之间人口双向来往，下乡运动并不是唯一的一次。1958 ~ 1960 年“大跃进”及紧接着的调整时期内，大约 2 500 万农民迁入城镇，跟着在 1961 ~ 1963 这三年间，2 300 多万人迁出。另一次重要的“大来大往”（虽然没那么惊心动魄）发生在 50 年代中期，1955 年迁出 200 多万人，就在第二年，1956 年又迁入了 600 多万人[③]。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由威权性质的国家来控制人口流动，也不能保证迁移的合理性。

虽然“在理论上长期把城市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果”[④]，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倒是真的给城市恢复名誉了。1984 年 10 月，在城市经济改造的决议中，可以读到下面这句话：“作为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及文化中心，在那里又集中了现代工业和

---

① 钱玲娟等，前引，41 页，以及郑也夫，前引，20 页。

② 高尔生、顾杏元，《上海市区三十年来生育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1984 年第 1 期，33 页。

③ 这些数字是我们根据《统计年鉴（1983）》（103、105 页）提供的有关人口及自然增长数据计算出来的，是关于整个城市人口的。

④ 李春林，《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等级》，《社会》1987 年第 2 期，4 页。

工人阶级，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起着主导的作用。”①

因此，人们估计2000年城镇人口会翻一番②。城市的优越地位恢复了，随之而来，第三产业的地位也得以相应的提高③。

下乡运动在减少城镇人口上所取得的成果确实很有限。其实，也仅仅是在某种发展战略之内，这类减少人口才具有一定意义。这种战略提倡自给自足，摒弃与外界的交流；优先发展“生产性”的经济部门（第一及第二产业）；重生产轻消费。这种所谓“中国道路”，从目标上来说，与斯大林式的经济政策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用剥削农村来快速发展重工业。然而，要想让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这种战略方针是无能为力的，最后被中国的掌管实务的领导们自己放弃了。因此，在城市化或者在就业上，下乡运动政策带来的众多问题迫使领导人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政策，亦有别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各个时期。这些变化关系到整个城市经济战略。长远来看，下乡运动政策在这方面导致的真正变化根本不是始作俑者，尤其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甚至应该说是完全相反的。

上山下乡与犯罪活动

至于城市犯罪问题，下乡运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要是部分年轻人失业而又前途未卜，这令各级领导惊恐犯罪活动加剧。事实上，犯罪活动确实有上升的趋势，不过那得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和下乡运动本身。正是“文化大革命”助长了部分年轻人的暴力行为习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母被监禁、被下放、甚至被致死，相当一部分孩子或者年幼的儿童长年累月无人照管、放任自流。说到下乡运动，那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知青非法返城是犯罪活动的主要原因，根据各种实例证明，这类犯罪活动

---

① Décision du Comité central du PCC sur la réforme du système économique（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Beijing Information*，1984年10月29日，II页。

② 新华社讯，1986年2月4日，刊于*FBIS*，1986年2月5日。

③ 徐天琪、叶振东，《调整劳动力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6期，39～44页。

远远高于“文化大革命”前[1]。

下乡运动带着由它导致的青年失业问题告终了，即使“黑户”问题得到了解决，整个局势也还没得到安顿。之后，经济自由化，社会控制部分放松，这都给犯罪活动制造了新机会。“变相劳改”不再合时宜了，政府毫不犹豫地操起惯用的常规斗争手段来对付犯罪分子：劳动改造、劳动教养[2]及判处死刑。政府还把与国家历史同样悠长的一种手段（罪犯被永久逐出城市、终生流放在外）编入法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决议案规定，被判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的城镇居民如果企图潜逃或者出来以后又重蹈覆辙，那么除了原判的惩罚之外，他们的个人户口也会被吊销，并禁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原籍城镇。他们将会在劳改营服完刑之后，依然留在那里，但作为自由劳动者被雇用[3]。对一个劳改犯来说，这类追加的惩罚是不言而喻的；但对劳动教养犯来说，一切决定权在警察手里，而后者则充分利用来作为镇压的一种手段。一位研究与户口制度有关问题的中国专家这样写道：“户口甚至成了惩办罪犯的一种手段。有些犯罪分子，公安局常进常出，把进监狱视为儿戏，但一听说要注销他们的城镇（城市）户口，就变得‘老实’了。”[4]

为了突出执行上述政策的惩罚性质，政府当局大力采取下放至贫瘠的边疆地区加上吊销城市户口的措施，以便达到消灭罪恶，尤其是青年犯罪的目的。1983年秋，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运动中，上海有4万人被捕，其中大部分被送到青海劳改场。当时，单位领导人经常使用“送你去青海”来威胁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好让他们规规矩矩[5]。1983年那一场运动确实就是针对那些青年犯罪分子，或者只不过是边缘分子。这就足以证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政策最终是失败了。

---

① 见本书，357～360页。

② 见本书，3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年8月20日，368页。

④ 丁水木，《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初议》，《社会》1987年第1期，19页。

⑤ 《争鸣》1984年7月号，37页。

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上山下乡与发展农村

前几章已经描述了大部分知青怎样在不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充当农村劳力。1957～1977年间，从全国总面积来看，可耕地面积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在中国1978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而在美国是48公顷①。

被下放去落后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和那些不只是当农村劳动力的知青的确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承认。

在中国边疆地区以及内陆某些不毛地区的垦殖、移民与开发上，有一部分就是知青的功劳。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一直引以为荣，就算后来在许可的条件下，他们选择了返城，也依然如是②。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陆续有些中国专家的文章指出其中的局限性。实际上，当时在这方面的政策有两大漏洞：一不考虑经济效益，二不考虑生态平衡。一位中国专家列出了下面几个惊人的数字：国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投资了46亿人民币建立垦殖农场，结果是亏损了32亿③。当年送去的知青太多了，远远超过当地的接待能力④。此外，"再教育"的思想和人定胜天的过分乐观经常使某些负责人头脑发热，以至于去组织种植一些根本不可能生长的作物，之后不得已全部放弃。一位中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写："有的地区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由于负

---

① K. C. Yeh, Macr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Readjustment, *China Quarterly*, 100, 1984年12月，692页。

②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前引，17页。

③ 田方等，前引，76～77页。

④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214～218页。

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①

1969 年被送去内蒙军垦农场的一位老女知青（如今是一位社会学家）这样描述让知青干的类似西西弗斯那种徒劳无功的活儿：在盐碱地上种庄稼，开凿无法开通的运河（这头儿刚挖好，那头儿就被沙土掩埋）："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②

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不会是尽如人意：1965～1978 年间，垦殖农场人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农场数目不增不减，但是新开垦土地的面积只增加了 28%，粮食产量也只增加了 59%③。此外，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整个大西北，在不考虑生态环境是否允许的情况下，展开了好几个大工程。毁林种田，以农代牧，造成了严重的土壤侵蚀④。以致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们对整套组织大批移民往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产生了怀疑。领导们发现"人海"战术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无济于事，于是开始强调需要组织高质量的移民，比如说专家、技术人员，等等，另一方面，平反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自由迁徙，准许个人自愿移民，让他们去农村干体力活儿，虽然有点儿"无政府状态"，但也值得尝试，因为政府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另外，由于他们是自愿去的，所以在农村待的时间会比较长⑤。

我们还发现，有组织的或者是自发的移民去边疆地区的有往城镇

---

① 张化，前引，150 页。

②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北京文学》1998 年第 6 期，102 页。

③ 《统计年鉴 1986》，211 页。关于农场，特别是解放军农场的低微收效，见本书，109～110 页。

④ 《胡焕庸教授谈向西北地区移民问题》，《人口研究》1985 年第 4 期，32 页。原华荣，《论西北的环境与移民》，《经济地理》1985 年第 3 期，197～201 页。

⑤ 于瑞厚、害延军，《青海人口问题探讨》，《人口与经济》1981 年第 4 期，23～26 页；李德滨，《解放后黑龙江移民问题探讨》，《社会》1983 年第 1 期，13～17 页；田方等，前引，321～322 页；吉平阎瑞，《内蒙古的人口迁移》，《人口与经济》1987 年第 1 期，29～37 页。

的，也有往农村的，不过前者比后者稳定得多。当年青海和宁夏的下放农村就是以失败告终（似乎只有劳改营才是例外的），在内蒙，1984 年城镇外来人口比例是 28.8%，而在农村只有 8%①。

所以，就算可能有个别的特殊情况，总的来讲，大批知青虽然安置在落后的边疆地区，然而无甚得益。后来他们突然离开那些地区之中大部分的农场，也没构成太大的问题，除了在南方地区 1979 年春耕那一段短时期，曾经有过一点儿麻烦。不过，很快就有当地的农民或其他自愿移民来的人替代了他们②。其实，知青们走了以后农场的陆续重组倒是有一番成绩。就像长年入不敷出的云南省农场，1980 年就取得了 4 100 万元的收益，而在过往，单是 1979 年就亏损了 1 800 万元③。当然，农民代替了知青这一点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情况的转变。全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主导因素。这个现象至少告诉我们，把知青安置到农场去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

唯一能在农村发展中派上真正用场的，看来是那一群得到了需要某种教育水平的工作的知青，为数极少，只占总数的 10% 到 15%④。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的落后乡村，在这些地方他们才能略微作出一些贡献⑤，因为在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一般都能找到受过教育的当地农村青年。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通常比城镇的低，在这种情形下，城镇知青是有一定用处的。在农村的发展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当教师和“赤脚医生”，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会当上干部，当上了，也只是在共青团和宣传部门工作。这一小部分知青所能起到的不大不小的作用也不足以说明大规模下放知青去农村是有充分理由的。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制定出一套政策，能够真正符合农村及边疆地区需要，

---

① 冯浩华，《对青海移民与垦荒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1983 年第 5 期，52～57 页；《人口年鉴（1985）》，567 页；吉平阎瑞，前引，29 页。

② 见本书，152 页，注②。这些自发移民是来自人口极度密集地区或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农民。

③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84 页。

④ 见本书，301 页。

⑤ 黑龙江省甘南县有一例，见田方等，前引，97～98 页。

而又不会像下乡运动那样付出代价。关于人员的派遣，新的变化主要是下面两点：首先是重质不重量，就是说派去的是高校毕业生[1]、技术人员与专家；其次，为了鼓励这类人员去那些条件艰苦的地区，不再简单地要求他们有牺牲精神，也不再光是采取强制手段，而是以褒奖来作为补偿（较高的工资，较快的提升）[2]。例如，头一个志愿去宁夏省的博士生立即就坐上了省教育局副局长的位子[3]。那些自愿迁移到这类地区工作的人都可以保留他们的城市户口以及城市的物资配给定量供应，而且在若干年后可以返回城市居住[4]。然而，任凭如何，这项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阻力。1978 年以后，20 世纪 50、60 年代走的专家们大批返回城中，但在某些地区，这些“流失的人才”并没有全部被新来的人所替代[5]。知青在农村通常的工作是中小学教师、卫生员、护士、助产士，等等，他们离开以后，主要是依靠在邻近城镇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来继续完成这些工作。因此，也特别强调有必要充分发挥这些青年人的潜力，并主张给他们提供补课进修的机会[6]。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入学考试不合格，最后还是能进入大学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毕业以后得回到自己的家乡[7]。这种充分利用本地人才的办法比下放知青去农村的政策现实得多。即使有的知青下了决心扎根农村，但为了适应艰苦的环境，他们总会遇到重重困难，而且对当地人来说他们总是“外来人”。

这些改革自然远远没有解决广大农村的发展及现代化的问题，而富裕城市与贫穷农村的两极分化却愈演愈烈。实现农村现代化及提高

---

① 见本书，205～208 页。

② 见田方等，前引，135～140 页。

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 年 4 月 16 日第 8 版。

④ 见田方等，前引，140～142 页；黄国初，《经济发展战略和人口迁移政策》，《人口与经济》1985 年第 1 期，36～37 页；亦见本书，206 页。

⑤ 见田方等，前引，139～140 页；《人口研究》1985 年，573 页。

⑥ 《人民日报》1981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17 日以及黑龙江电台广播，1984 年 7 月 18 日，分别刊于 *FBIS*，1983 年 3 月 21 日和 1984 年 7 月 20 日。

⑦ 《光明日报》1983 年 3 月 16 日第 1 版。

农民教育卫生水平的首要条件是他们得先富起来，起码得摆脱贫穷，发展经济不再仅仅是为了糊口。在这种思路下，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笼的农村改革政策与以往相比，是绝对地有利于农村发展的。20 世纪 60 及 70 年代，大约 1 800 万城镇知青被派遣去乡下，其中只有几十万人在几年之间能对农村作出一定贡献，而大多数对农民来说只是个沉重的负担。

缩小城乡差别

缩小“城乡差别”，这是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最为人提及的理由，唯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对农民来说，城市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所以城镇青年的出现，首先就使乡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有了较清晰的印象。实际上，尽管中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接待知青的只是一部分乡村，然而是不可忽视的。吉林在运动中一直是走在前面的一个省份，1977 年那里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接待过知青户①。在最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接触及认识长期来看应该对该区人民的精神面貌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文化层次上的融合，当然这并不否定在某些情况下相反会引起排斥和冲突。另一方面，千百万知青通过亲身体验深刻地了解了农村社会，有一些还感受到了“异族情调”的文化。他们又与家人朋友分享那些经历与反思，就是说他们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了大部分的城里人。后来，他们之中的一些成了作家、电影人或画家，又将他们亲身经历中得来的印象和体会，甚至见到的影像，全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广泛传播②。某些情况下，乡民与知青一直保持着联系，下乡运动的影响仍在继续。在一个户口制度严格、商业交易又有各种条条框框的国家里，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来往接触是极其有限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正好令社会上这两大族群互相有了较好的认识了解。不过千万别夸

---

①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84 页。

② 席扬，《知青笔下的中国农村》，《当代文艺思潮》1987 年第 6 期，56～63 页。电影方面，可见由插队西双版纳的北京老知青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绘画方面，见《美术》1984 年第 11 期，10～11 页。

大了这种接触的重要性。我们觉得，在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城镇青年相比，在城里念过书的农村青年起的作用明显地重要得多。一方面，乡亲们比较容易毫无顾虑地把责任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很想到城里生活，但是总体来看，他们受到发展农村远大理想的激励远远比城镇青年强烈。

下乡运动缓和了城乡两极之间的互不往来及互不了解的关系，但并没有改变植根于人们思想里的等级观念，反而是更加深了[①]。长期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准则，运动将此明显地推到了次要的位置。其实，在所有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眼里，在城里从事体力劳动也比在乡下从事脑力劳动强。此外，这场运动给城里人留下了那么一种集体记忆，以至于令他们认为宁愿失业，也不下乡。1984 年接受访问的一位 19 岁失业青年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他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可他却感谢邓小平，因为没有邓大人，他就得去下乡[②]。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行的好几个意见调查问卷都说明，为改变城市比农村优越的思想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到头来是满盘皆输。这种思想在上海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们可别忘了上海当年是下乡青年比例最高的一座城市[③]。只需看看征婚启事就可以发现社会分化到了什么地步。征婚者经常是把持有城市户口列为找对象的首要条件[④]。城里人看不起种地的，下乡运动一点儿都没能消除这种传统思想，也没能减轻一点儿。结果，到 1978 年底，政府还给自己制定了一项任务："在全社会树立以务农为荣的新思想。[⑤]"

城市比农村优越的观念之所以在下乡运动期间反而得到加强，那是因为双方都互相了解了，因此对两方之间的真正差别就更清楚了。

---

① 见本书，282～283 页。

② 张辛欣、桑叶，《北京人》，204 页。

③ 《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299～301 页；蓝成东、张钟汝，《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倾向》，《社会》1982 年第 2 期，22～25 页；A. P. L. Liu, Opinions and Attitudes of You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Survey*, 1984 年 9 月，982 页。

④ 例如，一名中学教师征婚，要求女方是"吃商品粮的"（城市人的特权）；见《中国妇女》1984 年第 12 期，43 页。

⑤ 《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5 日第 4 版。

无论是下乡运动还是其他各种政策，都没能在事实面前贬低市镇生活的优越性。不仅没有对这种城乡之间根本的不平等提出质疑，在生活水平上两者之间更出现了鸿沟：1964 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平均消费比例是 1:2.33，1978 年上升到 1:3.15[①]。这种倒退现象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因为政策鼓励自给自足及严格限制商品交流[②]。下乡运动对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无能为力，事与愿违，知青下了乡，反倒加重了农村人口的负担。

运动也没有正视城镇人和乡下人身份的基本区别，那是由户口与配给制度所造成的。20 世纪 80 年代起，某些中国专家才开始承认这种社会结构上的人为分化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城镇户口高于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高于乡镇户口，大城市户口又高于中小城市户口，这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社会现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户口成了比什么东西都重要的命根子。"[③]

为了真正消除城乡人口身份的不平等，就应该去检讨户口制度本身，而不只是剥夺千百万倒霉的知青在城镇居住的特权，然后奉送给从农村来的同等数量的新特权所有者。

我们甚至都不能真正地说下乡运动在城乡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道桥[④]。鉴于这种迁移方式是强制的，知青插队到农村就像是随便扔块木板，而不是修建桥梁。由此引起的问题令毛泽东派分子不得不同意建立一种组织得较好的制度，就是说迫使知青接受的文化及经济方

---

① C. Aubert, Capitalisme rural ou économie socialiste? Les relations villes-campagnes et les réformes agricoles en Chine, *Communication pour la Huit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agriculture en URSS et dans les pays de l'Est*, 1987 年 8 月 7～10 日，12 页。这些报告是以中国的权威部门所作的抽样调查为依据作出来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总的消费数字来计算，得出的结果大致相同：1967 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大部分是城市人口）的平均消费比例是 1:2.26，1977 年为 1:2.91，1982 年为 1:2.36，《统计年鉴（1983）》，484 页。

② 见费孝通的论文简述，刊于 *China News Analysis*，1259，1984 年 4 月 23 日，特别是第 5 页。

③ 丁水木，前引，19 页。

④ 像 R. C. Kraus 在一篇文章里那样说，见 The Limits of Maoist Egalitarianism, *Asian Survey*，1976 年 11 月，1 095 页。

面的落差没以前那么大：株洲市创立的在郊区分头组织知青场队的下放制度。这个制度虽然只涉及到少数知青，但这是一种真正的尝试，通过父母工作单位和农村接待社队之间的组织及经济联系，在城乡之间建起一座桥梁[1]。然而，这种尝试也是强制性的，因此得不到主要的三方面：知青、农民及城镇工厂的心甘情愿的接纳。

1978 年以来，尽管众多的中国专家提出意见，政府里的改革派们也没有着手去考虑打破户口制度。然而，随着经济改革，户口已经失去了一部分重要性。取消消费品的定量分配，容忍农民工大量地迁入城镇并为他们制定了临时户口，这些倒真的是在城乡之间架起了几座桥，比起毛泽东时代下放城市人去乡下见效多了。然而，这些乡下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是二等公民[2]，一个农民，就算他在城市生活，也不再种地了，可是在中国社会里他和一个城市人的差别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没有毛泽东时期那么鲜明而已，那是多亏了改革。

有关 1968 年掀起的下乡运动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似乎很负面。不过，既然我们认为运动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意识形态上，那首先就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评价。

---

① 见本书，103 ~ 106 页。

② D.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J. P. Béja & M. Bonnin, La mort du village du Zhejiang, *Perspectives Chinoises*, 第 32 期，1995 年 11 ~ 12 月，6 ~ 10 页。

第十四章
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结

作为政治赌注的下乡运动

如前所述，下乡运动的政治赌注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分散红卫兵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继续革命，发起一场新的运动来阻止社会趋向稳定。这两个目标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其实都能让毛泽东强化他手中的权力①。

把红卫兵及城镇青年大批下放到农村去，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他可以因此摆脱一股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政治势力，又可以防备另一股与他正在为自己建立起的新秩序相对抗的势力在城市里凝聚壮大。从这个角度看，下乡运动的结果对毛泽东来讲显然是有利的，起码短期里是这样。但长远来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下放农村以及大学新招生方案不过是暂时地堵塞了培养新的知识及政治精英之路。毛泽东担心这些人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并和他的对手结成联盟。然而，下乡运动引发的不满情绪，加上社会控制在农村相应较弱的条件促使了异端政治文化取向的萌动。虽然这些异端态度平时是处于隐蔽和无组织的状态，但是，机会一到，也曾经在光天化日下爆发

---

① 见本书，37～41页。

出来，甚至是在城市里[1]。

伟大舵手把下乡运动作为手段，以图向他的政敌肯定他对社会的“魅力领袖”权威，这个意图的总结算，在短期里是成功了，但长期来看就完全相反了。

诚然，毛泽东能够把持着这个权力直至他去世，那是由于他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至于下乡运动，尽管对社会及务实派们作了某些让步，他还是成功地避免了让运动变成一项简单的解决城镇劳动力过剩的办法。

这是一场“魅力领袖”型的运动，突出思想意识和革命道德，并与毛泽东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场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的进行只靠着主席的一条最高指示，而没有其他合法或合规定的依据。不仅如此，这场人口大迁徙还显示出是由主席本人亲自在左右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正是典型的毛泽东派思想意识目标。此外，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亦旨在按伟大领袖的标准塑造新的一代，并让他们重新体验他本人经历过的一切。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就是这样写道：“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就没有今天蓬蓬勃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 然而，与此同时，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不满情绪转向了它的始作俑者。相当多的知青把他们的苦难怨恨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以至于成为当过知青也似乎可以是构成反毛泽东的足够理由。王辅臣因参加民主运动在 1979 年 4 月被捕，1980 年 12 月底被控“诽谤罪”判以 3 年徒刑，上海的一份民办刊物曾经这样为他辩护：“所谓诽谤，指的是王在人民广场张贴的大幅标语，其中有一条大意是：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王是插队知青，毛泽东推行的上山下乡政策，使他身受其害。毛泽东左倾路线给国家带来的浩劫他也亲眼目睹，所以对毛泽东大不敬。他没有理论素养，也没有做过深刻的研究，感情

---

① 见本书，371～375 页。

② 《光明日报》1976 年 9 月 27 日第 3 版。

用事地对毛泽东作了评价，具有出气的性质，这是可以理解的。"①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毛泽东不满以至离弃的情绪日益普遍，其中确实有多重原因：人民已经厌倦了在寥寥可数的经济成就下，运动却无休无止，政策又反复无常。然而正是在毛泽东要从修正主义魔爪下抢救出来的，而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过他的老红卫兵及知青中，他的威信跌到了最低点。这一代青年1966年在毛泽东的怂恿下曾经喊着要打倒一批中共老干部，最后却与他们结成了半公开的战略联盟，齐手对抗毛泽东派分子，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失利是显而易见的了。李一哲大字报、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离世后又有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这些历史事件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有一个联盟存在于毛泽东曾想培养的一代年轻人与伟大舵手的党内宿敌之间。这种结合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理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溃败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只是在他离开人世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上面已经谈过，坚持在政治行动中突出思想意识目标加强了毛泽东的领袖个人威望的权力，因为伟大领袖在这个领域内掌握了一定的垄断权。思想意识目标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式下乡运动能持续到始创者去世，甚至还再长一点儿时间，这一事实就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的政治胜利。然而，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在他所维护的思想意识目标上并不是持单纯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他是真心希望目标能早日实现，就算只是为了在他本人肉身消失后还能继续存在。因此总结就是在这一点上最有研究价值。

意识形态上准备达到的目标

1968年提出的思想目标既是多重的又是统一的②。主要是对被修正主义腐蚀了的城市青年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由此可避免因他们的背叛而引致中国"变色"。想上大学或者干部想

---

① 《民主之声》第6期号外专刊，1981年1月6日，2页。

② 见本书，22～36页。

提升，与群众结合以及参加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各类选拔的标准并不是青年人的专业成绩，而是要看他们的态度是不是“革命的”。

以德甄选

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在战争及革命的非常时期里，个人行为的意义和真诚是比较容易判断的，除了这种情况，魅力领袖的专制制度（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与能力的基础上）只会鼓励人们虚伪、保守、告密。这种表现在下乡运动中泛滥成灾。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的理念早就被绝大多数知青从心里否定掉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比如说有机会上大学、回城或者是获得提拔上一个非农业职位，原则上所有这些都得看知青思想改造得怎么样，这时他们就会想法子，以外在的表现来证实内心世界已经得到改造，大多数情况下全是心口不一的两面派。这种制度并不排除为追逐好职位的竞争，但却用单一的政治竞争来替代过去的政治业务并重的竞争。然而以德甄选的制度并不能保证那些未来负责干部对革命是否忠诚。知青们不遗余力地表白自己的革命信条，然而与他们的真正情感之间有如此大的距离，以至于很难令人信服。事实就证明了那些起带头作用的最先进的积极分子通常是最早离开农村的，因此这项以德甄选的政策只能导致全面感染犬儒病。

虚假伪善与犬儒主义不是这种选拔制度唯一的缺失。其实，以德来管治并不受法律的约束。因而在下乡运动中，谁可以不下乡、谁可以回城、谁可以得到提拔，有关这种种问题，很少有客观的规范的标准。原则上，是由能够表现出革命思想的先进态度来决定的。这就赋予了干部们一种可任意使用的权力。由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只靠几条几行字的最高指示来领导中国，所以必须得对任中间人的干部们有信心，才能贯彻执行他本人的旨意。很明显，事实上，不是群众而是干部在决定知青的命运。因此，以德甄选的制度助长了阿谀奉承以及形形式

---

① M. Weber，前引。

式的行贿收买的风气（送红包、枱底交易、非法受益，等等）。

新精英甄拔多样化的真正所得并没能把那些意外的恶劣效果抵消掉。不仅干部子弟受益了，而且由于强调阶级成分的重要性，这种得益就合法化了。自然，工人和贫农子弟也因此有些得益于这项阶级优先政策，但远不及干部子弟。实际上最常见的是，原则道德为标准的甄选变成了拣选家庭出身，本来准备要防止的身份地位的世袭制度，结果在干部这一阶层里反倒是更变本加厉了①。这么一来，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感到非常沮丧，如今他们是归入了“反动阶级”的另册，然而“文化大革命”前，在大中学生里，只有他们和干部子弟并列被视为培养对象，是未来的专家及干部。毛泽东派的政策并不排斥重建一个“新阶级”，正相反，是以其来净化这一个由毛泽东判定为可憎的危险分子组成的阶级：知识分子。这一代城镇青年从小就树立起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现在大谈甄选淘汰得看出身，使宿命论又重整旗鼓还朝了。

从培养具有“纯洁”思想的新精英的角度来看，以德甄选政策的执行结果好像并无实效。而毛泽东的继承者认为尤其严重的是，在全力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同时，不再培养高水平的专家，连中等教育水平的人都不培养了。今天统计出来的数字显示，在 1966 ~ 1976 年间，大学生毕业生减少了 100 多万，技校毕业生减少了 200 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了下来。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②。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教育质量及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的普遍下降。究其成因，一方面是因为提供的教育完全偏重于政治宣传及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 1968 年开始执行的以德甄选的制度使学生完全失去学习的动力。升级考试取消了，教师威信日趋低下，这样，学生

---

① 我们掌握的资料完全证实了 M. Whyte & W. Parish（前引，51 ~ 53 页）在这点上的论据。根据一项抽样调查，与工人子女相比，高干子女入中学多 1.7 倍的机会，入大学则多 2.7 倍的机会；见 X. Zhou, P. Moen & N. Tuma,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 1949 – 19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1, 1998 年 7 月，213 页。

② 张化，前引，150 ~ 151 页。

怎么会去勤奋读书，简直连课都不愿上了。特别是把学生的学业成绩与中学毕业后的命运截然分开，这就让人感觉到念书是没有用的。很快，“读书无用论”就在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中广泛流传开了，在城镇和在农村都一样。在城里，学生们很清楚，他们的学习成绩好坏对今后能否躲过下乡一关不会有任何影响；就算有幸留在城里，对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也不会起任何作用，所以他们都无心向学。在农村，城镇年轻毕业生都被迫下乡来种地，而农民出身的初高中生也陆陆续续回乡了，眼见这些事实，人们自然不会看重读书了。

此外，知青在学习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样）得到的知识很少能在农村应用，可以说下乡运动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以德甄选制度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这在毛泽东后期的政策总结里占着重要的一章。一则非官方消息曾谈到，邓小平在 1977 年底决定恢复高考，天津市的保守派市长发现新入学的大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重降低了，居然打报告揭发“新的招生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邓小平即刻回复，写下批语：“救国要紧。”①

事实上，毛泽东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人才大浪费，也没有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对所有学校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②，可是总的游戏规则依然是：干部子弟进高中上大学都享有优先权，在好的学校里他们依然占很高的比例。另外，从学校毕业出来以后，学业成绩不再列入考虑因素，只以出身作为淘汰标准，与过去相比，这种制度更令他们占尽优势。1968 年制定的甄选政策并没有缓和各种不公，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青年想靠读书博取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发展个人事业的权利被剥夺了，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

---

① 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第 156 期，1978 年 12 月，16 页。

② 看来，这种取消并不意味着教育系统中不再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隔离。重点学校录取的高干子女仍然占极大比例数；与 Y. J. F. 的访谈，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他是北京四中的教师。

把知青改造成为“新型农民”

下乡运动比起以德甄选新的革命精英还要雄心勃勃的另一个目标是，将千百万城镇青年“知识分子”改造成“新型农民”，这样就可以加快消灭“三大差别”中的两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别。这种改造采取自愿接受再教育的方式，要求知青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指自私自利、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农民），从而蜕变成只为人民和革命服务的“新人”①。想达到这个境界，他们只需下定决心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因为贫下中农就已经具备了青年“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

正如第九章中所谈到的，知青是无法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农民打成一片的②。他们也没有融入到真正的农民的圈子里。生活水平差异极大，农民对他们存有戒心。特别是农村只能赋予极少的个人事业发展的可能性，面对这一现实，即便他们是自愿下乡的，自我牺牲的理想通常也坚持不了几年。当年毛泽东曾应允过他们可以在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后来大多数不得不满足于沉浸在既单调又累人的农活儿中。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镇青年，最后沦落为一个农业工人，这未免令人大失所望、灰心丧气，这种情绪很快就变得难以忍受。农民子弟也有类似的问题，在城里念完了书回到农村，就觉得是退回到愚昧的生活环境。一位回乡知青在一本青年杂志上大吐苦水：“在农村，无非是吃饭、睡觉、挣工分；结婚、成家、生儿女。别的，想也没有用。”③

因此，改造成农民的知青屈指可数。心甘情愿来到的青年，最初满怀为农民服务的崇高理想，誓为他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农活儿不过是临时的工作，可以让他们完成“自我改造”及深入到群众中去。然而，后来顺理成章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不让他们干地里的活儿了，

---

① 在当年还没有使用这个说法，但内含之意完全是这样。

② 见本书，267～271页。

③ 《青年一代》，1980年第2期，3页。

他们就分别当了教师、赤脚医生、技术员或者脱产干部。“返城风”刮过之后，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无可奈何地留了下来，大多数情况下干的也是农活儿以外的工作。通常他们都离开所在村子去当县、区或省一级的干部、专业人员或者工人，很多到最后都能成功地被调回原来的城市①。

受过教育的城镇青年没改造成“新型农民”。其实，虽然政府还是给了知青一些思想意识层次上的补偿，但整个下乡运动是在和平时期少见的大规模的“下降流动”②。如果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是简单地意味着把城市里的受过教育的青年及脑力劳动者降为农村体力劳动者，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强大的推动力。知青与知识分子认为那既是倒退的（把历史车轮往后拉）又不公平的（某些人可以逃避）实验。

当然，可以想象到毛泽东会期待知青们的雄心壮志，但他并没有对此抱有过什么幻想，他只希望改造他们，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要令他们脱胎换骨，这就解释了下乡运动的强制性。然而，这场“变相劳改”（林彪给下的定义）还不够严厉，以至不见成效。包若望（Jean Pasqualini）描写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劳改营里如何进行日常思想工作及不断收紧强制监视网，为的是让囚犯精神上屈从于他们③。这样得到的结果依然是很有限的，而且并不长久。我们觉得人的头脑是永远不会被绝对“清洗”的。村子里，甚或农场里的社会监控制度，不管怎么做，也没能把知青改造成农民。

知青非但没有变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人，相反，他们很快就发现贫下中农离着宣传机器塑造的理想形象十万八千里，而那些是给他们前进道路上树立的模范啊！他们后来在中国社会里很难再找到可供替换的模范人物。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及林彪，为了争权夺利

---

① 在边境地区，如内蒙古和云南，有几个北京、上海等地的老知青被提升到省一级的相当高的干部职位；与多位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交谈，1985年8月21日。另见周秉健的例子，本书167页，注释②。

② D. Davis, " Skidding" : Downward Mobility among Children of the Maoist Middle Class, *Modern China*, 18 (4), 1992年10月, 410~437页。

③ J. Pasqualini, *Prisonnier de Mao*, 1975.

搞激烈的斗争，从而立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这种改造人的灵魂的尝试完全没有成功，只留了在乌托邦的范畴里。但是，虽然知青没有按原来的计划被彻底改造过去，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让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改变过来。问题是朝哪个方向。

培养“革命接班人”，重塑一代新人

毛泽东先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之一是培养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代忠于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接班人，一代可以防止滑入“修正主义”道路的接班人，这样就能令资本主义国家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中国革命家身上的希望落空①。毋庸置疑，让那么多城镇青年去接受那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毛泽东塑造了一代很有政治特性的青年人，然而，那并不是继承他的革命事业的一代人，而是和当今制度提倡的价值观，尤其是和他本人在世最后 10 年努力建立的价值观决裂的一代年轻人。

一代人的树立有赖于青年培养期间所感受的共同历史经验，而这种经验会衍生出某些特殊的思想方法和为人处事作风，以及一种群体意识。历史经历越特殊，甚至是越令人精神受重创的，这种意识就越强烈②。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一代包括老红卫兵，在毛泽东式教育路线占上锋的时期（直至 1977 年）中学毕业后被送往农村或者工厂、矿山、军队的城镇青年也都包括在内③。这一代人大致上是1947～

---

① 见本书，23～24 页。

② K. Manheim, *Le problème des générations*; C. Attias-Donfus, *Sociologie des générations*。

③ 然而，本人觉得 H. Siu & Z. Stern 首创的“毛泽东的一代人”这个概念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p. XV, XXIV）。我认为不可以将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初期培养的作家，如张洁、刘心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之后涌现的作家，放在同一个类别里。无论如何，牵涉到的作家也会表示异议，群起而攻之。张洁就通过她的女主人公之一来明确指出：她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既不像上一代人那样盲目乐观，也不像下一代人那样盲目悲观”，指的就是红卫兵及知青一代；见张洁，《方舟》，《收获》1982 年第 2 期，43 页。

1960 年间出生的城镇人。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之中大约有一半下乡当过农民。1997 年底，仍然留在农村的及已经回城的知青总数几乎占城镇人口的百分之 15。下乡的时间平均为 6 年[①]。其实，不少知青待在农村的时间或者没那么长（2～4 年），或者更长（8～11 年）。

老三届是受影响最深的一群，他们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出生的。首先在中学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接着被宣布已经毕业了，然后就被大批大批地送往农村去了。“文化大革命”教会了他们独立思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过。当然，他们是生长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高度崇拜的时期。不过，毛泽东思想比较笼统，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各取所需，所以年轻人要选择参加哪一个组织，要挑选毛泽东思想中哪一个部分，主要都靠自己的个人决定。“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他们的政治嗅觉，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龄人，他们可敏感得多。事实上，两年间，对他们来说，政治不仅成为必需顶礼膜拜的宗教，而且还是他们日日夜夜关注的切身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也令他们积累了自行成立政治组织的经验，在这类制度的国家里倒是罕见的。此外，这场运动还给了他们机会去发挥从小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即便他们的希望后来都落了空，他们中间某些人还依旧耿耿于怀。

但是，也别再奢想这一代人会毫不犹疑地追随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对红卫兵的镇压和林彪事件使他们学会了对崇拜的偶像及政治理想提出怀疑。下乡运动中他们直接体会到了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老三届对下面几届学生影响相当大。那些学生虽然由于年龄较小没能完全经历“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也亲身体验了基层社会（农村或工厂）的现实，他们的知识才能被埋没掉了，也得不

---

① 1993～1994 年间在中国 20 个城市做过一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对象是有代表性的上海居民。根据这项调查，曾经当过知青的，每人平均在农村度过的时间为 6 年（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年 2 月，16 页）。本人曾经根据一本见证集（沙飞等编，《苦乐年华》）里面的 108 名老知青在农村长短不同的逗留期做过一个计算，结果是平均每人待过 6.61 年）。

到与他们的教育水平相符的工作。

这一代青年总的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源自“文化大革命”的群体意识。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将拯救中国乃至社会主义的神圣任务交付给了青年人，而且只交付给他们，不交给别人。可是后来，这种作为被“钦点”的一代的成员所感受到的抽象情感，被红卫兵之间派性分裂一笔勾销。然而，下放农村又把这些同是被城镇除名的青年人拧在一起。由此产生的团结意识很快就祛除了早先的分裂。

下乡运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恢复了，他们的这种感情也更加深了，因为这意味着一场实验的结束，他们之后再也没有人被当作试验品了。另一方面，大批回城的知青在重新纳入社会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令他们之间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从而组成了另一个被排斥的又不为人理解的社会阶层。就是在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作家开始出版一些作品，他们自我认定是他们那一代的发言人，公开宣称他们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有过独一无二经验的社会组别。这些作家们都声称，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要为他们那一代人说话，而他们的创作灵感经常是来自亲身的下乡经历。在大量的例子中，我们在下面抄录一段女诗人舒婷的见证：“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听过吉他悒郁的乡思，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中，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 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我拿起了笔。”①

他们的作品的名字通常都包含有“我们这一代人”这个说法或者

---

①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载于王蒙等，前引，283 页。“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是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的第一句。《南行记》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描写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云南和缅甸流浪的情景，也揭露了殖民主义的恶行。

概念①，很多都题了词："献给1 700万知青"、"献给老三届"还有"献给长埋农村的知青"。他们经常借这些书的主人公的口表达出那一代人的种种诉求，其中为首的就是要求承认并接受他们是与上一代不同的。在一本小说里，一位知青这样对他的女朋友的母亲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走的路和你们当年是不同的，不同，一点儿也不同！"②

毛泽东在1966年把年轻人推上打倒他的敌人以及"破四旧"的最前沿，那时候红卫兵站在了前辈，而且经常还是他们的父母的对立面。随后，下乡运动中的特殊经历令他们有别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在他们这一代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一事实不仅被他们自己一再肯定，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尤其是他们的前辈。老一辈人面对他们的子弟的思想与行为总是表示惊讶或者不理解③。自认为属于特殊一代的感觉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④。张抗抗曾经对这一现象做过很好的描述：尽管在重新寻回的城市社会中，知青老战友们四散各处，各人命运不同，但这种感觉依旧顽强地存在着⑤。自回城以后，老知青之间团结一致互相扶持，这就是那种归属感的最好诠释。这儿有很多例子。集体企业单位招工，特别照顾老知青，因为负责人本身也是⑥。另一位已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干部的前知青在上头为留在当地做了地方干部的老知青说话⑦。还有一位成了文学评论家，

---

① 见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王培公，《WM我们》；成正和，《我们都是年轻人》；亦见舒婷的诗《一代人的呼声》，引用在本书扉页。类似的书名、题目，可以抄录多页。

② 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前引，427页。

③ 顾工，《两代人》，《十月》1980年10月，49～51页。

④ 已经出版了大量小说，讲述下乡运动及这一代人的经历，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出版。其中一本的主人公向一名外国记者解释现今仍在世的五代人的特征。他特别强调第四代人，就是前红卫兵与知青，他也属于这一代，包括作者，他们具有非凡的优秀品质以及历史重要性。见柯云路，《夜与昼》，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631～634页。

⑤ 张抗抗《塔》，前引。

⑥ 1979年以来在中国进行的多次访谈。

⑦ 《青年一代》1984年第6期，35～36页。

看到一位知青作家被围攻，就义不容辞出来为他辩护[1]。这种团结互助并不能消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划分，正像地区间的互助那样，它既起缓冲作用，又使问题复杂化，因为它既令不同阶层的人士有所沟通，同时又将新的分歧引进各阶层内部。

无论是知青本人或是其他人所感悟到的，这一代人的特点具有两重性，可以用一个双重定义来界定：既是失落的一代（或称迷惘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如同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屠宰场”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对童年时期学到的的价值观，这失落的一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幻想，也不再信守[2]。他们曾经被美丽的言词所欺骗，又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他们得亲眼见到才会相信，当然还得要他们愿意去相信[3]。因失去理想而带来的空虚感使某些人采取了愤世嫉俗的犬儒式人生态度，同时也使另一些人萌生心愿去寻找更有说服力的价值观，不过总是有点儿失望。

我们说“失落的一代”，也是因为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机会，所以也称“耽误了的一代”（运动使他们耽误了许多时间）[4]。后来，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大转向就把教育水平和毕业文凭提升到了社会评价的第一位。这么一来，当年的那个耽误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致命的了。从 1977 年恢复高考起，不少知青就千方百计重新投入学习，但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能

---

① 见徐明旭，《论“新星”，“夜与昼”的政治、文化价值》，《当代》1987 年第 1 期，260～265 页。徐明旭，就像他在该文中所为之辩护的柯云路，也是这一代的作家之一，是小说《调动》（前引）的作者，他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② “失落的一代”这个词组似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Gertrude Stein 在巴黎首创的。他曾经听到一个修车师傅用这个词组来责骂徒弟，后来他向经常来往的 Hemingway 说：“就像你们所有人那样，你们这些去打过仗的年轻人，你们是失落的一代。你们什么都不在乎。”见 J. Taylor, Hemingway and Co. : le Paris de la 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nde*, , 1986 年 7 月 25 日，也见 E. Hemingway, Une génération perdue, *A Moveable Feast*, E. Hemingway Ltd. , 1964。

③ 他们的怀疑一切的思想在北岛的名为《回答》的那首诗里表现得最充分。诗中最有名的那句说得很简单：“我—不—相—信！”见北岛，《北岛诗选》，25～26 页。

④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王照华使用过这个词组，他也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见《中国农民》1994 年第 12 期，19 页。

上大学。其他的，很多都不得已只好上夜大或者电大。他们以无比坚定的毅力，部分成功地挽回耽误了的时间，这时他们已经有一份工作，成了家了，有孩子了。他们就是得这样“一切从头来”①，这一事实更增强了他们对“耽误了的一代”的归属感。根据一位官方作者所说，这也是“在一个时期里的一部分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原因”②。

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家庭一向很重视教育及文化，如今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他们的子弟虽有文艺科技方面的雄心壮志，但发展的道路全被堵塞了，因此这些年轻人心中的苦衷是尤其难言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儿子吴欢，“文化大革命”后不得不下了乡，而他在1966年才刚刚念完小学。在作品中他以讽刺的手法把那种苦涩描写得淋漓尽致：“据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社会主义也搞了几十年，闹了半天，小学毕业生也能算‘知识青年’。算就算吧，去的时候是知青，回来的时候成了傻青，到底是什么青，至今也弄不清。一晃10年过去，连青都不青了，只余一肚子窝囊，满脑门儿晦气。想起这些往事，脸上倒是发青。”③

以同样的自嘲风格，吴欢将他的作品称作“傻青文学”，与“知青文学”相对应。这种幽默不能掩盖对下乡这种艰苦经验的狂怒。在一本短篇小说里，他象征性地刻画了一位知青怎么在一个雪夜长途跋涉去借一本书，结果在和两只恶狼的搏斗中把书丢了。

“浑身的细胞都开始歌唱，开始咆哮了……他觉得这狼太可恶了，他觉得这些年太倒霉了！太别扭了！太受欺负了！太痛苦！太他妈的了！他觉得今天夜里太不叫玩艺儿了！吃的苦太大了！他一下子又把狼头狠狠摔在树上，直到把这畜牲摔晕，摔死，口喷鲜血，才放手。”④

人们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政策是对的，因为他怀有以教育政策去反

---

① 肖复兴，《柴达木作证》，前引，152页。
② 张华，前引，152页。
③ 《解放月报》1988年2月，60页。
④ 吴欢，《黑夜，森林，傻青》，《当代》1985年第6期，212页。

对社会再生产（即阶级地位世袭）的革命精神。然而，一方面，降低受教育的优越地位并没有涉及干部那一阶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子女是付出了在社会流动方面最高代价的一群。但，不仅仅是他们，与他们同龄的整整一代人都蒙受了教育方面的损失①。

诚然，这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幻想也一一破灭了，但不能仅从这一点就否定全盘。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中获取了独一无二的经验，那是他们的下一代（1978 年后形成的）所不具备的，那也是在多个领域里可以打得响的重要王牌。大家都普遍承认当今属于这一代的干部、车间总管或是企业领导在尊重现实、务实态度及决心毅力上都令人刮目相看。这一代人里已经产生了一些艺术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数众多的作家。他们都善于在自身的经验中汲取灵感，从而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张辛欣谈到过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出版的文学刊物中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②。在社会科学方面，属于这一代的研究员们极善于充分利用他们对社会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敏感嗅觉，从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③。那些有幸完成大学学业的老知青，从 1980 年起，在推行农村改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一咨是农业问题专家，他高度赞扬老知青的水平，将他们聚集在身边，在 1980 年成立了农村发展研究组，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提出别出心裁的建议，极大地帮助了改革派领袖们作出决定。以前的干部有时也到农村去，但是他们绝少对农村现实有像知青们那样的深刻了解，他们既没有同样的求实精神，也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

① 就像在别处那样，中国从 1977 年起开始实施推广全民教育的政策，而不是那种只惠及社会上的某一群人，置其他人于不顾。这种全面发展的政策最终会对教育上应有的机会均等造成最有利的影响；见 Z. Deng & D. J. Treiman,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2), 1997 年 9 月，425 页。

② 张辛欣，《“知识青年作家”群落的形成和演变》，在上海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1986 年 11 月 4～6 日。

③ 见蒋光宇，《“老三届”是我国人才资源的富矿》，《社会》1985 年第 4 期，14～16 页。

更没有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从政治观点来看，“思考的一代”同样表现出了他们的创造力及独特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感受到了“大民主”这个理想，还有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这都让他们对民主有了一定的向往。然而，在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和专制干部们的粗暴无理进行了思考之后，他们明白了，没有对法制的尊重就没有民主。“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对那些腐败的官僚们做过抨击，后来，这些老红卫兵发现靠“文化大革命”捞了一把爬上去的新干部比起原先的有过之而不及，抨击就更加深入了，直接针对官僚制度本身。此外，这些年轻人过去曾经自愿或非自愿地为毛泽东派的理想牺牲了那么多，因为当时人们大肆地过分颂扬个人的牺牲，结果反倒使他们对个人的存在价值以及应享的权利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最终自问：“在为社会和理想的奋斗中，我获得了什么？”①

这可不是说这一代人个个都变得特别的自私自利或者完全以我为中心的人。道德精神的失落是很难量化的，但必须承认它，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现象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而在当时情况下，受贿者比贿赂者更加道德败坏。老知青一般都仍然对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和国家的命运非常关心，许多人表示一直还都准备着为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牺牲自己或者最少是赴汤蹈火。不过，他们将会是觉醒的个人，而不再是革命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由此，正像我们谈到过的那样，这一代人在天安门事件以及民主运动中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为了要求返城，他们还组织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抗争行动②。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使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往往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以他的观点来看，那些老红卫兵和知青已经变得比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揭露

---

① 《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青年研究》1986年第12期，15页。

② 见本书，152～157、372～379页。

的“修正主义”还要修正主义①。一位老知青把这种相悖的后果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皮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②

在重新评价下乡运动的时候，官方宣传的一句老调子，知青自己也常跟着重复，那就是：这一代人经过农村艰苦生活的洗礼，都“能吃苦”，意思是他们比其他人都更有能力应付逆境，因而可引以为自豪。问题是得搞清楚，对个人或对全民来说，能过艰苦清贫日子是不是就可以被看作是积极因素。国家当然是希望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就心满意足，但是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它的子民，那就是个不利因素，因为习惯接受恶劣条件的人是不会想去改善的。同样的，当年提倡在日晒雨淋中磨炼身体，这也是老知青们至今依然津津乐道的。然而，正因如此，他们比城市同龄人老得快。总的来说，知青们在农村学到的和得到的一切并没能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城镇社会生活。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下乡运动，整整一代人的才智资源被荒废了，这种浪费对国家绝对是惨重的损失。幸好，这些青年人中的一部分靠着自学，或者充分利用 1977 ~ 1979 年就读大学期间以及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夜校里尽力追赶，最后成功地完成了必要的学业。他们不仅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同时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独特的长处也许稍微能补偿专业人士的大量缺失。另外，这

---

① 真的，很多方面都是这样，例如在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今天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这一代人不再相信什么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来进行自我改造，面对“劳动人民”他们再没有当年那些“左倾知识分子”的自卑及自疚。他们自己也当过工人农民，根本不必请求别人的宽恕，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要求承认他们的身份：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完完全全的人民的一分子；见访问作家韩少功，载于《争鸣》1986 年第 11 期，53 页。

② 李银河，前引，102 ~ 103 页。

一代人的经验令他们摆脱各类教条的枷锁，学会不再听信迷惑人的思想宣传，从而敞开心扉去接受新思想。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和下乡运动使他们丢弃政治与思想上的幻想，学会自己想问题，更了解了社会现实。因此，当改革初期拥邓派鼓吹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代人都很反感，因为这就等于否定他们无比珍惜的一部分人生经历，而没有这些，他们就完全丧失自我了。他们这一代人其实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比其他人“多点儿东西”。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甚至明明白白地宣泄出一种作为那一代人的优越感。张承志就曾经这样写过：“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①

老红卫兵和知青之所以拒绝“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是因为那个时期正是他们的青春时期，谁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全盘否定自己的青春。因此，许多作家以及我们的大部分采访对象，在他们返城以后，都很怀念当年下乡的生活。作家史铁生是这样写的：“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②

张抗抗的小说里，有一位知青也这么说过：“一个咒骂过千百遍的地方，离开了却常想念。再也不会有躺在秋天的谷草垛上，望着大雁从头顶的蓝天飞过引起的那种对未来无边无际的遐想再也没有那个年龄，再也没有……”③

这种强化老知青群体意识的反常怀旧感，在那些年轻时期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痛苦事件的上几代人中是很典型的。就像参加过第一次世

---

① 张承志，《后记》，《老桥》，305 页。

② 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载于马尚瑞等编《北京作家谈创作》，195～196 页。

③ 张抗抗，《塔》，前引，19 页。

界大战的老兵，他们的记忆往往只保留着“战壕里的兄弟情谊”；在不断回忆战争恐怖之时，又会不时流露出“一种同情”①。某种“老兵”情怀在老知青身上也所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们就开始结伴回到当年插队的村子里去②。

老红卫兵和知青们的这种同代人特性有其重要意义，必须得到承认，但亦无需过分夸大其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震撼力。作家梁晓声就举过一个例子：朱胜文原为哈尔滨的知青，后来成了该市第一副市长。梁觉得一个知青能高升到这么重要的负责岗位，他本人为之自豪，并大力赞扬该位知青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赤胆忠心。随后，朱因一桩贪污案而被革职，梁大吃一惊，失望之极③。

总的来看，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显得相当负面。运动仅有的数项正面效应根本不足够抵消给国家、给全社会、尤其给知青们带来的损失。官方为这场运动的合理性而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真正达到。相反，却导致了劣迹昭彰的后果，其中一些影响深远。那显然也构成了当时起始的社会气氛恶化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不过，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件那样，失败本身会带来正面的后果，这场运动也不例外。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泽东的继承者进行改革。它也令年轻一代意识到与国家制度性质有关联的相当一部分问题，而他们正是在这个制度下成长的。

毛泽东的急进与极端的政策，在各个领域里都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朝着伟大领袖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进行的。毛泽东离世后，中国抛弃了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抱负而去追求经济利益，结果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还超越了苏联。虽然这些改变转向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总算给了他们的子民多一点儿好处。

---

① A. Prost,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1914～1940, 33、45 页。

② 我们认识的老知青，差不多全都回去过曾经生活过的农村或农场，至少一次，而且经常是结队成行。有些时候，经济条件最好的出资帮助条件最差的，负担旅途费用。自 1980 年代中期始，这种“返乡之旅”开始变得相当普遍了；见《青年一代》1985 年第 6 期，8～9 页；《文汇报》（香港）1986 年 7 月 30 日第 20 版。

③ 晓剑、郭小东，前引，141～142 页。

结 论

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一场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目标的“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本人紧密不可分的。它并没有某些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或经济学专家们所赋予的“合理性”。硬把追求非实用目标的政体合理化，又把意识形态目标简单描述成一件微不足道的面具，这看来都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希特勒当年把灭绝犹太族裔作为他的首要任务，而置国家经济军事利益于不顾，这种思想意识动机绝对是非合理非实用的，连一些纳粹的高级将领都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①。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这种灭绝另一族群的誓愿，肯定是本末倒置。“上山下乡”问题也是同一种情况，仅仅强调经济动因而忽略分析政治因素，尤其是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这一动机（而不是成为“新一代农村精英”，可与过去回乡文人精英相比拟）②，这等于是在官方的话语里，选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部分。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前的运动中，由于城镇就业及教育经费问题，经济动因曾经是居于首位的。后来，由于“文化大

---

① 参看 H. Arendt，前引，282页。

② 这里特别参考本书，61（注释①）页引述的 Chen Pi-chao 的文章。但是许多其他的国外学者当时都陷入了对中共政治运作的经济主义及理想化的错误估计之中。

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的运动表面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混淆了各层面因素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在1968年以后，经济动机还继续存在，至少在某些领导人的思想里是这样。然而应该明确指出，下乡并不是唯一的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尽管表面上是经济原动因）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无法如愿依照自己的意图来管治国家，就在这种情势下掀起第一个下乡潮。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教育领域及各种群众运动中，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是忽冷忽热、大上大下的年代。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逐渐浮现。“大跃进”的惨败导致一场雷厉风行的经济调整，刘少奇，周恩来等掌管实务的领导深信有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一部分青年送离城镇。

但是，如果简单地跟这些青年说是为了发展某种经济模式而必须由他们作出牺牲，那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年轻人需要一种触及灵魂的精神力量来驱动。这就只能求助于毛泽东思想了。对毛泽东来说，思想可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直接关系到他的权力及改造社会的宏图大计。因此，正在他清除“务实派”（或说迫使他们就范）的时候发起的“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就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观念。政治思想动机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和伟大舵手的威望紧紧相连，这就给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下乡”运动开展过程中经济账总要算的，对那些能活到“文化大革命”的掌管实务的领导们（周恩来在先，邓小平在后）来说，那是得优先考虑的。他们试图重新按照他们的逻辑观念行事，结果令局势紧张非凡，可他们又不能公开质疑毛泽东指定的大方向。他们在伟大领袖去世后重新上台执政，这时他们提出要把运动纳入过去以经济利益为诱因的“下乡”模式。但是遭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对。身为实用主义者，他们很清楚，假使坚持推行这项政策，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虽然当时的人口膨胀，形势严峻，他们还是在一场广泛的经济政策改革中找到了办法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当斯大林模式终于被送进了坟墓，中国领导人才发现，曾经被说成是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再没有必要了。

在总结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犯下经济主义的错误。运动开始了，还持续了十几年，那是因为毛泽东的意愿。后来它寿终正寝了，那是因为毛泽东去世了。准确地说是因为一旦那些忠于毛泽东教导的死硬派们从各级领导岗位上被拉下了马，毛泽东在政治上就已经死亡。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大跃进’”①，那么同样可以肯定，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下乡运动”，起码不会有1968年开始的由他倡导的那种形式。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毛泽东要发起这场运动呢？他又为什么要拼命捍卫它至最后一分钟呢？如上所述，伟大舵手的目标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摆脱红卫兵，同时让全国继续处于“搞革命而不是种米粮”② 的动乱局面，他的这种意图正体现在1968年的“下乡”运动上，然而它的根源却可追溯到久远以前。这次运动不过是毛泽东的反知识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已经阐述过这种观点，并在1942年的下乡运动中付诸实现，此后在1955年又以他的一条有关指示发起了另一场运动。

或许毛泽东反知识分子的心态并不只是出自个人恩怨的内心反感，也不只是要消除社会差别的决心，而是在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思考精神的社会阶层③。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打击各类知识分子，反右运动紧跟在后。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正如前所述，虽然在那个时期里有高深教养的人士大量地减少了，但毛泽东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毛泽东是搞农村革命出身的，又受了李大钊介绍的俄国民粹派思

---

①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333页。

② D. S. Zagara，转引自 G. Bennett, *Yundong*, 75页。

③ 因此，当毛泽东把学校校长们下放到农村去，而起用毫无文化的工农兵来替代他们“执行上层建筑绝对专政”之时，他就在教育领域增强了自己的权力；见李洪林，《从择优录取谈消灭差别》，《人民日报》1978年2月11日第二版。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李当然没有把这些算在毛泽东的账上，而都归罪于“四人帮”。

想的影响，因此他的平民主义倾向也促使了他决心把千千万万的城镇青年下放去农村。毛泽东一向怀疑所有不在大型国营工厂和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城镇居民，而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故此，将一代城市人的一半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在审度下乡的合理性时，不应该忘记，即使经济因素能在具体政策执行中起着作用，大规模的下乡运动也从来没有过完善设计的经济规划。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插队知青的数量差别巨大，这就很说明问题①。插队一直是以缺乏组织的运动形式进行的，随着政治局势的反复而变动，还得展开政治思想上的全民总动员。在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然而，又很难把它归入此列，因为正式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惩罚，一般也没有用武力强迫执行，表面上是自愿性质的。这场难以定性的运动根本就是揉合了动员与强制的合二为一的创新，虽然它部分受了苏联样板的启发，但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它创出了中共特有的植根于该党历史及其领袖思想的模式。

下乡运动之所以特别引起注意，是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世纪末的党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权益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知青的命运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正是下乡运动把发起者的政治权力，也同时置于了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国境外也有少数受中国影响或自发的类似实践活动，从中看出那样的一场运动只能在某种政治制度下才会产生。因此，还在运动的严重失误未被传出国外之时，它也并没成为有人以为的第三世界的榜样。

国际间的追随者及同行者

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坦桑尼亚政府曾试图仿效中国，将城市失业者送去乡下。结果由于缺乏相

---

① 见本书，14 页及 178 页图表 1。同时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386～387 页。

应的社会管理控制体系，“一两天之后被强迫送走的绝大部分都返回了城市”[1]。然而在越南，一个政治体制与中国极为相近的国家，那里也设立了如同“户口”那样的户籍登记制度。从 1975 年起，他们成功地将红河三角洲及中央平原的城市人口迁移去开垦创建“新经济区”[2]。1976～1980 年的五年计划预计迁移 4 百万居民，最后只有 150 万是真正被迁移走了的。后来，尽管目标依旧宏伟[3]，移民人数却持续下降，从每年平均 30 万降到 1997 年只有大约 10 万。还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移民并不只牵扯到城市居民（他们所占的比率与人口密集地区的农民相比是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大部分被逼迁的人后来都离开了“新经济区”，因为那儿没有足够条件接待他们。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就动摇了户籍制度，以致自发的迁徙者开始变得比有组织的还要多。值得提出的是，许多为这类宏图大计作出的考察报告都谈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和其他在中国为转移城市人口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到他们的决心，一方面要限制城市扩张以及把多余的劳动力与如犯罪分子这些不稳定因素清除出城市；另一方面要开发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同时加强越南人民在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的战略工作[4]。

1975 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控制权之后比中国和越南走得更远。他们野蛮地撤空城市，将全部城市人口（医院病人也不得免）强制遣散出城到农村去从事集中营式的劳动[5]。在大疏散的同时，把能

---

① *New York Times*, 1977 年 1 月 17 日，转引自 T.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291 页。

②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448 页，以及 F. Gendreau 等的“Les migrations internes”，刊登在 2000 年 P. Gubry 出版的 Karthala-Ceped 编汇的 *Population et développement au Vietnam*, 195～217 页。

③ 政府预计 1986～1990 年间迁移 700 万人，并认为这个预计是“乐观”的（Le Monde 1985 年 10 月 30 日第 6 版及 1986 年 2 月 7 日第 6 版）。后来这个目标调整为 160 万，实际迁移人数达到 1 142 600。

④ F. Gendreau 等，见前引”Les migrations…”，198～199 页。

⑤ 见 F. Ponchaud, *Cambodge année zéro*; Pin Yathai, *L'utopie meurtrière*; D. P. Chandler, *Pol Pot, Brother Number One*; B. Kiernan, *Le génocide au Cambodge 1975～1979*.

唤起西方现代文明的物事尽数销毁。毫无疑问，这种将整个国家强制农村化的作法毫无疑问地解决了城市问题。不过他们心怀的主要是政治思想动机。就是说要更有效地控制老百姓[1]，尤其是要完成清洗高棉人民令其再生的基本任务。城市人属于那些新社会不再容纳的，只有在农村劳动才能得救的“堕落分子”[2]。一个政治指导员是这样阐述首都大疏散的：“城里就是金钱和买卖。这些只会产生不平等和贪污腐化。到地里去干活儿，人就得学懂人是来自稻谷之种的。开荒耕地播种收成，汗流浃背，人就能明白事物的真正价值。[3]”这些话本来很可能从毛泽东的嘴里说出来的。然而，意识形态尽管相同，毛泽东倒也从来没有得出像波尔布特那样极端的实际结论。把全民送去种地没能让农业得到发展，相反很快就出现了物资匮乏和饿殍遍野。这就使在一般称之为柬埔寨“种族灭绝行动”中的死亡人数大增。其实，这个行动只是附带地有一点点为本民族的理由；整个就是一场极权者以重构国家思想为名而对几乎占本国人口20%的百姓持续进行的肆无忌惮的大屠杀[4]。

我们无意将下乡运动跟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人民的遭遇作比较。然而很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波尔布特对毛泽东极其崇拜，但至1975年才得以见面。1965年底1966年初，他第一次到中国去旅行，印象深刻，当时正值伟大舵手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随后的10年间他在条件极差的农村地区创建了一支由仅受过些微教育的年轻农民组成的军队，最后控制了国内所有城市，他的这一历程可与毛泽东夺权的经历相比，

---

① B. Kiernan 写得很对：“没有了城市，那就完完全全地更容易控制老百姓了”。*Le génocide au Cambodge* 1975 - 1979，80页。

② 同上。书中谈到，有一本官方杂志在1976年曾肯定指出：“我们把居民从城市里撤走，这是我们的阶级斗争”。

③ B. Fidelin，*Prêtre au Cambodge*，97页。

④ 波尔布特曾说：“只需要一二百万年轻人就可以建设一个新柬埔寨。”见 P. Dreyfus，*Pol Pot*，*Le bourreau du Cambodge*，305页。

只不过范围小得多。红色高棉的社会经济政策部分是受毛泽东政策的启发，他们还借用了某些“概念”，比如“贫下中农”。如同毛泽东一样，柬埔寨领导人深信种地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他们很骄傲，因为懂得怎么让知识分子通过跟普通农民接触来改掉自己的臭毛病①。他们之中对城市人的怀疑是无一例外的②。因此，回金边某些工厂工作的少数工人，很快就被认为是更可靠的贫农替换下来了。反知识主义和乌托邦唯意志主义是红色高棉与伟大舵手共有的另类偏好，只不过各自的阐述表现方法有所不同。中共也是从得到胜利的第一天起就把某些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城。除了把旧政府官员送进劳改营以之外，还“对旧社会遗留在城市中的失业人员和一些不正当职业人员（如妓女、迷信职业等）进行动员，要他们到农村生产自救。③”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同样提醒他的纯洁无瑕的农民士兵，必须警惕在他们即将“解放”的一片腐败的城市中威胁他们的“糖衣炮弹”④。中国共产党也急不可待地要将城市里的西方影响清除以尽，特别是在上海。

与此亚洲共产党的特色（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有意思的是欧洲的齐奥塞斯库，虽然怀抱同样的要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宏愿，他却走了一条跟毛泽东及波尔布特完全相反的道路⑤。他把 7 000 座传统罗马尼亚村庄夷为平地，强迫村民到一些似城非城的地方去生活，那里都是些多层的“现代化”建筑物，但很多

---

① “在我们国家高棉的最底层，和农民打成一片，必须得重新检讨过去在巴黎学到的东西”。英萨利的这些话（P. Dreyfus, *Pol Pot.*, *Le bourreau du Cambodge*, 178 页）不禁令人想到毛泽东的言论，见本书，29 页注④。

② C. H. Twining, *Cambodia* 1975 – 1978: *Rendez-vous with Death*, 134 页。

③ 在江苏省，这类遣散涉及到好几十万人。虽然有大批人移居南京，但该城市人口从 1949 年的 1 100 000，骤降至 1953 年的 995 000。见《中国人口·江苏分册》，151 页。

④ 见本书，50 ~ 51 页。红色高棉公开提出有一个旨在“用女色、美酒与金钱”来腐蚀士兵的阴谋，以此作为金边空城的依据。见 P. Dreyfus, Pol Pot..., 128 页。

⑤ 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齐奥赛斯库大力宣传社会一体化，那就得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以及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见齐 1972 年在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转引自 G. Kligman, *The Politics of Duplicity*, 33 页。

连自来水都欠奉[1]。

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越南之外，只有南非仍然坚持以执行强制迁徙人口的政策来解决城市问题。在一个所谓“有序城市化”的政策框架下，当局强迫或试图强迫所有的“多余人”（全部是黑人）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到别处去安家，通常是他们落后的黑人家园[2]。当然不必怀疑，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脑，南非的各位极右首领并不是仿效中国或共产越南。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当事人理论上可以上诉请求仲裁。

中国的下乡运动在法国对少数毛泽东派大学生也有过一定的冲击。1967 年秋，他们发起一场“插入运动”，影响到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在随后几年中纷纷放弃学业，到工厂去“插厂”，有的还去了乡下[3]。然而，这场运动发生于 1968 年底中国插队运动的前一年，可见并不是由此诱发的，事实上是受了毛泽东的有关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理论的启迪。1967 年夏，法国（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几位负责人去中国旅行，回国后就调整了运动的方向，从源自于阿尔都斯（Althusser）研究的理论路线过度到与群众及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路线[4]。“插入”在开初并无预期持续好几年。运动应该使革命的年轻人领略社会真相和群众持有的“正确理念”，同时也进行毛泽东派的宣传，协助在“基本群众”中培养“先进分子”。1968 年暑假组织的“长征”把一些大学生带到农村地区，目标是相同的，不过时间比较短[5]。与其说“长征”和“插入运动”象 1968 年底的中国插队，不如说更接近于俄国民粹派的活动及 1942 年的中国下乡运动。耐人寻味的是在始创“插入运动”的文件中，那些法国年轻毛泽东派分子无意地

---

① J. Linz & A.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360 页；G. Kligman，同上，34 ~ 35 页。

② 见 *Le Monde*，1987 年 4 月 1 日第 1 及第 8 版，和 1988 年 4 月 1 日第 6 版。

③ M. Dressen, *Mais l'usine est-elle une fée?*（M. Dressen 自己就是一个“插入者”）。亦见 R. Linhart, *L'établi*。

④ J. - P. Le Dantec, *Les dangers du soleil*, 86 ~ 98 页。

⑤ 同上，131 ~ 136 页。这里的“长征”是直接受到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长征所启发。

提前作出了对1968年毛泽东式插队的抨击。他们不仅反对一切为动员参加生产而施行的“思想恐怖主义”威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以“毛泽东思想”[1] 为名义唾弃了后来成为1968年下乡运动的根本目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乃首要任务。他们认为这只能是推行“插入”路线带来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终极目标，不然就会回到鼓吹“共产党员个人修养路线”的老路上去，那是中国全民批判刘少奇的“修养”[2] 期间无可比拟的恐怖。很明显，法国的毛派分子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也和刘少奇一样有着唯心主义的倾向。中国方面表现倒很有礼貌，没有直指他们就是“臭知识分子”，急需改造。

“插入运动”似乎主要是插厂（下工厂），很少到农场去的。工人阶级对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吸引力比农民阶级大得多。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一场相当规模的下乡定居的运动，但不是受毛派思想的驱使，而是受了绿色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甚至宗教思想的启示。运动涉及到与“已经插入”的同一代人，他们在1968年五月运动政治上失败后心灰意懒，对改变整个社会失去了信心，因此就各自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再等待[3]。这种定居方式的成功率相当低。看来溶入农村社区是挺难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那几千名法国青年中刮起了一股“回城风”。就算那些留在乡下的大多数，他们本来最想逃避的是夫妻关系、家庭和国家，最终不过是换了个地方重新与这三者纠缠不清[4]。

---

① 当时他们把毛泽东思想译作 pensée-mao-tsé-toung，而不用正常的译名 pensée de Mao Tsé-toung，目的是想说明他们认为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独有的，而是全民的，企图以此虚伪的方式来掩盖他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② M. Dressen, *Mais l'usine est-elle une fée*? 81～82页。关于刘少奇思想的“个人修养”，见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③ D. Léger & B. Hervieu, *Le retour à la nature* 和 *Des communautés pour les temps difficiles.*

④ 同上；并见 Th. Quinsat, “Le retour de la terre”.

上山下乡运动与魅力威权的局限性

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的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作出了极好的诠释。当然它是由当局发起并组织的，通常是为了配合，社会民众只能对政府的这种创举作出某些反应。大部分当事人都能成功地运用消极但广泛深入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抵制，结果反倒令政府不能完全坐视不理，长远来讲还迫使它修改原来的计划。下乡运动显示出中国社会并不是白纸一张，在上面毛泽东可以随意涂写脑海里出现的妄想美梦①。社会上存在着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怀着个人需要及抱负乃至群体利益的不同人士，都想多少掌握一点自己的命运，能为社会尽一分力。当他们愿意参加一场伟大的全民事业时，无疑可以发挥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但为了一项并不属意他们的，而实践又证明了是空幻的事业，就不可能让他们无尽期地牺牲个人利益。1920～1940 年间，革命青年迂回曲折地下农村，上井岗，赴延安，那是为了执行一项使命，要把在城市里惨遭失败的革命进行到底，与此相反，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城市青年一代并不自觉负有什么历史使命，“缩小三大差别”是毛泽东强加给他们的使命。

大跃进初期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著名的 1966 年“五七指示”都反映出伟大舵手也许是真心地想寻求消除一切社会分工及社会差别。这种空想主义思想正反映出“均一的幻觉”，克罗德·勒夫（Claude Lefort）认为它刻划了基于否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割以及其他的社会内部分工的一种特殊制度。由其领袖所代表的唯一政党就是这多元归一的催化剂②。因此，对一直被比做红太阳的毛泽东来说，一切都应该淹没在一个巨大无比的光芒四射的统一体里，而他自然位于正中央，正像当年在大量宣传画中所看到的那样。然而用“下乡”作为手段来

---

① 1958 年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时曾说：“……中国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见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有关“白纸”的想法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见 L. Bianco, *La page blanche*, 59－72 页。

② C. Lefort, *L'invention démocratique*.

实现这种理想，根本没有使社会基本差别有一点儿改变。只是最终打造了一大群数以千百万计的边缘青年人。他们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只是一群在地理位置及社会层面上被移了位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组织，缺乏申诉的合法途径，还缺乏标志公民社会的对国家而言不过是相对的自主权，整个社会都奋起抵抗。开始的消极抵抗，随后多种形式的抵抗，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导致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因而为这场运动付出无法以数字表示的代价。毛泽东去世后，尽管新领导班子希图限制知青回城，同时采取另一形式继续推行下放知青的政策，但仍然未能阻止大规模的公开抵制。在对社会的统治组织机构丝毫无损的情况下，政府考虑到坚持一项如此不得民心的政策可能会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最后果真对社会的诉求大体作了让步。就这样，知青回城恰恰与社会力量重回中国政治舞台在同一时期。当时无上崇高的伟大领袖去世已经极度动摇了空想主义，下乡运动的结束也就正好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终结。由于新的农业政策几乎在同时推出，下放知青政策的放弃无疑宣告了社会力量在反对强行贯彻乌托邦式社会模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也是真正的人战胜了“新型人”的假设虚幻。

毛泽东确实曾怀抱此类魅力领袖的创世主式的雄心壮志，这驱使他们想到要去改造人本身，需要的话不惜诉诸强制手段①，为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非把你这个“人”放进依照他们的思想意识标准设定的模子里。布瑞齐特（Bertolt Brecht）在对这种荒谬绝伦的野心发表过著名的诗句：

领导们
把人民解散了
再选出一个新的

---

① 红色高棉把这种创世主式的精神发展到极端，就是这种“雄心壮志”驱使他们把国家变成劳改营，并屠杀掉所有“组织”判定为不能改造的，因为这些人无法成为将柬埔寨带往光明前途的理想人民中的一分子。事实上，红色高棉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对塑造“新人”的可能性并不乐观，这就是他们那么轻易杀人如麻的部分理由。

岂不更简单?①

然而那场运动并没能改变青年人的价值观和理想，以致后来尽管官方仍在以伟大理想来号召牺牲精神，运动几乎是单一地只依靠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各种操纵伎俩不仅都失效了，结果还适得其反，知青感觉到他们的牺牲太大，太不公平，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事实引导他们重新认识自我，这个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早已让他们差点儿忘记了的“自我”。假如说作一颗为革命为党服务的听话的小螺丝钉，是意味着成为工程师，干部，技术员，教师或者一个工作有保障并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人，这其实不难接受。但假如是要去最偏僻的农村跟黄土打一辈子交道，而其他人却仍待在城里，这就没那么容易欣然而往了。

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

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人农民也没有成为新人，缺少物质刺激的社会竞争也没能让经济得到飞跃，因此，毛泽东的接班人就决定放弃树立新人的神话，而对社会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开始考虑经济因素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和精神推动力。抛弃空想主义的追求触动到整个政府的所有政策，包括边疆地区的发展计划。一位人口迁徙问题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谈过如下的观点：“世上有比较艰苦、落后的地区，同时也有不畏艰苦、义无反顾、志在创业的人，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不能以这些同志的觉悟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点。”②

一旦对社会的控制放松了，即刻就出现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称作的“久受压抑的社会潜意识的回归”③。被迫隐藏多时而暗中坚持的“旧人”纷纷回到青天白日之下。他们并不满足于政府退让给予的自由空间。他们不时还为了争取更多一点而继续战斗。可是

---

① B. Brecht, “Die Lösung”, *Gesammelte Werke*, Band 10, 1 010页。

② 田方等，《中国人口迁移》，140页。

③ M. C. Bergère, “Après Mao, le retour du vieil homme”, 37页。

不能因“旧人回归”的隐喻而以为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历史，尤其是1966年到1978年的那十几年，只不过是一段反常的例外，之后旧人就恢复原状了。虽然旧人没有死去，虽然他也没有成为新人，但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却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也改变了他。这在“文化大革命”及下乡运动的混乱时期成长的一代身上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的上一代在20世纪50年代享受过革命后的和平恢复期以及初步成就，而他们的下一代是在经济改革发展时期成长的，只有他们是最倒霉的。与革命同时诞生的“毛泽东的孩子们”① 运气不佳，他们的“父亲”将他们当作祭品供奉在他的权力意愿及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祭坛上了。

不论在文学或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文化大革命”和下乡运动引起了中国人对代际现象的特殊兴趣。有目共睹，在中国历史20世纪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产生了相当典型的几代人。更深入地看，这种兴趣与1978年底三中全会后重新发掘社会及社会群体的存在是连在一起的②。这种重新发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本身企图表现自己，也寻求变成一种公民社会；另一方面，党国在策划经济战略的时候，也还是关注个人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

关于从1961年起两千多万“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准许进城的农民回乡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好啊！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③

毛泽东去世了，华国锋被挤走了，执政者明白再没有能力“办到”这样的事情，也明白一个政府不该为那样的一种表演感到自豪。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社会公众再也不会对这类宣传动员言听计从了。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任何人都不再可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地蔑视社会经济利益了。把经济目标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

① 根据Anita Chan的一本书的书名，见本书，19页，注释①。

②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大学研究院在沉寂了30年以后，重新开始社会学研究。

③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

同时确定不忽略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1]，还得赋予社会各成员相应的创新及表达的空间，只有在实现了这些条件之后，中共才得回部分合法性。

从这个时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绝对不可过高估计。中共依然大言不惭地坚持认为自己是全民利益的唯一代表，竭力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权，严厉打击社会上一切自行结社的企图。不管怎么说，中共不再搞乌托邦王国，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处理事情开始有情有理，看来可以保证类似大跃进或上山下乡的劳命伤财运动不再发生。

---

① 为了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国政府必须重视社会各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停滞不前是因为将一种非众人同意的总体利益强加于社会，上述这种提法当时出现在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文章里，他在美国研读政治学；见 Li Fan，“The Question of Interests in the Chinese Policy Making Process ”。

参考书目

中文著作

参考书籍（按书名排列）

《安徽省志·劳动志》，法制出版社，1998。
《安源县知青志》，安源县知青办公室，1998。
《北京劳动大事记》，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
《党的组织工作词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458 页。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49～1995）》，出版者不详，1996，771 页。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07 页。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6 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83。
《福建省志·劳动志》，法制出版社，1998。
《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广东省志·农垦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广西通志·劳动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贵州省志·劳动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海南省志·农垦志》，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1996。
《河北省志·劳动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黑龙江省志·劳动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河南省志·劳动人事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湖南省志·综合经济志·劳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江苏省志·劳动管理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吉林省劳动志》，吉林劳动厅，1991。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青海省志·劳动人事志》，西安出版社，2001。
《陕西省志·劳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山东省志·劳动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上海经济（1949～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上海统计年鉴（198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中华书局，1999。
《新疆通志·劳动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西双版纳五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云南省志·劳动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百科年鉴》1982，1983，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1983。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中国经济年鉴（1982）》，北京，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1982。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282 页。
《中国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 2 册，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56。
《中国人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按省和直辖市分成 30 册）。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自 1981 年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政策法规全书》，第 2 卷，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675 页。

其他参考书籍（按作者姓名或书名的汉语拼音排列）

阿老：《脚印》，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6。
《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677 页。
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77 页。
邓贤：《流浪金三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99 页。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89 页。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424 页
冯骥才：《100 个人的 10 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356 页。
顾洪章、胡梦洲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318 页。
顾洪章、马克森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202 页。

谷书堂等：《天津经济概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观沧海编：《“老五届”30年风云录》，3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出版者及出版日期不详，序言日期为1981年1月，279页。
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491页。
《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沈阳出版社，1992，543页。
胡发云等编：《沧桑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785页。
《婚姻案件100例》，见《民主与法制》编辑部。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452页。
姜昆等编：《中国知青回忆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3册，1757页。
金大陆：《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78页。
金大陆编：《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91页。
柯云路：《夜与昼，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539页。
李眉编：《荒原上的足迹》，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305页。
李银河、郑宏霞：《王小波画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164页。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172页。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台北，万象图书，1993，480页。
刘国凯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1996，468页。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及何岚：《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926页。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75页。
刘心武：《这里有黄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刘心武等：《让我们来讨论爱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毛泽东思想万岁》，出版者及出版地方不详，1969，716页。
《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婚姻案件100例》，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社，1981。
《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任毅：《生死悲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2页。
沙飞等编：《苦乐年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454页。
史卫民等编：《知青书信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73页。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89页。
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430页。
谭宗级等：《10年后的评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田方等编：《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372 页。
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吴旷等：《敢有歌吟动地哀》，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4。
萧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第一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肖复兴、肖复华：《啊，老三届》，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334 页。
肖复兴：《绝唱：老三届》，东方出版社，1999，346 页。
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267 页。
徐晓等：《遇罗克》，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417 页。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花出版社，1993，452 页。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92 页。
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3 页。
曾焰：《闯荡金三角》，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312 页。
张抗抗：《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174 页。
张抗抗：《大荒冰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81 页。
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张永平主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307 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 2 册，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56。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刑法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年劳动室：《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庄启东等编：《劳动工资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中文文章及论文（按作者姓名或文章题目的汉语拼音排列）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第 13 期 1981 年 7 月 1 日，66～67 页。
陈玮：《关于完善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探讨》，《人口研究》1987 年第 6 期，20～23 页。
陈甬沪：《无证经营为何屡禁不绝》，《社会》1987 年第 3 期，24～26 页。
丁水木：《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初议》，《社会》1987 年第 1 期，18～19 页。
丁望乙：《中国大陆的地下文学》，《黄河》第 3、4、5 期。
方苏：《千家驹谈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九十年代》1994 年第 4 期，90～93 页。
冯浩华：《对青海移民与垦荒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1983 年第 5 期，52～57 页。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 年第 6 期，6～22 页。
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小说家》1986 年第 6 期，6～13 页。

冯骥才：《当代于连》，《文汇月刊》1986年第11期，6～8页。
高尔生、顾杏元：《上海市区30年来生育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1984年第1期，26～33页。
顾工：《两代人》，《诗刊》1980年10月，49～51页。
洪英芳：《试论我国15～19岁人口的“非劳动力化”问题》，《人口研究》1987年第5期，26～31页。
《胡焕庸教授谈向西北地区移民问题》，文章介绍，刊于《人口研究》1985年第4期，32页。
胡开华、陈玮：《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3期，39～42页。
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第156期1978年12月，14～16页。
黄国初：《经济发展战略和人口迁移政策》，《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1期，36～37页。
蒋光宇：《“老三届”是我国人才资源的富矿》，《社会》1985年第4期，14～16页。
吉平阎瑞：《内蒙古的人口迁移》，《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1期，29～37页。
康就升：《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4期，18～24页。
蓝成东、张钟汝：《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倾向》，《社会》1982年第2期，22～25页。
李春林：《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等级》，《社会》1987年第2期，3～5页。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84，648～652页。
李德滨：《解放后黑龙江移民问题探讨》，《社会》1983年第1期，13～17页。
李洪林：《从择优录取谈消灭差别》，《人民日报》1978年2月11日第2版。
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载于李怡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香港，1980，2～9页。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102～103页。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年第3期。
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争鸣》1981年6月，12～16页。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1），1958年6月1日，3～4页。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引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32页。
米歇尔·波恩（Michel Bonnin）：《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8》，《海南纪实》1989年4月，72～78页。
潘鸣啸（Michel Bonnin）：《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争鸣》1989年1月，页54～57，及1989年2月，76～78页。
钱玲娟等：《北京市的人口发展情况和当前的任务》，《人口研究》1980年第1期，39～44页。

钱怡：《爱在北大荒》，《当代》1986年第5期，149～152页。
裘孔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上学、就业、婚姻问题》，《匪情月报》1976年1月，20～28页。
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载于马尚瑞等编《北京作家谈创作》，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195～196页。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载于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80～289页。
唐灿等：《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青年研究》1986年第11期，页21～25以及1986年第12期，12～17页。
田方：《我国移民问题的剖析》，《社会》1984年第6期，10～12页。
田小野：《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国妇女报·家庭周末》1998年5月22日第1版及第3版。
汪力田、李平：《上海30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社会》1982年第1期，8～13页。
王若望：《戏言不可以为法》，《民主与法制》1980年第1期，25～27页。
王泽厚、陈玉光：《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29～45页。
魏津生：《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一般趋势》，《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6期，28～35页。
吴欢：《黑夜、森林、傻青》，《当代》1985年第6期，180～212页。
席扬：《知青笔下的中国农村》，《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6期，56～63页。
肖复兴：《在北大荒和在北京》，《北大荒奇遇》的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336～352页。
徐明旭：《论《新星》、《夜与昼》的政治文化价值》，《当代》1987年第1期，260～265页。
徐天琪、叶振东：《调整劳动力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6期，39～44页。
叶辛：《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十月》1982年第3期，239～245页。
于瑞厚、厉延军：《青海人口问题探讨》，《人口与经济》1981年第4期，23～26页。
原华荣：《论西北的环境与移民》，《经济地理》，1985年第3期，197～201页。
章长根等：《上海市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30～34页。
张承志：《后记》，《老桥》，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张化：《十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载于谭宗级等《十年后的评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41～155页。
张抗抗：《从读书到写书》，载于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57～168页。
张辛欣：《“知识青年作家”群落的形成和演变》，在关于当代中国文学国际会议

上的发言，上海，1986 年 11 月 4～6 日。
郑也夫：《北京城区男女婚配比例失调原因初探》，《社会》1982 年第 2 期，20～25 页。
郑也夫：《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人口研究》1983 年第 5 期。
郑义：《向往自由》，《远村》的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77～486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 年 2 月 10 日，页 885～886。
竹林：《我的起步》，《十月》1982 年第 3 期，246～247 页。
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经济研究》1981 年第 12 期，25～31 页。

西方著作

Amselle Jean-Loup, *Branchements. Anthropologie de l'universalité des cultures*, Paris, Flammarion, 2001, 265p.
Arendt Hanna,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2.
Bartke Wolfgang, *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Sharpe, 1981.
Bennett Gordon,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Berkeley,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Bennett Gordon, Montaperto Ronald, *Mémoires du garde rouge Dai Hsiao-ai*, Paris, Albin Michel, 1971.
Bergère Marie-Clair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de* 1949 *à nos jours*, Paris, Armand Colin, 1987.
Bernstein Thomas P.,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ianco Lucien,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 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Folio/Histoire, 1987。
Bianco Lucien, Chevrier Yves (éd.),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5.
Boudon Raymond, *La place du désordre*, Paris, PUF, 1984.
Boudon Raymond, Bourricaud Françoi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sociologie*, Paris, PUF, 1982.
Bourdé Guy, Martin Hervé, *Les Écoles Historiqu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3.
Bowie R. R., Fairbank J. K. (ed.),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ell Charles P.,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254 p.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Unger Jonathan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New York, Sharpe, 1985.

Chan Anita, Madsen Richard, Unger Jonathan,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45 p.

Chan Kam Wing,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 – 1949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3 p.

Chance Norman, *China's Urban Villagers. Life in a Beijing Commune*, New York, CBS College Publishing, 1984.

Chandler David, *Pol Pot,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2.

Cheng Ying-hsiang, Cadart Claude,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7, 166 p.

Cohen Jerome Ala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63: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54.

Davis-Friedmann Deborah,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omes Jürgen,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Dressen Marnix, *Mais l'usine est-elle une fée ? Sur la naissance du mouvement d'établissement maoïste à la veille de mai* 1968, mémoire de maîtrise,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1985.

Dreyfus Paul, *Pol Pot. Le bourreau du Cambodge*, Paris, Stock, 2000, 350 p.

Dumont René, *La Révolution cultura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6.

Durkheim Émile, *Le Suicide*, Paris, Alcan, 1930.

Esmein Jea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0.

Fidelin Benoît, *Prêtre au Cambodge*, Paris, Albin Michel, 1999.

Frolic Michael, *Mao's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Frolic Michael, *Le peuple de Mao*, Paris Gallimard, 1982.

Goodman David, *Beijing Street Voices,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London/Boston, Marion Boyars, 1981.

Guillermaz Jacques,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 – 1949), Paris, Payot, 1975.

Guillermaz Jacques,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2 vol., Paris, Payot, 1979.

Heilmann Sebastian, *Turning Away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Grass-Roots Activism in the Mid-Seventies*,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28, September 1996, 44 p.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2, 196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3, 1964.

Howe Christopher, *China's Economy: a Basic Guide*, London, Paul Elek, 1978.

Howe Christopher,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 – 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Hsia T. A.,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3.

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Jiang Yarong, Ashley David, *Mao'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Voices from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res, Routledge, 2000, 177 p.

Joutard Philippe,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Paris, Hachette, 1983.

Kau Y. M., *The Lin Piao Affair*, New York, IASP, 1975.

Kessen William (ed.), *Childhood i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Kiernan Ben, *Le génocide au Cambodge* 1975 – 1979. *Race, idéologie et pouvoir*, Paris, Gallimard, 1998, 730 p.

Kirkby Richard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 – 2000 *A. 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Kleinman Arthur, Kleinman Joan, Rememb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ienating Pains and the Pain of Alienation/Transformation, in T. Y.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1 – 155.

Kligman Gail, *The Politics of Dupli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58 p.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0 p.

Lacroix Bernard, *L'Utopie communautaire*, Paris, PUF, 1981.

Lardy Nicholas, Lieberthal Kenneth (ed.),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 Y., Sharpe, M. E., 1983.

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Le Dantec Jean-Pierre, *Les dangers du soleil*, Paris, Presses d'aujourd'hui, 1978.

Lefort Claude, *L'Invention démocratique. Les limites de la domination totalitaire*, Paris, Fayard, 1981, 349 p.

Léger Danièle, Hervieu Bertrand, *Des communautés pour les temps difficiles: néo-ruraux ou nouveaux moines*, Paris, Le Centurion, 1983.

Léger Danièle, Hervieu Bertrand, *Le retour à la nature. Au fond de la forêt... l'État*,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9.

Leuwen Henri (ed.), *Hong Kong/Macao/Canton*, Paris, Éditions Autrement, 1983.

Leys Simon,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Paris, Éditions Champ Libre, 1971.

Li Zehou,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93, 128 p.

Li Zhisui, *La vie privée du Président Mao*, Paris, Plon, 1994, 668 p.

Liang Heng, Shapiro Judith, *Son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The Hogarth Press, 1983.

Ling Ken, *The Revenge of Heaven*, New York, Putnam, 1972.

Linhart Roger, *L'établi*,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8.

Linz Juan, Stepan Alfre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ou Chao-chi, *Pour être un bon communiste*,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 Édition, 1970.

Liu Zheng *et al.*,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ékin, New World Press, 1981.

Löfstedt J. I.,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83 p.

Malia Martin,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5, 686 p.

Mandarès Hector *et al.*, comp., *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4.

Mao Tsé-toung, *Œuvres choisies*, t. II, t. III, t. IV, t. V,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67, 1968, 1969, 1977.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L'Idéologie allemand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68.

McCauley Martin,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 Londres, Macmillan, 1976, 235 p.

Mead Margaret, *Le Fossé des générations*, Paris, Denoël/Gonthier, 1971.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326 p.

Meisner Maurice,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Michel Jean-Jacques,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8.

Morin Edgar, *Sociologie*, Paris, Fayard, 1984.

Munro Donal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Parish William L., Whyte Martin K.,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asqualini Jean, *Prisonnier de Mao*, Paris, Gallimard, 1975.

Pepper Suzanne, *China's Universitie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Pin Yathai, *L'utopie meurtriè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9, 415 p.

Ponchaud François, *Cambodge année zéro*, Paris, Julliard, 1977.

Prost Antoine,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1914 – 1940, Paris, Gallimard-Julliard, 197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Roux Alain, *Le casse-tête chinoi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80.

Scharping Thomas,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 – 1980,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81.

Schram Stuart, *Mao Tse-toung*, Paris, Armand Colin, 1972, 559 p.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eéd., 1968.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idane Victor, *Le Printemps de Pékin*, Paris, Gallimard, 1980, 252 p.

Sidane Victor, Zafanolli Wojtek,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Paris, Maspéro, 1981.

Sills 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 vol. 6, 14, 1968.

Siu Helen, Stern Zelda,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now Edgar,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Hutchinson of London, 1973.

Solinger Dorothy,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44 p.

Staline Joseph, *L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du socialisme en URSS*,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74.

Tien H. Y., *China's Population Struggl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Trolliet Pierre, Béja Jean-Philippe, *L'Empire du milliard, populat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Paris, Armand Colin, 1986.

Unger Jonathan,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 – 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ed.),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

Venturi François,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 révolution. Histoire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ê siècle*, t. 2, Paris, Gallimard, 1972.

Weber Max, *Économie et société*, Paris, Plon, 1971.

White Lynn T. III, *Careers in Shanghai: 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hyte Martin K.,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Whyte Martin K., Parish William,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Widor Claude (comp.),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chinois*, 1978 – 1980. *Revues parallèles et journaux muraux*, vol. 1 et 2, Paris, Éditions de l'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Hong Kong, The Observer Publishers, 1981 et 1984.

Wilson Amy Auerbacher *et al.* (ed.),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Wortman Richard,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Xue Muqiao, *China's Socialist Economy*, Péki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Yang Jiang, *Six récits de l'école des cadres*, Paris, Bourgois, 1983, 132 p.

Yu Luojin, *Le Nouveau conte d'hiver*, Paris, Bourgois, 1982, 237 p.

Yue Daiyun, Wakeman Carolyn, *To the St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Zafanolli Wojtek, *Le Président Clairvoyant contre la Veuve du Timonier*, Paris, Payot, 1981.

西方文章

Amitiés franco-chinoises, *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 (responsable du Bureau du Travail de la municipalité de Shanghai)*, compte rendu dactylographié d'une visite à Shanghai en août 1979.

Amitiés franco-chinoises, *Les J. I. chez les Yi-Same du Yunnan*, compte rendu dactylographié d'une visite effectuée en août 1979.

Amitiés franco-chinoises, *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compte rendu dactylographié d'une visite effectuée le 11/8/1979.

Aubert Claude, *Capitalisme rural ou économie socialiste? Les relations villes-campagnes et les réformes agricoles en Chine*, Communication pour la Huit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agriculture en URSS et dans les pays de l'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7 – 10/8/1987.

Bastid Marianne,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1980'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hina Quarterly*, Juin 1984, pp. 189 – 219.

Béja Jean-Philippe, Bonnin Michel, La Chine ou la crise comme mode d'exercice du pouvoir (1949 – 1981) , in Kende, Moïsi & Yannakakis (éd.), *Le système communiste : un monde en expansion*, Paris, IFRI, 1982, pp. 127 – 140.

Béja Jean-Philippe, Bonnin Michel, La mort du village du Zhejiang , *Perspectives Chinoises*, 32, nov. – déc. 1995, pp. 6 – 10.

Bennett Gordon, China's Mass Campaigns and Social Control , in A. A. Wilson *et al.* (ed.),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pp. 121 – 139.

Bergère Marie-Claire, Après Mao, le retour du vieil homme,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1, 1985, pp. 37, 31 – 45.

Bergère Marie-Claire, L'influence du modèle soviétique sur la politique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en Chine ,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 juin 1979, pp. 402 – 425.

Bianco Lucien,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ïsme , *Annales ESC*, 5, 1979, pp. 1094 – 1108.

Bianco Lucien, La page blanche, *Politique aujourd'hui*, mai 1970, pp. 96 – 112, juin 1970, pp. 59 – 72.

Blecher Marc, Peasant Labou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y , *World Development*, 11 (8), 1983, pp. 731 – 745.

Bonnin Michel,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he Need for a Change of Logic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Such a Change , in S. Feuchtwang *et al.* (ed.),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y*, vol. 1, London, Zed Books, 1988, pp. 198 – 221.

Bonnin Michel, 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 *Le Débat*, 3, juillet-août 1980, pp. 102 – 110.

Bonnin Michel,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9: The Cas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 in H. Martin (ed.), *Cologne Workshop* 1984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öln, Deutsche Welle, 1986, pp. 233 – 238.

Brecht Bertolt, Die Lösung , *Gesammelte Werke*, 10,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7, p. 1010.

La campagne est aussi une université, *Littérature chinoise*, 2, 1974, pp. 75 – 87.

Chan Anita, Editor's Introduction , in Liu Guoka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Hiver 1986 – 1987, pp. 1 – 13.

Chan Anita,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1), Sept. 1992, pp. 61-85.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Unger Jonathan,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 September 1980, pp. 397 – 446.

Chan Kam Wing, Xu Xueqiang,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Reconstructing a Baseline, *China Quarterly*, 104, Dec. 1985, pp. 583 – 613.

Chen Pi-Chao,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IV (3), april 1972, pp. 361 – 386.

Cheng Tiejun, Selden Mark,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 1994, pp. 644 – 668.

Chou Wei-l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usticated Educated Youths, *Issues and Studies*, X (13), 1974, pp. 75 – 87.

Davis Deborah, "Skidding": Downward Mobility among Children of the Maoist Middle Class, *Modern China*, 18 (4), Oct. 1992, pp. 410 – 437.

Deng Zhong, Treiman 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2), Sept. 1997, pp. 391 – 428.

Dreyer June Teufel,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eas, *Pacific Affairs*, 48 (3), printemps 1975, pp. 353 – 369.

Emerson John P.,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 – 1980, in USJEC,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1982, pp. 224 – 267.

L'emploi, le salaire et les œuvres sociales, *La Chine aujourd'hui*,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 res, 1983, pp. 1 – 9.

Fantanange Stéphane, Yunnan Mini-Tragedy, *Asiaweek*, 11/5/1979.

Feng Lanrui, Zhao Lükuan,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1982, pp. 123 – 139.

Feng Lanrui,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emploi et les salaires, in Yu Guangyuan (d.), *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t. 2,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84, pp. 195 – 256.

Field Richard M., Slow Growth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 1952 – 1981, *China Quarterly*, 96, Dec. 1983, pp. 641 – 664.

Gardner John, 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 1958 – 1966, in J. W.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35 – 286.

Gendreau Francis *et al.*, Les migrations internes, in P. Gubry (dir.), *Population et développement au Vietnam*, Paris, Karthala-Ceped, 2000, pp. 195 – 217.

Gold Thomas B.,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104, Dec. 1985, pp. 657 – 675.

Gold Thomas B. ,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 *China Quarterly*, 84, Dec. 1980, pp. 755 – 770.

Greenblatt Sidney L. ,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v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A. A. Wilson *et al.* (d.),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pp. 82 – 120.

Kraus Richard C. , The Limits of Maoist Egalitarianism , *Asian Survey*, Nov. 1976, pp. 1081 – 1096.

Kunming Military Region, Political Department, Propaganda Division, Outline of Education on Situation for Companies (Lesson Five) , April 6, 1973, *Issues and Studies*, X (10), July 1974, pp. 99 – 104.

Lewis John W. , Commerc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gshan , in J. W.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Li Fan, The Question of Interests in the Chinese Policy Making Process , *China Quarterly*, 109, March 1987, pp. 64 – 71.

Lieberthal Kenneth,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 in H. J. Ellison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p. 3 – 28.

Lin Zili, Initial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1980, pp. 172 – 194.

Liu Alan P. L. , Opinions and Attitudes of You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sian Survey*, Sept. 1984, pp. 975 – 996.

Mao Tsé-toung, D'où viennent les idées justes? , in *Quatre essais philosophiques*, Pékin,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67, pp. 150 – 152.

Martin Roberta,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China and on Taiwan: An Analysi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 *China Quarterly*, 62, June 1975, pp. 242 – 262.

McDougall Bonnie, Bei Dao's Poetry: Reve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2), printemps 1985, pp. 224 – 249.

MacLaren Anne,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 1979, pp. 1 – 20.

Morin Edgar, Notes méthodologiques pour l'interprétation des révoltes étudiantes du début 1968 , in E. Morin, *Sociologie*, Paris, Fayard, 1984, pp. 269 – 279.

Oi Jean C. ,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 *World Politics*, XXXVII (2), Jan. 1985, pp. 238 – 266.

Orleans Leo,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p. 268 – 302.

Ownby David, Growing Alienation Among Chinese Youths , in C. L. Hamrin & T.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 pp. 212 – 246.

People's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the Tehhung Autonomous Chou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Deal a Hard Blow to the Crimes Undermining the Program of Sending Educated Youths to Rural Areas , *Issues and Studies*, XI (3), March 1975, pp. 111 – 115.

Pepper Suzanne,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Two Steps Forward, 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 , *China Quarterly*, 81, March 1980, pp. 1 – 65.

Pepper Suzanne,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 *Asian Survey*, Sept. 1978, pp. 847 – 890.

Pye Lucian,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China Quarterly*, 108, Dec. 1986, pp. 604 – 606.

Quinsat Thierry, Le retour de la terre , *Le Monde Dimanche*, 10/8/1980, p. IV.

Rosen Stanley (ed.), The Rehabilit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Li Yizhe" ,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Summer 1981.

Rosen Stanley,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 *Modern China*, 11 (3), July 1985, pp. 301 – 346.

Schwartz Benjamin, A Personal View of Some Thoughts of Mao Tse-tung , in Ch. Johnson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p. 352 – 372.

Shi Tiesheng, Vaincre la Mort , *Littérature chinoise*, 2, 1986, pp. 158 – 162.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 *Current Scene*, VI (5), 15/3/1968, pp. 1 – 27.

Starr John B. ,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 *China Quarterly*, 67, Sept. 1976, pp. 457 – 488.

Taylor John, Hemingway and Co : le Paris de la génération perdue , *Le Monde*, 25/7/1986.

Teiwes Frederick C. ,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 *China Quarterly*, 62, June 1975, pp. 308 – 309.

Unger Jonathan, 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 *Contemporary China*, III (2), Summer 1979, pp. 85 – 92.

Walder Andrew, Li Bobai, Treiman Donald,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il 2000, pp. 191 – 209.

Wang Ho, A Review of the Maoist Sending Down of Intellectual Youths , *Issues and Studies*, VIII (3), Dec. 1971, pp. 40 – 52.

White Gordon, Urban Employment and Labour Allocation Policies in Post-Mao China , *World Development*, 10 (8), 1982.

White Lynn T.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

ban China , in A. A. Wilson *et al.* (ed.),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London, Praeger, 1977, pp. 151 – 172.

White Lynn T.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 – 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 *China Quaterly*, 79, Sept. 1979, pp. 481 – 510.

Woodward Dennis, Rural Campaig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xperience (1969 – 1972)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6, 1981.

Wu Harry Xiaoying,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 1994, pp. 669 – 698.

Yeh K. C., Macr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eadjustment , *China Quarterly*, 100, Dec. 1984, pp. 691 – 716.

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 , *Current Scene*, V (16), 2/10/1967, pp. 1 – 8.

Zafanolli Wojtek, Le nouveau cours littéraire : Portrait d'une génération individualiste , in C. Aubert *et al.*, *La société chinoise après Mao*, Paris, Fayard, 1986, pp. 155 – 228.

Zafanolli Wojtek,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 *Esprit*, 6, June 1979, pp. 22 – 30.

Zafanolli Wojtek, Hua Guofeng justicier , *Esprit*, juillet-août 1977, pp. 49 – 64.

Zhou Xueguang, Hou Liren,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b. 1999, pp. 12 – 36 (see also comments by Chen Kevin & Cheng Xiaonong, pp. 37 – 40).

Zhou Xueguang, Tuma Nancy, Moen Phylli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une 1997, pp. 339 – 365.

Zhou Xueguang, Tuma Nancy, Moen Phyllis,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 – 1994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uly 1998, pp. 199 – 222.

文艺作品及诗歌（按汉语拼音排列）

阿城：《棋王》，作家出版社，1985，231 页。

白桦：《“听橹居”盛衰记》，《七十年代》1981 年 6 月，86 ~ 90 页。

北岛：《回答》，《北岛诗选》，广州，新世界出版社，1986，25 ~ 26 页。

陈明杰：《一个红卫兵参加缅共的故事》，《九十年代》1984 年 10 月，68 ~ 72 页。

成正和：《我们都是年青人》，《青年佳作》，1981，178 ~ 193 页。

戴思杰：*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巴尔扎克与小裁缝》），Paris, Gallimard, 2000，229 页。

甘铁生（天然）：《聚会》，《中报》1980 年 6 月，页 104 ~ 107，（也载于《北京文艺》1980 年 2 月）。

甘铁生：《人不是含羞草》，《青年佳作》，1981，252～283 页。
Gu Hua（古华）：Une maisonnette couverte de lierre（《爬满青藤的木屋》），*Dix auteurs modernes*，Pékin，Littérature chinoise，1983，149～183 页。
果丙：《晚间》，《观察家》1979 年第 10 期，74～76 页。
何士光：《局长的女儿》，《观察家》1980 年第 9 期，59～61 页。
洪翔：《海咒》，《敢有歌吟动地哀》，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5，257～265 页。
Jin Yanhua，Wang Jingquan：Cries from Death Row?（《死刑室里发出的呼喊》），载于 P. Link（ed），*Stubborn Weed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p. 96～114。
孔捷生：《南方的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188 页。
孔捷生：《普通女工》，《普通女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55～247 页。
孔捷生：《大林莽》，《十月》1984 年第 6 期，132～192 页。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天津，百花出版社，1985，1～32 页。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1983～1984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第一册，174～331 页。
梁晓声：《北大荒纪实》，《天若有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84～109 页。
老鬼：《血色黄昏》，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621 页。
Liu Feng：Bonne chance!（《祝你好运!》），选自 *Le retour du père*（《父亲的归来》），Paris，Belfond，1981，pp. 175～214。原文载于《人民之声》第 10 期，1979 年 9 月。
陆天明：《桑哈高地的太阳》，《当代》1986 年第 4 期，24～145 页。
Lu Xinhua（卢新华）：The Wounded（《伤痕》），选自 *The wounded*（《伤痕》），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9～24 页。原文载于《文汇报》，1978 年 8 月 11 日。
糜庶：《瑞丽江畔》，《观察家》1979 年第 9 期，64～70 页，及 1979 年第 10 期，81～85 页。
平明：《碟仙》，《北斗》第 3 期，出版日期不详，50～52 页。
乔瑜：《孽障们的歌》，《当代》1986 年第 6 期，4～50 页。
沙叶新等：《假如我是真的》，载于李怡主编《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第 2 册，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272～301 页。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月报》1983 年第 3 期，39～47 页。
食指（郭路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京文学》1998 年第 6 期，105 页。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载于舒婷《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85～87 页。
王安忆：《麻刀厂春秋》。载于王安忆《小鲍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21 页。
王安忆：《小院琐记》，《青年佳作》，1981，284～304 页。

王培公：《WM我们》，《九十年代》1985年第12期，80～95页。
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文集》卷2，112～182页。
徐明旭：《调动》，选自李怡主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182～219页。
徐乃建：《杨柏的污染》，载于《盼，短篇小说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4～85页。
徐乃建：《因为我是30岁的姑娘》，载于刘锡诚主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卷3，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473～484页。
许子东：《可怜的人》，《百花洲》1981年第2期，37～46页。
Xue Haixiang：L'écume de la vie，选自 *Littérature chinoise*（《中国文学》）1982年第2期，137～203页。（原文：薛海翔：《啊，生活的浪花》，《种山》1981年第1期）
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农村短篇小说选》第1册，北京，宝文堂书店，1982，1～24页。
叶辛：《蹉跎岁月》，《收获》，1980年第5期，页4～80，及第6期，156～254页。
叶辛：《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429页。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2期，1～148页。
叶辛：《风凛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324页。
叶辛：《孽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411页。
虞雪：《广阔天地》，《北斗》第2期，出版日期不详，19～27页。
张承志：《黑骏马》，载于张承志《老桥》，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1984，52～129页。
张承志：《绿夜》，《十月》1982年第2期，130～137页。
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4～59页。
张抗抗：《白罂粟》，载于《1980年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6～513页。
张抗抗：《塔》，《收获》1983年第3期，4～41页。
张抗抗：《在丘陵，在湖畔》，《张抗抗中篇小说集》，北京，1982，309～438页。
Zhang Kangkang：*L'impitoyable*，Paris，Bleu de Chine，1997，148页。（原文：张抗抗：《残忍》，《上海文学》1995年第4期）
Zhang Xianliang（张贤亮）：Xor Bulak – L'histoire d'un routier，选自 *Littérature chinoise*（《中国文学》）1985年第1期，152～196页。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收获》1981年第6期，172～233页。
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收获》1982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第4册，香港，1983，159～175页。
赵振开：《波动》，《波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1～138页。
赵羽翔等：《山村新人·六场话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84页。
郑义：《凝结的微笑》，《花城》第3期，1979年11月，1～11页。
竹林：《生活的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82页。

报　刊

中文

《百姓》（香港）
《北斗》（香港）
《北京日报》（北京）
《北京晚报》（北京）
《当代》（北京）
《当代文艺思潮》（兰州）
《大众电影》（北京）
《动向》（香港）
《匪情月报》（台北）
《工人日报》（北京）
《观察家》（香港）
《广东青年》（广州）
《光明日报》（北京）
《海南纪实》（海口）
《黑龙江日报》（哈尔滨）
《红旗》（北京）
《黄河》（香港）
《解放日报》（上海）
《解放月报》（香港）
《经济地理》（长沙）
《经济研究》（北京）
《今天》（北京）
《九十年代》（香港）（为《七十年代》的继续）
《科学·民主·法制》（北京）
《连环画报》（北京）
《辽宁日报》（沈阳）
《美术》（北京）
《明报》（香港）
《明报月刊》（香港）
《民主与法制》（上海）
《民主之声》（上海）
《南北极》（香港）
《南方日报》（广州）
《青年研究》（北京）
《青年一代》（上海）
《青年作家》（成都）

《七十年代》（香港）
《人口研究》（北京）
《人口与经济》（北京）
《人民日报》（北京）
《社会》（上海）
《社会科学》（上海）
《诗刊》（北京）
《十月》（北京）
《收获》（上海）
《四五论坛》（北京）
《文汇报》（上海）
《文汇月刊》（上海）
《新观察》（北京）
《学习与批判》（上海）
《羊城晚报》（广州）
《争鸣》（香港）
《支农红旗》（广州）
《中报》（香港）
《中国妇女》（北京）
《中国妇女报》（北京）
《中国青年》（北京）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北京）
《中国之春》（纽约）
《中华月报》（香港）

西方语言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Chicago.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ew York.
Asia Survey, Berkeley.
Asiaweek, Hong Kong.
Aujourd'hui la Chine, Paris.
Aujourd'hui la Chine, Pék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anberra.
Beijing Information, Pékin (fait suite à *Pékin Informations*).
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Paris.
China News Analysis,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Londres.
China Youth Bulletin, Beiji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White Plains, USA.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White Plains, USA.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urrent Scene, Hong Kong.
Esprit, Par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FBIS :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ringfield, USA.
Hsinhua News Bulletin, Pragu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China Report, Springfield, USA.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Translations on Communist China, Springfield, USA.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Pékin.
Le Débat, Paris.
Le Monde, Paris.
Le Monde Dimanche, Paris (*supplément du Monde*).
Libération, Paris.
Littérature chinoise, Pék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Pékin Information, Pékin.
Perspectives Chinoises, Hong Kong.
Politique aujourd'hui, Paris.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Pari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Beij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lbany, N. Y., US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Hong Kong.
SWB: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 The Far East, Reading, England.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inceton, N. Y., USA.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Paris.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 Y., USA.